



Oral History
of the
DPP

透過十五位曾經參與黨外、建黨、執政的民進黨相關人物的親身口述，
重現近三十多年來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

從建黨 到執政

陳儀深—主訪

林志晟 / 彭孟濤 / 簡佳慧 / 嚴婉玲—紀錄

民進黨
相關人物
訪問
紀錄



許書寧

北港孩子，臺灣女兒，日本媳婦，天主教的基督徒。
先後畢業於輔仁大學大傳系廣告組及大阪綜合設計
專門學校繪本科。

作品曾獲關西美術文化展讀賣電視獎、STAEDTLER
舉辦筆繪 CD-R 設計比賽入選、青林文化「安徒生
童話插畫創作獎」入選、2005 及 2006 年度台灣兒
童文學精華集、第六屆貓頭鷹圖書館愛家手繪書比
賽貳獎等獎項。

主要的圖文作品有：《阿ㄇ一ㄚ、！》、《穿越書
本去旅行》、《耶路撒冷朝聖日記》、《亞西西的
小窮人》（以上為玉山社出版）、《古比歐的大野
狼》（上智文化）、《愛蓋章的國王》（小魯文化）、
《忽然覺得很幸福》（大是文化）等。插畫作品包
括《少年臺灣史》（玉山社）、《保母包萍系列》
（國語日報）等。主要翻譯作品為：《原子彈掉下
來的那一天》（上智文化）、《微笑帶來幸福》（太
雅出版）、《三浦綾子：《新約》告訴我的故事》、
《我知道如何去愛——明天開始要這樣的活》、《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什麼？》（以上為大是文化）。
當過空服員、主持過兒童廣播節目，也曾在大阪與
倫敦的 STARBUCKS 調製咖啡。喜歡一個人旅行與
嘗試新鮮的生活，造訪過二十幾個國家。
目前定居於大阪，從事文圖創作、設計與翻譯工作。



Oral History
of the
DPP

過十五位曾經參與黨外、建黨、執政的民進黨相關人物的親身口述，
親近三十多年來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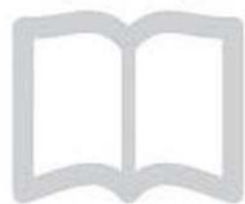
從建黨 到執政

陳儀深—主訪

林志晟 / 彭孟濤 / 簡佳慧 / 嚴婉玲—紀錄

民進黨
相關人物
訪問
記錄





此頁空白

【推薦序】

記取歷史，找回台灣精神

彭明敏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生長在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新一代公民，或許很難想像，成立一個新政黨竟是數個世代政治運動者的悲願。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暴發，一黨獨裁的國民黨執政當局展開全台大搜捕，投身島內選舉之黨外民主運動人士幾被一網打盡；孰料辯護律師順勢崛起，七年後，民主進步黨建黨成功；再過十四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贏得二〇〇〇年選舉，完成首次政黨輪替，出人意表的政治氛圍籠罩台灣。這段如夢似真的歷史過程距今不過十餘年，卻似乎被社會大眾所遺忘，如同當年所謂「黨外精神」仿若已為過往雲煙。

研究台灣社會現象的學者曾謂，「健忘」是純樸善良的台灣人另一集體特徵。面對曾經屠殺數以萬計社會菁英、無辜人民，以黨國暴力掠奪私人財產，以媒體司法掩護擁有千億資產的腐敗政黨，台灣人卻輕易原諒，用手中的選票賦予其合法的統治地位。威權復辟五年餘，台灣民主自由、經濟發展嚴重倒退，正義公平蕩然無存，政府公信破產，數十萬青年公民憤怒走上街頭以為自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雖謂老生常談，史學家亦曾嘲諷：「歷

史給人的教訓，是人們不曾記取歷史的教訓」。觀察今日台灣政治亂象，不只是健忘，更多民眾是在黨國教育與媒體壟斷洗腦下，對自己土地的歷史一無所知。

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教授多年來致力口述史教學及研究，從《九二一大地震》、《泰源監獄事件》、《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以及《濁水溪畔二二八》等訪談紀錄之出版，俱見其留存當代史料之用心。由彭明敏基金會贊助、台灣歷史學會執行的「民主進步黨建黨口述史」訪談計畫，克服人力、財力之限制，在玉山社魏總編輯大力協助下，終於出版發行。

美中不足者，由於此一重大事件相關當事人仍多活躍於政壇，對訪談紀錄容或有所顧忌，以致多位計畫訪談對象或直接拒訪、或訪談後不願刊登；也有因時間倉促無法配合而成為遺珠之憾，以致歷史事實之呈現略有欠缺。尤以幾位受訪者夸夸而談，因缺乏旁證，而有片面說辭之嫌。讀者可於閱覽此書過程中，體會計畫研究者忠實紀錄卻頗感無奈之處。

作為第一個在台灣執政的本土政黨，民主進步黨的建黨歷程、興衰起落值得國人多多認識，期盼陳教授以此本書為根基，繼續紀錄，豐富呈現。

2013年10月21日

【推薦序】

紀錄台灣民主的一大步

蔡錦堂

(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台灣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無庸置疑地，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是個重要的轉捩點，而1986年9月28日在圓山飯店創立的民主進步黨，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後所衍生出來台灣邁向民主化重要的一大步，它推倒了戰後中國國民黨於台灣所建立的一黨專政的骨牌，開啟了政黨政治的大門（雖然黨禁在1989年1月才解除）。

有關民主進步黨的相關書籍與學術論著已經不少，但是關於民進黨創黨時期實際參與者的口述歷史，則尚屬鳳毛麟角。有鑑於此，台灣歷史學會接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的委託，進行民主進步黨的建黨口述歷史計畫，並委由歷史學會會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儀深教授負責執行。

陳儀深教授是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的博士，專長為戰後台灣政治史，並精通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在口述歷史訪談方面，他執行並撰寫過「九二一震災」、「八八水災」等台灣近年發生的重大災害口述史；也進行了「蘇東啟政治案件」、「海外台獨相關人物」、「濁水溪畔二二八」、「美麗島事件」、「泰源監獄事件」等圍繞白色恐怖、

人權議題之台灣現代重要政治史相關人物與事件的口述歷史。陳教授的訪談經驗豐富、視角敏銳、文筆犀利、思考具邏輯性，委由他執行民進黨建黨口述歷史，堪稱不二人選。

陳教授首先從民進黨「創黨十八人小組」成員、國民黨與當時「黨外」的溝通者、銜命協調的四位台大學者、海外台灣人、甚至民進黨組黨時現場服務人員中，去選取訪談對象。除了已逝世者以及婉拒受訪者外，陳教授共有效訪問了十五位人士，包括了「創黨十八人小組」中的尤清、張俊雄、謝長廷、游錫堃、陳菊、許榮淑、洪奇昌，以及具有不同方面影響力的姚嘉文、朱高正、李鴻禧、林世煜、邱萬興、賴義雄、林濁水、田秋堃等。在官方檔案資料尚未公布之前，這些參與者的口述訪談資料，已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民進黨建黨當時相當清晰的、不可或缺的拼圖。

口述訪談紀錄稿之外，陳教授也撰寫了一篇長文作為「導論」。這篇導論寫出他選擇訪談人物思考點的同時，也針對民進黨成立的時代背景與經過作了精簡但清楚的敘說，並且也對現今正走在政治十字路口、陷入迷惘的民進黨說出期待，是篇值得推薦的精闢之作。

當然，僅以十五位人士的訪問稿內容，並無法涵蓋民進黨建黨時的整體範疇。企盼今後能再有更多當時參與民進黨建黨的人士接受訪談。

在感佩陳儀深教授於極短的期間內，盡心盡力完成訪談稿並予以付梓的同時，更對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的資助，深致謝意。

2013年11月8日

【導論】

轉捩點之發生

—論民主進步黨創黨成功的因素、創黨精神級其他—

陳儀深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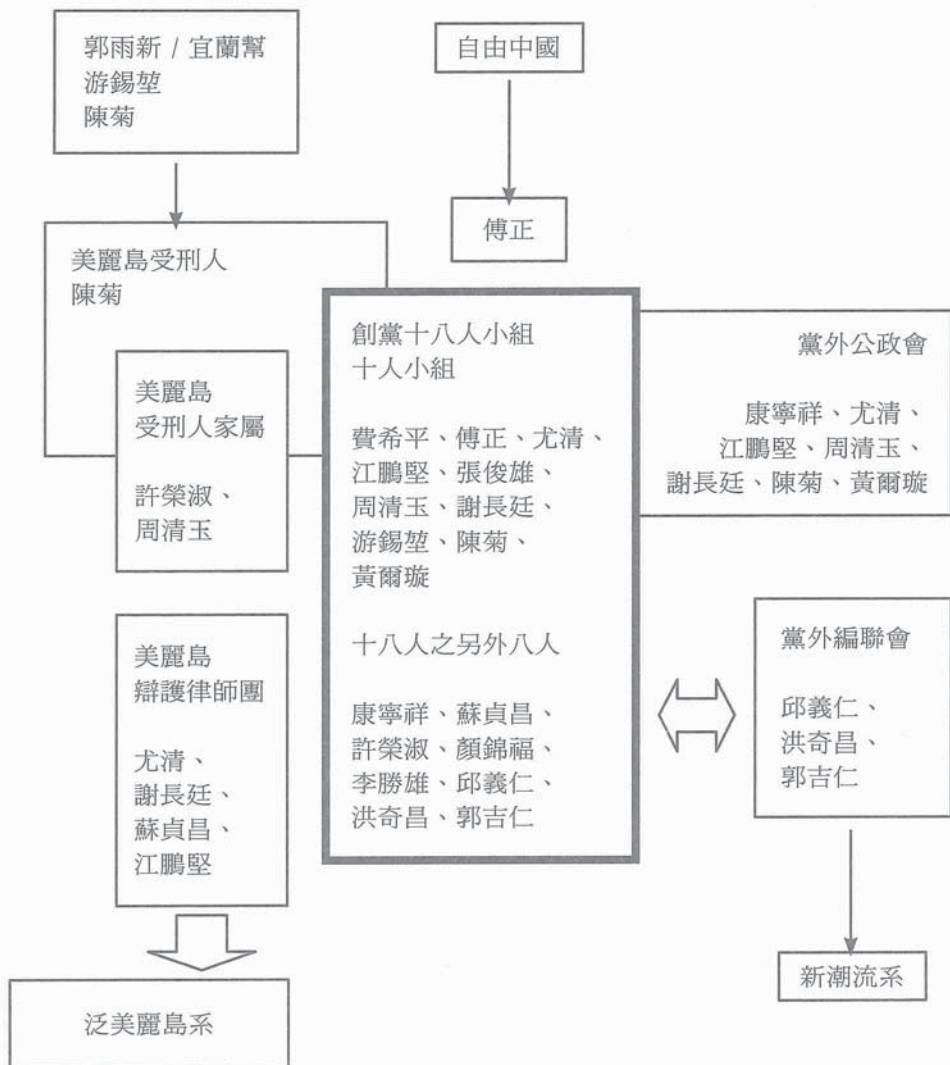
2013年9月，來自中國的學者范泓，在台北誠品信義店舉辦《民主的銅像——雷震傳》的新書發表會，現場與台灣學者對談的標題是「中國會出現下一個雷震嗎？」。筆者心裡立刻浮現的回應是：1. 雷震（1897 - 1979）是中國的嗎？雖然他來自中國，但發光發熱在台灣；2. 雷震的言論自由多少是來自胡適的庇蔭，但著手組織反對黨且與高玉樹、李萬居（1901 - 1966）等本省菁英合作，觸犯老蔣的禁忌才導致十年的牢獄之災，這件事有十足的「台灣性」；3. 范泓先生期待中國民主，期待中國早日出現有意義的反對黨，卻以1960年雷震等人這一次失敗的行動為典範，不免奇怪。不過，若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以艱難環境下仍能堅持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浪漫精神可以為未來開啟諸般可能性，那麼這場新書發表會的題目還是貼切的。

就像經濟學者談論經濟發展會認定一個起飛（take off）點一樣，政治學者會把「反對黨的成立」當作政治發展的起飛點，標誌著壟斷性體制進入競爭性體制。那麼，1986年在台北圓山飯店宣

布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突破長期戒嚴下的黨禁，導致1987年解嚴，當然是台灣政治史上「天大地大」的事件；尤其，十四年後民進黨竟能使中國國民黨交出政權，取得總統大位，這個政黨輪替驗證了台灣民主化的真實性。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作為一個歷史學、政治學的研究者，心中自有一些答案，但欲具體回答這個具有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的重大問題，因時間太近不可能有公開的官方檔案可用，於是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累積成為迫切之事。

筆者從2000年開始，已出版了八本口述歷史著作¹，其中除了震災、水災的口訪，都是環繞在二二八、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以及海外台獨相關人物，也就是攸關人權、政治發展的口述史。2013年因緣際會，感謝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出資、感謝台灣歷史學會接受執行，由我承擔這一項「民主進步黨建黨口述史」的訪問計畫。首先，如何決定受訪人選呢？1986年有所謂秘密十人小組、圓山宣布建黨以後陸續增加成為創黨十八人小組，是最基本的線索；為了明白建黨以後的轉型與變遷，儘量要訪到歷任黨主席；環境因素方面，要注意到國民黨當時負責與黨外溝通的梁肅戎（1940 - ）、蕭天讚（1920 - 2004）、關中（1941 - ）等人，銜命溝

1. 包括 1. 主訪「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10期（2000年12月），412頁。2. 主持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計畫，出版《九二一震災口述訪問紀錄》上、下二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2月），991頁。3. 主訪「泰源監獄事件專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11期（2002年8月），392頁。4. 主訪「美麗島事件專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第12期（2004年4月），442頁。5. 主訪《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史訪談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委託，2009年3月，332頁。6. 主訪《海外台獨相關人物口述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92（2009年4月），605頁。7. 主訪《八八水災口述史》，台灣教授協會企劃。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年1月，362頁。8. 主訪《海外台獨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92（2012年12月），587頁。



通的四位學者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以及在美國幫忙黨外壯大的台灣人等；其中扣除已經去世的傅正（1927 - 1991）、費希平（1916 - 2003）、江鵬堅（1940 - 2000）、黃信介（1928 - 1999），以及接觸之後明白表示不願受訪的關中、黃爾璇（1936-）、施明德（1941 - ）、林義雄，大概就是本次計畫所擬涵蓋的人選。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乃起因於「黨外政團」或「美麗島政團」採取群眾路線，在法律邊緣衝撞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所引起的，這個政團已經在實踐「沒有黨名的黨」，恰是國民黨當局所忌憚之事，這也是新政黨成立前的基礎或背景，所以1986年組黨的時候除了陳菊提早出獄、有趕上時機列名十人小組，其他人（包括林義雄雖已假釋出獄但出國進修）雖然沒能參與其事，並不表示這一群受刑人與組黨事件無關。

此外，口述歷史的理論著作也提醒我們，處在事情核心的當事人固然能夠回憶重要的情節，但「位居邊緣的人則比較能夠看出主要當事者彼此之間的差異性」；「最現成有用的受訪者反而是無名的次級人物，他精明地觀察整個過程，保持著清楚的記憶。」²所以在九二八宣布組黨當天，在現場負責拍照的邱萬興，在入口處收取費用的林秋滿³都應該是適當的受訪對象（可惜林秋滿這次也不願受訪）。

本書的十五位受訪者之中，有些人已經淡出、退出政壇，甚至如許榮淑已被民進黨開除而另立政黨，朱高正頻走北京，以今

2. 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第二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頁19、36。

3. 林秋滿是魏耀乾（1950-，曾任民進黨籍第一屆增額、第二屆立委）之妻，九二八當天黨外在圓山飯店開會的場地是魏耀乾以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的名義租借。

日眼光來看都可能不符合「政治正確」，但是如果平心閱讀他 / 她們的訪談紀錄，可以發現其當年的重要位置。這是我們研究歷史應有的態度，尚請讀者諒察。

作為一個口述史計畫，不免受到人力、物力、人際關係以及時間壓力等條件的限制，構成本書內容的十五位受訪者固然有足夠的代表性，但是像康寧祥（1938 -）、許信良（1941 -）、施明德以及陳水扁（1950 -）昔日的主要幕僚等未能納入，當然是缺憾，希望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完成另外的十五位做為續篇，來呈現「從建黨到執政」的大課題，就會更完備了。

二、犧牲換來民主

筆者出生於 50 年代的雲林鄉下，政治意識的啟蒙是到了台北讀大學時期，聽康寧祥的群眾演講才開始的。本書受訪者許榮淑所描述 1972 年選前之夜老康的雨中演講場景，恰是我大學時代的記憶，只是我親耳聽到的應該是 1975 年的演講場，當時廁身於成千上萬的群眾中，讓我首度感受到，我的母語竟然可以做這樣深入且動人的表達。筆者的成長過程無緣看到或聽到故鄉雲林蘇東啟、李萬居的選舉活動，但是從田朝明醫師夫婦為主角的紀錄片《牽阮的手》可知，經常去幫李萬居注射糖尿病藥物的田醫師，曾看到省議員李萬居家裡備有牙刷毛巾等私人用品的包袱，準備隨時被抓去坐牢；在那恐怖的氛圍中，田醫師常怨怪自己努力不夠才沒有被抓去坐牢，他曾經在一場群眾集會中高聲說：「為台灣獨立而死，是詩中之詩、美中之美。」本次訪問對象包括田家

後代田秋堇立委以及郭雨新的助理出身的陳菊市長，可以部分呈現這種承先啟後，以及戒嚴時期台灣反對運動的悲情。

美麗島事件雖然沒有人被判死刑，但是隨後留美博士陳文成返鄉慘死於台大校園，死因離不開他在美國為美麗島雜誌募款、從而寄美金支票回台給施明德卻被警總攔截有關；1980年2月28日美麗島受刑人林義雄家裡發生的祖孫命案，也簡直是為美麗島事件而死。學者吳乃德指出：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之後，「政治犯成為台灣社會的英雄，其家屬受到高度的同情和熱烈的支持。民眾對反對者同時給予的社會支持和政治的支持，應該是讓統治者 / 統治團體認識到其所謂的『時代在變』的重要因素之一。」⁴

本書受訪者之中，除了姚嘉文、陳菊本身是美麗島事件被軍法審判的八位受刑人之一，田秋堇是林宅血案的第一目擊者，受訪時有詳細而怵目驚心的描述；許榮淑是張俊宏（1938-）之妻，說到1979年12月13日清晨當局展開逮捕，二十幾位軍方及情治人員衝進她家裡高聲吆喝，四歲么女睡在夫妻兩人中間的驚嚇情狀。事後，政治受難者的家屬周清玉、方素敏、許榮淑都高票當選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實現了世間所謂的平反。

三、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社會科學對於後進國家民主化的研究，有所謂結構論、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社會多元→政治民主，它顯然忽略「人」

4. 吳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台灣政治學刊》第4期（2000年12月），頁93。

的因素；也有所謂過程論，探討統治者與反對菁英之間的互動，其中統治集團內部通常有開明 / 保守、反對菁英之間也有激進 / 溫和的分野，透過這四派的互動可以解釋民主化的成敗。筆者認為過程論比較適合說明台灣的故事。

國民黨政權在 70 年代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次之後，透過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以及經濟發展來補充統治的正當性，而開放選舉乃帶來「民主假期」，若林正丈教授說：「要求政治參與的台灣人中產階級『政治企業家』，與都市勞工在選舉時產生的『街頭同盟』（街頭演說的多數聽眾及投票者），是 70 年代以後黨外勢力的主要構成者。⁵」；若林教授同時指出，70 年代中華民國的外部危機紛至沓來，1972 年出任行政院長也就是公然接班的蔣經國（1910 - 1988），「面對危機並以政策將這些危機吸收」，所謂政策包括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名額的增加以及行政革新、啟用台籍青年等等，這大致是延續到 80 年代民進黨成立以前，黨外政團 vs. 國民黨政權的基本態勢。

關於國民黨政權為何在 1979 年對美麗島政團採取鎮壓、在 1986 年卻對圓山組黨事件容忍，學界曾經從美國的壓力以及蔣經國的抉擇做解釋⁶，不過這個問題可能源於「蔣經國是開明派或是保守派？」而來的問法，若就組黨行動的成敗而言，不如將 1960 年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失敗與 1986 年民主進步黨的成功做比較。如前所述，除了喪失聯合國席位、與美國斷交等外部的

5.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頁 186。

6. 參見吳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頁 80-81。

挫敗使國民黨政府必須從內部改革獲取正當性以外，來自黨外政團的策略、行動在過去似乎沒有受到重視與討論。事實上，雷震當時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主要憑藉來自理念（《自由中國》半月刊），雖然也有李萬居高玉樹等等民選菁英的支持，但尚未集結、力量不夠，而1986年黨外政團背後已有百萬以上的選票基礎，根據本書的訪談紀錄可知，參與圓山會議的黨外人士包括被黨外後援會推薦的二十位立委及二十二位國代候選人，通通是新黨的發起人；而擔任「1986黨外選舉全國後援會」召集人的游錫堃說，「嚴守秘密」是圓山組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其次，黨外已逐漸凝聚「選前組黨」才是最好時機的共識，包括他自己在9月20日出刊的《噶瑪蘭周刊》專訪中說：「黨外很多人說要組黨已經說很久了，再等三年，對民眾實在無法交待。……今年是組黨最好時機。」

關於「嚴守秘密」，本書受訪者邱萬興說：「秘密組黨十人小組周清玉、謝長廷要選國代與立委，要我幫忙設計文宣，他們都叫我跟在身邊幫忙攝影紀錄，所以像我們這麼接近他們的人也不知道秘密組黨的事，我是一直到九二八當天，民主進步黨宣布組黨時才知道的。」連跟在身邊的人都不知道，真是夠秘密了。之所以要秘密進行，當然是為了避免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取締。

不過，秘密與否屬於技術層面，基本上組黨所需要的準備是否充分，應更重要。尤清受訪時斬釘截鐵地說，「組黨的準備很充分」，他舉出從德國留學回台以後發表的三篇文章，一是〈論抵抗權〉（1979發表）、二是〈立憲、違憲、護憲—德國憲政回顧〉（1983年10月博觀叢書）、三是〈談制定新黨綱領〉（1986年7月發表於美國加州「台灣人公共政策研討會」），尤其第三篇是根

據德國政黨的經驗，「實際組黨時，有公政會的基本綱領，行動綱領採納編聯會，這個政黨綱領的製作，都是符合歐洲民主政黨黨綱的製作模式。」甚至，1982年9月22日他就曾經找三個黨外雜誌的代表人來家裡專門討論組黨，包括深耕雜誌（林世煜、吳乃德、邱義仁）、八十年代（吳煜輝）、博觀雜誌（尤宏、林濁水），該次會議結論整理成八大項，刊登於1982年10月1日的博觀雜誌第二期⁷。

內政部長林洋港（1927 - 2013）於1982年9月24日在立法院與國民黨籍立委唱雙簧，針對尤清住宅那一場「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座談會，說政府會依法制止組黨，理由是：1. 目前我國與中共隔海對峙，「國家處境特殊」；2. 容許新黨成立勢必造成政黨林立、造成擾攘不安。尤清立即在博觀雜誌以社論加以反駁，包括「戰爭不是組黨的障礙」、「我國目前政治安定適宜組織新政黨」、「政黨林立不足為憂」以外，尤清強調「組織新黨，沒有法律障礙」：

依據國父遺教及憲法可以組黨！國父遺教及憲法都肯定政黨政治及組黨自由。在憲法解釋方法學中有「憲法相符合的解釋」。在法律無明文規定或有多種解釋滋生疑義時，應以憲法之原則或精神作為解釋依據。……也許有人說，戒嚴法第十一條是「黨禁」的依據。這顯然是存心曲解條文。因為這個條文明明規定，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得停止或解散與軍事有妨害的集會結社。憲政的政黨與軍事無關，何妨害之有？……在民主國家中組織政黨不需要得到許可，指示成立後，政黨的組

7. 〈黨外雜誌編輯座談〉紀錄，收入尤清，《新黨救台灣》（台北縣：曹子勤，1987年），頁54-60。

織及其活動違反憲法，才由憲法法院判決為違憲並加以解散。政黨的成立或解散，由行政官署進行行政自由裁量，在民主憲政國家，聞所未聞！⁸

尤清的結論是「組不組黨，只應看人民態度」。留學德國回來的法學博士，這樣論理清晰、滔滔雄辯，且呈現在台灣的公共領域，對人民而言是很好的政治教育，也給台灣社會一種組黨之前的「心理準備」。

若只是理論、論理的心理準備也是不夠，反對國民黨的力量必須集結。謝長廷認為，黨外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建黨，事實上扮演政黨功能的若干組織已漸漸浮現，包括負責提名的「黨外後援會」、負責研究政策的是「公政會」、宣傳理念的就是「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編聯會）」，謝長廷把這樣的組織稱作「黨外黨」，還寫了一本《黨外黨》的書來闡述這種柔性政黨的觀念。不過前述尤清家裡三個雜誌社的代表們的座談會，大部分人認為不能停留在柔性政黨的階段，必須成立具有政黨綱領以及黨紀約束力的剛性政黨。

根據傅正日記，他的「組黨行事曆」從1985年9月6日起至1986年9月28日止，共分四個階段⁹：第一階段秘密組黨積極串聯、第二階段秘密組黨十人小組、第三階段秘密組黨擴大會議、第四階段秘密組黨突破黨禁。他說1985年夏天，費希平去美國洛杉磯、華盛頓、紐約，參加台灣人團體所主辦的組黨促進會，回台之後

8. 〈憑什麼制止組黨—對行政院所謂「依法制止組黨」的嚴正聲明〉，同上註，頁63-68。

9. 詳見〈傅正札記—民進黨會議（一）〉，《雷震、傅正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館藏號：052-01-10-001。

就和幾位黨外朋友積極磋商組黨的事，9月6日在謝坤銓家、9月19日在周清玉家、12月5日在傅正家、12月19日在費希平家、12月31日在尤清家，1986年1月4日在康寧祥家、接下來有三次在謝長廷服務處——1月14日、1月21日、2月4日——由於只剩下費希平、尤清、黃爾璇、謝長廷、傅正等五個人比較積極，其他人似乎意願不高，就暫停進行。

第二階段從1986年7月3日至9月12日，在周清玉家共開了八次會議，7月3日傍晚先在御龍園餐廳用餐，然後去周清玉家談組黨事，當晚確定十人小組名單（因康寧祥於21時30分左右先走未被列入）：費希平、傅正、尤清、江鵬堅、張俊雄、周清玉、謝長廷、游錫堃、陳菊、黃爾璇，這個小組直到9月28日宣布建黨未再增減，即所謂秘密組黨十人小組的由來；比較特別的是，當晚討論各種黨名，多數已傾向接受謝長廷提議的「民主進步黨」。第三階段的擴大會議，分別於9月19日、23日、27日召開，廣泛徵求組黨發起人，過程中已經在整合黨外公政會和黨外編聯會的不同版本黨綱、黨章，不過27日也就是組黨前夕的最後一次會議，雖然說好在第二天的黨外後援會推薦大會上由尤清提案並說明，要求變更議程討論組黨事宜，但是否即為發起人大會，仍有爭議。

最後，第四階段即9月28日，上午9時30分尤清先說明提案，主席游錫堃徵詢大會意見，一致鼓掌通過發起組織新黨，並決議於下午2時45分召開發起人大會、由費希平主持，上午的議程主要還是後援會推薦候選人。下午的會議即發起人大會由費希平主持、游錫堃擔任司儀，討論黨名時還是有台灣民主黨、中國

民主黨等爭議，費希平曾建議是否先組籌備委員會，但多人主張今天就正式成立新政黨。下午5時有所謂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民主進步黨」的黨名，並推舉組黨工作委員會成員，下午6時6分會議主席費希平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

以上根據傅正日記的敘事，時間地點人物應比較正確可靠，但情節高潮可能有賴口述史才能補強。邱萬興、尤清都說9月28日當天朱高正有發揮「臨門一腳」的功能，到底是怎樣的一腳呢？朱高正自己這樣描述：

如果我當天沒有出席這場後援會，或許歷史發展的軌跡就會有所不同了。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由於這場後援會於上午時的會議主題在於討論年底各項公職的提名人選及相關辦法，經過一陣子密集的商討後，人選方面終於大致抵定，於是大家就開始用餐，並於下午一點半繼續開會。起初預定下午的目標只是準備成立「組黨籌備委員會」，就籌備事宜逐一進行討論。

眼見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已經到了兩點十餘分，我就主動向主席舉手要求發言。在獲得許可後，我起立發言道：「組黨必須依靠決心與行動，如果只是坐而言，是無法達成目標的。大家不要忘記當年雷震於中國民主黨籌組階段時，就被國民黨『雞仔烏仔抓到沒剩半隻』。組黨需要有決心以及勇氣，我建議即刻宣布新政黨的成立，並以今天上午接受後援會提名的參加年底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四十一位候選人為共同發起人。如果在選舉前夕任何一位因參與組織新黨而被國民黨逮捕，其餘四十位候選人將共同宣布一起退出此次選舉，讓此

事因為黨外組黨而有人被捕，以致集體杯葛選舉，成為國際媒體矚目的政治新聞，看看蔣經國敢不敢賭這一把？」語畢，現場掌聲如雷，民主進步黨就此正式成立。

9月28日下午到底是1時30分或是2時45分繼續開會？這類的記憶恐有出入，但發言的意旨應該大致可靠。比較特別的是，朱高正還講了下面這一段話：

日後，有一次宋心濂（1922 - 1995）跟我說：「朱委員，今天台灣能夠走向政黨政治，您居功厥偉！但是我也有一份功勞。」我心想此話怎說？於是他又繼續說道：「因為民進黨組黨當天是國定假日，我們蒐集到的情報顯示後援會只是要成立『組黨籌備委員會』，卻沒想到您天外飛來一筆的提議，打亂了我們的整體佈局。其實，我們當時都有派人進行竊聽，特別是您講的話我前後聽了五、六次之多，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後來七海官邸打電話來，要我即刻向總統報告圓山大飯店內的狀況，我一開始的建議是『依法處理』，也就是準備動手逮捕相關人員，但後來覺得此舉不妥，於是又加了一個『暫緩處理』的方案，兩案併陳，請總統裁決。」

如果朱高正轉述宋心濂的話確實，那麼黨外陣營利用選前的時機組黨、並且以集體退出選舉的說法相脅，果真打到國民黨的要害，讓蔣經國決定「暫緩處理」了。1986年10月7日，也就是「圓山組黨」事件之後第九天，蔣經國接受《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女士（Katherine Graham）等外國記者訪問時，意外宣布：政府「準備很快」提議解除戒嚴，對於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蔣雖然說

它「缺乏國家觀念，政綱中沒有提到反共國策」，但國民黨目前正積極研究准許成立新黨的問題¹⁰；10月15日，蔣主席又在中常會上提示，國民黨「必須採納新主意、新做法，以符合變動不居的情勢之需求」，中常會乃通過制訂新的國家安全法以取代戒嚴法、修訂民間團體法和選罷法以允許組成新政黨的議案。據此，後來為蔣經國撰寫傳記的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就凸顯了蔣經國的開明角色，說他和（黨秘書長）馬樹禮花了一年的功夫與黨內的反動（保守）派溝通，「只有經國先生能夠走過險灘暗礁，能夠說服國民黨及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自動放棄獨裁權力；王昇（1917-2006）事件和劉宜良命案凸顯出蔣經國大去之後，反動派依然有可能奪得權柄。」¹¹當然，這樣的觀察除了有「遠看成嶺側成峰」的問題，陶涵撰寫過程中訪談的對象幾乎都是黨國要員（如錢復、李煥、馬樹禮、馬英九等等），自有其限制。

四、國民黨因素（所謂「溝通」及其他）

如果把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說成國民黨早有規劃、或蔣經國口袋中自有一張時間表，固然不值一笑，但若完全忽略國民黨方面的因素，以為黨外政團的犧牲奮鬥造就一切，也不免偏頗。就像1958年八二三砲戰的收場，主因在於美中戰略互動以及毛蔣默契之類的政治因素¹²，不是美國支援那兩門巨砲，轟毀了廈門火車

10. 1986年10月9日，《中央日報》第二版。

11. Jay Taylor 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頁447-456。

12. 參見沈志華、唐啟華主編，《金門：內戰與冷戰——美、蘇、中檔案解密與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頁104-157。

站¹³ 這種軍事因素奏功。

1984年年底內政部長說要取締黨外公政會，陶百川（1903 - 2002）從美國致函勸告政府不可輕率處理，並請吳豐山、顏文門兩位先生轉告胡佛、楊國樞（1932 - ）、李鴻禧三位教授，努力溝通，但無所成；1986年4月下旬報載如果黨外公政會要成立分會，政府就要連公政會總會在內加以取締，陶百川說：「面對這種雙方衝突極可能升高的情勢，他們（三位教授）深感憂慮，於是想請執政黨和公政會各派代表，面談解決辦法，以期緩和情勢，但恐雙方不能接受他們的邀請……因而和我商量，要我共同出面邀請雙方餐敘面談。」所以陶百川說他出面主持溝通「最大的動機是為胡佛、楊國樞、李鴻禧三位台大教授熱心國是所感動。」¹⁴

根據梁肅戎的說法，1986年4月29日蔣經國召見國策顧問陶百川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第一次黨內外溝通也就是5月10日包括國民黨、黨外與學者，在來來飯店湘園廳舉行「三邊會談」，其緣由如下：

國民黨何以會在此時與黨外進行三十多年來前所未有，規模、層次都較以往為大、為高的溝通？主要是由於蔣總統經國先生於5月7日國民黨例行的中央常會中指示中央政策會，應本誠心誠意的態度，與社會各方面人士溝通意見，隨後，國民黨中央指派政策會三位副祕書長——我、蕭天讚、黃光平擔任

13. 筆者曾經訪問一位當時在金門服役的台籍充員兵葉寬先生，他就是認為巨砲轟了廈門之後，對方受創慘重才改成「單打雙不打」。陳儀深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至十期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2005年12月）。

14. 張叔明訪問紀錄，「互讓互重建立共識共信——訪陶百川先生談對黨內外溝通的期望」，收入陶百川，《政治玉連環》（台北：杯水車薪基金，1986年9月），頁32-33。

和黨外溝通的工作。¹⁵

梁肅戎說5月10日那天經過五個小時的溝通，達成三點結論：（一）參加人士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實施都具有共識，至於如何積極推動民主憲政，仍有待繼續磋商。（二）參加人士對於公政會與分會的成立咸表同意，至於「登記」及「名稱」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磋商。（三）參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間共同為政治的和諧而努力。第二次溝通則經過一些波折，才在5月24日下午6點15分開始進行，國民黨代表仍然強調同意讓公政會組織化但應行「登記」並將「黨外」二字取消，黨外代表不能同意，可謂毫無進展。原定6月7日舉行的第三次溝通，「由於黨外人士以種種理由延期舉行，並相繼成立分會，事實上已難以做公開、集體性溝通。」雙方溝通雖無疾而終，但梁肅戎認為有兩點值得稱述的意義，一是黨外首次以集體運作、集體參與的方式進行溝通，二是朝野雙方首次以公開方式進行溝通，首度以對國是問題「達成協議」的方式提高了溝通的層次¹⁶。

本次受訪人士對於黨外參與溝通的回憶不一，尤清說早在1986年2月下旬，他的監委同事黃光平即告知，蔣經國要他和蕭天讚來與尤清談黨外公政會的事，尤清說要談就找秘書長謝長廷一起來談，「後來在來來『桃山』吃飯不歡而散，各付各的帳。」梁肅戎說的不論是規模、時間、地點（來來湘園廳）都與尤清說的不一樣，應該不是同一件事；而謝長廷說「當時和黨外溝通的管道也很多，國民黨是以黨領政，所以直接與國民黨的公開溝通，

15. 劉鳳翰、何智霖訪問，何智霖紀錄整理，《梁肅戎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1995年），頁197。

16. 《梁肅戎先生訪談錄》，頁199-204。

是把朝野溝通提升到最高層次，國民黨方面是由梁肅戎負責，……黨外這邊的負責人是費希平。……他也是萬年國會立委的其中一員，他跟梁肅戎都住在內湖的宿舍，所以由他們兩位負責溝通是比較適合的。」謝長廷受訪時還說到一個重點，黨外的立場是：公政會不能登記，「登記就完蛋了，那就變成社團（而不是政黨）了！」

如果把「溝通」當作國民黨重視黨外、願與黨外和平共存的轉折點，那麼蔣經國確實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本書受訪者之一的李鴻禧教授就說：「既然張忠棟不願意加入，所以後來蔣經國就找了我、胡佛、楊國樞等三位教授，共同參與國民黨與黨外的溝通工作。」1985年某日陶百川曾經告訴李鴻禧：「我已經向經國先生推薦你來溝通，經國先生說很好……」以致李鴻禧有這個評語：「蔣經國晚年作風和往昔不太一樣。」

按照梁肅戎的說法黨內外正式溝通只有5月10日、24日兩次，都在圓山宣布組黨以前，實則9月28日宣布組黨以後，雖然有10月7日《華盛頓郵報》透露的正面訊息，但是隨後仍有危疑不安的氣氛，即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修訂「人團法」容納政治團體，所謂政治團體是否包括政黨？國民黨又說在未修訂前，舊法仍然有效，新政黨如開黨員代表大會，將予取締。根據黃爾璇教授的日記，他當時認為國民黨「顯然又採取嚇阻策略。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一方面宣告將解除黨禁，以此贏得民心，然後抓人。如果DPP軟化，明年必被壓下去，變成政治團體，而非『政黨』，在位階上低於國民黨，這樣無異被逼回去過去公政會須登記的情形。」於是1986年10月19日中午與中介人士楊國樞、胡佛約在假期飯店

商談，胡、楊說蔣主席所言之政治團體當然包括政黨，黃爾璇日記則說：「現在右派的人想逼退 DPP 為『政治團體』。陶公已呈請蔣主席，乾脆宣布解除黨禁，承認新黨的成立，以免右派製造事端；但結果如何，尚未可知。中介人士希望 DPP 接受三條件，一切當無問題。說來說去，中介人士希望我們接受三條件；大會規模小一些，事先通知他們，不遊行、不群眾大會。」¹⁷ 所謂三條件就是（一）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二）支持反共國策，（三）與台獨畫清界線。民進黨除了以發表聲明回應三條件，11月10日在環亞召開的第一次全大會大致符合中介人士所希望的方式。

可見，所謂中介人士的溝通還頗為細膩複雜，不能只看梁肅戎所說的那兩次公開的溝通。

五、從黨外到民進黨的路線問題

前文述及社會科學解釋民主化的過程，有所謂「四派互動」，即統治集團內部通常有開明 / 保守、反對菁英之間也有激進 / 溫和的分野，透過這四派的互動可以解釋民主化的成敗。當梁肅戎描述國民黨如何決定、如何進行與黨外溝通的時候，也說到黨內右派對他的攻擊：「國民黨內部分人士把溝通聯想成『國共和談』的痛苦經驗，黨外則把溝通當作投降的代名詞。溝通，反而成為朝野雙方互相分化及自我分化的催化劑。」¹⁸ 實則，就組黨這個目標而言，黨外陣營不論是公政會或編聯會還相當一致，黨外陣營

17. 黃爾璇日記，〈1986-10-19 政策組第六次會，與胡、楊會談〉。<http://tw.myblog.yahoo.com/jw!BvLQmvOcFOQiAsEYrDg-/archive?l=f&id=24>。

18. 《梁肅戎先生訪談錄》，頁 197。

在80年代的爭議主要是路線問題，包括妥協或杯葛、「公職掛帥」、群眾路線或議會路線等，建黨以後則是台獨主張文字化的問題。

1970年代中後期的「黨外運動」逐漸茁壯，醞釀出政團的架式，與前此單打獨鬥對抗國民黨的「無黨籍」政治人物有別。黨外運動與黨外雜誌緊密相連，其中1975年8月至12月的《台灣政論》，由黃信介當發行人、康寧祥當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雖然只出了五期，但可說是戰後第一份具體呈現本土色彩的政論雜誌，具有奠基性的意義。1979年至1986年之間黨外雜誌繁多，如同雨後春筍，有研究者挑出康寧祥主持的《八十年代》系列（1979年6月至1984年1月是月刊、1984年4月至12月以及1986年9月至10月是半月刊、1985年1月至1986年5月是週刊）作為溫和派的代表，《美麗島》（1979年8月至11月，月刊）、《蓬萊島》系列（1983年1月至10月是月刊、1984年6月至1986年6月是週刊）作為激進派的代表¹⁹；所謂溫和派是指理性問政、主張議會路線，內容比較豐富多元，激進派是指主張群眾路線、反體制，內容除了政經議題還偏重報導黨外消息，以及揭發國民黨內幕、蔣家野史等。

始終在《八十年代》系列主持筆政的司馬文武，一開始即與康寧祥說好不介入他的政治活動，要純粹從言論、思想的角度做好他的黨外角色，他認為真理、真相可以使人得到自由，黨外雜誌也應該注意真實、客觀和查證義務，所以他是以自由主義為立

19. 蕭淑玲，〈台灣黨外雜誌對黨外運動的作用（1979-1986）——以《八十年代》系列、《美麗島》《蓬萊島》系列兩大路線為例〉。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

場、以「做第一流的記者」為生命價值之所在²⁰。但是其他的黨外雜誌編輯頗有人不以為然，曾經有人這樣批評：

司馬文武似乎有點錯把黨外雜誌當作學術刊物或中立刊物，所以才會有這種要求，實際上，現階段黨外雜誌的目標決不是在辦一份純新聞的刊物，而是必須以黨外的立場去分析事物、剖析國民黨，爭取民眾的支持，成為一份真正的黨外雜誌，……其次，求證的問題也頗大，台灣的政治參與還相當封閉，尤其核心的權力只是少數人在操縱，一般人根本無法知道，……試問蔣經國、俞國華會接受黨外雜誌的專訪或查證嗎？²¹

如果只是言論風格的差異事小，但如果炮口向內、針對路線問題持續批鬥某個人或某群人，就可能產生複雜的影響。

1982年《深耕》批評康寧祥，就是一種持續的批鬥。先是針對1982年5月黨外立委的議事杯葛半途而廢展開批判，繼而對康寧祥等四位公職出訪美國的過程批判（對名單的決定以及其與國民黨政府禮貌互動的態度不滿），進一步還在第16、17、18期密集討論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總之他們主張改革體制而不是體制內改革、反對與國民黨妥協，批康的風潮迅速蔓延至其他黨外雜誌。一般認為，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之際，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正式推薦的九人之中所謂康系人馬（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都落選，與這一波批康風潮有相當程度的關聯²²。

20. 筆者此次口訪計畫本已訪問司馬文武，有兩萬字以上的訪問紀錄，可惜他尚不願公開刊登。

21. 匿名〈一黨外雜誌編輯〉，〈給司馬文武的兩點意見〉，《蓬萊島》叢刊9（1984年8月7日），頁19。

22. 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5期（2008年3月），頁198-199。

《深耕》於1981年6月創刊，原係黃石城所辦，前五期銷量不佳，第6期開始由許榮淑接手稱為「復刊號」，開創了招收訂戶的做法、有比較穩定的經濟來源，訂戶加上零售的銷量曾達兩萬本以上。許榮淑放手讓林正杰（1952 - ）、林世煜、林濁水、邱義仁、吳乃仁（1947 - ）等年輕人去發揮。許榮淑在受訪時說：靈魂人物邱義仁，剛從美國回來不久，許信良再三向她推薦要重用他，所以儘管雜誌缺額已滿，她也請他擔任司機兼助理。邱義仁常陪許榮淑下鄉做選民服務、且詳細紀錄並撰成文章發表於《深耕》，許稱讚他「擅長將各項資源串連在一起」。但林正杰漸感理念不同，遂離開《深耕》出去另辦《前進》週刊，於1983年3月14日開始發行。1983年9月林正杰發動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深耕》方面在林世煜和邱義仁的動員之下，出席人數比林正杰的《前進》方面還多，選出第一任會長林濁水。不過編聯會只是回應黨外公職人員「後援會」組織化的方式，仍是大雜燴，邱義仁乃進一步從《深耕》帶走一批「同質性很高的人」，去組成《新潮流》，這時的性質已經是組織第一、雜誌第二了。當時就決定淡出政治的林世煜，最近受訪時有言簡意賅的評述：「我的瞭解就是喇叭（邱義仁）發動對公職的路線鬥爭」、「進新潮流跟入教一樣」、「有新潮流後，編聯會就不重要了。」

組成編聯會的黨外新生代以專業黨工自居，雖然對公政會多所不滿，但彼此想要組成新黨的目標是一樣的，1986年編聯會與公政會雙方內部都有組黨小組，也都做了政綱草案，幸好在11月10日第一次全代會之前及時整合完成。11月10日那天，一全大會在台北市環亞文化中心召開，通過黨章黨綱和仲裁辦法，接著

選出 31 位中執委；評議委員在第二會場「甲天下」進行選舉；中常委則於晚上 10 點 30 分至 11 點在元穠茶藝館選舉，同一個晚上在金華女中有一場人山人海的——由民進黨舉辦的群眾大會，據黃爾璇的日記所載，晚會進行中特別停下來由 18 位工作委員會成員手扶募款箱走入人群，民眾紛紛投下一百、五百、一千的鈔票，計有八十多萬元，對呱呱落地的政黨而言可謂雪中送炭。

至於在元穠進行的中常委選舉，黃爾璇說他到達時感受到神祕、詭詐、合縱連橫的氣息，「中常委唱票時，派系山頭配票堅實不可破，每一張都可以猜得出其山頭所屬。」「今後新黨將由兩個主要派系控制一段時間，不是康系便是編聯會派，將來任何人如欲在 DPP 佔有一席，則須投靠任何一大派系，否則無可能。」政治學者黃爾璇的參與觀察，雖不中亦不遠矣。

六、結語

2012 年 4 月 7 日高雄市長陳菊來台北出席追思《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時，接受記者訪問，謂民進黨主席改選在即，面對多人有意出馬角逐，她表示歡迎且感謝，希望他們都「不忘初心」²³。至於甚麼是創黨初衷？報導中並無進一步的說明。同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中央在圓山飯店舉辦創黨二十六週年黨慶茶會，主席蘇貞昌（1947 - ）致詞時說，民進黨「絕對堅守創黨初衷，努力奮鬥，讓綠色的旗升上天……」，他接著闡述：

23. 「多人爭黨魁 陳菊籲不忘初心」，中國評論新聞（2012-04-07），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二十六年前的今天，在這個地方，……民進黨成立了，人少、但理想高；沒黨產、但有熱情，不怕戒嚴令的會殺、會抓、會關，不管國民黨的獨霸、高壓，不顧自己是生是死的前途、命運，踏出勇敢的一步，合力推開了時代的大門，為台灣衝撞出一片天，讓台灣成為台灣人的台灣。……從街頭到國會，從在野到執政，民進黨爭民主、顧主權、護弱勢，建設台灣，民進黨的表現，比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強太多了！²⁴

以上蘇貞昌歸納的創黨精神大致是：勇敢、不怕犧牲，爭民主、顧主權、護弱勢。關於追求台灣的民主、主權，以及關心弱勢，從民進黨建黨時公布的——編聯會和公政會整合出來的——黨綱可以看得更為清楚。不過，這只是四平八穩的描述方法，若要針對性地問：民進黨是不是一個台獨黨？民進黨建黨時對於統獨的立場是甚麼？就不大容易回答了。

從費希平、林正杰、朱高正的思想言論，以及他們從黨外到民進黨過程中的重要角色，就可以發現 1986 年民進黨建黨之際，大致只有愛好自由民主的共同基礎，其他方面而言不免是「反國民黨的大雜燴」，不但雞兔同籠而且統獨一爐。不過，費希平畢竟在 1988 年 12 月退出民進黨、林正杰和朱高正也在 1990 年相繼退出，而且 1991 年 10 月 13 日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修訂黨綱中的一個條文，謂民進黨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附帶的程序是「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

24. 「民進黨 26 歲 蘇：堅守創黨初衷 讓綠旗升上天」，自由時報（2012-09-29），第一版。

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決定。」它一方面把台獨主張明白寫入黨綱，一方面附加住民自決的民主程序，其實就是黨外時期從強調民主制衡，進一步到「民主、自決、救台灣」，也就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個人認為這樣的描述比較符合民進黨的創黨精神。換句話說，追索創黨精神似不必要侷限在 1986 年 9 月那個時點發生的事，有研究者認為 1991 年終於把台獨寫入黨綱，顯示 1986 至 1991 年乃是民進黨「台獨論述正式制度化為集體目標的強化期」；只不過 1991 年年底民進黨遭逢二屆國代選舉失利，其台獨論述乃退回「現狀描述」的務實（或模糊）期²⁵。

要之，政黨形象和路線的形成必然受到環境的制約，在 1986 年以前固然反對勢力把主要訴求放在自由、民主、人權等執政當局難以拒絕的議題，卻不見得不關心統獨議題；90 年代的環境，則是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本土化、中華民國台灣化，一再在重要的選舉中以強勢的選票成績顯示其對政局的主導性，從而也影響了施明德與許信良兩位黨主席任內促使民進黨「轉型」為體制內的選舉黨²⁶。他們雖然沒有改廢台獨黨綱，卻以其他的表述方式使台獨黨綱成為「歷史文件」。90 年代民進黨在歷屆地方首長以及中央民代的選舉中成績不惡，過程中為了回應社會的需求，黨中央標榜清廉勤政，結合相關學者專家規劃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國防安全等等政策，都是必要的學習，也有重要的成果。公元 2000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國民黨分裂的情況下能以 39.30% 的選票當選總統，就此而言不能說全是僥倖和意外。

25. 葉欣怡，〈台獨論述與民進黨轉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7 月。頁 153-222。

26. 詳見郭正亮，《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8 年）。

問題是，一個負責任的台灣政黨，對於暫時擱置的「國家建立」課題不應該坐等時間的消逝期盼上天自然解決，尤其台灣與中國的經貿文化交流密切至此，中國對台政策從昔日的以商圍政、以民逼官，進展到現在的服貿協定，種種方法正是結合台灣的民主制度而發揮效用；與中共片面和解之後的中國國民黨，也很懂得運用民主法治的價值或口號來規避轉型正義，來走私中華民族主義。此時，秉承黨外時期以來「民主、自決、救台灣」之民族民主主義精神的民主進步黨，應如何負起責任呢？

筆者訪問（本書的受訪者）的過程中，除了關注其在早期建黨方面的經歷，也會藉機詢問當前（如上述）問題解決之道，恰好林濁水與謝長廷的思考方向可以成為對照組。林濁水說民進黨的核心精神就是「台灣人出頭天」，他根據 90 年代種種民調認為台獨的支持者節節上升，所以很不認同陳水扁競選幕僚方面把台獨當作「票房毒藥」而擬定的競選策略；何況民進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應該要能創造價值，即便該價值是今日的少數也要努力把它變成明日的多數。林濁水的說法其實也是多數台派社團的立場。謝長廷則是從實然而不是應然的角度說，民進黨在建黨的第一階段已經和革命團體做了劃分，明確定位自己不是革命政黨；在 2000 年執政以後的階段，更明顯已成為一個議會政黨。還沒有執政之前，可以說是運動政黨，有了執政機會之後民進黨就是追求執政的議會政黨。社團可以比較有理想性，強調以運動來改變現狀，但是「我們民進黨一定要很清楚自己是什麼角色，我們就是要執政，執政一定要在乎人民的感受，要考慮人民的風險、人民的憂慮。我們有理想，但是要跟人民溝通，也要讓人民感受到，

我們有智慧和能力去處理風險，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我們不能執政，民進黨會成為一個只是發洩不滿的政黨。」為了追求執政，謝長廷主張台派應該結合「維持現狀」的中華民國派，才能成為相對乃至絕對多數²⁷。

無獨有偶，今年9月28日又逢民進黨黨慶紀念日，謝長廷在報紙發表〈憲政是民進黨創黨精神〉一文，他說民進黨建黨的精神包括無私團結、為台灣奮鬥的精神以外，「保護台灣人民可以當家做主的憲政精神，爭取台灣人民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乃是民進黨創黨最重要的基本主張。為了佐證此一觀點，謝長廷舉出當年圓山宣布建黨以後，蔣經國曾經提出三項條件作為開放前提，民進黨則由發言人尤清發表三項聲明作為回應，其中有「本黨希望政府行使公權力應依據《憲法》，不要濫用；本黨堅持組黨自由的合憲權利，我們願意與各政黨公平競爭，共同推動民主憲政。」²⁸個人認為，由於戒嚴時代台灣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剝奪人民諸多權利，於是黨外人士在策略上要求國民黨「回歸憲政、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以保障人民諸多自由，乃是可以理解之事，但是一旦解嚴、廢除臨時條款，中華民國憲法與台灣國家的相容性、矛盾性即須面對²⁹；問題是，「一個負責任的台灣政黨」同樣不能坐等北京對台政策軟化、坐看國民黨壟斷兩岸關係的話語權，所以謝長廷盱衡時勢為民進黨尋找「順而逆」之解決方式的努力，也不容忽視。只是，今日民進黨為了處理中國政策，為

27. 筆者對此曾經撰文評論，見陳儀深，〈是態度論述 不是台獨論述〉，中國時報，2011年1月21日。

28. 謝長廷，〈憲政是民進黨創黨精神〉，蘋果日報「焦點評論」，2013年9月28日。

29. 李登輝時代曾有一定程度的處理，參見陳儀深，〈關鍵的一九九一：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誕生〉，《思與言》第50卷第2期（2012年6月），頁33-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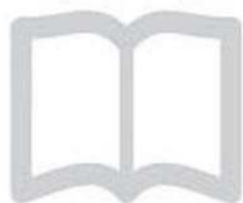
了必須與北京政府交往（交手），是否應以「憲法共識」作為最好的論述是一回事，宜不宜把當年權變順應的「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當作創黨精神，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是另一回事。

作為一本口述歷史作品，原只是史料的收集，只要根據問題意識找到適當的訪問對象，在彼此信任的情況下傾聽細談，然後準確而通順地整好稿件，即可出版以供各方研究，原不必做太多解釋或抑揚。惟筆者長期關注台灣民主化的議題，忍不住多說了些話，必須在此打住。

【目次】

| | |
|---------------------------|-----|
| 推薦序 記取歷史，找回台灣精神 彭明敏 | 3 |
| 推薦序 紀錄台灣民主的一大步 蔡錦堂 | 5 |
| 導 論 轉捩點之發生 陳儀深 | 7 |
| 整合意見，深耕台灣 | |
| 尤清先生訪問紀錄 | 37 |
| 目睹艱辛苦難，矢志守護台灣 | |
| 田秋堇女士訪問紀錄 | 71 |
| 臨門一腳，催生台灣新政黨 | |
| 朱高正先生訪問紀錄 | 93 |
| 因緣際會，參與朝野溝通 | |
| 李鴻禧先生訪問紀錄 | 119 |
| 台灣寶貴的核心價值面臨威脅 | |
| 林世煜先生訪問紀錄 | 143 |
| 被一波狂飆的時代給席捲進去 | |
| 林濁水先生訪問紀錄 | 159 |
| 用影像見證台灣民主運動 | |
| 邱萬興先生訪問紀錄 | 187 |

| | |
|-----------------------|-----|
| 推動民主改革，展現新氣象 | |
| 姚嘉文先生訪問紀錄 | 215 |
|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 |
| 洪奇昌先生訪問紀錄 | 253 |
| 願意為實踐理想而奮鬥 | |
| 張俊雄先生訪問紀錄 | 269 |
| 天佑、天譴、天意是我的座右銘 | |
| 許榮淑女士訪問紀錄 | 291 |
| 從黨外小妹到直轄市長 | |
| 陳菊女士訪問紀錄 | 327 |
| 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 |
| 游錫堃先生訪問紀錄 | 357 |
| 國民黨是對手，中共是敵人 | |
| 賴義雄先生訪問紀錄 | 389 |
| 民主的包容，進步的取向 | |
| 謝長廷先生訪問紀錄 | 413 |
| 索引 | 456 |



此頁空白

整合意見，深耕台灣

尤清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嚴婉玲

時間：2013年3月26日上午

地點：台北市青島東路尤清辦公室

尤清，1942年生於高雄縣大樹鄉，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留學德國五年，1978年獲得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學成返台後在大學任教並擔任律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時，擔任辯護律師。1980年，獲得黨外省議員五票的支持，當選監察委員。1985年接替費希平成為黨外公政會理事長，隔年又成為秘密組黨十八小組及創黨十八小組的成員。民進黨成立後，曾任立委，1989年至1997年間，擔任台北縣縣長。2000年政黨輪替後，歷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不分區立法委員、駐德代表。

出生於高雄農家

我是 1942 年 3 月 20 日出生在高雄縣大樹鄉，高屏溪河邊的溪埔村。我父親是一個農夫，他對台灣農業改革最大的貢獻是推廣農業機械化，他從日本進口「鐵牛」（耕耘機），是從銀行貸款買的，回來後到處表演讓人家看，教農人要用鐵牛，很有熱情，可是 46 歲就過世了。¹ 我們小時候有頭母牛給別人家養，如果生公牛就歸我們，生母牛就給養牛的人，剛好連續兩次都是生公牛，所以我小學三四年級以後就要養牛。我母親生了八個、共養了十個孩子，因為我小姑丈當日本兵，留下遺腹子，生下後交給我們家養，又大姑守寡，後來病死，留下表哥由媽媽扶養。那時我四年級，表哥五年級；表哥要去補習時，我一個人就要養兩隻牛；當時，牛發情以後聞到母牛的尿就跑了，我小弟常笑說我養牛養到牛跑掉。

我父親就是因為看日本的雜誌，看到日本有一種鐵牛可以不用餵草、不用養。他想，如果我的兒子都在養牛就不用念書了，不如借錢去買鐵牛，就不必讓兒子去養牛。買了以後，他一個農人就從北到南去宣傳鐵牛，跟人家說不要讓你的兒子養牛，要讓他去念書。我家有十甲地，三甲多水田、六甲果園，就在佛光山附近，星雲法師說佛陀紀念館的北有祇園、南有靈山，在那靈山部分土地上，我家種玉荷包荔枝。

我讀溪埔國小，地板都是泥巴，掃地掃一掃地就凹下去，桌子都擺不平，甚至有窗子沒玻璃，因為沒錢換，冬天風灌進來很

1. 尤清父尤水得為自耕農，曾擔任高雄縣縣議員、土地改革委員、省農會理事。

冷。小學時代最快樂的事情就是上小學五年級時。有一位黃雲星老師教自然課，他從學校周邊的水田中拿稻來教，從根、莖、葉、花、果、種子……教起。另一位楊光武老師教地理、歷史，也很有趣，他是青年軍，中學沒畢業就去當兵，受傷後就安排到國小當老師，因為他到處打仗，大江南北都去過。後來我當縣長的時候，楊老師的兒子在五股結婚，他的結婚典禮我從頭坐到尾都不敢離開。

中學的時候我去鳳山讀，高中三年有一個國文老師，他是廈門大學畢業，魯迅的崇拜者，他是白話文運動的健將張振文，從高一到高三都是我們導師，這個國文老師戰後就到了馬公，當馬公中學的校長。²山東有一個軍閥秦德純，他帶了很多流亡學生到馬公來，有些學生就跑到馬公中學去念書，穿破衣服，從軍隊帶來的便當裡面有很多碎石子，怎麼吃？校長就跟部隊交涉好幾次，部隊方面說，我們哪一個人吃的米裡面沒有石頭？這些軍隊恨死他了，有天就給他搞個文字獄，就是先抓某個老師，來抄家時發現有魯迅的書，這個老師說這個書是從校長那邊拿來的，後來這個老師被送感化教育，校長則被拔官了，於是流亡到鳳山來當老師，這段歷史是他快死之前講給我聽的。

我從高一就那麼尊敬他，是因為我們中學都要寫週記，週記很無聊，要抄一週大事、學習心得，我就把這個當我的論壇，本週大事我不是去抄報紙標題，我就挑一個我喜歡的事情去發表評論。每週一交週記，老師週二就會找我叫我重寫，週記都被撕

2. 張振文，福建人，上海江南學院畢業，於馬公中學任校長之時間為 1946 年 7 月到 1947 年 8 月。

掉了。我們學校就在稻田中間，他說你這個秧苗不要一下就被拔掉，我回問說那我要寫什麼？他說你不要寫這個，別人寫什麼你就跟著別人寫什麼，隨便寫都沒關係，不要批評政府就好。我就寫同學老師有些什麼奇怪的動作，這個他就認為可以了。

高三時有一天教官把我叫去，那時張振文當導師，他說：「你又出了什麼事？」我說王教官找我參加國民黨。他說：「你爸爸叫你去基督教受洗你都不答應了，教官叫你去入黨你怎麼會答應呢？」他覺得參加政黨跟信仰宗教一樣是內心最堅強的決意，從此我就佩服這個老師。我大兒子取名本來要紀念這個老師，後來另一個老師說不能跟長輩取一樣的名字，我就用了同音的字。

學思歷程

政大有一個老師叫楊玉宏，教法哲學及羅馬法。我去德國念書也是因為在他那邊借一本 Friedmann 的法理論 (Legal Theory)，這是一個德裔美國籍猶太人寫的書。³ 他有一次在政大要坐交通車沒坐到，我問他怎麼辦，他說坐公車，後來，我就幫他提書包去他家，他留我吃午飯，午餐時他正在看這本書，我就問這本書哪裡好？他說這寫得很好，有一系列介紹法哲學的文章，那裡面有一章介紹對抗法實證主義的自然法學家 Gustav Radbruch⁴，他對抗希特勒被禁教職 12 年，他堅持惡法非法，那時《美麗島》雜誌邀我寫抵抗權及談人權法治，我就用這個概念。

3. Wolfgang Friedmann, *Leg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4. 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德國重要法哲學學者，曾於威瑪共和時期擔任聯邦司法部部長。

Radbruch 是海德堡大學法哲學及刑法的教授，有一年劍橋聘他去當客座教授，他用德文寫了一本書叫英國法律要義，到現在仍然是關於英國法的經典著作。他被禁了 12 年的教職，甚至不能進大學的任何建築物，但他不屈服，他去劍橋那一年人家要留他他也拒絕。他的國際名氣太大，所以沒死，1945 年德國戰敗，滿目瘡痍，9 月海德堡是第一間大學開學，當時的校長雅斯培（Jaspers）就找這個 Radbruch 回去做法學院院長。他在斷垣殘壁的廣場上演講法的信心，旁邊還有學生在抗議，他反對法律就是統治者的工具。我去南神教了一年，我就用這個教。我初中一年級就被叫去長老教會受洗，我父親希望我當牧師，我不要。我想說為了還我爸的願，去南神免費教一年書，每週五去，週六還在那裏，被我教的學生都很有正義感。我特別影印給學生他們看，他提出法的理念有三，法之正義、法之安定及法之目的，特別強調法律違反人權及正義，則失去法律的資格，惡法非法！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父親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請同學吃飯，在政大門口的餐廳吃一頓五元的午餐，我爸問我願望是甚麼，我就說要去德國研究 Radbruch 的法哲學，他說我這「囡仔」不怕死，要賣三分田讓我去念，結果那一年我父親就過世了，那一年是 1965 年，因此我無法出國。後來我先當兵、結婚生兩個兒子，律師考試也考上了，但有未竟之志。有一天我從報紙看到教育部的公費留學，德國政府的 DAAD（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獎學金，我就去考 DAAD 獎學金。我從大學三年級就開始念德文，老師拿給我看看這本書 *Legal Theory*，我就佩服 Radbruch 對惡法非法的堅持，決定去海德堡。

碩士時我跟著楊玉宏老師到文化大學去念，碩論我寫「當代社會的變遷與法律的變遷」，一般讀法律的人都讀條文，考試比較好寫，我去寫法律跟社會的變遷的交互影響，我本來要寫憲法，搞一個民國三十四年不實行的憲法拿來台灣做最高的法規範，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的情況都變動，怎麼可以用這個當最高規範？老師叫我不寫這個，會惹麻煩。所有的法律制度、社會變遷都不是單一因素，單一因素就是唯物論的觀點，那就是馬克思說的唯物論，但其他學者都主張 interaction（交互影響）。我們在做黨綱的時候我就有這種警覺，不能以政治人物的參選政見來當作政黨唯一的政見，要跟社會有 interaction。

我的碩士論文有參考兩三個人的文章，包括龐德（Roscoe Pound），他是哈佛大學的法學院長，他提出 social control，⁵ 另一個蘇聯後裔的創辦哈佛大學社會系的教授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的 social dynamic（社會動態變化），⁶ 這兩個思想貫串我的論文。這個非常有用，國民黨、希特勒都覺得制定法律就可以控制社會，但社會是 dynamic 的，是反彈的。寫完後楊玉宏給我八十幾分，好像是那年最高分，我花了兩年時間寫的。我們法律人都給人家教條主義的想法，人家怎麼規定就怎麼遵守，寫論文也是這樣，這是教條主義（domestic）。我那時父親死掉，弟妹還年幼，要賺錢要上班，碩士學位根本不重要，曾經想放棄，

5. 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曾執教於內布拉斯加州大學法學院、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哈佛大學，任哈佛法學院院長長達 20 年，為社會法學派創始人。

6. Pitirim A. Sorokin (1898-1996)，社會學家，原籍俄國，因遭受政治迫害，1924 年逃往美國並歸化，曾任明尼蘇達大學社會系教授、哈佛大學社會系首任系主任，著作等身，最重要之著作為《社會與文化動力學》（*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1937-1941）。

但他一直鼓勵我，甚至為我改到週日上課，所以我後來就拋棄一個法律人的教條主義，而找到法律的變遷與存在是因社會而來。整個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遷史，社會是流動的，法律制定以前是 dynamic 的，制定以後也還會繼續，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寫政黨政見的時候，一定要有這種社會的 dynamic，民進黨組黨的時候，我當然從政黨學來思考擬定黨綱。

楊玉宏老師教羅馬法，繞來繞去都在講羅馬法的歷史，講羅馬私法如何影響歐洲的歷史、特別是德國的法律歷史。1973 年我去德國念書，Adolf Laufs⁷ 教德國法律發展史，因為楊玉宏老師教羅馬法對於十五世紀歐洲的影響，以及羅馬法與日耳曼法兩個系統匯流在一起的歷史，我在台灣有被教到這些所以很清楚。這讓 Laufs 很驚奇，他說你們台灣怎麼會對羅馬法這麼精通。在德國海德堡給的法學博士學位名稱就是同時含有國王法跟上帝法，英國的最高學位叫作 LLD 指的就是 Doctor of Both Law（天上的法與地上的法），我拿的就是這個 Dr. iur. utr.。

到德國後，我先去歌德學院念德文，四個月後就去海德堡大學。第一天看到學生排隊，我就跟著排，原來是一個神學院的教授演講，談批判聖經，馬丁路德只批判教會，他竟然連聖經也批評！結束以後我就急著要來看看 Radbruch 的研究室跟徒子徒孫在哪。我跑去問門房，他叫我去問助教，助教說就是在這間德國法律史研究所，德國是在六百年前就成立法律史研究所，分兩部分，一個羅馬法，一個日耳曼法。

7. Adolf Laufs (1935-), 德國法律史學者及醫療法律研究先驅，著有 *Rechtsentwicklungen in Deutschland* 等書，曾任海德堡大學法律系教授、校長。

那個法律史研究所有個 38 歲的年輕教授看到我，我說我來看 Radbruch，他就覺得為什麼你這個「日本人」會想看 Radbruch。我說我是台灣人。他就問我為什麼對 Radbruch 有興趣，我說他堅持惡法非法，他聽得很有興趣，就跟我說，Radbruch 被希特勒迫害，但希特勒和他的名字都是 Adolf，真是很巧合。他請我喝兩杯咖啡，我跟他聊，他對我另眼相待，他的新著《德國法律發展史》（*Rechtsentwicklungen in Deutschland*）剛出版（1973 年 5 月）還送我一本。他還跟我說 Radbruch 的照片就是這禎，我也跑去跟他合照，後來黨外雜誌也有刊出。Radbruch 在 30 年代希特勒掌權之前兩度做司法部長，他在海德堡大學拿博士，去 Kiel 大學當教授。有一天他要去上課的路上，看到勞工示威被警察打，他很同情，就和勞工站在一起，結果也被打。幾年後社會民主黨推他做國會議員，後來他也當過司法部長，就任之前先去監獄看守所住一個月才去當部長，保安處分的很多制度是他當時制定的。他說刑法不是懲罰，是要教育。卡羅琳娜（Carolina）刑法典是刑法歷史中人道的開始，以前都不是以人為本，都是以人為工具，卡羅琳娜刑法是以人作為目的，藉此形塑他的刑罰論。

德國博士學生要提出一個法律史的考據，也就是除了博士論文以外，要做一個法制史的一個考據（*exgese*）的小論文，兩個月內寫成。外國博士生要考法律史，以代替考據，可考民法史、刑法史或憲法史。憲法史我不考，只有兩百年，是 1848 年以後的事。刑法史從卡洛琳娜法典以降，我也不去考。我去考民法史，要讀羅馬法兩千年，日耳曼法一千年，這讓 Laufs 很佩服，一個亞洲人可以上下縱橫二千年。這是我挑戰德國學術的方式。

當年我學成回國，面臨就業的選擇：教書或執業律師？我要對抗惡法，所以就走進民間做律師。踩上這一步也是很坎坷，我丈人在長安東路有個營業所，借我一個小房間開業。1979年二二八的時候，因為我借用他們的電報號碼，有個給我的電報寫「二二八血仇必報」傳來，工作人員就跑去跟我丈人說，丈人為了跟我劃清界線，就把我趕出來。3月上旬就趕我走。

1980年春天美麗島大審剛開庭，教育部長朱匯森寫信給政大、台大及文化校長要求政大地政研究所、文化法律研究所和台大醫學院停聘我。政大教授殷章甫當時做地政研究所所長，後來寫回憶錄有寫到這段。殷章甫認為我是蕭錚老師介紹，他就跑去跟蕭錚說，蕭錚老師說尤清是律師，幫人辯護是應該的，他也覺得有理，堅持留人。但文化及台大醫學院開的課馬上被停聘了。

博觀天下、深耕台灣

我認為組黨的準備很充分。我1978年從德國回來，1979年就發表「論抵抗權」的文章，那是要挑戰國民黨戒嚴法制。我在1983年和尤宏、林濁水辦了《博觀》雜誌，目標就是為組黨做準備，討論的社會問題都與組黨有關。博觀的拉丁文就是 Panorama，意思是博觀世界，全方位的觀察，總攬全局。後來黃石城找我辦雜誌，我就命名為《深耕》，我以前在木柵念書，隔壁就是深坑，那邊的田都是看天田，要深深地耕下去才能有好收成。鄭勝助律師接辦了一年就沒辦，給許榮淑拿去繼續發行。

那時的想法就是要博觀天下、深耕台灣。我們要做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政黨。《博觀》才辦四期，每期都被禁，被禁之後，林濁水就說要出叢書，第一個就是談瓦解的帝國，林濁水的想法就是破解漢人沙文主義，之後再批判國民黨所謂的法統，挑戰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

向德國政黨經驗取經

Carl Schmitt⁸ 有篇論文很出名，講正當性與合法性，說納粹披著合法性的外衣，但沒有正當性，他是德國海德堡的憲法教授，許信良最推崇這本書，我就用這個作模式去批判國民黨統治沒有正當性。

後來我在博觀叢書（1983年10月出版）中，有寫一篇〈立憲、違憲、護憲——德國憲政回顧〉用短短的一篇文章把三階段都講清楚：講德國的憲政體制，從威瑪立憲到納粹毀憲，戰後基本法又護憲，德國的憲法史就是人類憲法史的縮影；威瑪是自由憲法，但威瑪憲法無法阻擋納粹那種蠻橫的人，這篇發表在博觀叢書裡面，也是被禁。別人說以古非今，我則是拿德國的歷史經驗來批評時事，1945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如同威瑪憲法，本來是有民主自由精神，但後來的戒嚴統治，與納粹模式相似，本文如同照妖鏡，使國民黨戒嚴期間違憲又迫害人權的惡形怪狀無所遁形。

8. Carl Schmitt (1888 - 1985)，德國法學家，曾任柏林大學法律系教授，因曾於納粹政府任職，戰後曾遭盟軍逮捕送紐倫堡法庭審判，獲無罪開釋，但因拒絕西德政府之去納粹化政策妥協遭永久剝奪正式任教權。

當時要組黨也要構想歐洲民主國家的政黨是什麼原則，例如黨內民主、進出自由、友黨各黨平等、黨的財務公開，這幾樣都是台灣要面對的問題。1984年9月29日比較法學會有一場國際研討會，會中演講找李鴻禧、胡佛和我。李鴻禧講國會，胡佛講選舉，我講德國政黨法的基本原則，從這個來凸顯國民黨不是民主政黨，也為組黨確立民主政黨的基本原則。

第三篇就是組黨前一年（1986年）七月，我在美國加州大學參加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發表談制定新黨綱領，那年我的小孩剛好在考試，我就請江鵬堅去發表。⁹

為什麼我很重視政黨的綱領呢？回顧日治時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時代，左右分裂，就是共同目標與共同政策沒共識，我這個文章就是在講德國各政黨，例如社會民主黨、基督民主黨，都有左右派，他們如何形成共識。這個政黨綱領是按照學術規格，就像建築師的藍圖，組黨都是按照這個藍圖逐步進行。這個四種綱領的形式跟功能表我都列出來，到現在仍然是個標準，像是一個計量表。實際組黨時，有公政會的基本綱領，行動綱領採納編聯會，這個政黨綱領的製作，都是符合歐洲民主政黨黨綱的製作模式。

1986年8月14日，我去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大學發表〈建設現代化的國家〉¹⁰，這個就是基本綱領的第一部分，這都符合歐洲民主國家的政黨綱領，我要說明的就是組黨是有充分準備的。

9. 〈談制定新黨綱領〉，收錄於尤清，《新黨救台灣》（台北縣：曹子勤，1987），頁99-112。

10. 本文後收錄於尤清，《新黨救台灣》，頁123-134。

綱領我寫的是法政的部分，財經我有寫，被林鐘雄整個改過，國際跟國防是黃爾璇，後來有費希平、謝長廷、傅正等人加入增修意見。我最大的準備工作就是利用公政會穿梭黨外人士之間，把每個人的意見整合起來，並歸納為當時黨外人士的選舉政見。

如何歸納黨外眾人的意見

所謂組黨準備充分，是如何歸納黨外的意見，也就是建立共識，以免又造成日治時代文化協會和民眾黨的分裂，這是台灣人的慘痛教訓。《博觀》第二期（1982年10月）有一篇是邱義仁等人來我家講組黨的事情，談新黨的組織綱領與運作，參加座談的有林世煜、吳煜輝、吳德（吳乃德）、張明雄（邱義仁）、尤宏、林濁水，這個是陳楚人（陳文茜）紀錄的。我們找三個雜誌的代表人來我家專門談這個事情。那時就在討論要柔性政黨還是剛性政黨，基本綱領跟構想已經投石問路出去了，這個時間點已經成熟了，這是1982年10月的事，事後看這個內容其實很成熟，那時為了談話方便所以整理出來。¹¹

【本報台北十一日電】由公政會召集的「黨內外人士」座談會，昨(十)日在公政會會所舉行，與會人士包括公政會會長林世煜、副會長吳煜輝、秘書長吳德、公政會各分會負責人等，與會人士對公政會及分會設立，一致希望為促進政治和諧努力。

公政會會長林世煜在會中致詞，對公政會及分會設立，表示極大的信心，並表示公政會及分會將繼續努力，為促進政治和諧而努力。

與會人士對公政會及分會設立，表示極大的信心，並表示公政會及分會將繼續努力，為促進政治和諧而努力。

公政會及分會將繼續努力，為促進政治和諧而努力。

新聞報導工政會設立。(《聯合報》1986年5月11日)

11. 〈新黨的組織綱領和運作〉，收錄於尤清，《新黨救台灣》，頁45-62。

我認為台灣不能推柔性政黨，不然不能對抗國民黨，照美國的沒辦法，歐洲都是剛性政黨。當時編聯會還沒成立，喇叭（邱義仁）來找濁水，濁水說可以打開門找三個雜誌談，那場座談我有準備資料，丟問題給他們。當年我很鼓勵黨外雜誌「林立」，只有辦一個雜誌太危險，被查禁就沒了，不如到處發散種子，讓野火春風吹又生。

總之組黨的充分準備就是要建立共識，趕快讓黨綱出來。

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

1982年選舉結束後，在省議會會館，黨外的人都聚在一起，費希平說要成立黨外選舉後援會，我說，選舉結束了，說後援會沒有凝聚力，不如說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就是這樣成形的。

那時我在讀一本書，《自立晚報》有出一本書寫台灣的社會運動史，吳三連（1899 - 1988）先生等三人寫的，我看了很感動，裡面提到民眾黨到後來也分裂了，如果沒有共識，也不能異中求同，就會分裂，就像箍水桶就會箍不緊。

黨外公政會時代的難題：第一個沒錢，第二個是台灣人不服人的個性問題，台灣小小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有 268 座超過三千公尺的山，一山比一山高，人不服人。一個長輩（是我父親的老師）跟我說，台灣人放尿攪沙灘做堆，他說北迴歸線一過氣候就不同，生活習慣也不同，想法、做法都不同，所以人不服人，我把這些都記在心裡。我認為台灣人的政治結合不能用選舉，要

用「想法」的聯繫，用這種無形的聯繫。第一屆公政會的理事長是費希平，他做一半就生氣辭掉，因為他發現台灣人人不服人，他老人家不想跟我們攪和。我補任一屆，再接任一屆，後來謝長廷、洪奇昌、顏錦福（1938 - ）就來逼退，說我要選縣長不應該再做，後來顏錦福接任。

編聯會去扛江鵬堅。江鵬堅也是氣宇非凡，志在天下，他們把江拱成組黨主任委員，我找了費希平、傅正、黃爾璇等人，我說將計就計讓江鵬堅腳踏兩條船，要他也來做公政會組黨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是我建議的，傅正也有猶疑，一方面是怕他跟編聯會互通聲息會破局，黃爾璇極力支持找江來。新潮流本來就是有心栽培江鵬堅，他們認為江比較好妥協、好操作，後來做首任黨主席也跟這個有關，不過他們後來也翻臉。



黨外公政會的活動。（邱萬興 提供）

1986年，有一個林義雄（1941-）的教授叫佛利曼，是聖地牙哥大學的教授，也是田弘茂的教授，剛好來台灣，五四那天我就請他在公政會演講，談組黨與行憲，5月到9月只差四個月而已，那時已經很密集了。演講會有很多人來聽，我就說這很清楚了，民進黨今年一定組黨。

5月之前，2月時黨外公政會在台北就開始有分裂現象，分成首都和台北兩個分會，還有桃園公政會和中壢公政會，中壢掛牌時警察馬上去拆下來。

公政會與編聯會

公政會都是公職，編聯會都是黨外雜誌的作家、編輯，核心是邱義仁、洪奇昌，吳乃仁是金主，吳的地位穩固是因為花費都是他支付，邱義仁和吳乃德會說一些理論，尤其是吳乃德都會說一些政治理論，他就被當神了。

事後來看，編聯會的人就是要把公職這些人趕下來，才會有批康寧祥的雞兔問題，這也是編聯會去操作，要把他鬥倒。我覺得那時謝長廷的手腕比較好，他是市議員，但他跟編聯會關係沒打壞。康寧祥因為被司馬文武捏著，司馬有稿源，康寧祥因司馬文武而起、也因司馬文武而下，因為編聯會這群作家就打不進去康寧祥的《八十年代》，我覺得編聯會鬥康，是因為稿子進不去《八十年代》和《亞洲人》有關。

康寧祥有跟我約稿，我都沒有幫他寫，不是因為我跟他關係

不好，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一夥人了，不要都在同一圈，應該要百花齊放，你們是玫瑰花就去當玫瑰花，我們就去當其他的野百合好了。

那時美麗島審判結束後，康寧祥就叫林濁水和林世煜來找我，我那時還是律師，來問我說要如何寫一系列文章討論「為何社會和法律脫節」，法律人都會被抓走？我就問說為什麼來找我，他們說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寫法律變遷與社會變遷。

國民黨與黨外之間的「溝通」

1986年2月下旬，監委同事黃光平說，蕭天讚奉國民黨高層之命要來跟我溝通，他說的比較露骨，說蔣經國要他和蕭天讚來談黨外公政會的事，我說，我不能單獨跟你談，至少要找謝長廷秘書長一起來談，公事不能私相授受的。因為蕭天讚最後說如果分會繼續設，政府一定會取締，我說沒什麼好取締的，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取締無法可據，他說是戒嚴法規定。我說，哪一條有講人民不能結社？後來在來來飯店的「桃山」吃飯不歡而散，各付各的帳。

午後兩三點回到家我很生氣，當時想直接去找蔣經國表明黨外要組黨，我就叫我太太打電話給總統府秘書長，我叫她說我丈夫尤清要見蔣經國總統，時間最好是2月底。對方說如果2月底不行呢？我說那就不必了，我要出國了。

赴美遊說

1986年3月下旬，我出國第一站去加州，由蔡明憲接待。當時台灣有一個《國際日報》被停刊，鬧得很厲害，FAPA他們要去遊說美國國會，包括蔡同榮（1935 - ）、陳唐山（1935 - ）、彭明敏（1923 - ）等人就叫我跟著去遊說國會改選跟新聞自由，我說如果有談組黨自由我就去，他們就把這個加到遊說的內容中，目的就是加我這個人頭去遊說，我就去了。

那一趟有見到幾個美國國會議員，一個 Pell，是陳唐山陪我去的，他是個老年人，談一談就睡著了，我跟陳唐山說差不多了，他睡醒後只問說，你跟我講這麼多，我只問你有沒有支持台獨？我說有啦。我後來還見了甘迺迪、Leach。對索拉茲印象最深，他說，昨天的菲律賓，就是今天的南韓，明天的台灣。

我跟他說，年底一定要組黨，如果國民黨抓人，你們美國國會會不會聲援？他們說一定聲援。那時參眾兩院有一個聯合提案，支持台灣的言論自由、國會改選、組黨自由。

我4月5日回來，4月6日費希平邀請黨外的人包括我、張德銘、謝長廷、黃爾璇、傅正、康寧祥、顏錦福吃飯，我就拿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共同提案給他們看，我說，買股票有論盈虧，搞政治只有論是非，今年若不組黨，之後沒機會了，因為年底要選舉國民黨會怕，今年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你們看美國國會議員很多人都說如果抓人就會聲援了。抓人當然人人會怕，但今年不拚就越來越難。

陶百川先生

四月中，有一天我在監察院圖書館查監察院的歷年紀錄，我要去查 1960 年國民黨當局抓《自由中國》雷震時，他的同仁有沒有什麼紀錄是聲援他的。那天正好碰到陶百川先生，那時他是國策顧問，他常常來圖書館，在角落有個固定座位，他就找我談，他說前天去參加總統府的月會，碰到監察院的國民黨書記馬空群，跟他說蔣經國找他，要會見監委尤清；陶就趕快把這個消息告訴我，他還加一句說：「監察委員同仁還在猜說我是不是要去告發國防部跟荷蘭買潛水艇的弊端？」我就答覆陶說：「弊端何止買潛艇？還包括外匯存底作弊……講不完！這些我不講了。」他說：「你不講，那蔣經國見你要談什麼？」我說要談組黨。

我就把蕭天讚跟黃光平見我的事情跟他講一次。我說國防採購弊端是小事，其他委員都可以辦，我就是談組黨。陶百川是人格者，非常愛護晚輩的長者，他馬上就跟我說：「這個事情很大。」我說最大就是這件事，蔣氏父子到台灣都是講經濟、講土地改革，事實上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民主化，蔣介石（1887 - 1975）做不了但蔣經國有機會，包括開放言論自由、開放黨禁、國會全面改選，我就把去美國講的這一套又跟他講一遍。

我說這就好像「大江東去擋不住」，菲律賓、韓國、台灣都擋不住，陶百川就「喔」了一聲，他說你談這個事情是一個最大的挑戰。他們以前以為我要去揭發弊端，我內心想：「你把我看成抓老鼠的人？」我心裡想的是建國建黨……後來跟他談了很久，圖書館樓上有一個餐廳，我們早上談了很久，廚房都開始準

備午餐了。

我馬上想到我當初當選監察委員時，《自立晚報》有個記者叫林倖一，曾以最快速度告訴陶百川說尤清當選了，林倖一告訴我這件事時我很感動，就在當選監委的第二或第三天就首先去拜訪陶百川，請教他監察院的一些事情，沒有想到這個老先生有備而來，我去中央新村他家去看他時，他從《古文觀止》影印了一份〈賈誼論〉，他用紅藍鉛筆勾了一句話：「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就像給我一個錦囊妙計，他聽我講組黨，他有點驚奇，我想到他的想法可能很像《史記》項羽本紀中所說的「豎子不足與謀」。後來我說：陶公，我今天就決定不去見蔣先生了。理由很簡單，我去就是要跟他講，蔣氏父子來台灣，一向標榜經濟，蔣經國也應該來標榜政治改革，開放組黨是唯一的機會。我講這句話，以陶公的經驗大概會覺得很難，因為這等於是挖蔣家的根柢。我跟陶公說：「那我們自己就做了，公政會照做，組黨的方向也是一樣，陶公我不敢騙你。」

組黨前夕

4月6日費希平盛請午宴。餐敘時黃爾璇說一句話，他說火車鳴笛了，火車要開了，不上車的人就追不上來，就要搭下一班車了。這比喻很傳神。

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就是有人說會抓人，周清玉也在場。我就說，很簡單，我們這批可以去輪替坐牢，周清玉說不行不行，

（她先生）關在裡面的就已經悽慘了，「我們悽慘，還要讓另一群人去關嗎？」……她就在那邊哭。我當時是很豪情壯志，但本來政治就是危險的，輪流坐牢也公道。

黃爾璇又說了一句很利的話，他說：「這班車沒搭上的，即使沒被抓去，年底也選不上！」這句話很動人。

1986年5月，有一次傅正邀十個人，包括我，以他做生日的名義要請客，在周清玉家旁邊有一家「御龍園」餃子館吃飯，吃飽就去周清玉家。之前，我4月初回來時，有在費希平那邊確定今年一定要組黨。大家見面後就談組黨，傅正有說一點很重要，我們這十個人都不能跟家裡說、不能有任何紀錄、不能打電話，每週五下午三點見面，不另行通知，絕對不能用電話講。抓姚嘉文、施明德時，軍法大審就是用筆記本的人名電話去抓人，所以從軍法大審以後，我就不用筆記本、不用電話簿，也不蒐集名片。

9月下旬密集開會，開了三次會議，第一次是游錫堃主持，第二次是謝長廷主持，都在黨外公政會，第三次是組黨的前一天，9月27日，由我主持。第一次會，來三四十個，第二次會剩二十幾個，第三次會剩十幾個，大家還是會怕。第三次會開到六點，我請朋友開車載我去北港，為了朱高正選立委要在媽祖廟前誓師。我就找了田再庭，田屬馬大我十二歲，我又比朱高正大十二歲，所以我就說田是大馬，我是中馬，朱是小馬，我們來助他一臂之力，田很豪氣地答應。

我到北港已經晚上九點多，在媽祖廟前廣場，一、兩千名軍

警對朱高正及我們噴水柱。我們對抗到午夜十二時才散場，到十二點多弄完去吃麵的時候，我跟朱高正說：「我現在載你回台北，有件事我告訴你，你不能告訴別人——明天要組黨，當大家猶豫不決時，你要臨門一腳鼎力支持組黨。」

組黨那一天

第二天（9月28日）就在圓山開會，為什麼那天是游錫堃當主席？因為那年只有他沒參加選舉，費希平建議找他，而且游錫堃沉默寡言也與人無爭，因此找他主持。

圓山飯店早上開會開到中午都講不成，大家會怕，最後跑到只剩下大概一百多人在場。朱高正很猛，我希望他能臨門一腳，那時討論時有人說要組籌備會，雲林許立委站起來罵朱高正說：「我為民主貢獻，搞到肚子一個洞（因為他大腸癌肚子有開一個



1986年民進黨舉辦第一屆全國黨員大會，尤清擔任中常委與創黨主席江鵬堅、秘書長黃爾璇一起主持大會進行。（邱萬興提供）

引道)，現在叫一個警察的小孩來選。」朱高正說：「我被罵成這樣，我不要選、現在來走好了。」我說：「你不能走，今天是很重要的時刻。」朱高正在那天有臨門一腳的貢獻。

開會談組黨的時候，有一些人動搖，那也很正常，我就說，今天是最後一次機會，今天不組黨之後就沒機會了，我有說六點理由特別強調今年是組黨的最好時機，今天是今年的最好時機，那時還有很多人猶疑不決，說不然先籌備，先選舉再說。我六點說完後，大家才覺得好，今天來組黨。那時何春木（1922 -）先生從《自由中國》時代就參與，他站起來說：「好啦！不要再拖了！」朱高正那時也喊得大小聲的。

組黨那天是六點六分宣布，六點半至七點我趕到監察院，那天是9月28日放假，趕快去我的桌內找一個德國通訊社駐亞洲的主任的住家電話，他在東京，我回家打電話給他，將民進黨三十二個基本綱領都講給他聽。那時我用德文手寫三十二條綱領，寫在卡片上，用德文寫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參考德國憲法及歐洲各民主政黨的黨綱，一是怕他們來抓人，抓人時他們看不懂那是什麼。組黨後我就把這些卡片放火燒掉了。

建黨之後出任的公職

我在1981年2月當監察委員，六年後，1987年開始做兩年十個月的立委。1989年12月底提早三個月離開立委職務，去當台北縣長，縣長兩任八年，1997年12月卸任。1998年選立委



1989年台北縣長競選的造勢活動。(邱萬興提供)

沒選上，就回去做律師，做律師時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就是在1999年幫台北縣的電腦公會，成立一個講習班，專門教電腦與法律，當時我寫了幾篇文章，關於電子商務，連續大概半年。他們找了我、黃茂榮教授等七八個人，談電腦法律的十個議題。我寫聯合國的電子商務的模範法，還有網路的法律責任及網路所涉及的司法問題，這篇文章還被歐盟的電腦法律小組列為參考文獻。¹² 2000年《法令月刊》五十周年的紀念文集把我一篇網路所涉及的司法管轄權問題的文章收入論文集。2000年8月，另一篇文章〈網際網路提供者的法律責任〉發表在經濟部的期刊《科技法律透析》，這篇後來也被收進《全國律師》月刊。¹³

12. 尤清，〈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模範法評述〉，《全國律師》7:4，2003.04，頁65-74。

13. 尤清，〈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之法律責任——從德國及美國司法判決談起〉，《科技法律透析》12:12，民89.12，頁52-62。

縣長卸任以後，我再任立委是 2002 年。2000 年做過一年國策顧問，2001 年做過一年無任所大使，專走歐盟，後來 2002 年去做不分區立委，兩任六年。2007 年 9 月去當駐德代表，駐德代表的時候有幾件事情。2008 年 5 月，當時政黨確定輪替，我已經請辭，但我在德國舉行台灣國際地位的研討會，找一個我的好朋友 Frowein 當 Keynote Speaker，他是國際法學者，我做開頭的演講，這個演講要突出一點，就是歐洲這些國家都沒有外交承認台灣，但台灣是一個事實存在的民主主權國家。我強調說，德國有一個媒體基金會，每兩年對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做一個民主程度的評估。台灣是全世界第四名，亞洲第一名，比南韓還前面，第一名的捷克、第二名的斯洛伐尼亞、第三名的愛沙尼亞，他們人口加起來都沒有台灣多，台灣在中國的軍事威脅下還能實行民主，應該得到肯定。這些歐洲所期待的民主價值，台灣做得最好，還實現了健康保險、社會公義，雖然你們沒有承認，但台灣仍然實存。

Frowein 的演講有三個重點。第一點，儘管歐美主要國家對台灣沒有外交承認，但台灣還是事實存在。第二點，聯合國憲章第二章第四項「禁用武力原則」也應適用於台灣，不管台灣是否為聯合國之會員國。就如同韓戰時，南北韓也被很多國家不承認，但也適用聯合國「禁用武力原則」。第三點，台灣何去何從應由人民決定，如同兩個聯合國會員國東、西德要分要合都是人民決定。他呼應我的說法，強調台灣是一個國家，不管有沒有外交承認，遭受中國武力威脅時應該適用禁用武力原則，而台灣前途應由人民決定。當時中央社對此事有做過報導。

第二件事是漢堡有個「竹會」，就是東方文化政治的研究會，大概五六十年了，有一年找我去做主題演講，來聽演講的一個律師告訴我，我的博士論文被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列為參考文獻，我說哪有可能，都沒人告訴我。我是 1978 年拿到博士學位，1983 年論文被聯邦法院收入參考文獻，我寫的是人格權的保障，特別是醫學秘密被洩漏的情況下，他告訴我那篇論文被列入是因為現在的基因圖譜，就是人的身體的醫學秘密，按照德國民法上的消滅時效是三十年，而侵權行為是兩年，我等於把醫療機構保守秘密的義務延長為三十年。

台北縣長任內

我擔任縣長早有準備，可以說是準備了七年才當選。1983 年我當監察委員時去巡視台北縣與桃園縣，台北縣 250 萬人、桃園縣 150 萬人是全國最大的兩個縣，當時台北縣的問題就是未來桃園縣的問題。經過這個考察，我就投入研究台北的大都會計畫，研究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政策。我去把台北市議會、桃園縣議會的紀錄調來看，看議員跟縣長的互動是什麼。台北縣是台灣問題的縮影，我花了三年研究，同時在政大地政研究所教國土規劃法制的比較研究。我從 1983 年就在做這個研究，觀察東京、漢城、漢堡、慕尼黑、柏林這些大都會的計畫如何因應社會、經濟、交通、環保的問題。後來我就很成熟了，1985 年第一次選縣長沒當選，我花了七年準備，其間做立法委員，質詢都是圍繞這個問題。新時代基金會有做立法委員的問政評估，我是

第一名，提案、發言的次數都最多，但當時書面質詢是吳淑珍最多。那時我的質詢都是針對台北縣，例如教育問題、反核四、中低收入戶等等。那時我的立委選區是涵蓋台北縣、宜蘭、基隆等地。

在台北縣長的任內，我的施政針對幾個重點問題。首先是教育方面有國小「二部制」和高中不足的問題。我解決了國小二部制，蓋了9000間教室，增設國中、國小約五十個新設校，還設了九個完全中學及鶯歌工商高職。¹⁴

第二個是「垃圾一定清」。台北縣的垃圾以往被丟在淡水河、大漢溪。我建設垃圾場和焚化爐，把垃圾山都搬走，我搬到一半，後來由蘇貞昌縣長完成。為搬遷大漢溪床的垃圾山，我做那個垃圾場做五年，搬了兩年，在林口火力電廠對面的一座山，我把整座山挖掉，砂石拿去做北二高的路基，現在已經填滿、種樹變成森林公園。有一個泰興建設本來做核四工程，被我們反對，使核四基礎（大地）工程停擺了，他就來低價承包這個工程。我任內還在台北縣實施垃圾不落地，永和先做，板橋、新莊再做，還蓋了新店與樹林焚化爐。

交通也是很大的問題。因為主要的幹道都在做捷運，我促成兩件事。台北縣市為什麼很擁擠？因為是以台北火車站為核心，匯集六條交通走廊，上班往台北老城集中，下班回去，而這也正是捷運路線，我當縣長開始挖捷運。

14. 尤清任縣長時期之台北縣教育改革經驗，可參考尤清主編《台北縣教育改革經驗》（高雄：復文，1995）。

板橋新站本來有一個酒廠，前任縣長同意菸酒公賣局要變更為住宅區，我把它擋下來，用酒廠、營區、一個國中校地建立了板橋特區。大家都以為尤清「只會計畫不會執行」，這個不對。台鐵的地下化，我把車站移到公賣局的這塊地，縣政府大樓也是我破土，1996年底我卸任之前，板橋車站已經通車了。

第二個是新莊副都會中心，面積一百公頃，前任縣長因為有人民抗爭就擱置，我做的時候，都市計畫的細部都做好了。我當時就為此得罪林榮三，依法令其他99%的地主要負擔45%的土地捐出，他不捐，為了適法、也為了公平，我就跟他對抗，所以我得罪《自由時報》。後來民進黨執政，蘇貞昌接任縣長時，又改了好幾次。

第三件是三峽大學城。林豐正先做，留下來一個問題是三峽溪有一些佃農，他們想按都市法規，要拿回1/3的救濟補償，內政部與省政府都不正面支持，按照法律講，這些佃農是不能夠拿1/3的公告地價的救濟補償，因為他們已經沒有租約，但不給補償人民又會抗爭。內政部說，請貴府「本權責依法處理」，到我卸任也還沒解決，廢省以後又政黨輪替，中央也由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蘇貞昌才完成。

還有淡水的漁人碼頭，碼頭是我蓋的，原先淡水的漁人碼頭做了六年，也有民眾抗爭，後來我完成了。蘇貞昌做了情人橋又改變了漁業碼頭的境界。我曾經和謝長廷去巴爾的摩去看漁港，我就跟謝說，淡水比基隆還有條件做觀光碼頭。

我當縣長時，國民黨透過政風室監督我們整個縣政府。我一

點人事權都沒有，我只有一個機要秘書任用權，就聘請張國龍教授。所有的局長都是常務官，下一任縣長才有五個局長是政務任用。我當縣長的兩三個月後，我們有個職員叫高蘇省，發現辦公室有一個裝有監視器的鏡頭，我就拿這個鏡頭問政風室主任，他說是為了縣長安全，我問什麼時候裝的，他說就任前一週，我問為什麼前任縣長都不用？他說縣長特別，我說那縣長官邸外面的圍籬上鐵絲網剛好老舊，順便拆掉還可以安裝監視器，他就說好呀！我們根本就是透明人一樣。我當縣長卸任的那一年，已經連續三年台北縣是整頓政風的第一名，最後三名是宜蘭縣，我就向游錫堃抗議說我第一名是因為我抓貪瀆，而且我自己不貪瀆，可是名聲為何老是宜蘭最好。

林玉体教授當教育局長時做一件事，搞得天搖地動，他把國中小的蔣公銅像拆掉，改成時鐘，議員說是要給蔣公送終，那些校長怕被鬥爭，就把銅像都放到校長室。新店中正國小那個銅像是立體的，站姿，不是人頭，校長室不好擺，就放在門外面剛好面對廁所，議員就說尤清你真「酷刑」，讓蔣公去「顧便所」！

當時還做一件事，由於吳京當教育部長，說要教學正常化，要常態分班。他來找我時說，台北縣如果支持，台灣就成功了六分之一甚至更多，我說我支持，但我希望教科書的習題減半，他說他也支持。我說我的完全高中入學考試的命題範圍不超過教科書範圍。我設社區高中，我常說要打破明星學校的迷思，我就是鳳山高中出來的，我也好好的，什麼都不缺，大家要有自信，要有完全的人格教育，就要在社區，走路騎腳踏車就可以去上學。

後來台北縣有實現常態分班。

楊國樞幫教育部做了「璞玉計畫」，國中中輟生已經讀了兩三年中輟掉很可惜，璞玉計畫就是要把這些中輟生找回來。有一個趙次長找我談這個計畫，我聽了感動流眼淚，我的台北縣有5800個中輟生沒找回來。璞玉計畫中，每找回來一個中輟學生教育部補貼班導師一千元，我說，台北縣再補貼一千元。後來找回來5400個，讓他們做職業訓練，像是去學做麵包，女孩子去做頭髮的也很多。

我卸任後，有一天在蘆洲路上遇到有一個金頭髮的女孩子，叫我縣長，她說她就是璞玉計畫找回來的學生，她現在在曼都當設計師，今天剛好她得獎要慶祝，叫我一起去，我就真的去了。她的父母離婚，父親又過世，後來姑媽帶去養，姑媽兒女多，常被表兄弟姊妹看不起，她就逃學，璞玉計畫找她回來，開拓了她的新人生。

這個璞玉專案，最有功勞的就是勞工局長郭吉仁（1944-），他做這件事真的了不起，璞玉專案是找經濟部的職訓局訓練，便當是縣府出的，大概三、四個月，就是國三下學期，學生不上學可以，但每天要去職業訓練。教育局長鄧運林就是因為璞玉專案成功，後來被找去當佛光大學校長。

莊碩漢的岳父是朱朗陽校長，中低收入家庭的營養午餐費用是由台北縣編預算，這也是張國龍與林玉体的功勞，朱校長每天跟五、六個學生一起吃便當，很多都是中低收入戶又隔代教養，他就輔導他們。

抵抗關說

蔡丁貴局長也做了一件事。1993年，連任選舉的前一個月，文化中心主任劉峯松拿一幅中時晚報的廣告打樣給我看，是李敖要威脅我，說新店玫瑰中國城建案，國民黨時代縣府第一二期都讓它過，房子也賣了，第三期尤清不讓它開發。我就把這個廣告打樣拿給國宅局長蔡丁貴，叫他找兩個專家學者去看一下檔案和現場，看我們工務局阻擋這個案子有沒有道理。他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去看，回來後他說這個開發案不行，坡度太大。我說，那就得罪了。我跟劉峯松說，縱然這張登出來讓我因此落選，我也認命，我尊重專家。

有一位在台派圈子很有名的周文治先生，他每年都會請很多台派的教授學者吃飯，有一次他找李鎮源院士來跟我說一件事，他蘆洲有一塊地，有一個角落被前任縣長列入重劃，到我當縣長就要分土地，他的土地也要重劃負擔，大概損失一百坪，是一個工廠的守衛室列入重劃區，他認為這塊地有建物，不要列入重劃，他要分回100%土地，別人只能分55%，我不肯讓步，我就跟周文治和他太太說，他又不差這三、五百萬，但這塊地他拿回去的話，我們都會被告違法，我們一輩子都要打官司。以前的縣長留下來的地政局長說，你縣長就是下條子我也不敢准，換了兩三個局長都這樣說，我怎麼敢准？

台北縣與LA縣結姊妹市，有一個僑胞叫陳立夫也曾經來跟我關說，山佳火車站那邊有容積率設限，只夠蓋到四樓，縣政府核照時沒注意設限，讓建商蓋了八層樓，蓋到兩層樓時，縣政府

要他停止蓋，但他照樣蓋好把房子賣掉，五樓以上接了水電就變成違法。我就找張政雄律師去研究怎麼辦，他提出幾個方案，第一個是報請省政府網開一面，讓違建變合法，這被省政府駁回；第二個是五層樓以上的部分要拆掉，縣政府要賠償，但買方不肯，因為買方說賠的錢也買不到新房子，那麼我就堅持加蓋的五樓以上就不合法。堅持守法，不怕得罪人，雖千萬人吾往矣！

高雄的林永堅副市長是我推薦給謝長廷，他來感謝我，問我做八年怎麼沒被抓，我說第一個要合法，第二個要公平處理，第三個不要拿人家一毛錢。我期待，也如此要求從政的朋友。

參選黨主席

2010年4、5月間我和蔡英文（1956-）競選民進黨主席，我跟蔡英文沒有任何恩怨，但我挑戰蔡英文是因為我覺得她違背黨內民主，她幾乎放棄黨員投票，說是為了怕黨內初選有人買票，怕被司法迫害，我覺得這些都是藉口，國民黨難道沒有嗎？大家應該要面對，這些買票的人應該通過司法的檢驗把他淘汰掉，但黨內民主是核心價值不該放棄。

民進黨本來就是本土政黨，本來就要擔當以台灣為本位的重責大任，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認同民進黨、認同台灣建國的理想，民進黨有義務訓練民主的講師到台灣各地去散布民主的種子。蔡英文做主席的兩年，也許她正盤算未來要選總統，一些安排是為了選總統。她做「十年政綱」應該予以肯定，但看起來就是為了

總統選舉鋪路，總統候選人肩負大局但會有私人的野心，但黨主席應以黨為重。

「十年政綱」應該是行動綱領，她提出的時候正逢五都選舉，我挑戰她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提五都選舉的選舉綱領，因為五都選舉是台灣政治結構的地盤大變動，她那時是黨主席還在猶疑究竟要選北市或新北市，她也在想未來要選總統。黨主席該做的應該是號召全國的人民來思考台灣的前途，而非只圖自己競選而已。

我挑戰蔡英文第一個就是要求黨內民主，要恢復黨員選舉，國民黨的服務站都設立到了村里，你民進黨還把鄉鎮市黨部撤掉，等於人家在布樁你卻在拔樁。提名公職候選人要黨員投票，是黨內民主的核心，你居然把它廢掉，都用民調，這是笑話，全世界哪有用民調在決定提名的？德國是普設民主學校讓要參加黨的人或是關心社會的人來加入，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就批評她這幾點，我知道我選的時候，人家跟我說你頂多拿百分之十，我說沒關係，看看能不能為民進黨注入一些活水。我覺得民進黨敗選後，蔡英文接的兩年就是一灘死水，沒有建立大的方向、大的格局。

雖然我挑戰她，但她選新北市長，在土城海霸王餐廳募款餐會，我親自帶一萬元去共襄盛舉。當然她選總統我也去新北市，甚至帶了八個好友去中壢拉票。

如何在創黨的理想上因應社會變遷

康德說，人不要成為客體，要作為主體，人不是工具，是目的。德國的基本法重點就是國家為人而生存，不是人為國家生存。不管任何政府、任何政策應該以台灣人民作為主體，以台灣人民大多數的意願作為走向。台灣人民的意願有被蒙蔽誤導之虞，中國媒體又介入台灣，選舉也介入台灣，民進黨要思考如何將真相勤擦拭？

台灣人的「本願」已經惹塵埃了，民進黨要去勤擦拭，把我們台灣人要如何「當家做主」講出來，這個「當家做主」就是建國理想，是最高的價值，台灣的人民也有這個意願。惹塵埃就勤擦拭，我們不能放棄，對中國來說，我覺得中國沒有這個力氣也不敢冒這個險對台灣動武，但它會從台灣內部策反。

謝長廷說的「一中」憲法其實使台灣跳入一中陷阱，本來國家主權外人不能干涉，要殺到血流成河才會被干涉，就像維吾爾人說我們要（從中國）跳出來，台灣人怎麼還要跳進牆內？謝長廷說的，一個政治體一定要有最高規範，但在憲法之下是否要承認一中？

最根本的就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台灣關係法認為統治體就是地區人民要組成政府統治，這就是統治當局，也就是事實國家，無論是事實國家（de facto state），或是法理國家（de jure state），都是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禁用武力原則所適用的國家，中國對台使用武力，就違反聯合國憲章。既然是事實國家，

就不要去計較是叫中華民國憲法還是台灣憲法，就是在一個最高的法規下去治理。馬關條約後人民還有選擇國籍的權力，戰後我們卻沒有選擇機會，但是今天我們不需要自己跳入一中陷阱。

社會變遷與法律變遷交互作用，社會已經變遷，但法律還沒變遷。在1980年美麗島大審之後，有一天康寧祥帶林濁水、林世煜來找我，他們所問的問題，現在民進黨也面臨一樣的問題。社會已經變遷，但民進黨與社會互動不足，沒有趕上社會變遷，民進黨應該要站在創黨的理想例如民主、公義、人權、法治、甚至台灣獨立的立場。但社會在變的部分像兩岸以前是對立，現在是交流頻繁，台灣又受到中國大陸的經濟影響，中國甚至介入台灣的媒體。社會、經濟也正在變遷，民進黨如何站在變遷的浪頭上，這是民進黨要思考的，如何能堅持創黨的理想，也能因應社會變遷，找出好答案而不失立場。

我們回憶陳水扁執政時代，選舉之前也有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黨代表大會又通過當前政治、經濟等好幾個決議文，這些決議文都是要呼應當代社會的變遷。蔡英文當主席選總統時還密集地開「十年政綱」的會議，之後最近（2013年）一、兩年整個民進黨對於行動綱領、基本綱領都沒有再進行跟社會的互動。2014年的五都選舉及2016年大選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應該要趕快對於行動綱領、甚至基本綱領做全盤的檢討，不管是要十年政綱或是修改行動綱領，或是提出2016年的選舉綱領，要趕快用黨綱回應社會的需求。

目睹艱辛苦難，矢志守護台灣

田秋董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林志晟

時間：2013年8月7日 15:50 - 17:30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 809 會議室

田秋董，1954年出生於台南市。自幼受其父田朝明醫師、郭雨新、李萬居等人影響，於就讀台灣大學哲學系期間就積極參與黨外競選活動。於擔任林義雄秘書期間，發生林宅血案而為第一目擊者。田女士曾任台灣環保聯盟宜蘭分會創會會長、宜蘭縣環境保護聯盟火力發電專案小組召集人等社團要職，長期關懷環保、食品安全等議題。2004年受民進黨提名出任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復於2008、2012兩度蟬聯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我父親是「一人軍隊」

我是台南市人，於1957年5月27日在台南市省立醫院出生。之所以在這裡出生，是因為我父親田朝明（1918 - 2010）在此任職服務。父親於36歲高齡才盼得我的到來，自然高興無比，對我疼愛有加。我幼時對自己名字感到十分好奇，有一次就問父親：「堇花是秋天開的植物嗎？不然為何將我命名為秋堇？」父親則回道：「堇花是春天開的美麗花朵，非常漂亮，貼近泥土，是一種非常謙虛的植物。但妳對我而言，就像是秋天綻開的堇花般珍貴，因此替妳取名為秋堇。」所以我從小就非常在意大家是否能夠正確書寫「堇」字，而不會誤植為革命烈士秋瑾的瑾。如果我的名字被寫錯了，父親會非常不高興，因為他覺得錯字與他原意無關。父親對我的殷切期望及用心，可從他替我命名的含意中獲知梗概。

父親非常有文學涵養，渾身散發著詩人魅力。不過出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父親，生不逢時，身處亂世，在日本人禁止台灣人選讀文學相關學科的歷史背景下，終究未能擠入東京帝國大學的窄門，只好就讀東京醫學大學，走上懸壺濟世的路。我每次和弟弟談到父親的經歷時，都十分慶幸父親擔任醫生，不然依照父親大鳴大放、疾惡如仇，連爬山旅遊都會發出不平之鳴的性格，生在蔣家威權統治下的我們，很可能會淪落街頭，無家可歸。

父親原先在台南行醫，因故舉家搬遷到花蓮，因此我在花蓮度過生命中第一個生日，而母親也在花蓮懷了弟弟，替我們家帶來另一個新生命。後來父親對國民黨處理廖文毅一案的方式非常

不滿，一氣之下，辭職搬回台南，一度生活沒有任何著落。因此，父親的友人曾向父親打趣地說怎麼會有醫生沒有工作？隨後，由於父親得過肺結核，對於處理這種疾病很有經驗，所以父親被聘到台北市立醫院服務，我們又因此從台南搬到台北。

父親任職於台北市立醫院期間，因醫治了一位來自中壢的民眾，而該民眾感謝父親，並向他說中壢一帶沒有好醫生，希望我父親能夠到中壢替他們的鄉親看診，守護他們的健康，於是父親又帶著我們全家移居到內壢，直到我小學三年級時，才又遷回台北。由於我小時曾多次遷移住所，所以日後我踏入政壇開始演講時，就多了許多可以和群眾互動的話題，到處都可以跟當地的選民訴說我曾經在該地成長的經歷，藉以獲取他們的認同與支持。有趣的是，雖然父親十分痛恨腐敗的國民黨，並屢屢出言痛斥他們的腐敗，但因他的醫術高超，即便搬到內壢後，附近的警察與校長還是會來請父親看病。父親知道政治犯及其家屬十分可憐，並認同他們對於台灣民主發展的貢獻，所以他們如果來家裡看診，父親從來不向他們收費，有時甚至還自掏腰包幫他們繳學費。

父親一向過著清教徒式的生活，不給我們零用錢。他認為我們已經有得吃，有得穿，為什麼還要帶錢去學校呢？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帶錢去學校過。因此，當我看到父親拿著一大筆錢資助政治犯或其家屬時，心中感到十分訝異！讀大學時，擔任郭雨新秘書多年的陳菊送了我一套《娃娃看天下》漫畫，並說書中的主人翁瑪法達過著和我一樣的生活。

我一直覺得父親是一人軍隊（One Man Army），用著他的身心，獨立對抗整個不公不義的國家體制，絕不屈服與妥協，所以一路走來艱辛無比。當然作為他的伴侶，也就是我的母親田孟淑（1934 - ）自然亦相當辛苦。他們兩個非常恩愛，雖然有時母親會埋怨父親讓她過著這麼艱苦的日子，卻依舊陪著父親過著戰鬥式的生活，支持他不斷耕耘未完的理想。

早年親近李萬居、郭雨新

我小時候看見父親看完診後，就會從抽屜中拿出一張小紙條交給病人，心中感到十分好奇，卻又不敢詢問。後來問了母親，才知因為父親每日忙於看診，無法替黨外黃玉嬌（1919 - 1999）挨家挨戶請託，只好透過看診時發放傳單替黃拉票，請病患能支持黃。不過我當下實在不懂何謂「黨外」？

約此同時，《公論報》主筆倪師壇被國民黨政府以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為由而逮捕，父親見狀後毛遂自薦寫了封信給李萬居，表示自己雖然中文造詣不高，但願意奉獻心力幫忙，兩人因此產生友誼。我記得母親曾告訴我，以前《公論報》的送報僮會被警察欺壓，只好跑到我們家尋求庇護。由此不難想見當時黨外人士為了捍衛言論自由，遭受多少困苦。

我們剛從內壢搬回台北時住在泉州街，離李萬居住家非常近。李常請他的三輪車伕來家裡接父親到他的住宅替他看診，我也跟著父親去了幾次。他家在螢橋國小旁，是一間美麗的日式房



田秋堃女士（後排左三）攝於郭雨新家中。（邱萬興 提供）

屋，養了很多可愛的狗，可惜後來遭到祝融之災。據父親的說法，應該是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刻意縱火所造成的，具有濃厚警告意味。我從小就不斷聽到父親強調李萬居的為人令人敬佩，他大可跟著國民黨政府一起為所欲為，享受榮華富貴；可是李始終不願意配合國民黨，也不願屈服在他們的淫威之下。據說李萬居在家裡準備了一包隨身行李，如果國民黨突如其來要逮捕他時，就可以從容不迫地拿著行李入獄。

其後，我們搬到民權東路，到我高中時，又遷到雙城街上，和郭雨新（1908 - 1985）家可謂比鄰而居。由於地利之便，父親常到郭家替郭雨新母親看病，我也經常跟著父親到郭家拜訪。我記憶中的郭雨新是一個謙謙君子，講話溫文儒雅，非常和善斯文，舉手投足都散發著紳士的氣質。我們家的孩子考上聯考或

者有其他好表現時，他都會請陳菊送來鋼筆等賀禮，以示祝賀之意。

有一件事情讓我對郭雨新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某天父親在家和郭聊天時，我意外發現家中客廳桌上怎麼多了一個煙灰缸。因為父母親都不抽煙，家裡突然多了一個煙灰缸時，我當然感到驚訝。等到郭離開後，我去問媽媽為何要擺放煙灰缸？母親才告訴我郭對陌生環境格外謹慎，有時談話的內容不便口述，只能用寫的；等寫好讓父親看完後，就立即燒毀成灰，避免留下證據，而煙灰缸的功用就是拿來盛裝紙條灰燼；我也曾聽郭的秘書說過，郭如果在外用餐，絕對不坐在背對門口的位子。為求安全起見，小心駛得萬年船，似乎是郭雨新經年養成的習慣。

其實我十分感謝父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讓我接觸到郭雨新、李萬居這群台灣政壇的菁英，並看到他們永不屈服於當政者的高風亮節，令我十分感動。對我而言，從小就不斷地聽到這些民主鬥士的日常生活點滴，他們的一言一行已成為我童年生活與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這卻變成我到學校後與同學格格不入的原因。因為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是理所當然，也是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實際典範。

不過每當我將這些民主先賢的生活經過說出來時，同學們總是一臉不可思議的表情看著我，彷彿覺得我是怪胎一般，並抨擊政治人物都是帶著虛假的面具，總是汲汲營營地追求名利。可是我十分不以為然，因為我看到的政治人物就是帶著理想永遠奮鬥不懈的人，也讓我體會到「堅持」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豐富的助選經驗

我之所以開始接觸選舉，起因是我們一群台大志同道合的好友，被郭雨新的堅持精神所感動，因此無畏國民黨政府的施壓，毅然前往幫助郭雨新發傳單。而我們選擇穿著台大制服的用意，就是希望打破國民黨抹黑黨外人士都是一群草莽的謊言。我印象中當時我是到板橋車站替郭雨新發傳單，而板橋車站是一個非常大的交通樞紐，由台北、基隆、宜蘭等地，四面八方來的車輛都在此交會，旅客攘來熙往，非常熱鬧，使得毫無助選經驗的我不知從何發起。只看到陳菊用著非常堅毅的眼神，以極為誠懇的態度將傳單送給每位旅客。

有一次我看見他將傳單遞給一位老兵，並說請他支持郭雨新時，這位老兵卻當著陳菊的面將傳單用力地摔在地上，還發出「啪」的一聲巨響。當下我被嚇傻，完全愣住，不知所措，生氣、羞辱的感覺湧上心頭。不過我看見陳菊立即俐落地彎腰將地上的傳單撿起來，並對著老兵道謝，隨即將傳單發給從旁經過的旅客。這件事對我做了身教示範。它給我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傳單內容必須能夠說服我自己，才可以無愧於心、昂揚地發給每一位民眾。

1973年，張俊宏等人宣布角逐台北市議員，並組成無黨派聯合陣線，康寧祥遂來家中和父親討論競選事宜，並請剛考進台大的我去替張俊宏散發傳單。雖然此時的我沒有任何助選經驗，但還是聽了長輩的話，前往張位於萬華的競選總部幫忙發傳單。我到了張的競選總部後，覺得當中有許多成員是國民黨派來的間

諜，他們身上並沒有「黨外人士」的特質。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願意主動來幫忙黨外人士選舉的學生，都理解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可怕，遂懷著兢兢業業、忐忑不安的心情，低調地協助選舉事務；而不是像張競選總部中的某些成員，總是高談闊論、嬉笑怒罵，唯恐天下不知的張揚態度。兩者的心境、眼神乃至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但我們只是誠心來總部協助與幫忙，不便多加揣測與猜疑，只希望自己的猜測是錯的。

我還記得當時張的競選總部每天發給我們二十塊錢的餐費，讓我們到附近的自助餐店用餐。二十塊錢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筆非常大的數字，父親也很少給我這麼多的零用錢。我覺得張需要募款才能得到這些微薄的競選經費，得來不易，所以非常珍惜這些錢，心中總是想著要如何幫忙節省開支。後來我心生一計，利用從公館前往萬華前先買好兩個單價五塊錢麵包，並在公車上吃完，等到下車時總部人員問我是否吃過飯，我就說有，藉此替他省下些許支出。

我印象中張落選當天晚上，被我懷疑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的那群人，還走過來向我們威脅說我們慘了，一定會被政府逮捕。他們那種輕佻，視我們為亂臣賊子，亦無視於民主政治的可貴的態度我依稀記得，永難忘懷。他們的作為正好說明我們是身處兩個不同世界的人。事實上，我對於張的落選感到非常難過。不過平心而論，他的台語演講還無法感動人心，技巧仍有待加強，因此不易取得民眾的認同與支持。但等到他回南投競選省議員時，他的演講魅力就大幅增加，理論及實務兼具，整個人猶如脫胎換

骨般。

1977年，張俊宏回南投參選時，許信良在故鄉桃園角逐百里侯，林義雄也出馬回宜蘭競選省議員。在陳菊的協調下，我一開始是先到宜蘭幫忙林義雄散發新書《虎落平陽—選戰！官司！郭雨新》的傳單，¹順道為林的競選暖身。平心而論，林是第一次發傳單，他的經驗還不如我豐富。他在考慮效率的狀況下，要求我們要快速地將傳單發給民眾；不過依照我的經驗，散發傳單時帶給群眾的感受，攸關收到傳單的人是否決定支持傳單上的候選人，所以不宜草草了事，必須極為誠摯用心。因此，我發傳單時一定會向收傳單的人親口說聲：「拜託！多謝您的支持，請您要好好看一下傳單內容。」所以我發傳單的速度就遠不如其他人。結果我們兩人就產生意見不合，還勞動姚嘉文當和事佬，希望我們別造成口角。

後來陳菊發現張俊宏處無人幫忙，選情堪慮，而林義雄還能接收郭雨新所留下的人脈班底及資源，不至於匱乏，因此陳就情商我是否能到張處協助競選，於是我立刻趕往南投，發現確如陳菊所言，沒有人襄助張俊宏進行選戰，南投可謂是黨外的一片荒漠。張的父親張慶沛是校長，也是地方聞人，一開始並不支持張出馬角逐省議員，等到他的聲勢漸有起色時，他父親的學生才開始偷偷幫忙。

第一個出面幫忙張俊宏的人是他的弟弟，他弟弟找了一群沒有考上大學的朋友協助開宣傳車。當時的環境真的非常險惡，不

1. 林義雄，《虎落平陽》（台北：林義雄、姚嘉文，1977）。

僅張貼傳單的漿糊都需要張的後母出面設法處理後，再交給我們協助張貼在公告欄或電線桿上；張也只能在外租了一間相當簡陋的小房子，讓我們這些助選人員與義工有個棲身之所。我記得某日辦完造勢演講後，我們和候選人去吃宵夜打牙祭，但因連日疲累不已，體力不支，我幾乎是睡著走回到租屋處。

在協助競選的過程中，我也學會了許多事情，例如投票當天必須安排監票人員，防止有心人士從中舞弊，上下其手。不過當時我經驗不足，沒有設想到每個投開票所均應設置一名監票人員，並需總部提供一整天餐飲的問題，直到投票前夕有人提出問題時，我才驚覺此事似乎還沒有安排妥當，也不知如何辨識屬於自己陣營的投票人員。

經過討論後，有人給予建議，讓己方陣營的監票員將大拇指放在褲子口袋外側作為辨識記號，而這個方法也順利讓我們完成監票作業。不過幾年後，我因故到南投辦事時，有一位民眾跑來跟我抱怨說：「田小姐，我是幾年前幫助張俊宏監票的人。我整天都將拇指放在褲子外側，卻一直看不到有人替我送餐飲，又怕國民黨作票，不敢擅離職守，害我整日粒米未食，滴水未進，也沒有上廁所，差點暈倒在投開票所內。」讓我對這位民眾感到非常抱歉。

雖然張俊宏取得勝選，不過在桃園爆發了震驚國內外的「中壢事件」。當時張認為即便許信良勝選，也難逃國民黨的做票手段，除非票數相差懸殊，讓國民黨無法公然做票，以狸貓換太子的方式取得勝利。我覺得中壢事件爆發後國民黨發現眾怒難犯，

不敢公然做票；雖然他們有時還是有舞弊嫌疑，但比較不敢像以前一樣在大庭廣眾下公開為之，所以許多黨外人士如張俊宏、林義雄等人能夠憑藉自己實力獲得勝選。

林宅血案的第一目擊者

張俊宏及林義雄等人當選省議員後，我就回到台北。這時陳菊問我是否有意願擔任林的秘書，替他處理選民服務及各項庶務工作。我心想雖然自己畢業後曾到父親友人開設的貿易公司做事，但對這種一成不變的商業生活甚感煩悶，於是就答應陳的提議。我開始工作一陣子之後，有一天姚嘉文突然問我說願不願意去幫他，並問我林提供多少薪水給我？這時，我才想到我住在家裡也吃家裡，基本上不會用到錢，因此從頭到尾沒有跟林義雄提過薪資問題，所以姚要我去和林談談。後來林想了想之後，跟我說三千塊是否足夠？由於我沒什麼慾望，聽到林願意給我這麼一筆薪水，心中十分開心，就答應他了。

我擔任秘書的主要工作內容是陪林義雄回宜蘭進行選民服務。我剛開始替他工作的時候，他的法律事務所員工曾要求我一定要提醒林準時用餐，不然他會忘記。結果沒想到，後來是林常常提醒我要準時吃飯。林對我有所期許，他希望我能夠緊跟在他旁邊學習，目的是將我訓練成第二個陳菊，或者扮演他的分身，替他回宜蘭服務鄉親。另外，有時我也會陪同他到省議會，主要是替他執筆完成《從蘭陽到霧峰：瞧這個省議會》一書。² 其

2. 林義雄，《從蘭陽到霧峰：瞧這個省議會》（台北：林義雄，1978）。

實他在省議會已和張俊宏合請邱義仁（1950 -）幫忙擬訂政策，實在不需我代勞這些事情。後來發生美麗島事件，林隨即被捕入獄，我就無法繼續幫他工作，所以我擔任他的秘書時間約一年多而已。但更不幸的是，林義雄入獄未久，就發生慘絕人寰的林宅血案。

就我所知的狀況來說，血案發生的前一天，我和蕭裕珍（1956-）陪同方素敏前往拜訪陶百川（1903 - 2002）等人，希望他們能夠對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給予援助。不過回來後時間已晚，方因考量安全問題，遂邀請我們兩人當晚住在林宅，也便於翌日陪同她去景美看守所探視林義雄。隔天上午，蕭有事先行離開，由我陪方前往景美。

我們上午到了景美看守所後，由於只有家屬能夠和入獄者會面，因此我就在會客室等候方素敏。結果她告訴我獄方當天早上並沒有讓林義雄與她會面，因此她急著趕回家照顧母親及女兒。不過我勸方說雖然獄方早上沒有讓妳們見面，不過下午要臨時開庭，林一定會出席。而在這種艱困的時候，他特別需要我們的鼓勵與支持。如果他看不到我們出現，心中可能備受打擊，產生種種負面想法，這對他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請方務必留下來等候。後來方素敏聽從我的建議，而我也想知道開庭的狀況，於是我們兩人就跟著其他家屬一起到附近的餐廳用餐。

由於當天時間緊迫，我沒有吃早餐，加上景美看守所內也沒有東西可吃，所以一到餐廳後，飢腸轆轆的我就先吃了幾口辣味小菜。吃沒幾道菜後，方素敏神色匆匆地跟我說她打電話回家怎

麼都沒人接？可是我一點也不緊張，因為以前我在林位於仁愛路的律師事務所工作時，有數次林或方打電話回家沒人接，就請我去家中幫忙確認情況，結果孩子們就在門口玩耍，任由電話響個不停，所以對此不以為意。但方認為事有蹊蹺，就把家中鑰匙交給我，請我趕回家中照顧孩子，於是我立刻搭著公車回去林宅。

因為我空腹吃了摻辣的小菜，還沒回到林宅時就感到腸胃不適。後來我進到客廳後，覺得一如往常，沒有變化，於是就想先到昨天睡覺的主臥室休息一下，結果我一進臥室，就看到臉色慘白的奂均（1971 -）躺在床上，似乎非常不舒服。當時她上半身穿著卡其衣以及一件毛衣靠在床邊，下半身接觸地板，面朝門口，像是走到床邊後突然體力不支，趴在床邊睡覺一樣。

這時，我突然想到專精小兒科的父親曾告訴過我，學齡前後的孩子應該活力十足，活繃亂跳。如果孩子沒來由地臥床而睡，一定是身體不舒服才會這樣。所以我立即快步走過去摸摸奂均的額頭，但沒有發燒現象，於是輕輕地搖了她一下。沒想到奂均回我說：「阿姨您別搖我，我好痛唷！」我一開始以為她是跌倒受傷，不過看了一下她的長褲，並沒有發現跌倒的傷口，便問她怎麼了？她才用虛弱的聲音跟我說：「有小偷跑進家裡，還拿刀從後面刺我。」我馬上檢查她背後的傷口，而這一幕猶如電影定格的畫面，永遠存在我的腦海中。

我察看她的背部，發現她的卡其衣有一道傷口非常深，而衣服破損造成的線頭十分整齊，彷彿是被利器快速劃破。想起父親曾教過我們的簡單醫學常識，我不敢輕易移動奂均，就問她是否

知道妹妹在哪？她說她不知道，而且她很口渴。我忽然想到大學上護理課時，老師曾提及不宜讓有內傷的病人飲用整杯水，怕造成更大影響。當時我身上剛好有手帕，就用手帕沾水潤濕她的嘴唇，並讓她輕輕吸吮。等到她喝得差不多時，我告訴她我要去找一下妹妹。不過奂均非常害怕，深怕我就此離開家中，一直叫我別離開她，我則輕聲安撫她，告訴她我馬上回來。於是我立刻起身去找這對可愛的雙胞胎，甚至連冰箱也曾翻過。

我在家中找尋雙胞胎的時候，除了先打電話通知一一九派救護車來，也刻意發出聲響，讓奂均知道我沒離開，也意圖讓兇手知道已經有人回到家中，讓對方知難而退。不過沒想到負責監視林義雄住宅的大安分局非常可惡，當我向他們告知林義雄家中發生事故時，接聽電話的員警卻以無關痛癢的輕蔑態度說道：「是哪個林義雄啊？」

過了好一陣子，終於有人來按門鈴。我一開門，發現是一位外省籍人士，他說他是大安分局的人。我心想兇手這時應該還不曉得我已經通知大安分局了，於是就讓這位員警進到房子裡面。同時，雜誌社的江春男（1944 -）、林濁水等人也趕到現場了。員警進入屋內後，好整以暇地四處走動，一副無關緊要的樣子。可是更令人不滿的是，當救護車抵達現場後，救護人員兩手空空進來，想以徒手將奂均搬上救護車，我立即出言阻止，並要求他們以擔架將奂均抬上救護車送醫。

我不但慶幸是警員先到林宅，不然他們可能會栽贓我與林濁水等人破壞第一現場；更沒想到救護車是將奂均送到仁愛醫院，

而當時的仁愛醫院院長柯賢忠是胸腔科權威，終於救回奂均一命。如果當時救護車把奂均送到台大醫院，後果未可逆料。後來林義雄及方素敏前往向院方致謝時，院長曾表示如果傷口再深一點點，可能就回天乏術。對此，奂均之後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說她回家放好書包，轉頭間突然看到兇手正要下手，所以本能性地往側邊移動，可能因此沒有完全命中。然而奂均移動身體，兇手還幾乎能不偏不倚地刺中她，顯見兇手是職業級慣犯。

當局隨便嫁禍

其後，負責共同偵辦此案的台北市刑警大隊小隊長告訴我，他們在樓下找到林母的遺體，並在她腳旁發現台灣話俗稱的「腳尾錢」，是職業兇手的慣用手法；另外，他還追問我是否認得原來放在臥室內的棉被，是放在臥室內，還是地下室。由於我們昨天才蓋過這床棉被，因此印象深刻，所以告訴他棉被本來是放在臥室。後來他才說他的目的是想確認這床棉被原來的位子，藉以判斷兇手的意圖。因為兇手用這床棉被在地下室覆蓋大體做法，符合職業殺手殺害他人之後，以棉被包覆遺體，避免他們的魂魄回頭找兇手算帳的習慣。奂均也提到兇手刺傷她後，曾用棉被蓋住她。綜上幾點，兇手是職業級的殺手應該無誤。

不過或許天祐吉人，奂均被刺傷後一度昏迷，但她清醒後，怕兇手發現，所以默默地爬起來將她的房門反鎖，並想爬上書桌向外求援。結果沒想到因失血過多，體力不支，摔到窗外與家中

圍牆隔成的畸零三角形空地內。而這塊三角形空地末端是通往林義雄及方素敏的主臥室，日常用一道附有喇叭鎖的門鎖住，以防止宵小。幸運的是，當天不知為何，門居然沒有鎖住，所以當她摔到三角形空地時，還能艱難地爬到主臥室躲避兇手，並且讓我發現，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而這種巧合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可能就無法救回奐均的寶貴性命。因此，我最終只能歸因於天意如此！

據奐均所言，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常有許多她不認識的人來家中向她母親表達慰問之意，因此兇手尾隨剛放學的她進入家門時，她以為是這類親友，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不過沒想到她進到自己房間放好書包後，兇手就殘忍地對她痛下毒手，她根本來不及看清楚兇手的廬山真面目。後來警方製作筆錄時問她兇手的面貌及身材等特徵，自然也就無法給予具體描述。而坊間盛傳有一位大鬍子是兇手，絕對不是奐均或我所說的，應該是有心人士想要轉移焦點，才嫁禍給素與我們交好的家博（Bruce Jacobs）。

血案發生不久後，警方來向我偵訊，我告訴他們因為林義雄家中被警總監聽，所以他們可以去向警總調閱林家的通話錄音，就能釐清血案發生前後究竟有什麼可疑人士在林宅出入；而我自己案發後只撥了兩通電話，一通是打給一一九請求支援救護車，一通是通知我父母趕來幫忙當時身無分文的我。可是沒想到他們的長官直接告訴我說，他們曾向警總提出請求，但警總回覆並沒有這些錄音。

不過我對警總的說法十分不以為然，因為我家就曾經被警總監聽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通話過程常有不知名的吵雜聲響出現。後來父母親心生妙計，如果想要談論重要事情，就去使用住家外面的公用電話，一來避免監聽，二來不至拖累不知情者。可是沒想到某天母親接到一通無名氏打來的電話，質問母親家中怎麼會突然減少通話量？母親非常生氣，對他說這不關你的事後，立即將電話掛斷。警總如此膽大妄為、無法無天的囂張行徑，反應出當年的時代氛圍。

此外，林濁水也和我說過有次他在電話中提到友人「蔡文章」之名，沒想到警方居然迅速地來找他詢問「燦章」是誰？這時他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監聽，只是監聽人員沒有聽清楚，誤將「蔡文章」聽成「燦章」所致。不然這些情治人員怎麼會知道他與友人的對話呢？

林宅血案發生多年後，我曾以宜蘭縣縣長夫人的身分與台北市刑警大隊聯繫，表示希望調閱我當年針對林宅血案所做的筆錄及其他證物，但承辦人回應他只能讓我看自己的筆錄，其他則愛莫能助。這名承辦人也坦白向我說這些資料後來全放在他們的地下室，沒想到有一年颱風淹水，以致大部分資料遭到毀損；我認為林宅血案與洪仲丘案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證據在第一時間沒有被妥善保存，有關人士有時間串證乃至於滅證等等，真相根本無從查起，各種努力都是徒勞無功。馬英九（1950 -）當選後曾表示他將請有關部門重新調查林宅血案，我也針對此事召開記者會回應，抨擊他只是藉此搏名，毫無誠意，只是消費林宅血案。

而《牽阮的手》這部電影中對我目擊林宅血案一事描述基本上沒有失真，只是他們在卡通部分將我的頭髮畫得太短了。

組黨前後的我

我結婚前曾經參加過《八十年代》撰稿與編輯工作，等到婚後育有子女，不便出外上班，所以投稿《關懷》，協助貼補家計，後來也當過《深耕》的特約撰述。由於我和《八十年代》頗有互動，所以林世煜後來因故離開《八十年代》時，我就推薦我先生劉守成（1951 -）進來幫忙，同批的戰友還有簡錫堦（1947 -）、廖仁義等人。因此，我和劉守成自然也參加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劉甚至還當到幹事長。我記得我在醫院待產時，先生還陪著張富忠（1952 -）到南部開會。

其後，我們一群被國民黨封為「十八飛鷹」的幾位好友們，因試圖替黨外創造一個較有理論體系的論述空間，遂利用黨外作家編聯會的基礎，另外創辦了《新潮流》雜誌，我負責撰寫關於食品安全及環保等民生議題方面的稿件。

就編聯會與新潮流的性質而言，黨外作家編聯會成員屬性較為多元，只要是黨外雜誌的相關工作者都可以自由參加；而《新潮流》則較有一致性。不過當時我的長子還小，又懷么女，必須一邊帶孩子，一邊參與刊務，真的忙得不可開交。因此，批康或雞兔問題的論戰我並未參與。不過，日後外界仍將我歸類到新潮流系，我也不置可否。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派系問題並不重

要，我問政時還是以議題為主，有時候不同派系仍可能相互攜手合作。但新潮流系的優點就是凝聚共識，不分大小，唯理是尊，不會盲目服從，也積極栽培新血，所以吸引不少黨內同志加入。

其實我心中對於批康或者雞兔問題感到非常納悶，不認為這是重要的議題。因為我從小生長在充滿黨外人士的環境中，每一個黨外人士猶如自己家人般親近，要批判他們對我而言是非常痛苦與困擾的事情。可是其他成員覺得大家有必要把問題說清楚。不過，我想到韓國的黨外運動是以威權獨裁式的風格進行，所以如果有人願意和被視為台灣黨外領袖的康寧祥對話，提出不同思維交相討論，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坦白說，當時我的心情十分複雜與忐忑不安，深感是否有必要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來討論這些不同意見。

有一次我聽到邱義仁說台灣的黨外運動彷彿是一個循環，每當黨外勢力達到高峰時，執政當局就嚴厲打壓，以致黨外勢力漸趨消退，周而復始，永遠無法擺脫這種宿命，必須設法突破國民黨的控制，唯有採用他的方法才可能突破僵局。

雖然組黨前我未能參與相關籌備工作，但組黨後我立即在宜蘭辦理入黨手續，而我先生劉守成是宜蘭縣黨部第一任主任委員。當時他因為花了許多時間在編聯會的相關事務上，所以他的博士論文延宕甚久。到了組黨前後，終於接近完工階段，很快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不過他認為在這段漫長學習的歷程中，已獲得自己想要追尋的學問，所以不在乎學位，想專心投入黨務工作。面對他的抉擇，我和婆婆都覺得難以置信，我為了幫助他完成博

士論文還吃了不少苦頭。

其實我認為這時候先生已經有從政的念頭，並認為黨部主委一職將有助於他的從政之路。先生於 1989 年角逐第九屆台灣省議員時很吃虧，因為他除了是第一次競選經驗不足；加上他還是學生身分，不能上台發表政見。而我因當過林義雄的秘書，加上常主持地方活動，知名度比他高，所以他參與選舉時常用的頭銜是「民主進步黨宜蘭縣黨部主任委員」以及「田秋堇的先生」。

我在 2004 年開始擔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前，奉獻了絕大部分的時間與心力在宜蘭推展環保運動，如台灣環保聯盟宜蘭分會創會會長、宜蘭縣環境保護聯盟火力發電專案小組召集人等等。特別是當時利用火力發電是國家政策，我和幾位友人只能以微薄之力和國家機器對抗。幸好最後藉由單點突破的戰術奏效，透過將濕地劃為保護區的方式，迫使台電無法在蘇澳設立火力發電廠。這段抗爭時間長達約十年之久，只是這段歷程外界不甚清楚，連台灣環保聯盟也不知其詳。

其實我對宜蘭的環境問題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在與宜蘭縣政府並肩作戰反六輕的同時，依舊關注火力發電問題；等到六輕確定退出宜蘭後，我們再全力朝著火力發電議題努力。現在的宜蘭能夠擁有全國稱羨的青山綠水，是經過許多嚴苛挑戰而得來的艱辛成果。後來，我也開始關注生態保育運動，不過這個議題就更少人參與了。我覺得自己的生命歷程相當有趣，從民主運動走到環保運動，再從環保運動轉到政治運動，不過這些經驗都是相輔相成，讓我可以走得更加穩固。

值得順道一提的是，在反六輕的過程中發生一段趣事。台灣環保聯盟宜蘭分會要創立的時候，我其實並沒有接任會長的考量與安排，不過，熱衷地方事務的周家安老師在開最後一次籌備會時，跟我說如果我不接任會長，他就要向外界宣稱我拿了台塑集團的獻金，用這種方式逼我一定要接下會長職務，而這位教師後來也成為我的總幹事。

對於未來的展望

民進黨是否能於2016年重返執政，帶領台灣人民走向康莊大道當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民進黨應該讓台灣人民信任與肯定，讓大家覺得幸好有民進黨守護台灣，可是這個部分牽涉到個人的信念、價值與做法，所以各界的反應不一，褒貶互見。例如我們這幾天為了核四議題守護在立法院內，片刻不敢離開，深怕國民黨以人數優勢強渡關山，可是外界也有



田秋堃女士與母親一同參加台灣寶貝遊行活動。（邱萬興提供）

質疑我們的做法是否有效，甚至有人質疑我們過去支持公投，為何現在轉而反對公投？但我們認為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應該主動出擊，破國民黨的「發球局」，不能讓國民黨為所欲為，也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對歷史與自己的良心有所交代。

我認為民進黨未來在擬訂任何宣言與政策前，務必考量這些動作對於台灣人民造成什麼印象，帶來什麼影響？人民才會認定民進黨的重要性。另外，民進黨也一定要深層反省過去八年執政不足之處，謙卑地面對錯誤與不足，進而誠懇地向各界報告檢討成果，認真回應各界的期待；至於國民黨所遺留的各種文化包袱與惡習，亦需除惡務盡。唯有如此，民進黨才有可能重返執政之路！

臨門一腳，催生台灣新政黨

朱高正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林志晟

時間：2013年8月27日 14:40 - 16:40

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辦公室

朱高正，1954年生於雲林斗六，於就讀台南一中時，已萌生政治意識，遂加入國民黨，並組織「易興復華會」與友人鑽研《易經》。1973年考取台灣大學法律系，於協助郭雨新競選時，與田秋堃等人同遭調查局提報校方懲處。後赴德國深造，專攻康德哲學，1985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86年，因競選立法委員參與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會議中倡言組黨，成為民進黨創黨重要推手。1990年退出民進黨，成立中華社會民主黨，復又改入新黨。近年密集往返兩岸，於中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黨校等校講學。

從雲林到台北

我於 1954 年出生在雲林斗六的糖廠原料宿舍。父親是斗六人，母親為斗南人。我一歲三個月時，因父親工作異動，搬遷至北港。自此之後，我就一直定居於北港，直到小學畢業，才離家到嘉義玉山初中讀書。我記得幼年住在北港時，常常去李萬居家中玩耍。

我的高中學業在台南一中完成，而我之所以選擇離鄉背井到台南就讀，是受到父親及大舅舅的影響。由於台南一中的前身是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一年只招收三十位台灣籍學生，是日治時代濁水溪以南最菁英的學校。而父親與大舅舅卻能突破重重困難，就讀該校，是相當光宗耀祖的事情，自然對我產生啟迪作用。經過層層考驗後，我於 1969 年順利考入台南一中，入學時還和十餘位新生一起獲得李昇（1917 - 2004，為國際知名導演李安之父）校長召見勉勵。

我讀高一時，父親退休，賦閒在家。我印象中父親閒來無事在家閱報時，常會有感而發，大肆抨擊當時社會的種種亂象，對政治、司法等層面尤感不滿。我看到父親如此地感嘆時，也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居然主動向父親說：「就由我來改變這種亂象吧！」父親聽到後笑答：「你這個猴崽仔，不知天高地厚。你講這番話可能會被當局找麻煩！」我第一次參與政見發表會，也是在高一。我記得當時聽到張博雅（1942 - ）的演講後，覺得她的口才實在不行；而後來當選立法委員的郭國基（1900 - 1970）演講就讓我讚嘆，深感「有為者亦若是」！可惜他上任不久就因直

腸癌併發尿毒症，病逝台大醫院。

我的政治意識萌芽算相當早，就讀高二時，已開始思考籌組新黨的政治問題，並鼓動其他同學一起加入青年黨或民社黨。我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兩黨合併，變相組織新政黨。某日，我意外從一位時常聊天的教官處得知他私下支持青年黨，還勸我：「朱高正，你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必須從碉堡內部瓦解碉堡勢力。」意圖鼓勵我加入國民黨。我聽了教官的建議後，從高二下學期開始加入國民黨。可是我才加入該黨不久，立刻就發現自己誤上賊船，黨內根本沒人認真研究三民主義，全黨瀰漫著歌功頌德、爭相吹捧的惡習。我一氣之下就將黨證撕毀，離開國民黨。

值得一提的是，我高三時和嘉義高中、高雄中學、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及鳳山高等五校二十餘位好友組織了名為「易興復華會」的讀書會，即以振興易學，恢復中華為共同理念。但國民黨政府非常反對人民組織團體，所以調查局等相關單位強力介入，一度還想對我栽贓罪名，幸好有老師願意出面力保我的清白，才逃過一劫。由此亦可知道我從早年就開始對《易經》產生興趣，並對我日後的人生觀及價值造成重大影響，更成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

後來，我和兩位雲林同鄉兼同窗好友一起考取台灣大學，分別考入醫科、中文及法律三系。然而在入學需繳交的相關表件中，有一個欄位寫著：「是否曾經入黨」，要求我們翔實填寫。我心想我雖然曾經是黨員，但早已不是，於是不予理會。不過到了大三時，因為我和友人囊括了除三民主義研究社與大陸問題研

究社以外的所有社團，其他校內主要的社團及刊物也都由我們主導，算是學校的風雲人物，引起校方重視，怕我們藉機肇事，所以開始約談我們。

校方經過瞭解後，發現我曾經加入國民黨，遂派專人前來和我接觸。我向對方明言，只要不追究我當年脫黨行為，並同意我的黨齡從高二下開始計算，我就願意恢復國民黨籍。對方表示同意我提出的各項條件，於是就發給我黨證。因此，我又重新成為國民黨黨員。順帶一提，我到台北讀書後，發現南北城鄉差異甚鉅，使得台北都市的孩子與南部鄉下小孩的想法、生活態度，都有著明顯的差異：台北孩子比較世故及現實，缺乏熱情的理想，也顯得自私；與此相反，鄉下小孩的特質是較為樸實，相對關心鄉土事務。

1975年，郭雨新參與第一屆立法院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時，我的幾位室友主動前往其競選總部幫忙。但沒想到我只去發了一次傳單，卻名列調查局提報台大校方懲處五人名單中的首位，另外四位分別是謝明達（1956-）、田秋堇、周弘憲、林嘉誠（1952-）等人。

當時擔任台大訓導長的俞寬賜教授知道此事後，就約我面談。我看到他時，未等他開口，便主動說：「報告訓導長，在您和我進行談話前，請讓我有機會先弄清楚，究竟您是代表校方，還是代表黨部與我談話呢？」他回答道：「我們的氣氛無須這麼嚴肅，只是見面聊聊。」我又說：「這件事情非常嚴肅。如果您是以黨部身分約談我，我們就改約時間地點再聊。」說畢，我就

轉頭離開，他的秘書立即快步追上說：「朱同學，訓導長也是奉命行事。如果你想要討回公道，可以向鄧傳楷（1912 - 1999），或是李煥（1917 - 2010）兩人陳情看看。」

我聽到這樣的訊息後，立刻打電話給李煥的辦公室。他一聽到是我打來時，立即接過秘書手上的電話，親自和我對話，並將原先預定的兩個行程挪開，只為了和我見上一面。後來我們兩人見面時，我向李表示：「蔣經國先生鼓勵社會人士參與選舉，豈知我因替郭雨新助選而成為懲處名單？究竟社會人士的定義為何？況且我從未參加郭競選總部的運作，只是替他發了一個上午的傳單而已，事後亦無任何聯繫。僅憑此點就要處罰我，我實難接受。如果我因此而受到處分，我將永遠退出國民黨！」

入伍服役

1977年，我大學畢業後入伍。我在當兵時發生了一件趣事，迄今仍在我服役的政戰學校流傳，此事源自於我為預備軍官學員舉行「革命理論座談會」。當時正炙手可熱、權傾一時的王昇，以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之姿，親臨復興崗主持會議，並於會場中不斷強調共產黨的可怕，藉以恫嚇與會者必須愛黨愛國。

由於上層規定座談會時，每個與會單位須依編制大小提出三到五個問題不等，作為討論的基礎，於是我的長官也命令我必須擬訂五個問題。然而座談會進行一個鐘頭後，我的連長低聲問我：「朱高正，你怎麼還不提出你的問題？」我回道：「長官還沒說

完話，況且也許是我擬的問題程度不足，人家沒興趣答覆。」

不過時間飛逝，一轉眼座談會的時間只剩十分鐘左右，我遂鼓起勇氣，舉手發問：「學生朱高正，有三個問題想請問王大將軍。第一個問題是您剛剛提到說，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均為十七、十八世紀的產物，共產主義則是十九世紀的產物。我們如何利用十七、十八世紀的產物對付十九世紀的產物？如果您剛剛這番話被有心人士操弄的話，恐將對反共復國大計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請問我們在台灣高喊復興五千年中華文化，如何對抗十九世紀的共產主義？」

我的第一個問題還沒有說完，隨即被王中斷，並要我提出第二個題目，藉以轉移話題。果不其然，第二個問題與第三個問題也都沒有等我說完，就遭到王的阻止。最後王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避實就虛，在對我略加稱讚後，還反問我是否對他的回答感到滿意？試問，我在現場能夠說「我不滿意」嗎？後來我的連長代為轉述時任政戰學校校長的朱致遠將軍（1922 - ）對我的看法，他說：「朱校長說你的問題提得非常好，就是太尖銳了。」自此，王昇不曾再親自參加「革命理論座談會」，而是改派副手廖祖（1921 - 1996）述中將與會。

負笈德國

我自軍中退伍後，本來要前往美國留學，後來因為韓忠謨（1915 - 1993）先生的勸告，而於1980年前往德國攻讀博士學位，

並於五年內完成學業。在當時德國的教育體制中，十年寒窗苦讀才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算是稀鬆平常，司空見慣。我則以五學期的時間完成博士論文，創下德國自二戰結束後唯一沒有延長修業年限就拿到哲學博士的空前紀錄。畢業前夕，提供我獎學金的艾德諾基金會問我有什麼願望。我向校方提出了兩個要求：其一是想造訪文明古國，看看不同文化的過人之處；其二則是希望和曾經領取同樣獎學金的前賢共同聚餐，向他們請益一些問題。經過他們的同意與安排後，我畢業回國前不僅和這些優秀前輩見面吃飯，還搭乘飛機到擁有悠久歷史的希臘、埃及與印度三國參訪兩個月，而於 1985 年 8 月正式學成歸國。

其實我回台後的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一開始我想要申請母校台大教職，不過青輔會不願出具推薦函，他們認定我的思想有安全上的顧慮，因此無法進台大教書。至此，我知道申請國立大學的職缺無望，乃將目標轉向私立學校。而東吳校方看到我是德國的哲學博士，願意敦聘我，並立即發聘書給我。可是過了沒多久，東吳校方也要求我補繳青輔會的推薦函。對此，我大感意外，並向校方提出質疑：「私立學校也需要青輔會的推薦嗎？」校方則認真答覆我：「就是因為東吳是私校，所以更需要這些資料。」

當時東吳校方規定必須要有十位學生選修才能開課，但東吳校方卻在第二學期勸說學生不要修我的課。幸好我第一學期教學的口碑不差，學生不減反增。一年結束後，校方婉言辭退我，卻沒想到有二十餘位學生在行政大樓靜坐表示抗議，不過我當時立刻出面安慰、勸阻這些同學，告訴他們不要為了我的小事影響自

己的大好前程。

我於 1986 年離開東吳後，台南神學院邀請我到該校講「西洋哲學史」。經過一年後，我對校方表示每兩週要去一趟台南，對繁忙的我是一大負擔，希望他們另請高明。不過沒想到我後來雖然接受校方的懇請，繼續開課，卻因為我與校方的政治意識型態不同，不支持台灣獨立，突然於 1987 年年底遭到無預警解聘。

參與黨外選舉

我返台不到一個月，就受到時任監察委員的尤清的邀請，希望我能加入他競選台北縣縣長的團隊。我們之所以產生連結，說來相當有趣。因為當時出身新莊的鄭余鎮（1946 - ）不滿尤清空投到他的地盤台北縣，因此伙同立法委員蘇秋鎮（1935 - ）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長約兩小時的座談會，意在醜化尤清，我也坐在會場後方觀察全場動向。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我一面舉手一面走向會場前方，希望取得主辦單位的發言許可。經過對方同意後，我開始分享我的想法，結果沒想到我講話不到五分鐘，對方努力精心布置的座談會成效就全部化為烏有。尤清從他人聽到這個消息後，就斷定這一定是朱高正所為，「只有他才有這種本事」，於是開始積極和我聯繫。

當尤清向我提出邀請時，我心想自己才剛回到台灣，對國內狀況並不熟悉，必須徵詢家人意見，所以回覆尤說：「請給我 24 小時仔細考慮後再答覆你。」在太太及母親不表反對的情形下，

我才答應尤。但我對尤提出條件，就是我不會上台替他助講，而是投入競選事務為主，我有自信這將比我助講更有功效。果不其然，同為台大法律系友的廖學廣（1954 - ）就被我成功說服，率先出面表態支持尤清競選台北縣縣長。廖當時是台北縣議會四十多位議員中唯一公開支持尤清的。

我記得開票當天傍晚五點半左右，我告訴尤清別被湧入競選總部的人潮所迷惑，那些支持群眾都是沒有選票的人，他應該會落選。如果他能拿到三成以上的選票，已經是相當亮眼的成績了。我勸他不但要準備敗選感言，還應該特別強調他將在三重成立服務處，展現他準備長期在台北縣深耕的決心。果然，日後他在三重重新路三段 333 號的服務處就是由我出面替他處理的。其後，尤清於 1989 年捲土重來，終於擊敗李錫錕獲得勝選。

1985 年底縣長選舉落幕不久，接著換廖學廣準備角逐台北縣縣議員，於是我勸尤無論如何一定要強力替廖輔選，不然日後沒有人敢力挺黨外人士參與選舉。為了拉抬廖學廣的選情，我利用尤清所留下的各項資源主動替廖輔選。我在台灣第一次替人上台助講，就是獻給廖學廣的這場選戰。他也不負黨外人士的期望，以九千八百多票高票當選。據說國民黨為了擊敗廖，曾以一票四千元的高價在他戶籍所在里進行買票。不過廖學廣令我相當失望，因為他高票當選就跑到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攻讀政治學碩士學位。這種選擇對選民而言，是相當不負責任的做法。王淑慧（1955 - ）也是在為尤清助選時奠下選舉的基礎。

1986 年初，尤清、吳祥輝（1954 - ）和我三人籌辦了《自由

台灣》雜誌，由我擔任發行人，希望藉此傳遞組黨的各種想法。這種做法自然遭到國民黨政府嚴加看管，我們每出刊一期，警備總司令部就來查扣一期，到了第八期已感力不從心。我們又勉強出刊三期後，覺得獨木難支，只好匆匆結束營業。在善後時，吳祥輝建議以一本三元的低價出售，我認為應提高至五元才不致慘賠，沒想到我們拿去南部販賣時，居然賣到三本一百元的天價，而且一時洛陽紙貴，南部群眾爭相購買，以致許榮淑一度翻印我們的過期雜誌，還引起吳祥輝不滿。

我處理完雜誌社的後續事宜就回到第四選區，也就是包含我故鄉在內的雲嘉南選區一帶，準備參與第一屆立法委員第五次增額立法委員的競選活動。在雲嘉南一帶轉了三、四週後，我評估應有力拚一席的可能性，不過當時黨外已有四、五人爭取提名。

其實當時有意出馬競選第四選區立法委員的人當中，有一位是我二哥的高中同窗好友。他於1986年北港大拜拜（農曆3月19日）時，在北港糖廠席開百桌宴客，我也前往參加。宴會結束後，他主動留下我三哥的電話，希望藉此和我取得聯繫管道。後來，他在國民黨提名截止登記的當天下午五點多打電話給我說：「朱博士，站在我和令兄是摯友的立場，我誠心建議你這種人才應該要出來競選。」後來我知道他自知無法力拚林時機，而林時機之子也相當支持我，所以推薦我參選。日後我與林時機見面時，他還再三叮囑我絕對不要讓外界知道他兒子是我的支持者。

我第一次收到的政治獻金，是一位大我一兩歲的企業家捐贈的。我還記得當時我在台南市的進學國小演講完後，這位企業家

帶著他大腹便便的太太走過來向我打氣加油，並說：「朱博士您好，我和太太商量過，願意捐贈二十萬元給您當作競選經費。」我覺得這個數字太過龐大，所以不敢收受。不過這位企業家說：「我已經聽了您十一場的演講，我太太也聽了十場，我們兩人覺得一定要支持你。」我心想對方的盛情可感，可是金額實在太大，於是我靈機一動，請他幫忙改善我的音響設備。不過，我沒想到他後來花了六十幾萬，比他原來預定捐獻的金額更多，讓我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我必須要特別提到的是，尤清對我很好，當我有意參選時，他曾將他監委一個月的薪水拿給我，讓我下鄉評估是否可以參與這場選舉。我也善加利用這筆經費，將其中五千塊交給一位張姓友人，請他負責台南縣市的文宣。沒想到在他的努力下，我在台南縣市拿到了七萬多票，光是這兩地的票數就足夠讓我當選立法委員了。我在當時公辦政見會的期間，雖然自辦了四十八場之多的演講會，不過在台南市只辦兩場。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公辦政見發表會最後一場是出身於台南的林聯輝接續在我後頭上台演講，而我講完後因須趕回嘉義就匆匆離開，沒想到居然有九成民眾跟著我一起離開會場，原被林聯輝視為大票倉的台南竟然至此地步，讓他為之氣結，還當場責罵選民沒有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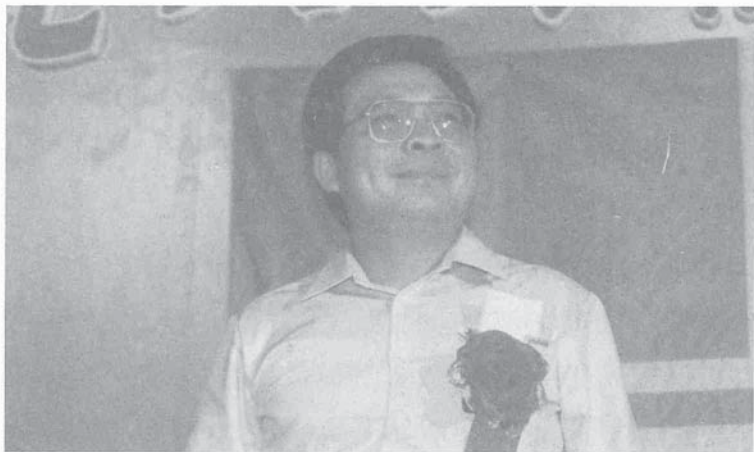
臨門一腳組新黨

在參與尤清競選縣長以及創辦雜誌的期間內，我已發表了大

量準備籌組新黨的相關文章及言論，所以我對於組織新黨一事早有一套自己的想法。1986年9月27日時，我特意在我的母校北港鎮南陽國小，舉辦了第一場正式「參選說明會」，並獲得有關當局許可我進行三天的宣傳活動。不過沒想到當天下午三點多時，曾是我父親部屬的警察局長來家裡，轉達上級不許我召開參選說明會的意見，並說已有兩千餘名警力進駐南陽國小，另有兩營憲兵駐紮在糖廠內，雲林縣唯一的高壓噴水車亦已就定位，企圖迫使我終止活動。此時，負責雲林及嘉義一帶治安的中警部司令張少剛親自坐鎮督軍，雲林各警察分局長也奉命前來「觀摩」如何打壓群眾集會。當時北港的情勢猶如諾曼地登陸般地緊張，風聲鶴唳，連蛇籠都被派上街頭。

當天下午五點多我用過晚飯後，積極思考以何處作為「決戰的地點」，最後決定選在北港朝天宮門口的中山路。在我家駐守的員警看我起身有所動作，緊張地上前問我要幹什麼？我一派輕鬆地回答他們：「難道我上街隨意走走不行嗎？」所以我就裝作若無其事地往街上走去，同時開始設法聚集群眾。等我走到朝天宮時，已經有上百位民眾尾隨在後。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群眾聚集在朝天宮的廣場前。在群情激憤的狀況下，支持群眾和在現場對峙的軍警不免擦槍走火，產生肢體衝突。不過由於隔天民進黨組黨的新聞鋪天蓋地而來，掩蓋了這場事件，以致外界比較不瞭解這段過程。

翌日，也就是1986年9月28日，我四點多就由雲林出發，準備參加「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於圓山大飯店二樓，召開年底



1986年在圓山民進黨創黨大會上的朱高正先生。(邱萬興提供)

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立法委員選舉的黨外候選人後援會，並由游錫堃擔任會議主席。這場後援會的意義在於確認年底競選的提名人數及人選。在雲嘉南黨外後援會推薦提名的四十一張選票中，我囊括了三十八張，許哲男獲得兩張，林國華（1935 -）只有一張，因此我獲得後援會提名出馬角逐第四選區的立法委員。有趣的是，林國華只拿到一票，但蘇洪月嬌（1931 - 2004）聲稱她的一票投給林國華，可是林國華又說他這一票是自己投給自己的。所以我暗忖今天可能會很「熱鬧」，因為許哲男堅持要參選。果不出我預料，許哲男一上台講話後，就開始抨擊尤清、蘇洪月嬌等人，接著又將矛頭轉向我身上。

我聽完許的發言後，也舉手要求發言。這時大家心想「好戲即將開鑼」了！我上台後就說：「在此向大會報告，我這一輩子到現在只投過一次票，就是在立委選舉時，將我的一票投給許哲

男先生。雲林鄉親第一位請我回故鄉參選立委的人，也是許哲男先生。我對於剛剛許先生所言一切沒有意見。我相信黨外在雲嘉南的實力應該足以當選兩席，懇請大會一定要補提名許哲男先生。」說完台下傳來一片掌聲。

如果我當天沒有出席這場後援會，或許歷史發展的軌跡就會有所不同了。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由於這場後援會於上午時的會議主題在於討論年底各項公職的提名人選及相關辦法，經過一陣子密集的商討後，人選方面終於大致抵定，於是大家就開始用餐，並於下午一點半繼續開會。起初預定下午的目標只是準備成立「組黨籌備委員會」，就籌備事宜逐一進行討論。

眼見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已經到了兩點十餘分，我就主動向主席舉手要求發言。在獲得許可後，我起立發言道：「組黨必須依靠決心與行動，如果只是坐而言，是無法達成目標的。大家不要忘記當年雷震於中國民主黨籌組階段時，就被國民黨『雞仔烏仔抓到沒剩半隻』。組黨需要有決心以及勇氣，我建議即刻宣布新政黨的成立，並以今天上午接受後援會提名的參加年底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四十一位候選人為共同發起人。如果在選舉前夕任何一位因參與組織新黨而被國民黨逮捕，其餘四十位候選人將共同宣布一起退出此次選舉，讓此事因為黨外組黨而有人被捕，以致集體杯葛選舉，成為國際媒體矚目的政治新聞，看看蔣經國敢不敢賭這一把？」語畢，現場掌聲如雷，民主進步黨就此正式成立。

當時郭吉仁律師趁我走向廁所時，靠過來摸著自己的脖子對

我說：「朱博士，您不覺得慶幸這裡還『溫溫的』嗎？因為您剛剛提議的事是『砍頭罪』啊……」我說：「怕死的，就不要和國民黨對抗。」在此，我必須要肯定許信良對於島內組黨一事作出外人難以想像的重大貢獻。因為他於1986年5月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一事，不僅促使島內對於組黨產生更開闊的討論空間及視野，並造成國民黨特務機關轉移焦點，國民黨寧可我們在國內組黨，也不願見到在美國組起來……我們才有可能一舉成功。

日後，有一次宋心濂跟我說：「朱委員，今天台灣能夠走向政黨政治，您居功厥偉！但是我也有一份功勞。」我心想此話怎說？於是他又繼續說道：「因為民進黨組黨當天是國定假日，我們蒐集到的情報顯示後援會只是要成立『組黨籌備委員會』，卻沒想到您天外飛來一筆的提議，打亂了我們的整體佈局。其實，我們當時都有派人進行竊聽，特別是您講的話我前後聽了五、六次之多，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後來七海官邸打電話來，要我即刻向總統報告圓山大飯店內的狀況，我一開始的建議是『依法處理』，也就是準備動手逮捕相關人員，但後來覺得此舉不妥，於是又加了一個『暫緩處理』的方案，兩案併陳，請總統裁決。」

蔣經國與宋心濂兩人緊急會商後，蔣終於決定採用暫緩處理的方案。究其用意，應在於先以緩和方式觀察黨外人士於此次選舉票數的高低，避免激起強烈抗爭。如果組黨後，黨外人士的票數沒有明顯增長，代表民眾並不支持他們籌組新政黨，屆時再逮捕相關人士都還不遲，才不至引起國內外騷動；反之，如果黨外

人士的選票有明顯增長的話，象徵民心思變，到時再來思考應變之策。

然而民進黨成立後，政府立即要面對的棘手問題就是宣布解嚴。而要宣布解嚴之前，必須先著手處理《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法》等「國安三法」的制定與修法，我代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與國民黨協商此三法的修法原則。當時蔣經國非常堅持要反共、反台獨、不得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等三立法原則放進《國家安全法》的條文中。曾有人說：「如果台灣沒有朱高正，現在的台灣或許不一樣。」這或許是對我的一種肯定！

我在組黨前為了籌措立委選舉經費以及拉抬選情，所以出了兩本書，都相當暢銷。一本名為《組黨是人民的權利》，內容以講述組黨相關理論為主；另外一本是《容忍暴政就是罪惡》。不過這兩本書現在在市面上不易找到。特別的是，有人將《組黨是人民的權利》一書告知蔣經國，並向他說我和其他黨外人士有所不同。選舉結束後，呂學海又替我出版了《走在理性的鋼索上》一書。¹這本書集結了我一直以來對於如何組黨、如何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等等問題的觀察與看法。

衝撞萬年國會

組黨後，我曾經多次親身參與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我在立法院的問政經過，應該很值得留下歷史紀錄。如1987年2月份時，因適逢農曆春節假期，立法院召開非正式的談話會，讓立委

1. 朱高正，《走在理性的鋼索上》（台北：久大文化，1987）。

們互相拜年寒暄，以利院務的推動。我掌握了這個難得的時機，在這場談話會上一口氣講了一百一十分鐘之久，談話內容也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原因是我一開口就說道：「各位老委員們，本席來立法院報到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向我提醒過了，絕對不能稱呼你們是『老委員』，一定要稱為『資深委員』。但是各位老委員們，我實在無法稱呼你們為資深委員，只能稱呼你們為老委員。」

大家聽到這裡是一頭霧水，於是我接著講：「因為你們是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本席也是第一屆立法委員，大家同是第一屆立法委員，何來資深資淺之說呢？我知道你們心裡正在嘀咕著：『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在打什麼謊語？我的年紀足夠當你的爺爺或奶奶了。』我也認同你們講的，因為本席現在才三十二歲，你們平均年紀都超過八十三歲了。你們1948年在南京宣誓就職時，本席都還沒有投胎呢！就年紀而言，確實足夠當我的祖輩。不過，我們差了兩個世代，怎麼會變成同一屆的同事呢？我告訴你們，這就是國民黨政權反動的本質之所在！」我還沒有講完，台下部分年事已高的立法委員已經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了。

這時，我不疾不徐地繼續說：「你們知道本席在雲嘉南地區是第一高票當選的嗎？我的政見其實只有一條，我在這裡用國語鄭重地說給你們聽。我的政見是：『各位鄉親父老們，只要大家願意把手中那張神聖的選票投給登記第十一號的朱高正，就等同送了一顆超級炸彈進入立法院。我向大家保證，一定會把立法院

衝撞得山崩地裂、翻江倒海。如果國民黨不接受我提出的國會全面改選的政見，我絕對不會善罷干休。」各位老委員，我今天就是受到選民的委託來挑戰你們的！我生性磊落，絕對不幹宵小般的勾當。在此，我正式向大家宣戰。即日起，各位到立法院前一定要有心理準備，到立法院開會，就等於上戰場。」我又接著講：「大家都年紀一大把了，國民黨這個腐敗的政權值得你們如此為它犧牲奉獻嗎？」前前後後總共講了將近兩個小時之久。

此外，我於組黨後也曾參與大家所熟悉的農民運動。由於1988年春季時，國民黨政府因決定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的數量與種類，引起大多數農民的質疑和恐慌，遂有農民準備於5月20日齊聚台北向政府請願。而我在4月底得知此次請願活動是由林國華帶隊時，就曾向最高法院某位庭長表達我對於此次農民運動的憂慮，並預言這場請願活動恐將以暴力流血收場。果不其然，農民在請願的過程中和警方爆發多次嚴重的肢體衝突。

我是看了當天晚上十點半的新聞報導後，心想不去現場關心不行，遂告知太太我準備要去忠孝西路的現場一趟。太太看我這麼晚還穿著運動鞋出門，心裡也清楚我大概今晚回不來了。結果我到了現場，意外遭到一位憲兵中校暴力相向，當晚住進國泰醫院接受觀察。前述的最高法院庭長知道此事後，立即趕到醫院探視我，並說：「朱委員，您真是料事如神啊！居然提早三個禮拜就能預知這種狀況。」

其實我手上握有施暴者的個人資料，不過我無意控告他，因為我認為要告，就要告決策高層的人，當時還有黨內同志以為我

被國民黨政府收買。經過許久後，我才知道對我施暴的憲兵中校之子，於數月前因急性盲腸炎送醫途中，受到民進黨遊行隊伍所困，以致延誤就醫，不幸死亡，所以他非常痛恨民進黨，我也才成為無辜的箭靶。

我認為，這場農民運動並沒有任何贏家，只是迫使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更加悲情而已。雖然請願農民們於活動中總共提出八大訴求，但是到了民進黨執政時，仍是連一項訴求也沒有實現！擔任扁政府農委會副主委的戴振耀因而曾經被同樣叫「阿耀」的農民臭罵一頓。然而五二〇這場農民運動並非由我主導，這是必須要特別澄清的一點。

對民進黨台獨理念的看法

1989年6月初，我針對民進黨內新潮流系等主張台獨派系的崛起，曾發表過批評文章，並在翌年正式退出民進黨。其實我的文章都禁得起歷史考驗，而且新潮流系也逐漸揚棄自己的主張。不過聽到他們過去主張的人，卻越來越支持台獨理念，形成一個非常弔詭的特殊現象。

1989年8、9月間，黃信介及張俊宏（1938-）兩人內心認為如果放任新潮流系坐大，整個黨都會被該系所把持，遂邀我共同另起爐灶。但我向他們表示民進黨是第一個本土政黨，我不能因為一己之私，造成黨內分裂；也勸他們不要畏懼新潮流系的存在，並建議他們要認真注意美麗島系自身應提升素質，以及如何傳承

等問題。

事實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初期對於民進黨成立一事並未全力支持，因為兩者理念仍未一致。長老教會希望讓台灣走向獨立，而非如民進黨創黨初期以爭取民主自由為目標，兩者方向顯有差異。不過民進黨會開始傾向台獨意識，就是受到長老教會以及政治受難者聯誼會兩方面的推波助瀾所致。

長老教會的存在當然有其歷史意義與貢獻，但他們也應該要檢討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們畢竟是基督教派，在華人社會中難以成為主流宗教團體。至於政治受難者可分為兩大類別，一派是對自己的政治理念太過篤信的「鐵齒」派，認為國民黨不敢動他一根汗毛；另一派則是「笨得徹底」，無法看穿社會動態與時代氛圍。這兩類的受難者有其共同特點，就是會擴大自身受難經驗，藉此強化民眾對國民黨的反對意識。在長老教會及政治受難者聯誼會兩股力量匯流下，民進黨逐漸走向台獨的不歸路。

此外，我認為民進黨內的黨公職也不夠努力與用功，只會以謾罵或醜化國民黨作為競選策略，是不夠上進的作為。但是如果他們提出具體政策，卻力有未逮。民進黨創黨初期在立法院提出的許多法案，多數是我和國民黨協商後通過的。

對我而言，民進黨多年來持續推動「台獨」運動，這是該黨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錯誤。我認為民進黨相當不長進，才會採取台獨意識型態。若用李登輝（1923 -）的話來說：「統獨是個假議題。」而就我自己的看法來說，力倡獨台的李登輝也不是一個真君子。他身處國民黨體系太久，不敢將真實想法公諸於眾，也缺

乏寬厚的氣度與胸襟。

而我與黃爾璇纏訟十餘年的官司，則是源自於黃爾璇代表民進黨參選雲林縣立委時種下的恩怨。由於我 1989 年在競選第一屆第六次增額立法委員期間，聽到新潮流系與相關人士掌握近八萬張選票，足夠確保黃爾璇可以順利當選的耳語。對此，我相當不以為然，於是發下豪語，要是沒有兩萬人以上的選民連署，我就不願意在雲林縣參選。結果我獲得兩萬五千多人參與連署。當我感受到這股選戰熱度時，自己預估應該可以拿到七至八萬票左右。結果開票後的票數遠超出我意料，我獲得十二萬八千多票，幾乎比國民黨在雲林足額提名的三位候選人以及黨內同志黃爾璇四人總和票數還多，順利連任。

黃爾璇獲得黨內各重量級人物多次力挺站台，卻只獲得不到七千票，是他這一輩子無法彌補的痛處。由於我的票數非常高，選舉結束後他對我非常不滿。他剛南下參選時，不斷散發不實文宣醜化我，我只反唇相譏他一次「歪哥」。而我之所以說他「歪哥」，乃肇因於姚嘉文擔任黨主席時經常請我協助募款。有一次我們在福華飯店舉辦募款餐會，成功募得 186 萬元，但姚卻將其中 36 萬交給太太周清玉（1944 -）的關懷基金會運用。對此，我深覺不妥，遂請黃出面斡旋此事，但最後這 36 萬還是進了關懷基金會，所以我說黃「歪哥」。

但我萬萬沒想到因這一句「歪哥」，被黃一狀告上法院，控告我違反《選罷法》，兩人纏訟多年，彼此相互上訴，不過我始終沒有出庭過。後來我離開立法院後，覺得再纏訟下去很沒意

義，遂在第一次出庭時向法官表示：「為了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以致相關卷證累積高達一米多，著實浪費國家司法資源。對此，我深表愧疚之意，請法官判我有罪，我放棄上訴權。」於是這宗爭議，總算以我入獄一個月為代價，劃下句點。

我曾一度計畫在解嚴後醞釀要籌組港、台、大陸三邊會談，並與同黨的康寧祥、尤清，以及國民黨的饒穎奇（1934 -）、黃主文（1941 -）、林時機等人都已談妥，箭在弦上。不過後來受到兩黨的強力阻攔，他們全都未能如願成行，只有我一個人單獨和香港及大陸代表進行會談。我一直認為民進黨應該要有與大陸溝通的管道，可是事與願違。民進黨對於大陸的瞭解非常少，甚至可用「無知」來形容，這是十分危險的事情。民進黨必須下定決心，徹底瞭解大陸發展的全貌。迄今為止，我還是一直鼓勵年輕人有機會多到大陸走走。整體而言，我覺得民進黨應深自反省，為何經過如此長期的努力，仍然無法取得台灣人民足夠的認同，還是由國民黨再次完全執政？這必然有其原因！

加入新黨

我退出民進黨後，於1991年3月成立了中華社會民主黨，並以「國民黨爛、民進黨亂」為由，號召選民支持以「法治國、社會國、文化國」為主的第三種選擇，主張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實行責任內閣制，不過幾次選舉結果都不盡理想。後來趙少康（1950 -）前來向我遊說，希望將中華社會民主黨、勞動黨

與工黨等併入新黨內。可惜事有波折，工黨已幾近停止運作，勞動黨則是剛召開完全國代表大會，不易在短時間內促成此事。後來，只剩中華社會民主黨與新黨合併的可能性存在。

當時趙少康表示合併後的新黨黨綱採中華社會民主黨版本，黨章則以新黨版本為主。我聽完他的意見後，對他說：「我組黨的意義就是希望實踐黨的理想，我們的黨綱也被認為是最優秀的黨綱，可是在台灣從事政黨政治活動，並不需要依靠黨綱吸引選民。這是台灣發展的悲哀！」相較於台灣政黨對於黨綱的棄之如敝屣，中國共產黨則是高度重視，每次召開黨代表大會修改黨綱時，總要提前精心運作。我舉個例子，如國民黨在開十五全代會時，李登輝在進行政治報告前一天，才匆匆找了蘇志誠囑咐數項要點並修正後，就成了他在十五全代會上的政治報告。與此相反，中共在處理十五大的相關議題時，則必須經過非常繁複的程序才能定案，前後費時約一年半之久。

我的大陸經驗

我在1990年首度造訪大陸，並向對岸積極推銷「生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嶄新思維，且陸續舉辦了十八場研討會。但因對方無法接受我的理念，我於兩年半內不曾再度踏入大陸。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時，將我提出的「生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調整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納入黨綱，並於翌年3月正式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五條後，隨即派人與

我聯繫。當時對方表示：「朱先生，您所提的節能減排等生態思維，祖國目前還沒有實施的條件。不過您建議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部分，我們則調整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已放入《憲法》第十五條。歡迎您儘快回大陸訪問。」自此開始，我每年造訪大陸多次。

1998年，我立委連任失利後，當晚，唯一一位讓我主動求見過的人，也就是北京大學的易學泰斗朱伯崑（1923 - 2007）先生打了通電話給我，邀請我到北京大學客座一學期，我立即答允他的邀約。我還曾為他在2000年12月30日為江澤民（1926 - ）講授《易經》，出謀策劃過。鄰近的清華大學得知我要到北大開課後，也主動向我提出授課邀請。此後，我也經常往返兩岸到北京大學、上海交大等校的「總裁班」授課。1999年我於北大教授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學說，並由北大出版了《朱高正講康德》一書，在大陸頗受好評，被視為研究康德的最佳入門書；² 在清華授課則是以《易經》為主，有時會觸及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體系。一般人要被北大與清華同時邀聘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

另外，我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特邀教授，在該院教授《憲法》，課題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民主政治」，實在忙得不可開交，因我必須定期返台探親，只好拒絕其他學校的聘約。我曾多次在大陸演講，動輒上萬人參與，場面十分浩大，不過有時候也會有小型座談會形式的授課。這種現象一來反映了中國的崛起，二來也表示我在大陸的口碑不差。

2. 朱高正，《朱高正講康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朱高正先生攝於受訪時。

此外，我是中共中央黨校唯一的境外講座教授，有一次許長仁到大陸聽我在中共中央黨校為省部級以上的官員授課。當時我上課的題目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意義」，替中國共產黨解決一些理論上的問題。我在上課時對這些官員說：「我對中國共產黨史研究不多，但是我對黨史有一個總結性的歸納：中國共產黨與國際主義走到一起的時候，就是黨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但如果中國共產黨和愛國主義緊密結合的時候，便是黨史上最輝煌的時刻！」我說完後，全場歡聲雷動。

有一次我去河南省鄭州外語中學演講，讓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因為該校囊括了北大、清華、浙江大學等名校提供給河南省入學的一半名額，世界各知名大學一年也提供超過五十名以上的全額獎學金給鄭州外語中學，是中國最具知名度與升學實力的中學，學生著實臥虎藏龍、出類拔萃！

對於兩岸發展的省思

就我長期研究易經的心得來說，我認為政治發展不應太過勉強。兩岸硬要謀求統一，或者單方片面宣布獨立，都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歷史悲劇。應該順其自然，順勢而行。例如兩岸過去對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定位與評價是南轅北轍，多有歧見，但近年來大陸已經撥亂反正。同樣的，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存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必須在自然互動中求同存異，並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累積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我個人想法，從未認定「統一」是絕對的終極目標，也始終不承認「獨立」是最崇高的理想。台灣在面對大陸時，應該力持不卑不亢的態度，要保存自己的特色。我相信大陸在發展的過程中，會逐漸發現他們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我經常建議中共領導階層，應該下令各部門要優先幫助台灣人民，並且養成一句口頭禪：「台灣同胞們，你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直到三、五年後大家沒有什麼不滿了，才會讓他們有認同感，政治講求水到渠成，這是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如果只是以「口號」治國，未能付諸實踐，只會讓下一代過得更辛苦。總而言之，現在當務之急，就是雙方各自把自己分內的工作認真做好！

因緣際會，參與朝野溝通

李鴻禧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彭孟濤

時間：2013年7月14日 10:20 - 12:20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李宅

李鴻禧，1937年生於嘉義市。1955年進入台大法律系。大學期間涉獵日本的憲法著作，對提出「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達吉相當敬佩，決心赴日攻讀憲法。1968年留學東京大學法政研究所。1974年回台大，前後任教三十年。為推廣民主憲政的理念，除在大學課堂講學外，也常透過為黨外候選人站台的場合宣講，自詡為「半個媒體人」。在戒嚴時代，與胡佛、楊國樞、張忠棟並稱為四大自由派學者。2000年政黨輪替後，積極推動制憲，邀集學者專家共同草擬「台灣憲法草案」。2004年出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

立志讀法律

在我高中時代，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很愛看《傳記文學》，使我因而差一點選擇念歷史系。當時我對《傳記文學》頗有興趣，反而到了現在卻對傳記相當反感。因為我看到和我同時代的人，不論是自己書寫的自傳或回憶錄，還是他人代勞的口述歷史，都和他本人實際的形象差距太大，畢竟不可能自己罵自己，只可能自我吹噓，寫得宛如聖人，所以現在我對於傳記類都不大認同。更何況我也自認自己沒什麼了不起，回顧我的一生，我就是讀自己喜歡讀的東西，講自己讀出來的東西，看看能否回饋社會而已。其實外界一般對我的印象，和我真正的性格，可能會有些差距。一般人都認為我個性外向、能言善道又精明，一定長於籌謀經略，但實際上的我生性內向，不喜歡社交，我毋寧喜歡讀書。此外我也充滿浪漫性格。

我本來想念歷史系，但我母親很反對。因為我大姊當年是和許世賢¹ 同時代被台灣總督府保送到日本學醫的，有點像《浪淘

1. 許世賢（1908-1983），台南市人。父親許煥章是清朝秀才。台南第二高女畢業，赴日就讀東京女子醫專。1930年醫專畢業返台，初於台南醫院服務，後獨力開設泰德醫院、世賢醫院。1933年與嘉義張進通醫師結婚，旋同赴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專攻婦產科，兩人並於1939年先後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人稱「鴛鴦博士」。1940年返台，於嘉義開設順天堂醫院。戰後被派為嘉義女中校長，於任內創辦高中部，積極推動校務。1946年先後當選嘉義市參議員、制憲國大代表候補。翌年二二八事件時倖免於難。1954年以後任臨時省議員、省議員，長達15年，因其犀利的質詢問政風格，而與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李源棧省議員有省議會「五龍一鳳」之美名。期間曾於1960年參與中國民主黨創黨活動。1968年當選嘉義市長，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市長。1972年當選增額立委，並得連任。1982年7月1日嘉義市升格為省轄市，以75歲高齡再度當選嘉義市長。其對嘉義市政的貢獻，被市民尊稱為「嘉義媽祖婆」。參見蔡說麗撰，〈許世賢〉，收於許雲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804-805。

沙》²裡的蔡阿信³。阿信似乎高我姊姊兩屆，在日本就讀東京女子醫專學醫。我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二人，我是老么，我大姊多我十八歲。當年我大姊在日本讀書時，和許世賢交情很深，所以有一次我稱呼許世賢為「許博士」，就遭到她的輕責道：「叫聲姊姊有那麼難嘛！」因為大姊當醫生的關係，我家裡當時希望我學醫，尤其是我的母親一定要我學醫來改善家中環境，此外我也一直對醫學也有興趣，包括後來我在《中國論壇》也發表不少醫學方面的文章，不過這種情況到了我高二時發生改變。有一位老師發現我會寫文章，作文比賽時常得獎，演講比賽也很強，又擅長辯論，所以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我認為你應該讀法律、政治，不要像魯迅、孫文。魯迅念東北大學，但後來還是回到文學，等於醫學浪費了；孫文念香港的西醫學校，當然醫學沒念好，也因為這樣他的法律基礎不好，寫的三民主義不三不四！」就是這句話，讓我嚇了一跳。我的老師是國民黨的，又是外省人，當

-
2. 《浪淘沙》是台灣作家東方白的長篇小說，全長三大本，共一百五十萬字，內容以台灣第一個留日女醫師丘雅信的生命故事為主軸，透過她的一生來透視整個台灣的變遷。書中的主角「丘雅信」的原型就是源自蔡阿信。詳見東方白，《浪淘沙》（台北：前衛，1990）。
 3. 蔡阿信（1899-1990），台北人。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淡水女學）畢業，前往日本就讀私立立教女學堂。1920年11月東京女子醫專畢業，是台灣第一位習西洋醫學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女醫師。1921年4月返台，先後服務於台北醫院、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1924年在台北市日新町自宅開設婦產科醫院。同年與彭華英結婚。1926年6月在台中市大正町開設清信醫院，1928年創辦附設「產婆講習所」，訓練嚴格，畢業者產婆資格考每考必中，10年間培養約500名產婆。也是第一位提倡限制生育的醫師，對台灣社會事業貢獻頗多，連續多年獲得日本昭和天皇御賜獎金。1938年受戰爭的影響，醫院休業，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1941年轉往加拿大任職。1946年返回台灣，但受二二八事件的衝擊，1953年往加拿大定居。1982年5月成立「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從事寡婦精神關懷與保健諮詢，為台灣社會貢獻心力。1990年逝世於加拿大。參見范燕秋撰，〈蔡阿信〉，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1231-1232。

時在白色恐怖時代他竟然敢跟我說這些話。因此，影響我立定志向要讀法律。

1949年我進入嘉義中學的初中部，1952年進入高中部。嘉義高中可說是上海復旦大學的「分校」，因為當時復旦大學一位名教授芮寶公到嘉中當校長，就延聘了原先在復旦大學的一些教授來嘉中教書，例如能與董作賓（1895 - 1963）、李濟（1896 - 1979）分庭抗禮的魯實先（1913 - 1977），以及孫文（1866 - 1925）的機要秘書戴天球等人（戴天球是胡佛〔1932 - 〕的親生父親）。

台大法律系憶往

1955年我高中畢業後進入台大法律系。1959年入伍當了一年半的兵，服預官役。1961年退伍後回到嘉義，在嘉商教書。當時我的母親輕中風。我們家原本有十二個兄弟姊妹，但後來陸續有六個過世，到那時只剩下六人。我大哥當時人在台北，我二哥念土木的，到處跑，我母親輕中風需要照料，所以我比同屆的同學出國慢了八年左右。我和我太太是當時在班上拿書卷獎卻沒出國留學的特例。我本來有機會拿公費赴美留學，但我沒去，後來又拿到了日本的公費也沒有去，等到1968年我考取日本政府獎學金準備赴日留學時已比別人慢了一陣子。早在我大二、大三時，高考、司法官檢定及普考就通通及格。我卻仍在嘉義教書一陣子，後來我母親覺得這樣對我的前途不好，所以就決定靠自己

運動來復建，身體好像也有好轉，就敦促我去考公費留學，沒想到我 1968 年出國，我母親隔年就不幸去世了。

當時公費留學一般是流行到美國，不過我卻負笈日本。主要是因為我在大學時代就喜歡讀憲法，彷彿我天生就是要讀憲法的，雖然拿書卷獎的我成績一向不壞，但特別是憲法之類的科目，好像我的成績在哪個班上都是很高分的，後來我還旁聽研究所的憲法課程。劉慶瑞教授是我的啟蒙老師。在我念台大的時代，老實說法律系師資並不好，有許多官僚，大概只有幾位老師我印象比較深，包括留學巴黎大學的梅仲協（1900 - 1971）和王伯琦（1909 - 1961），兩人民法教的不錯，以及東京大學出身、又到明尼蘇達大學留學、教授憲法的劉慶瑞教授，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畢業、又到巴黎大學深造的彭明敏教授。

彭明敏老師當時是政治系的教授，但有開授國際公法課程，而我剛好不論憲法或國際公法都是班上成績很好的學生，所以我對彭教授印象很深刻。彭老師當年不過三十幾歲，就已是航空法的世界權威之一，而且上課的內容新穎，所以深獲學生歡迎。我還記得第一次上課，他反而向我們敬個禮，把大家嚇了一跳，他說：「從今天開始我要教你們國際公法，因為我比你們早研究，讀的比你們多，所以我會影響你們的看法，但我不是權威，我講的話未必完全是真理，怕誤了大家，所以我先向各位道歉。然後順便要告訴大家，不要以為我講的話都是完全正確。考試時如果你上課有記筆記，並把我的教科書讀好，可能只有 70 多分。你必須有補充，看別的老師的書或是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樣才有

80 分以上。你要拿 80 分以上的高分，最好是要對我的看法有點意見！」我受他這句話的影響很大，後來在台大教書時，也仿照他的方式教學。

此外，彭老師很重視儀容，經常西裝筆挺，且他是法學院中少見不戴深色領帶的老師，人長得高大挺拔，玉樹臨風，很多女同學很迷他。在那個時代，他上課內容很新穎，國際公法的考試題竟然出國際法庭實例 case，印象中我有次考試光 case 的部分他就給我很高分，也曾在導生會鼓勵我是否考慮讀國際法，結果我仍然偏好憲法。劉慶瑞老師的憲法當然也教得不錯，只可惜平平整整，問他比較敏感的問題常會顧左右而言他，後來我才曉得他一直到退休都是副教授，和殷海光（1919 - 1969）老師一樣，均遭受政治的迫害。

醉心憲法

我在台大很快地便喜歡上憲法，就去找相關著作來閱讀。結果像林紀東（1915 - 1990）、洪應灶（1913 - 1976）老師等人的書我都不喜歡，尤其是林紀東老師的書反而常成為我的反面教材。林紀東的論著不少，但我讀過的感想是，儘管他為人清淡、廉潔，但他卻提出了很多像機動的法治、戰時憲法的理論，我想他大概就因此被有些人歸類為「御用學者」吧。這些人的著作我都不滿意，剛好我會日文，劉慶瑞老師又曾建議我去讀日文的憲法書籍。我的日文底子過得去，所以我沒修過日文課。本來到東京

大學第一年要修日文，我去請我的指導老師幫我寫一封推薦信，讓我不需多讀一年日文，就直接讀憲法。沒想到我老師竟然說：「你修日文幹嘛？你的日文程度夠了！」我的日文好，與我母親是嘉義最早的日語老師有很大的關係。我外公羅錦卿是嘉義末代秀才，我母親是他的養女。

之後我在台大法學院圖書館看了許多日文的憲法書，對美濃部達吉（1873 - 1948）相當欣賞。原本我要讀法律系時，母親很反對，一方面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在嘉義殺了不少人，白色恐怖也抓了不少人，另方面她知道日本東京大學的「天皇機關說」事件，希望我不要念法律。她告訴我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有位她很佩服的美濃部達吉教授，因提出「天皇機關說」，結果不但被東大解聘，著作遭查禁，連寫文章也被禁刊登，甚至後來還被右派青年捅了一刀，但他仍然展現學者風骨而不改其學術見解，等到天皇被軍部壓迫而下令將他的貴族頭銜剝奪，人才癱瘓下來。因此我母親說：「日本對反政府的學者都如此，你這人意見多，很有個性，在台灣讀法律一定會惹事，一定很命苦，我勸你最好不要步上這條路。」

但我聽完母親的勸告，反而對美濃部達吉既欽佩又神往，於是就到台大讀了一些美濃部達吉的著作。台大有個好處，就是雖屬日本九所帝大之一，但天高皇帝遠，當軍部在排斥美濃部達吉的時候，日本國內的其他大學中美濃部達吉的著作也被查禁、焚燬，唯獨台大保存得還很完整。這也影響到我退休後會捐書給台大。因為我發現台大很少有美濃部達吉之後、亦即戰後日本的憲

法書籍，所以我於退休後的 2006 年把我收藏的一萬本憲法書籍贈與台大，我於捐書前自己先做了篩選，把重覆的或不必要的剔除，最後送了大約六千本擺在台大總圖。就這樣，我捐的書加上台大原有藏書，有關日本憲法的書籍就比較完整了，只可惜我之後台大就再也沒有留日的憲法學者。

我退休以後就不常看憲法書了，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學生輩像許宗力（1956 - ）、林子儀（1954 - ）等人都還不錯，所以就安心放下了，事實上我受我東大蘆部信喜（1923 - 1999）老師的影響，希望能成為「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tes）。看過我書櫥的人肯定會嚇一跳，因為我的藏書六成以上不是法律書。

我在 1974 年能回台大教書是很意外，因為劉慶瑞老師罹患鼻癌過世後，一直沒有專攻憲法的老師，都是洪應灶、曾繁康（1911 - 1995）老師等人在教授，看他們寫的教科書就知道他們不是憲法科班出身的，有一次台大法學院院長韓忠謨（1915 - 1993）到日本參訪，在此因緣際會下把我引介回台大。一般人對韓忠謨老師的印象就是很保守，但殊不知他那時已歷經滄桑，在台大本來要從教務長升校長，然而卻被法學界同仁暗鬥下來。他帶有自由派思想。韓忠謨老師來日本時，台大方面聯絡我接待他，考察各大學圖書館、課程等等，他在日本停留一個禮拜，我和他談了很多憲法、憲政問題，他要我回台大，於是我就匆忙回來。

當時我要回台大教書，原本遭到法律系的反對。他們大概有個考慮，那時我們台大同班已有五個人在系上任教。即陳明汝

(1937 -)、陳榮宗、駱永家、林文雄及楊日然(1933 - 1994)，假如再加上我就有六人，唯恐我們六人如果結成「派系」，勢必會在一個有三、四十位教授的法律系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不過法律系對外宣稱的理由當然不會是「派系」，而是強調同一年有六位老師屆齡退休，法學院教師斷層會發生問題。事實上，我們六個人有六種性格，六種價值觀，六種不同的領域，表面上大家相處融洽，但私底下交誼都不是很深。

我1974年回台大教書，照理說是8月1日介聘，但聘書卻是10月1日才到，聽說是因為警總方面對我有意見。我在日本東大讀書時，駐日本大使館宋姓公使一定要我當留日同學會的主席，我並非國民黨員。當時留日同學有一萬人，遍佈日本各地，勢力龐大。可能是因我負責日本的前一年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工作，局長王正誼(1915 - ?)讓我擔任專員兼科長，並因通曉日文、德文和英文，所以受到王的賞識。王正誼是蔣介石生母王采玉老夫人(1863 - 1921)的親戚，雖然他只是人事行政局長，但他同時也是官邸的機要秘書，只不過後來因為權力鬥爭的關係成為了犧牲品，被處以無期徒刑，關了很久才保外就醫。當年我母親不希望我繼續教書，她的病況也不允許我出國留學，於是我就在人事行政局短暫工作一年，可能這時的表現較好，被國民黨「催台青」系統盯上了。

我到東大本想拜小林直樹(1921 -)教授為師，因為小林直樹較早出版憲法教科書，我在日本大使館有個朋友介紹我讀他的書，我讀完不勝欽仰，偏偏那年小林直樹受邀到耶魯客座。想想

一位日本大學的教授能到耶魯大學教書，相當不容易。小林直樹教的是東方憲法，但卻能和耶魯的憲法教授們稱兄道弟。正因為小林直樹到耶魯客座的关系，於是我便改師事出身哈佛法學院的蘆部信喜教授。結果對我更好，我迷小林，小林講課有一手，他常說做一位憲法教授，你不但要能言善道，而且寫文章要帶點華麗，用詞要優美；至於蘆部則常說，做一個法律人，你的邏輯要很縝密，寫的文章要能滴水不漏、毫無破綻，而他們兩人的風格，我都盡量地效法，但離他們的水準還有一段差距。他們二位也都是百科全書派，知識淵博的程度，起初接觸他們時，甚感師生差距過大、望塵莫及，想起怎能迎頭趕上，幾乎讓我精神頹喪崩潰！



李鴻禧教授（右）於受訪時留影。

台大任教壓力多

我在台大教書時，受到外界的壓力當然很多，好比我升等都比別人慢，我們班雖有五個同學和我是同事，但我猜想他們大概都沒投我的票，所以我升等很困難，但我仍然每年都提論文，而且提的論文都讓他們覺得有份量，到了最後一年我索性不提了。台大有個老規矩，就是年資最高的副教授要升等教授，其他人不好意思跳過，所以後來礙於這項慣例，他們也曉得再不讓我通過升等也說不過去。總之我的升等，不論是講師升副教授，抑或副教授升教授，都比他人慢。不過後來，我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另外一個壓力是來自國科會的審查。申請國科會補助審查多半是由一位我熟悉的同行教授評分，他通常都打我 40 - 50 分，但之後輪到我評分他的同類申請時，我都給他高分，展示自己胸襟風度。這人上課經常批我罵我，我也不回罵，讓他自己去難過。

我在台大教書時並不將升等放在心上，國科會每年申請不通過也不以為意。以前國科會補助幾乎等於薪水，但對我而言國科會的補助並不算大。因為我很早就被數家藍綠媒體延攬為主筆及專欄作家，收入遠高於此。當時我的想法是既要推廣憲政理念，光靠一個大學的大教室是不夠的。雖然我在台大任教三十年，幾乎每年都榮登排行榜前茅，但只靠講學還是不夠。尤其 80 年代後，台灣開始有選舉，很多在野黨人喜歡我站台助講，我也喜歡借在野黨的場子，讓我能替在野黨候選人推薦十分鐘後，剩下五十分鐘以上來宣揚民主憲政，把憲法觀念帶進政治批評中，結果在街頭巷尾、禮堂操場大受群眾歡迎，我也做得很有成就感！

半個媒體人

我自認那時期的我，算是半個媒體人。或許一般人很難想像我曾在所謂「藍色媒體」的《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當過一陣子的主筆，那大概是與我在《中國論壇》⁴ 同一時期的事。我進入《中國論壇》與楊選堂⁵ 有關。我原本在《法論》月刊就有發表文章。起初《法論》月刊的符兆祥（1939 - ），請我試著寫文章，結果我寫完讓他們大吃一驚，從此我就每個月固定在月刊發表。

《法論》月刊大約經營了兩、三年，我就寫了兩、三年。作品之後也被其他報紙編輯部門發現，我就這樣漸漸地打開知名度。同時由於我教課風評也不錯，那時陳繼盛律師便來請我加入原名「中國比較法學會」（現為「台灣法學會」），並在其出版刊物

4. 《中國論壇》係由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吾出資創辦的刊物，創刊於1975年10月10日，原為半月刊，至1990年10月10日改為月刊，最後於1992年10月停刊，共發行三百八十五期。該刊發行人楊選堂在最終期將此雜誌定位為「自由主義的刊物」，它的言論立場，就是「知識分子為民主憲政而倡導、而批判的立場」。楊選堂，〈由創刊到停刊－《中國論壇》十七年的歷史過程〉，《中國論壇》，33:1=385（台北，1992.10），頁2-16。
5. 楊選堂（1923-2011），筆名楊子，廣東梅縣人。出生於印尼，在當地接受中文教育迄高中畢業。原本以政治為第一志願，後回中國大陸暨南大學就讀的則是商學院。1947年來台，至台灣大學經濟學系補修學分，獲商學士學位。曾任台灣大學講師、中興大學副教授、台灣省政府編譯室主任、行政院參事兼編譯室主任、中央銀行行政委員等職。其後歷任《前線日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新生報》及《民族晚報》五報主筆，1952年轉入《聯合報》，1970年升為總主筆。之後任《聯合報》、《經濟日報》和《聯合晚報》三報總主筆兼《聯合報》社長、《中國論壇》發行人、亞盟與世盟中國總會顧問，1990年6月尚應邀出席國會會議。楊選堂係《中國論壇》早期靈魂人物，除任發行人一職外，各期社論多出自其手，且於封底裡另闢「楊子論衡」專欄。至1980年左右，編委會運作已上軌道，楊選堂逐漸退居幕後。然每逢社慶或重要官方節日之社論，仍由其執筆，偶或以本名撰文。作品多與政府施政、經濟與現代化問題有關。參見陳重生，〈《中國論壇》有關台灣政治發展的言論分析（1975-199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5-6。

發表論文。此外，學術性刊物《台大法學論叢》當然也有我的論文發表，而且這些文章後來也都受到各方關注。總之為了推廣憲政理念，我年輕時，盡其所能地讓我的文章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刊物中。

我在《中國論壇》多年，後來還一度擔任多年的總編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受《中國論壇》影響深遠。我還記得我擔任總編輯時，每期專題的內容均要事先討論，然後再找相關領域的學者撰文，我也從中吸收不少新知。我在《中國論壇》也發表許多短篇的文章，就數量而言是名列前茅，所以有人還特別研究我在《中國論壇》時期的思想價值。此外，我在《中國論壇》的期間，結識了不少外省系的自由派學者，包括文崇一（1925 - ）、李亦園（1931 - ）、沈君山（1932 - ）、袁頌西（1933 - ）、胡佛、楊國樞、張忠棟（1933 - 1999）、尉天聰（1935 - ）等人。

後來我花很多時間在媒體，除了上述刊物我有定期發表外，其他例如《日本文摘》、《今周刊》、《台灣春秋》我也有專欄，之後《自立晚報》的專欄我也參與，此外《自立早報》與《民眾日報》我則擔任主筆也寫專欄。1997年我還應《台灣日報》之邀擔任廣告代言人。

參與朝野溝通

我是在因緣際會下參與了1985年朝野溝通的行列。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老百姓很反感，蔣經國為紓解壓力而開放選舉，黨

外大有斬獲，也逐步升高與國民黨的對抗。這種雙方緊張對峙的情勢，令胡佛、楊國樞與我相當煩惱，就連國策顧問陶百川也感到憂心。在一次餐敘的場合中，陶百川便提議由他出面談談看。

在參與溝通的學者中，原本要找張忠棟，但張忠棟台獨色彩濃厚，比台灣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國民黨及蔣經國有所疑慮，此外張忠棟本身也沒有意願，加上台灣人雖然尊敬他但不熟悉，台灣人熟悉的面孔是我，但總不能只有我一人。既然張忠棟不願意加入，所以後來蔣經國就找了我、胡佛、楊國樞等三位教授，共同參與國民黨與黨外的溝通工作。蔣經國大概也對我的底細瞭如指掌。我當中國同學會主席時，當地的文化公使有天寫給我一封信，要我去見總統府秘書長張羣（1889 - 1990）。他們，希望拉攏我入黨，說我擁有幾個背景，包括是公費留學生、在名門學府就讀法政科系、擔任中國同學會主席、又能寫能說，只是尚欠缺對黨國的貢獻（如做「抓耙子」等等），然而我卻當面拒絕他們的好意，所以等我沒去見張羣後，就知我心志而開始另眼相看。不久，我也辭去中國同學會主席一職之連任。事實上我自認當時當主席期間個性很衝，例如舉辦海外學生國慶慶祝會時，本來需要辦得轟轟烈烈，我卻全部交給副主席處理。

1985年的某一天，陶百川告訴我說：「我已經向經國先生推薦由你溝通，經國先生說很好，因為你常常幫黨外站台，你黨外比較熟。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是無黨無派、社會形象中立的學者？」的確，我那時形象還蠻中立的，不像現在，要說自己超然，別人也不相信！只不過，我聽完陶百川的話，第一時間倒沒有

很願意擔當溝通的工作。這結果令陶百川有些意外，他可能心想你這個菜鳥，怎麼不聽老前輩的勸告？直到有一天，蔣經國設法向我表示，台灣沒有本錢再發生第二次的美麗島事件，講得很誠懇，那時的我好像吃了熊心豹子膽，鼓起勇氣回應：「台灣禁不了第二次美麗島事件，當前東歐共產國家都在動搖，千萬不要讓這種情況再次發生。」然後，我才答應投入黨內外溝通的運作。

老實說，在台灣學界人士中我較大膽，也許不能說是大膽，正確來說是「愚膽」。至今我依舊百思不得其解，像我這般粗魯無禮、不知死活的人，竟然沒讓我坐牢，還放任我為所欲為、無顧無忌地批判政治、月旦人物直到今天。我猜想，這也許和蔣經國晚年作風和往昔不太一樣有所關連。從前的蔣經國，是無血無淚地鎮壓異己的。

當時我們曾把社會的實況一五一十向蔣經國說明，請他親自去看看，現在社會上黨外人士相當多，美麗島事件後，民意恐怕不像治安單位所報告那樣單純。他更力倡朝野雙方一起來商量，避免衝突，異中求同，找出共識。隨後，國民黨中央指派包括蕭天讚等高幹擔任黨外溝通的工作。蕭天讚是台灣人，嘉中高一一期，台大法律系也高一一期，甚至在宿舍，我們還睡同一張床，他睡上鋪我睡下鋪，不過他後來走國民黨路線，我則走台灣路線，既非黨外，也非民進黨的路線。

表面上是楊國樞、胡佛擔任橋梁，但實際上對黨外人士主要是由我來負責溝通，只不過實質運作卻頗為困難。國民黨對口有蕭天讚、梁肅戎等人，背後則是有關中在運籌帷幄。關中時任省

黨部主委，手腕高明。黨外方面，既有公政會，又有編聯會系統，派系複雜，意見分歧，因此後來我反而覺得國民黨較好溝通，黨外較難。⁶

事實上早在美麗島大審期間，我就參與溝通。當時國民黨的窗口是新聞局長兼官邸秘書的宋楚瑜（1942 - ）。在判決前，我傳達給他的訊息是，第一希望判輕，第二希望宣判前事先通知我們。不料後來宋楚瑜打電話告訴我判決結果，一聽到黃信介等人被處重刑，我當場回以憤怒的重話。事實上，當時陶百川也有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向蔣經國一再求情，說到激動處甚至不禁落淚。聽說蔣介石臨終前曾告訴蔣經國，陶百川沒有心機，講的話雖不中聽，但忠言逆耳應該多聽。只可惜蔣經國終究沒有接受陶百川的苦苦哀求而網開一面，美麗島事件的八人仍被判處重刑。無論如何，陶百川當時的作為，也讓我非常感動，因此陶百川逝世百年之際，我還特別撰文一篇予以紀念，用表謝意。

然而，後來發生一件事，讓我對陶百川的完美形象有些破滅。蔣經國驟逝，李登輝接任總統，在李尚未接黨主席前，有一次大家餐敘時，陶百川突然說了一句，「李登輝憑什麼接黨主席？」我說：「蔣經國先生和先總統在任時都兼黨主席。」沒想到他竟然說：「但李登輝是台灣人。」我當下聽完有點心寒，陶百川長年為民主發聲，到頭來他的民族主義、中國情結原來那麼

6. 1986年5月7日，蔣經國總統於國民黨例行的中央常會中指示中央政策會，應本誠心誠意的態度，與社會各方面人士進行溝通意見，隨後，國民黨中央指派政策會三位副秘書長—梁肅戎、蕭天讚、黃光平擔任和黨外溝通的工作。1986年5月10日，由國民黨、黨外與學者組成的「三邊會談」，在來來飯店湘園舉行，此即第一次黨內外溝通。梁肅戎，《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台北：天下文化，1995），頁209-211。

重。之後我和老朋友胡佛分道揚鑣也肇因於此。早年我和胡佛堪稱一對宏揚台灣民主的陰陽劍，和人辯論政事時只要我們二人出馬，一定不會輸，但後來我們還是為了統獨問題漸行漸遠，胡佛認為台灣不能獨立。他曾感嘆道：「鴻禧，你什麼都好，能寫能說，頭腦清晰，但為什麼要搞台獨？」我回說：「你跟我說這麼多要民主、主權在民，可為什麼一定要中國來統一？中國又窮又獨裁……」他辯說：「有一天會變好，不相信你看看。」此外，胡佛奉五權憲法為聖經，而我則是五權憲法的病理專家。這也難怪，畢竟胡佛的父親是孫文的機要秘書戴天球，而且他又和王世杰（1891 - 1981）關係匪淺，王世杰擔任中研院院長時，胡佛任其人事主任，王世杰正是五權憲法的詮釋者，所以胡佛對五權憲法崇拜得不得了，我對五權憲法和他意見相左時，他會不以為然。

朝野第一次面對面餐敘溝通由國民黨做東，第二次換我們三位學者請客，等到第三次輪到他們時，黨外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組黨工作。我原本還一再強調絕對不會組黨，希望國民黨方面不要亂抓人，不料沒多久民進黨居然就成立了，我只好笑說他們要組黨我也沒辦法。民進黨成立，國民黨沒有予以取締、逮捕，恐怕和蔣經國身體急遽惡化有關。蔣經國晚年受糖尿病影響，不但視力模糊而且行動不便，必須仰賴輪椅，他做總統做得很辛苦。

我認為民進黨之所以組成，固然有黨外人士的冒險與突破，另方面也 and 蔣經國晚年開始願意改革密切相關。其實，我們這些學者一再撰文勸蔣經國說，我們國內不能再發生第二次美麗島事

件，現在投黨外的人那麼多，千萬別把人逼上梁山！甚至特意提醒，政府要鎮壓很容易，但要小心中國可能會藉機攻打台灣。

如今回首從前參與溝通的歲月，令人感慨萬千。當年的我和現今相比簡直天差地別，那時比較謹慎小心，而且較沒尊嚴地放下身段。記得在美麗島大審期間，為了拯救那八位受刑人的生命，甚至不惜說出違心之論，在那群中國人黨政高官的面前，批評台灣人的不是，還舉從前孔明遠征南蠻，七擒孟獲的歷史，表示現在台灣人才第一次犯錯，判處重刑有所不宜！

有時我真會看不起當時的自己，為這八個人求情而極盡委屈之能事。現在每想到當初求情的對象是施明德等立場前後不一的人，都覺得相當不值得！坦白說，當年我為黨外人士的諸多付出，對我個人及內人，乃至家庭生活傷害不小。可是我無怨無悔，畢竟出於自己的理想，多些犧牲也不足惜。我內人也是法律系畢業，和我是同班同學，深知讀法律就是學公平正義，所以很能體諒並支持我的作為，為此我也很感激她。

為制憲運動打拚

2003年開始，我積極投身於制憲運動。在制憲運動期間，我一直向陳水扁總統強調一個重要的憲法觀念，即主權在民。制定憲法是屬於自然法和根本法的層次。換言之，人民有制憲權，有制憲權就能制憲，所以憲法中只會規定修憲程序，而不能規定如何制憲。總之，制憲權是人民至高無上的權利，請阿扁務必

要宣布制憲。但他說：「總統職權無此規定。」我說：「世界各國都無此種成文法之規定，但現實上由總統發動制憲卻司空見慣。」他又說：「不過我總統就職時宣誓余必遵守憲法……」我說：「你看東歐共產國家垮台，民選總統也宣誓遵守憲法，但上台後都紛紛制憲。」我告訴他其實制憲不難，只要找一百個人，若要客觀些，就讓學界占 40%，政界 20%，剩下 40% 則是由人民選出制憲代表。假如擔心人民代表會做錯選擇，也可讓人民代表占 30%，各黨派代表 30%，學界 40%。但我卻又擔心法政學界中，專攻憲法學者太少，因為我們這代法政學界中，專攻憲法科班出身的，屈指可數。事實上，之前國民黨政府修憲，我就堅決反對，所以李登輝時代多次修憲，我都拒絕參加，也沒有簽名背書，以免之後淪為笑柄，被人恥笑說李鴻禧鑽研憲法多年，居然修了這種荒腔走板的憲法。看看我們憲法增修條文，全世界哪有國家的憲法明文寫說，等到中國統一後才如何如何，根本就不該把這種不合理的意識形態放進憲法條文中。

在我的強力勸說下，陳水扁總統終於公開宣布 2006 年要公投制憲，但礙於國民黨的反彈壓力，2005 年他又退縮不敢推動，卻聘請研究憲法的李俊侶（1965 - ）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憲改辦公室主任。後來我心想既然總統對制憲卻步，就自掏腰包，出面邀集國內法政及相關部門的學者專家，共同草擬「台灣憲法草案」，並將草擬的憲法草案全文，刊登在《自由時報》。

那時也有不少機關團體共襄盛舉，投入制憲運動的行列，可惜當中憲法學者十分欠缺。許宗力、黃昭元（1949 - ）、葉俊榮

等台大法律系憲法教授本來都不方便來參加我這制憲會議，卻或多或少有些心志，也因礙於我是他們的憲法老師，都直接間接、有形無形參與此事。因而幾經研討、協調、辯論、表決，草擬出有濃厚堅實憲法學基礎的台灣憲法草案。

例如憲法草案草擬過程中，我極力主張台灣應成為一永久和平中立國，不過我的學生們反對，互相爭論不休，後來投票落敗，我的主張終究未被納入憲草條文中。我的心目中一直期盼台灣變成東方瑞士，既不與美國軍事同盟，並取消台灣關係法，也不要被中國統一，走向和平中立國之路。此外，我也主張內閣制，可是最後表決仍是提倡總統制的如許宗力等年輕學者一派勝出。傾向總統制的人認為台灣現今尚為開發中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但我不以為然，培養民主憲政固然不容易，但主張仰賴一個領導者來領導民主憲政的鞏固與深化，那簡直是天方夜譚！我壓根不相信更換領導者就可以辦到，而是需要時間慢慢建立。以美國為例，近幾十年來的美國總統未必盡是英明幹才，即便如此，在他們的主政之下美國依然強盛。因為總統不行，還有國會，國會不行，還有法院，法院不行，還有學界，學界不行，還有知識水準高的人民。

2005年阿扁之所以在制憲立場上退卻，甚至說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話遭致不少批評。陳水扁並非自願說自己在總統任內無法推動正名制憲，而是因為2004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顯示立法院議席泛綠沒有過半，所以必須順從民意，把制憲主張收起來。那時立委選後的政治情勢的確對民進黨政府更加不利，總

統雖然可以提制憲，但日後若召開制憲會議，在領導力不足的情況下，容易受到強力杯葛。不過我建議他可以先擬妥憲法草案，再交由人民公投決定。制憲不需要法源依據，有人說制憲需要有制憲法規，那是對憲法的無知。因為制憲權和修憲權是不同的層次。例如憲法不能規定主權屬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體國民，因為主權在民是毋須憲法特別規定的。憲法有主權在民之條文，只是給予 double protection。從而，像毛澤東（1893 - 1976）時代，把主權屬於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體國民，以及把林彪（1907 - 1971）是毛澤東繼承人寫入憲法條文的做法，只能以荒唐至極來形容。

我和民進黨不熟，也很少到民進黨黨部，惟獨民進黨競選總統時和幾位前輩去過。一般人往往以為我一言九鼎，對陳水扁總統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其實不然。我乃一介書生，除非他有事來向我請教，否則我不會主動進言，況且我所提供的意見，他也不見得會全然採納，只是列為參考，以示尊敬而已。

外界把我譽為「國師」，好像我會在幕後下指導棋，但事實並非如此。阿扁很聰明，不定期會邀請我們夫婦到總統府吃飯，外界以為他有事常會找我商議，但事實上多半是由他單方面說明，只不過有時我聽了不爽快，也會直言不諱。例如有次他提議要去慈湖，我說：「你如果去，以後不要與我往來！」兩蔣父子殺了那麼多台灣人，今天居然為了台灣和解，就要去弔祭，毫無道理。奇怪的是，我在總統府與阿扁見面一事沒多久就消息外洩，被某雜誌刊登出來，說阿扁本已決定到慈湖，但在李鴻禧勸阻下，臨時打了退堂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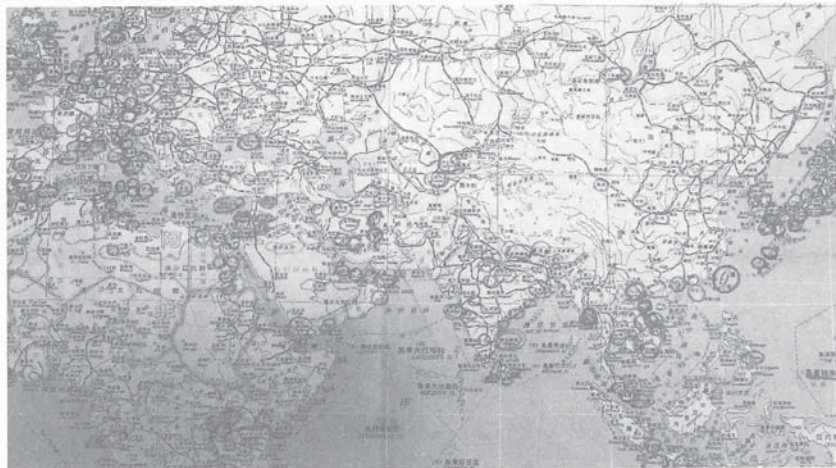
唐吉訶德式的性格

我自認自己的性格最能以唐吉訶德做比擬，我遍訪世界 107 個國家，許多偏遠的國家，例如舊蘇聯、古巴、伊朗、格達費時代的利比亞、突尼西亞、巴基斯坦、葉門，都有我的足跡。由於我周遊列國，所以也留下三百本的旅遊相簿。

每到一國家我都會挑選一件象徵物做紀念，像這尊唐吉訶德的雕像，最能做為我個人的象徵。我既沒加入政黨，也無行政資源，但騎著一匹瘦馬，手握一支古槍，就想去天下行俠仗義。我並非佛教的信徒，但觀音聞聲救苦的精神深植我心，因此也收藏不少觀音像。鬻是我們家的圖騰，鬻最大的特徵，就是雌雄一旦共結連理，便形影不離，一輩子不分開，充分象徵我與內人的婚姻關係，至今仍舊鶼鶼情深。除愛情專一外，鬻的第二個特性是和平反戰，牠雖生有多刺，卻不會主動攻擊。第三則是刻苦耐勞，如果把牠關起來不給牠水，牠一年至少可以冬眠四個月。最後，鬻還有一個好處，即眼光遠大，牠有多只眼睛，能看得很廣。我受到達爾文（1809 - 1882）的影響也很深遠，他的進化論令我折服。浪漫的莎士比亞（1564 - 1616）、非暴力的甘地（1869 - 1948）、代表自由主義的自由女神等，都是我內心理念的表徵。



李教授收藏的唐吉訶德像。



李教授在世界地圖上註記去過的地方。

我受我的恩師影響，屬於百科全書學派型人物，藏書萬卷，涉獵廣泛。舉凡藝術、生物、地理、科學、天文等各個領域的套書我都閱讀蒐藏。日文版的四庫全書我讀得暢快淋漓，世界名著全集也是如此。我也典藏不少從國外購買的古典音樂套裝 CD。反而是法律書籍我大多已送給台大，另一部分則放在我兒子李俊偲新店的房子。

我的人生經歷豐富而精彩，不少人勸我寫回憶錄，但我一直沒寫，也不願寫。最近我寫了〈憲法生命的誕生蛻變和繭蛹化蛾—耄耋憲法學究的憶夢〉一文，收錄於《我的學思歷程》⁷，記載至我留學結束的經過。當初之所以書寫純粹是出於嘗試的心理，但後來因讀了一些現代名人自我吹噓、不堪入目的回憶錄或傳記後，對於寫回憶錄一事又了無興趣。我對口述歷史一向敬謝

7. 李鴻禧等，《我的學思歷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3）。

不敏。不過回顧這一生，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我自認過得很滿足，這既非來自 money，也非來自 power，而是我擁有一個 good content of life。我不但人生歷練多，認識的人脈廣，且社會上一般人對我還很客氣，也許是潛意識裡以為李鴻禧對社會有些貢獻吧！

今天要不是我們自己的彭明敏文教基金會邀訪，我不會答應受訪，有六家出版社一直希望從我口中知道我的生命故事，尤其是溝通與營救美麗島八位受刑人的經過，但我都一一婉拒了。之所以接受你們的訪問，很大原因也是由於你我同病相憐，一輩子都受到外來統治勢力的打壓，所以我把你當成自己人，就開誠布公，多說了一些事。

台灣寶貴的核心價值面臨威脅

林世煜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嚴婉玲
時間：2013年6月3日下午
地點：台北市林世煜先生自宅

林世煜，1953年出生，台南安平人，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1978年幫忙林應專助選，從此加入黨外運動。1979年進入《八十年代》雜誌社工作，並參加美麗島事件。1981年加入《進步》、《深耕》雜誌，擔任總編輯。後與吳乃仁、邱義仁等人成立黨外編聯會。1984年離開黨外運動，轉而經營自己的生意。2000年開始，與其妻胡慧玲投入台灣戰後白色恐怖口述史的田野調查，及「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景美軍事審判紀念園區」之史料收集 and 展示規劃。

求學過程

我生於 1953 年，台南安平人。高中念台南一中，後來轉學到建中。父親是低階的公務員，家裡並沒有什麼政治意識。我是家裡第一個受大學教育的，也沒有前輩教我要對國民黨怎樣。

小時候對政治的印象很少。只記得選舉期間，父親會低聲聽收音機，聽到無黨籍的候選人打贏就很興奮。如果我沒有接觸黨外運動，這些事可能就不會再回想。但現在想來，父親的興奮有其時代意義，多少流露出他的態度。我參與運動的時候，家裡多少受到一些騷擾，但不嚴重。他們要追查人際網絡跟錢的流動，你跟誰接觸，有沒有人給你錢。

大學畢業前沒有接觸過政治，我的啟蒙是從研究所才開始。1975 年老蔣死的那年，我從政大外交系畢業，同時考上政治研究所和預官。我決定先去當兵，受訓期間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說，有一個新的雜誌叫《台灣政論》，他說得很激動，我卻茫茫然一頭霧水。

1977 年退伍回來念研究所，才開始關心政治。恰巧遇到 1978 年因為「中」美斷交而暫停的選舉。那次選舉有一個研究所的朋友參選，他是高雄縣黑派政治世家出身，名叫林應專，是當年的候選人中第二年輕的。他說要選舉，政大研究生宿舍的同學就起哄說要去幫忙。真要動身的時候，卻沒有人敢去，最後只有我去了。政大畢竟是傳統黨校，只是我不諳世情，「青睞牛不驚打槍」。

那一屆選舉，黨外人士組了一個全國助選團。我代替林應專去中山堂參加成立大會，戴著他的名牌進會場，裡面的服務生全部都換成抓耙仔，這應該是我在台北第一次見識到政治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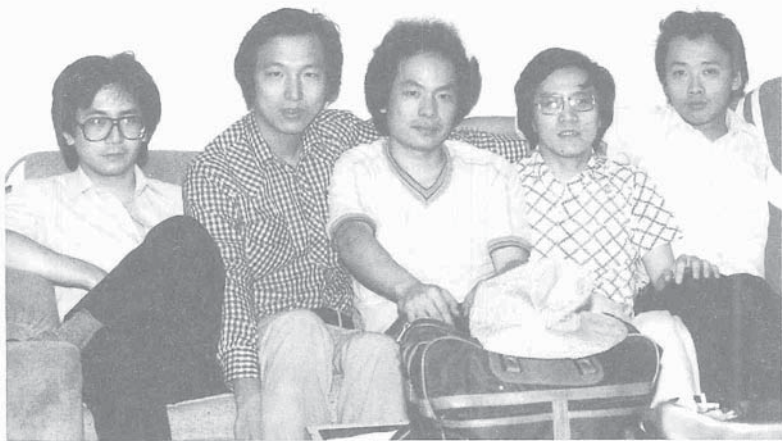
我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可說是從高雄縣各鄉鎮的街頭開始。和林應專一起到各鄉鎮去發傳單、拜會地方樁腳頭人。我站在宣傳車上，覺得只要會罵國民黨，派一個工讀生去選都能贏。後來因為台美斷交選舉暫停，我又另有巧遇。建中同學林正杰到政大唸公共行政研究所。當時他剛印好《選舉萬歲》，我們接上線，不久林正杰去當兵，輾轉捎來訊息說康寧祥辦雜誌缺人，要我跟另一個同學去看看。我們去老康家聊了通宵，隔天他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去上班，我當時學科考已經通過，便答應他。

進入黨外雜誌工作

1979年的夏天，進入《八十年代》雜誌社工作（編第五期）。剛好《美麗島》創刊。那個時代讓你成長很快，沒幾個月就是美麗島事件，「大人」都抓光了。1980年，我才27歲，被推出去當周清玉的競選總幹事。那次有幾位受難者家屬代夫出征，都選上了。隨後我在1981年1月10日結婚。度完蜜月回來，林正杰已經辦了《前進》雜誌。他是社長，林濁水是總主筆，我是總編輯。一期就被查禁了。接下來辦《深耕》；林正杰也另起爐灶辦《前進》。當時的幾本黨外雜誌，風格明顯不同。反對陣營中有保守派跟激進派，就像執政黨也會有鷹派、鴿派。

激進的人在《美麗島》，幾乎一次被殲滅；穩健派都在《八十年代》，但我們那時才二十幾歲，能穩健到哪裡去？後來發生「批康事件」，其實是難以避免的世代差異。康對我們說，他心目中台灣人從政的典範是高玉樹、吳三連。他們能在國民黨主導的遊戲裡存活。這一段話讓我印象很深刻。反之，許信良就像他的對照組。許的风格是會說：「台灣漁民再被菲律賓欺負的話，就讓我指揮海軍去打一仗！」這就是當時的種风格，兩條路線吧。

從 1975 年到 1979、1980 年之後，黨外運動逐漸形成群眾基礎，不再只是少數的「歧異份子」出來搏命了。新興的社會力持續蓄積，受過高等教育也開始累積財富的都會中產階級，希望能解除黨國對政治、經濟、金融、旅行、和資訊的管制，以便在廣闊的世界市場大展身手。於是這一輩渴求自由化，上升中的中產階級迅速跟黨外結合，所以我們看到選舉結果最亮眼的、是大都



1982 年 6 月，林世煜主編的深耕雜誌第 11 期，公開指責康寧祥放水，掀起黨外雜誌與黨外公職人員路線之爭。左起林世煜、于良麒、林正杰、邱義仁。（邱萬興 提供）

會區的台北市。這些人是經濟起飛階段的前鋒，他們盼望結合黨外人士來突破屋頂，讓他們可以飛上天。當然，等到後來經濟情勢不那麼樂觀的時候，這些人擔心任何變動只會導致他們的經濟地位更加跌落，於是臣服於國民黨製造的恐懼，以維護現狀為重，拋棄了昔日的盟友民進黨。

我們長期和特務鬥法，多少能分辨他們的行事習慣。辦雜誌時也多少可以計算風險。哪一篇哪一句會踢到鐵板，心裡大概有數。這樣就能決定要挑釁到什麼程度，付得起多少代價，可以獲得支持又不會被抓。這些都可以概略估算。所以勇士會跑出來，投機分子也會跑出來，各種想法越來越多。那時每逢選舉，我家都開派對辦賭盤，一邊吃喝一邊看開票，整晚不斷的喝采。這是群眾支持大幅成長，反對運動搞得興高采烈的時代。

隨著運動的開展，路線或利害關係的爭論，是免不了的。像新潮流提起的雞兔問題，應採取體制內或體制外路線的爭論等等，都是運動往前推進的時候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林正杰與編聯會成立

運動擴展到相當的規模，結構性的問題開始浮現，就要構想如何組織，形成戰略等等。但是平常的日子，多半陷在雜誌編輯的例行公事裡，單單日常的鬥爭就會把大部分人的力氣蝕光了，只有很少數的人，能夠身忙心閒的去想長遠的事。例如謝長廷，他來《深耕》雜誌找吳乃仁、邱義仁和我，帶著一張簡單的示意

圖，標出黨外運動短中長期的目標和進程。他是來尋求同志的，我覺得相當感動。我們四個人談了大半天，這些想法應該是謝日後推動黨外公政會的緣起。

第二個推動組織化的是林正杰。他帶著籌組黨外編聯會的想法，單刀赴會到深耕雜誌社。組織的確能有效壯大力量，一旦組織成功，領導和操控就變得非常重要。《前進》和《深耕》在意識型態和運動路線上各有堅持，也都在各自的圈子裡獨領風騷，一旦談起共同的組織，免不了會有較勁的意味。

四個人在辦公室談到很晚，沒有結論。隔天早上，邱義仁下決心進場，不但要參加，而且要贏！

我那時動員了一些人進來，背地裡被罵找人頭。我找了長老教會的朋友，他們從黨外早期就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台南神學院的系統，在美麗島事件中有不少人被抓去關。他們很開心知道我是教友。我打電話給黃昭凱，他找了一堆人，能拿筆的都來了。我也邀請許榮淑在地方上的義工來參加。後來聽前進系的朋友說，他們沒有灌人頭，不然不會輸我們，我知道確實是這樣。

編聯會第一次開會大約有百人參加，在仁愛路的四季餐廳舉行。第一任會長推出林濁水，雙方都能接受。編聯會並不曾「有意義」的運作很久，因為組織要能擁有資源、分配資源，才能叫得動成員。編聯會成立不久，又要迎接選舉，黨外公職人員推動聯合競選和公政會，不出幾年，參與體制內的選舉就形成黨外陣營的風潮。吵過一陣雞兔問題之後，選舉總路線漸漸成為主流。

邱義仁與新潮流成立

第三個是組織新潮流的邱義仁。他找來一批同質性高的同志，建立了列寧式核心菁英型的組織，採集中民主制，至今依然是民進黨內部行動最「整齊」的次團體。嚴格來說，新潮流不像派系，因為派系是沒有成文規矩、進出隨意沒有成員資格限制的俱樂部。但新潮流是黨中之黨，要進新潮流跟信教一樣，必須有長老引介、通過教義問答接受洗禮的，不過日後的行事風格，倒是更接近幫派了。這種核心菁英組織的戰略和林正杰相反，林催生的編聯會是群眾性的，大家都可以來，是開放給各路人馬的大雜燴。於是，擁有舞台風采的魅力領袖，比較容易取得主導權。

邱義仁這個核心型同志組織也採用新的戰略。在此之前，黨外運動大都倚靠文宣，反映在選舉行為上叫作「空氣票」。支持者像吹過的風，風過後無跡可尋，不知道支持者是誰、在哪裡，不知道會不會更積極的參與。於是邱義仁開始進入基層蹲點，組訓幹部，希望能接觸進而掌握支持者，建立群眾組織，這是黨外「回歸」到古典組織戰的先聲。

在黨外雜誌方面，漸漸的只剩下以週刊形式發行的《前進》和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系列。同時間，因為參政管道更通暢，加上國民黨的控制力日趨衰微，街頭運動和突破各種禁忌的行動也蜂湧而起。鄭南榕花了很大部分的精力，有計畫的進行一連串的突破。像五一九反戒嚴，二二八事件平反，和新國家運動。他像一頭義無反顧的領頭羊，一路絕塵而去，把其他人遠遠甩在後面。直到他把自己鎖進總編輯室，點燃汽油，燒成焦黑那一刻。

當時我離開《深耕》，離開「運動」一陣子了。想起來有點慶幸，萬一留在圈子裡，以我白目不知輕重的個性，大約免不了被抓去坐牢，或者因從政得罪四方大德，終而落到不堪的境地吧！我一生缺乏強烈的成就動機，離開的選擇並不費力。至今更覺後浪洶湧，雛鳳清於老鳳，無不令人嘖嘖稱賞。想想自己或者有幸在世事又一番曲折之後，仗著新世代的蔭庇，做一個快樂的老人。

離開之後，在鄭南榕生前一段時間，每週三到自由時代幫忙寫社論。那是我唯一保留的，和運動的接觸。隨後的組黨運動，我只間接從幾位好友那裡聽說。直到九二八那天，那位帶我認識選舉政治的林應專的爸爸，突然打電話來，他在大會現場。「世煜啊，今仔日組黨啊你知嘍？」唉呀我哪知！我的第一念頭是，江鵬堅律師原先和我們相約，當天六點鐘要一起喝酒吃飯，看來他有困難了。但是江律師是重然諾的人，他準時出現在餐廳，接受我們英雄式的歡呼。

幾天之後，我接到一通沒頭沒腦的電話：

「Michael！」

「是！」

「你排第三梯。」

「好！」

很榮幸昔日同志把我列入赴死名單，這是我和組黨最近身的接觸。至今我不知道電話中那個男聲是誰！

野百合學運世代

在我缺席的年代，最遺憾的是不曾參與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的社會運動。大概是某種想把自己封閉或隔離的適應不良吧！多年之後，我有意識地讀資料，也主動去認識野百合學運世代的朋友，有點像事後的補償，之後我一直維持和新世代的接觸。之所以會這樣，可能是在年輕時，因美麗島大逮捕導致傳承的環節脫落，迫使我們在一夜之間淪為舉目無親，必需扛起超齡的責任有關，但我也沒有太多值得傳承的東西啊！和年輕的世代在一起，更多的是，從他們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當中汲取力量吧！

我們這「四年級」的一代是個夾縫，美麗島人士長我們 5 - 10 歲，我們這層薄薄的，然後就轉到野百合學運那一代。從自由之愛到後學運，上下大約八年，這一代遭遇到台灣最大的變局。他們懂事以後看到組黨，看到解嚴；他們助過選，擔任助理；全程經歷兩次民主轉型的奠基性選舉，遇到數百年來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本土政權。其中有些人才 30 歲就得以與聞廟堂，這還真是有點奇幻的命運吧？

姑且拿阿扁做例子（他當然不是野百合世代）。管理學上的彼得定律說，人會升到他能勝任的位置，然後把事情搞砸。阿扁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是一個很有氣度的人，但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他搞砸了。

在那八年當中，學運世代很多人加入執政團隊。他們在那個陌生的，冷酷異境裡，面貌變得難以辨認了。其他沒有踏入政界，

留在學術圈的，眼睜睜看著那些同學的「異化」，彷彿心頭虛無了。那幾年以來，原先被優秀的學院子弟視為命運呼召與人生志業所在的「黨外—民進黨」，變得越來越疏離，越來越排斥。

這個虛無的態度，要等到政權再度輪替，復辟的馬政府圖窮匕現，開始明目張膽的破壞我國的核心價值——民主憲政和人權保障——時，才再度激起他們胸中的鬥志。改變的契機，是中國特使陳雲林到訪，引發的街頭對抗以及野草莓學運。那時野百合學運世代，大概都四十幾歲了。他們回到昔日野百合佔領的自由廣場，之後又組成「守護台灣民主平台」。幾乎可以說，這回，他們的心一直留在自由廣場，到現在都還堅定的守護著。

我想，他們都深刻的感受到，多年來台灣寶貴的核心價值面臨內外嚴峻的威脅，沒有人可以袖手不管。但是從再輪替的階段開始，政治運動逐漸因民進黨的弱化，而從政黨領導變為公民主導。往後，社運團體的能動性，設定議題的開創性，甚至對執政者形成壓力的能力，都逐漸朝自主發展的方向走。民進黨彷彿已放棄政治領導的企圖了。

野草莓與後野草莓

陳雲林來訪，馬英九宛如迎接上國宣慰使的傀儡，毫不留情的在每一個角落毆打驅趕前去抗議的民眾，我國的核心價值蒙受空前的挑戰。野草莓運動的學生，多半是戒嚴之後出生，他們初次目睹軍警在街頭的暴力，受到的驚嚇遠遠大於我們這些世代。

80 和 90 年代，我們多的是在街頭和鎮暴車、拒馬蛇籠纏鬥的經驗。但是馬政權一復辟就上演國家暴力的洗禮，冷冷的向野草莓世代指出，他們與生俱來就充份享用的自由和民主，其實隨時可以被摧毀。他們感到台灣公民社會遭遇重大的危機，這是支撐他們在廣場上堅持不退的，最強烈的心理推力吧。相形之下，「大人」的憤怒，就像不久之前的敗選，以及因為敗選導致的無力感，不久就消風了。

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長期壟斷政治權力的國民黨極端不適應。他們掀起的政黨惡鬥，達到人神共厭的地步。在自由廣場上的野草莓，拉起一道人牆，把自己圍起來，把屬於大人世界的，噁爛的政治擋在外面，政治人物不准進來，社會人士也只能圍觀。這種強烈的「反政治」——不是去政治——態度，極刺眼的反映了青年世代對惡質政治的切齒痛恨。

然而當國家的核心價值遭受中國咄咄逼人的威脅之時，理應傾舉國之力相挺的。但是國家認同是分裂的，復辟的國民黨毫不疼惜台灣的民主自由，而民進黨還在敗選的廢墟裡掙扎，導致支持民主的社會力量十分消沈。他們被野草莓擋在外面，也看不到民進黨有意願或能力動員，以力挽民主倒退的狂瀾，於是退回自己角落各自土農工商。留下人數一直不多的野草莓學生，在廣場上任風吹雨打，無人聞問，終而帶著渾身傷痕，抑鬱解散。

野草莓始於切割政治力和社會力，反映了當時的青年對政黨惡鬥的痛恨，自有其時代性的、外在的原因。之後因為政治力和社會力不曾動員，以致雖然懷抱先知的焦慮，卻終被一片蒼白的

無力感淹沒。他們寂寞撤離的時候，或許只聽到復辟成功的馬政權，在背後發出桀桀的笑聲，日後野草莓世代的學生，多半都要暗地裡默默治療自己的內傷。

野草莓運動留下來最具正面價值的，是廣場上的「野教授」們之後建立的「守護台灣民主平台」，他們有許多是昔日野百合學運的成員。在這一場捍衛台灣核心的民主價值之戰，擺脫了虛無，找到人生的第二個戰場。民主平台的朋友，之前才提出「自由人宣言」，對台灣未來的可能性，提出極具顛覆性的願景和規劃。

至於後野草莓世代，我看著他們總覺得難以置信，他們才稍晚野草莓幾年而已，卻表現出完全相反的面貌。他們有強大的實踐力，對長期的纏鬥不以為苦，他們融入社會，投入土地正義、居住正義，和工作權各個議題。透過和在地社群結合，共同面對壓迫者，並從中汲取草根的養份和力量。他們也很現實主義的「政治化」，因為很清楚不論想走到哪裡，政治都是最重要的途徑。他們得到前一代政治領袖和社會樁腳的疼惜和支持。

後野草莓世代這些特質持續發酵，並且越來越發達。我深刻的感到，他們會是我老年最大的安慰和倚靠。

轉型正義的工作

我國「官方」開始推動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最早是李登輝時代推動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公佈。至於「白色恐怖」，大約始於

阿扁的台北市長任內，跟中研院近史所合作的田野調查。日後看來，政黨輪替以及相關的補償發放之前，田野訪談很難聽到真話。2000年之後再做，受難者的心理防衛才終於鬆動了，令人感覺政黨輪替之後，簡直應該重寫我國的現代史。至於相關的檔案，在2001年成立國家檔案局之後，開始移轉並解密了許多檔案，開啟全新的研究領域，也逐漸照亮現代史上最陰暗的那一面。

大約在2002年左右，陳文成基金會因為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的推動，我有機會參與白色恐怖的真相調查與其他事物。基金會董事曹欽榮得到評估人權園區的委託案，基金會才得以參與其中。當時園區的設立面臨強大的反對意見，因為園址是綠島最大片的平地，某些機關和地方人士希望能在那裡興建火力發電廠，以支援一個五星級的國際飯店大賭場，這是金光閃閃非常誘人的機會，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擋下那些人的發財夢。直到人權園區開幕式請來阿扁剪綵，綠島鄉長才表示不再爭取開發了，觀光局也表示罷手，整個二十五公頃的遺址都保留給人權園區。

從那時開始，漸漸的有更多人系統做田野採訪、進行檔案判讀。到現在十年有餘了，轉型正義漸漸成為顯學，許多學生寫了論文，國家也做了這裡一些那裡一些的相關動作。但官方推動轉型正義，在李登輝時代，仍是百般不願意。李出身國民黨，若放手推動轉型正義，等於算自己的老帳，於是他說要向前看，把前事忘掉。

至於民進黨，即使很多黨人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但是

他們也不特別重視轉型正義的議題。民進黨在物質跟心靈上都很貧窮，長期以來一窮二白，一朝執政了，那些乾渴一輩子的兄弟姊妹，能不搶紅了眼嗎？所以民進黨有非常強固的、短線的現實感，只有對於能夠快速兌換成選票或鈔票的好康，才會眼睛發亮。那些白色恐怖時代存活至今的、化石般的老政治犯，既沒有錢也沒有票，政治人物有誰會沒事想起他們。除非是選戰考慮，除非是儀式性的場合。

於是在那八年裡，轉型正義染上了選戰工具化的色彩，使得這個詞也相對的貶值了。不過，一個新興的價值符號，迅速的普及化、俗民化、現實化，大概也是宿命吧！

民眾也不會對轉型正義有興趣，畢竟這是半世紀以前的事，而且很徹底地被掩蓋，人們並不是遺忘，而是根本不知道。戒嚴



林世煜先生（左）與主訪者合影。

時代那種偶語棄市的嚴峻，洗腦與污名化，徹底隔絕了受難者與一般人，以致五十年之間，幾乎沒有人敢說什麼，之後也只有淡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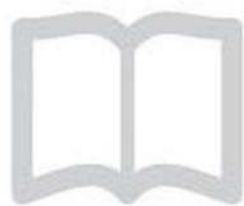
不曾及時處理轉型正義，或許是當今道德趨近崩壞，朝野和民眾之間的互信蕩然無存，令人常懷亡天下之憂的深層原因。

對當前民進黨的期待

民進黨還是一個政黨嗎？在一群染上權位飢渴症的人看來，當然是的。他們念念不忘爭取提名贏得選戰，等不及的宣稱「我準備好了。」但是人民呢？國家呢？我們這個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呢？如今對一個政治人物提這些問題，會被罵白目的，不是嗎！

台灣的政經社會情勢多麼嚴峻，可是看不到民進黨的領袖站出來，拿出主意，或者表示要共同承擔的決心。他們會繼續推出候選人參加各種選舉，他們當是充滿現實主義意味的，如假包換的政黨。只是我看不到民眾的支持在哪裡，也看不到公民和國家如果只靠他們，會有什麼勝算。

但是對這個黨，我們這幾個世代的人，在心裡都為她留下一個角落，或百般疼愛，或切齒扼腕，都有滿滿的、不足為道的情緒。



此頁空白

被一波狂飆的時代給席卷進去

林濁水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嚴婉玲

與談：陳忠信

時間：2013年6月3日 11:30 - 14:00

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福容大飯店

林濁水，1947年生，南投埔里人，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歷任《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的編輯，1983年出任黨外編聯會的創會會長。與林正杰、林世煜被譽為「黨外三林」。民進黨創黨後，出任《民進報》總主筆。1992年於台北市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2001年與2004年，獲選為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2006年宣布辭去立委一職。1991年提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素有「台獨理論大師」的稱號。

生長背景

我的成長背景很普通，1947年生，南投埔里人。二二八的時候，謝雪紅的部隊跑到我家附近，一顆子彈從我爸後腦勺擦過，差一吋我就變遺腹子了。後來，碰到張炎憲、陳芳明、鄭自才他們幾個1947年出生的，我們有組一個「四七社」，「四七社」現在都沒有活動了。組社那時笑說，我們這些都是二二八冤魂轉世。我聽我祖母講過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那一年我爸差點死掉，第二件是謝雪紅當時都是「由一些大學生背著她跑」；那時大學生比現在博士稀罕，謝雪紅由他他們背著跑，對鄉下人來說是很大的衝擊，覺得不是普通的事情，可能具有什麼大意義，但他們講不出來。

我家裡勉強有的政治態度，就是父母對外省人很感冒，我有個大姊嫁給外省人，過年回家，父親躺在床上假裝睡午覺不願起來見她。其他事很少受家庭的影響，我們是普通的家庭，到我成為黨外運動者為止，都是平凡的，沒什麼偉大的「感召」。

來台北讀書，大學時代政治也接觸不多，政治大學畢業、出社會以後，剛好那時碰到美麗島狂飆時代，認識一些朋友，我一個平凡的人就被一個狂飆的時代給席捲進去。

加入黨外

我當過計程車司機，那是在辦雜誌的空檔。我前後辦過不少

雜誌，當過總編輯、當社長、總主筆，職位繁多，換來換去，因為不斷被禁，新辦一份我就換了個職稱。當編輯最早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但文章產量不多，雜誌又是月刊，於是同時在《美麗島》雜誌寫文章，《美麗島》雜誌消逝後，《八十年代》變成《亞洲人》、《暖流》，後來也停刊了。之後就跟林世煜、林正杰辦了《進步》雜誌，也是兩三下就被禁，不見了。那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林正杰當兵回來辦的，從那邊開始，主編尤清辦的《博觀》月刊，被禁後變成《博觀叢刊》，後來邱義仁、吳乃德從美國回來，大家合辦了《新潮流》，也替《深耕》寫了一些東西，《新潮流》禁了變《新社會》，名字改來改去，都辦沒幾期就被查禁，被迫停刊。最後雜誌辦不下去，只好跑去開計程車。

參加民主運動，一開始我就以寫文章為主要工作，不是搞組織，但陰錯陽差成了民進黨兩個主要「前身」之一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以下簡稱編聯會）創會會長。應該是在辦《博觀》時，那時雜誌很多包括《自由時代》、《深耕》、《博觀》，有一群朋友相邀組織了這個編輯作家聯誼會，都是比較年輕的雜誌成員去辦的，一開始組成就希望漸漸往組黨方向走。1983年編聯會成立以後，一群辯護律師剛當選市議員，還有康寧祥等人任公職，他們在1984年組成公政會（公共政策研究會），這兩股力量就成了組黨的主力。這兩個團體主要的不同就是，公政會主要由公職組成，所以認為民主運動的方向應以議會問政為主；編聯會則認為，不能只綁在議會，應該串聯社會力量，在議會之外也要進入街頭。編聯會在這樣的方向之下，就在組黨的前一兩



1988年1月，林濁水先生在台灣高等法院聲援蔡有全與許曹德台獨案。
(邱萬興 提供)

年開始下鄉去做組訓，其中最明顯的大概有幾件，一件就是農運，一件是原住民運動。農運、工運、環保同時推動，下鄉的地方不同，農運就是去農村，工運重心是放在公營事業，環保大概是以學術界為主軸，分頭去做，還有一些原住民運動。

編聯會與新潮流的關係

編聯會不等於新潮流。編聯會是編聯會，新潮流是新潮流，組黨之前就有新潮流，像《自由時代》一直不是新潮流的成員，編聯會在新潮流之前組成，後來有些人留在這裡，有些人就跑去組新潮流。新潮流也是雜誌社，但是是有比較強烈要去做運動性質的雜誌社。新潮流也辦了幾次到基層的幹部訓練，雖然是雜誌社，但本來就不是以辦雜誌為目的。

編聯會還是編聯會，事實上編聯會有一些公職服務處的人參加，像賁心儀在謝長廷那邊做事，但她寫了一些東西，所以她也參加編聯會。可以說編聯會裡面有個新潮流，而新潮流在裡面有比較大的領導作用，但還是兩回事。

康寧祥的路線與爭議

編聯會在1983年成立，「批康」事件更早，主要就是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之爭。其實這有誤解要說明，很多人都說新潮流編聯會不是主張群眾路線嗎，後來為什麼轉向也參加選舉，這是外行的說法。其實新潮流並不是說大家都不要走議會路線，也沒說新潮流都不要選舉，只是說從以前黨外只能躲在議會，這個編聯會跟新潮流都反對，認為要走入群眾，走農運、工運，走入街頭。並不是說走街頭就不要選舉，不然很奇怪啊，作為政黨不選舉，一天到晚運動，這很荒謬，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政黨這樣。如果不選舉，就是要革命到底，那也是用槍桿子拿政權，從政就是要拿政權，群眾運動是累積拿政權實力的一種辦法，選舉也是，所以是雙軌並進，頂多哪一種偏重一點。很自然的，等體制越來越民主化，群眾路線就會減少，群眾路線跟議會路線是針對那個國會都不改選的情況下，群眾路線就要加強嘛！

【陳忠信：濁水講的我不是完全不贊成。我講一個我知道的，美麗島事件以前，陳婉真（1950 - ）、陳鼓應（1935 - ）要選，拓仔（王拓）在基隆要選，他跟《夏潮》關係很好，早期沒分那麼

清楚。王拓（1944 - ）和陳鼓應有很嚴重的爭論，就像濁水講的那樣，但新潮流確實沒有這麼嚴重。用白話說，康比較怕死，不敢衝，基本就是這樣的心態，那時新潮流的雜誌有一句話說：「社會運動政治化 政治運動社會化」。我跟喇叭很熟，那時對這句話有一些批評。

濁水說的這些都沒錯，但是，地方派系給人的印象，確實比較「選舉路線」，這個有啦！但新潮流是沒說不能選舉，年輕人沒資源，沒運動怎麼會有資源，新潮流是不得不這樣，因為大家都沒資源，剛從學校出來，什麼都沒有，像地方派系就有樁腳。他們那時強調這個，有一次在烏來巨龍山莊，辦類似革實院的培訓，我住在那邊，有三個講員，許信良講了一節課就走了，我整天留在那邊跟學員攪和，後來就剩我跟劉進興在那邊，我就講選舉，劉進興講馬克思那套，講了半天，我發現下面有一個人一直挑戰我，就是邱義仁。】

任何團體都有一些激進教條主義，不一定是主流，舉一個例子，劉進興還不是典型，jan（簡錫堦）最典型，我一聽他講話，頭皮就發麻，他容易把一個複雜的東西簡單化。建黨以後，一連串的狂飆就沒有了，要求解除戒嚴、龍山寺抗爭之類的，都沒有了。

【陳忠信：康寧祥最近在寫傳記，不知道寫好了沒。我覺得從康的角度來寫也好。民進黨創黨，思想上、理論上種種準備好了沒？從康的角度，康是很經驗主義的人，他辦雜誌就找司馬文武、李筱峰等人，我是很保守的，但康覺得我很激進，所以許信

良後來叫我們就過去了，我們也覺得許信良這邊比較好玩。

康這個性格跟他在立法院的關係有關，他是吳三連帶領的，吳三連在戒嚴高壓下，甚至他的小孩都被當過人質，逼他就範，所以很小心。他們帶康時，覺得他是可造之材，我曾聽他們說過，康寧祥進立法院時看到質詢台上的情況，就覺得這跟市議會很不一樣，這都影響他後來的問政風格。現在哪一個立委像他這樣，他問政六年都只有寫預算，某個角度是很認真，但另一個角度好像康看到就只有這樣，但那時候只有單兵作戰，也沒辦法。黃信介常說作立委有什麼好的，做議員多爽，三輪車坐了就去酒家喝，信介真的這樣說過，這比較符合他的個性。回過頭來說批康，那當然是路線問題，但像喇叭（邱義仁）那種，從康看起來就是沒有社會經驗，只會衝，不知死活。但有可能是濁水這群年輕人賭得對，時勢的變化剛好促成了。】

我那時在康那邊的時候沒有什麼路線問題，頂多就是《美麗島》那邊比較衝，康這邊比較無膽，但那時沒人說路線問題。

【陳忠信：1978年停止選舉那天，12月15日那天早上我在桃園，康打電話來，說中美要建交，我就衝去台北，後來信介和Nori（施明德）一群就去什麼花，康就帶著他的人馬去北投洗溫泉。那時還沒有《八十年代》，我跟RURU（范巽綠，1952 - ）剛進來沒多久，我們就跟著康，另一邊就去喊殺喊打了，其實個性上很早就顯現，這和康的從政個性有關，他很謹慎，所以後來後輩說他怕死、沒膽，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現在跟吳乃德在編一本給大學生看的民主運動史，其中有一點，乃德從民主轉型出發說的一點，我很同意。他說那時美麗島之後的黨外四人行，康又出面召集那些人，這件事很重要，那時很艱苦，這個動作是告訴執政黨，這些人不會掃了就先倒，沒讓這個火熄掉，雖然火很弱，忍辱偷生。從轉型的理論來看這個火很重要，後面才能接下去，這是1980年的事情，那時家屬哭哭啼啼，都是感性的訴求，沒有政治作為，能把這些人聚起來的人就是康。美麗島大審律師團有兩個人現在都沒人講，律師團是張德銘和陳繼盛他們組起來的，現在檯面上的蘇貞昌、謝長廷都是被找來的。】

出了事之後，康真的有在「箍」（協調統合，coordinate的意思），但不是很勇，有風吹草動就縮起來，看時勢可以了就伸出來。全台灣他都去箍，但那些家屬不太相信康，因為覺得他沒被抓。呂秀蓮（1944 - ）出了一本書，關於美麗島事件發生當晚的演講、部隊的部署，那些都是我整理的，康叫我處理，我去了高雄至少一週，把所有路線、痕跡都去追蹤一次，所以那個鎮暴部隊有幾台車、如何噴煙，那個圖都是我畫的。我畫給劉峰松，劉後來拿給呂。

組黨的核心精神

組黨的核心精神就是「台灣人出頭天」。組黨那天我在，但過程參與比較少。大家說做黨外運動就是民主運動，其實是台灣

人出頭天運動，民族運動比民主運動內容多，黃信介那有什麼民主觀念，康可能多少有一點。

【陳忠信：我認為民主不是什麼大理論，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就是理論。《美麗島》有一篇在講連體嬰分割，其實就是在講台獨，但當時根本不太敢講。（林濁水：不太敢講我承認，但整把火就是在燒這個，外面蓋起來。）我出獄後看到錫安山事件的印象很奇特，他們動員能力很強，但那不是民主運動嘛！那就是反國民黨嘛！當時黨外運動有人是主張台灣人出頭天，像姚嘉文學法律，民主多一點，什麼人都有，就像大雜燴，也有統、也有左，像陳鼓應、曾心儀，但他們有沒有民主的觀念？當然有，但不是理論的，是很素樸的，這不像列寧、毛澤東，有一套理論跟你拚，台灣沒有這種理論家。主要力量就是選舉，編聯會後來認為除了選舉，還有街頭運動，我覺得這個是從橋頭事件開始的。

美麗島事件那晚，整群盾牌翻過去時，我想到我小時候，我家靠近濁水溪，那時沒有西螺大橋，阿嬤講媽祖刈香的經過給我聽。我阿嬤不認識字，她說，溪水高漲，神轎走過來，媽祖的令旗就大喊過啊過的，又讓我想起摩西出紅海，海水分開的事情，我那晚就想到這段往事。美麗島事件那晚大家衝啊都不怕死的，就像那樣，後來像許信良的生日餐會，都是選舉以外的群眾聚會，群眾運動就這樣一波一波的衝出來。】

社會科學家多少都有人講過那時的社會條件、政治條件是什麼，舉一個例子，1991年台獨黨綱通過的過程，國際因素第一是天安門事件以後，共產黨被國際社會修理，第二是波羅的海

小國獨立，這世界一下多了那麼多新國家，台灣當然會有人想跟，台獨黨綱中就把這一個背景寫進去了。另一方面，國內因素如果從分期付款的民主跟獨立來看，就是從台獨言論自由權、四一七決議文、1004 決議文到台獨黨綱，慢慢堆起來。

要怎樣讓民進黨變成台獨黨？一開始老討論要談台獨還是言論自由，黨內就一堆反對了，後來就變成先討論要有台獨的言論自由，這個議題過關，沒抓人，然後再討論主權獨立，又過關，然後民進黨比較大了，就可以提出台獨黨綱了。

很多人認為民進黨因二屆國代選舉挫敗而轉向，但我認為這個轉向是錯的，我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當時國大得到 23% 的選票，那時立委頂多也才到 27%，國大的得票比立委低是常態，所以 23% 不算低，但很多人嚇壞了就堅持得 23% 是被選民修理，包括郭正亮，拿各種比較數字給他看也沒用。

【陳忠信：民進黨創黨，得票率很快提升到 20%，這應該有人要研究，被牽涉到林宅血案的家博，寫過一篇英文論文，他說從 50 年代開始，黨外一直都有百分之二十幾的得票率，所以民進黨是把這些散兵游勇組織化，這些人原本就存在，這力量和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基礎有關，我有觀察到，但我不確定。】

民進黨應有「使命政黨」之自覺

我以前有整理過，很舊的文章，得票率不是都是百分之二十，而是有起伏的，所以我認為 23% 不算低。第二個，我一

直覺得民進黨注定要從無到有，創造新價值讓社會從拒絕到接受，就是以「使命政黨」定位民進黨，你的主張在社會是少數的，你是要去改變社會價值的政黨，價值改變之前你當然就是少數，價值改變了就可以坐享其成。使命政黨跟保守政黨的根差異，就是一個是維護既有價值，一個是改變既有價值，就是要讓台獨從少數變多數。陳水扁要修改台獨黨綱就是想要迎合多數民意，但我認為當時替他操盤的喇叭他們很不認真，說台獨是票房毒藥，那時的民意調查我整理得很完整，各報剪報都搜集，1990年代《聯合報》開始經常性地調查台獨支持度，1991年支持度只有個位數，但到了1997年百分之四十幾，贏過統一的百分之三十幾，已經贏了，怎麼會是票房毒藥？

不管如何，作為一個選舉政黨，民進黨剛建黨時，在民眾評價中，你在統獨、社會組織、金錢等等都輸，清廉、治理績效又都還沒做過怎麼知道？要怎樣去贏？

我認為要創造執政黨現在沒有的價值，雖然這價值現在在社會支持上是少數，但你得把他變成多數，你要去把它創造出來！如果你只想包括統獨一切都要迎合多數，那投降就好了。

喇叭、郭正亮都要討好他們認為的「現有的多數」，但那應該是保守政黨的做法，在這情形下他們主張的民進黨轉型，其實是要民進黨從使命政黨變成保守政黨，但民進黨當時究竟沒走上這條路。

【陳忠信：我那時在黨部，在政策研究中心，後來變政策委員會。還有一個選舉對策委員中心，就是現在民調中心，那時建

立是為了阿扁的選舉，林佳龍做統計分析，然後把資料送去給羅文嘉（1966 - ）。還有一個中國事務委員會，江鵬堅做主委，我做執行長，1993年辜汪會談的時候。】

假設郭正亮要民進黨做多數的追隨者，那本書《民進黨轉型之痛》提出來的時間也不對，時間落伍了，因為書是1996、1997年寫的，而1997台獨已經是多數，他要反台獨，豈不是要民進黨轉到少數那邊？

【陳忠信：如果許信良當主席，他確實認為，不處理中國問題，民進黨不可能執政。施明德哪有什麼思考，就是要贏而已，那是兩個主席的想法，民進黨從來不會說反台獨，只是說多說少，那不是轉型，是著重點不同。】

〈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現

〈台灣前途決議文〉是這樣來的，阿扁要選總統，他認為台獨是票房毒藥，競選團隊選完後寫文章回顧時還是這樣說，包括陳明通、邱義仁都這樣覺得，但我不贊成，我覺得他們講台獨都隨便講講，坦白講，太不用功了！

舉個例，大家都覺得邱義仁對這個很內行，但有一次，一個日本官員來新潮流辦公室，兩三個人在講話，邱義仁居然說，你們日本都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大家都接受……。我說錯了、錯了，日本和中國簽建交公報，我對內容清清楚楚，幾乎可以背，中國提建交三條件，第一，只有一個中國，第二，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兩個，日本都說 OK，日本 recognize，但第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本說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拒絕用 recognize，內閣官員在國會答覆時解釋得很清楚，日本就是不能接受 recognize，才會用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人家是這樣建交的，邱義仁弄台獨一輩子，卻這樣講，我蠻意外，但在民進黨幹部中這情形到現在還很普遍。連邱義仁都這樣，當時扁不可能比邱義仁更內行——這是民進黨還沒執政的時候。

因為台獨黨綱跟陳水扁市長落選有關，所以要推動 1999 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這說法恐怕大有問題，因為其他縣市長選舉大贏，民進黨氣勢正旺。只是扁還是認為台獨是票房毒藥，不利他選總統，所以要廢台獨黨綱，把他修掉。扁推薦游錫堃當黨秘書長，專門負責做這件事。討論時，陳忠信說：「不要廢台



1990 年林濁水先生參加新潮流主辦的制憲建國說明會。(邱萬興 提供)

獨黨綱，弄個決議文。」中央黨部就找了幾個人起草，主要執筆是郭正亮、梁文傑，我也是起草小組成員。陳水扁只要黨綱承認中華民國，廢掉台灣共和國就好，其他他都沒興趣管。後來大家就妥協成在決議文中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目前國號叫中華民國」，「目前」兩個字是我加上去的。我考慮的是：

第一：要妥協的話，阿扁要中華民國，我讓你，但我要主權獨立。第二：講中華民國真的會通嗎？堅持的話，你的駐外代表處的招牌會都被拆光光，代表處都得搬回來，連北美協調會的招牌都被拆回來了。所以我加了一個但書，說目前國號是中華民國，但在國際上要彈性運用。再來就是國家領域要依新修的領海法界定清楚。修領海法時在我強力主張下，內政部放棄公布已經畫好的，從中國遼寧一直畫到廣西東京灣的領海海圖，只公布台澎，釣魚台，太平島的海域，等於公布了台灣獨立的領海海圖。

我有一次和蘇永欽辯論，那很早了，我們都在選國大的時候，是《聯合報》舉辦的一個討論會，蘇永欽那時主張德國模式，他說兩岸要像德國那樣界定關係，他說德國人認為東德和西德是既「非本國」亦「非外國」。我笑他說，你認為這是偉大的法律發明嗎？我說且來從法律面、情感面兩個層面來看，他們這樣看是法律和情感糾纏不清的妥協結果：

如果東、西德界定為國內，這樣會沒辦法建立往來秩序，所以認為「非本國」，是為了建立往來秩序，這是理性的；但偉大的德意志帝國怎麼可以不見了，變成兩個國家？這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所以非得要說「非外國」。「非本國」、「非外國」一個是

法律理性的用語，一個是非理性的情感用語，他聽了臉就紅了。

稱中華民國或台灣國，我基本上傾向強調這些是情感的成分比較大。如從政治學的ABC來界定，國家的條件是政府、領土、主權、人民，沒有一個政治學教科書會說除了這四個條件之外，還有第五個條件叫國號的。確實，國家不會沒有國號，但沒有政治學教科書把國號當作國家的條件。所以情感上面我覺得這可以妥協，接受中華民國，但我當然不爽，所以才要加「目前」兩個字。畢竟，最重要的是領域的問題，還有土地、人民、政府才是關鍵。

在我看來，兩蔣時代世界各國都不是真正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各國人要去北京，絕對不會去台北領事館簽證。退出聯合國前，中華民國你講爽的，我就尊重你，這是因為排他性承認的關係，合法政府我只能承認一個，另一個我不承認，但管轄他的領土、人民的權力還是否認不了；退出聯合國後，兩岸主客位置倒過來，但國際上「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的基本立場還是沒改變。

【陳忠信：當時決定形式要用決議文，我說現在黨綱很奇怪，用括弧、註文來解釋。那時剛好要2000年，不如就用邁向新世紀的決議文來處理這些東西，1986年的就變成歷史文件，認為還需要的就寫成新的，過時的、已實施的就不要寫了。像美國是柔性政黨，每四年就有一個新看法，柯林頓選舉就有出一個政綱。共產黨是剛性政黨，但每次都有政治報告。我是建議用決議文的形式，但喇叭（邱義仁）他們覺得很麻煩，就只弄主權那個部分，後面那些經濟、司法，理論上應該要處理但沒處理，所

以就侷限在台灣前途。那是大家討論的結果，我都是小組成員，由喇叭召集、叫林濁水主導。】

民進黨台獨路線重要進程文件

「林濁水文集」這套書有一些要校正，但當時重要的一些文獻相對齊全，包括有〈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章程〉、設置目標，還有關於台獨發展的〈民進黨一一〇二台獨言論自由決議文〉、〈民進黨四一七主權獨立決議文〉、〈民進黨一〇〇七台灣主權決議文〉、〈黨綱提案：建立台灣共和國〉等等，這裡有很多是《民進報》的社論，我那時是總主筆。

台獨這個立場是民進黨成立以後才逐步推動確立的，剛建黨時，立場就只是自決，有台獨傾向，但不是公開的立場。這就像日本若林教授提出的有名理論，台灣的獨立和民主都是「分期付款」的，因為台灣人沒足夠能力——革命，不然就革命了，台灣人沒做這個選擇。沒做這個選擇，台獨運動進程就變成了分期付款的方式。

如果以人為中心，我可以把整個台獨的進程完整串聯起來。像江蓋世（1958 - ）主張台灣人有講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我替他寫文宣，從江蓋世推動台獨言論自由開始，民進黨到處去舉辦討論會，討論完就做成一個決議，也由我起草，新國家連線的參選宣言也是我寫的，當然還有後來姚嘉文推動的前後兩個主權決議文，皆由我起草，直到 1991 我領銜提案通過台獨黨綱。

1990年立法院處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我在替民進黨提出對案《中國關係法》時，想出了民進黨台獨如何實踐的時空架構，請周威佑寫出來，作為一個運動的策略藍圖。此後，至少我個人，大體上就照藍此圖做，這藍圖拿來對照我自己的歷程，從民進黨組黨一直到當立委，很意外，基本上都符合，於是2008年我把這個架構寫在《歷史劇場》裡面，有時間軸、國會、外部團體如何影響等等。

有趣的是，《歷史劇場》這本書是被人罵出來的。2007的十一寇風波中，我被罵說「假台獨」，我就把進入立法院以後在關於台灣主權、國家安全的努力的成果整理出來，相關法案有我自己做的，也有跟其他人一起做的相關法案。舉個例子，廢省修憲案是我一個人推的，推的過程《歷史劇場》書裡都有寫。

還有國民黨修〈領海法〉，草案是從遼寧到海南島，我推動修改到只有台澎。領海的海圖一出來，等於就是用海圖宣布獨立，這也是我一人弄的。〈公投法〉最早的法案是我起草的，不是蔡同榮也不是黃爾璇。那是我當立委之前，盧修一（1941 - 1998）等幾個立委聯合起來組了一個研究室，我當主任，負責起草這個法案，這是第一部公投法草案，我當立委之後繼續修改，黃爾璇有接手，蔡同榮應該是第三個，這些都有進入立法院的議程，有完整提案，但沒有辦法進入審查。

〈公投法〉草案路線爭議

最後通過的〈公投法〉是我當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所主持，由梁文傑起草的。〈公投法〉最早提的是我，最後面完成的也是我，很湊巧。其實以我的看法，蔡同榮的〈公投法〉草案是荒謬的，他最強調的就是裡面要規定制憲公投，我說制憲不需要，也不應當有什麼法律依據，那有法律在規定制憲的？那公投法豈不成了憲法的母法？哪有孩子生母親的道理，後來這個有拿掉。因為制憲是憲法秩序重新來過，只要政治力量夠，可以做成結論，就制憲，如果沒有那個力量，立什麼公投法一點用處都沒有。但如果那樣立法，會反而讓憲法一直陷在被另一個法制定的荒謬。

大家講到公投，就會提到瑞士，瑞士修憲很簡單，公投就可以修憲，的確很民主，但憲法也變得很奇怪，一路走來，天然景色、電影、獎學金、學校強制體操、咖啡館、蒸餾飲料、酒精銷售量不及二公升者視為零售，酒、苦艾酒、葡萄酒……小麥麵粉貯存、種子、水資源「冷卻用途」等等的營業規定都成了憲法條文，這類條文竟有二、三十條之多，我們真的要學嗎？也因此有關〈公投法〉門檻，以我來講，我是不贊成門檻太低的，不然就像瑞士憲法。

我的公投法草案有一些重要的內涵如「防禦性公投」是其他人沒有的。防禦性公投的來源就是姚嘉文，談到這裡涉及一個台獨運動觀的革命。最早的台獨基本立場是「台灣地位未定論」，所以要以公投制憲的程序創設主權。而決議文把立場改成「主權

已經獨立」。當然早先的主權決議文有「四個如果」條件下才獨立的規定，豈不和「已經獨立」矛盾？的確是矛盾，這「四個如果」是陳水扁加的，簡直是搞不清狀況的小孩，非要搞個不通的怪動作讓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似的，又好笑又好氣，但不給他加就沒得玩。

革命的意義，姚嘉文那時恐怕也還沒想透徹，但後來就一路發展下來了，歷史真是神奇。

為什麼這是一個台獨運動觀的革命？

「四個如果」就是主權還沒獨立。前面先說獨立，後面卻說如果這樣那樣才宣布獨立，這就是衝突的。從四一七、1007 決議文開始，有一個革命，那是同樣一個脈絡，就是主權已經獨立。這也不太算一個完全新的發明，如果一定要追溯可以追溯到施明德在美麗島軍法大審時說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精神可以追溯到那時。既然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實踐方法就會跟過去很不同。主權未定才需要透過制憲、公投來創造主權。

台灣地位未定論是中日和約、舊金山和約的基本精神，那是戰後不久的事，那時提未定論等於是一個現狀的描述，中國內戰也還打得火熱，誰會被消滅是未定之局。但八二三炮戰之後兩岸分立，時間越拖越長，看來可見的時間內誰也消滅不了誰，雙方的統治時間之久都符合「時效原則」的要求了。經過那麼久還

說台灣地位未定，對台灣太委屈了！所以說，「台灣主權已經獨立」，這時，公民投票有了完全不同的新意義，不是要用來「創造主權」，而是用來「保護主權」，這就是「防禦公投」，我起草的公投法的基本精神就是這樣來的。

1988年通過四一七決議文時，黨主席是姚嘉文，所以掛名是他，起草是我，1991年的台獨公投黨綱也是我起草的，新潮流開會決定推動。在《路是人走出來的》這本書裡，收錄了台獨黨綱的原始草案，（〈黨綱提案：建立台灣共和國〉，頁91）這草案就是依「主權已定論」起草的。陳水扁改成了公投台獨黨綱，這一改，和四一七四個如果主權獨立決議文一樣，都產生了前後文間的矛盾：前面已經宣稱主權獨立，建國卻還要再公民投票一次才能獨立，陳水扁真令人頭痛。

原案是基於國民主權原理，應公民投票決定制憲與否，公民投票不是來創造主權的。

陳水扁的台獨路線

陳水扁其實向來不關心這個議題，但他考慮到幾點：第一個我要表現，我一定要插手，如果不行插手我就不要。例如有民進黨幾次像憲政改造的重要開會，他就寧願去視察學校看廁所。第二他要把議題弄得安全，至於有沒有矛盾那不是他關心的事，所以「四個如果」跟他當總統宣布「四不一沒有」沒什麼不同，都是給台獨加上條件，這樣等於否定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這非常

有趣，照道理，激進的人往往會採取未定論；穩健的採取主權已獨立論；但最保守的主張「維持現狀」，又成了不折不扣的未定論立場。

陳水扁的四不事實上比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還接近傳統的國民黨：兩人都一樣「不獨不武」，但馬多了一個「不統」，而扁則有「未來一中」、「兩岸統合」和「不廢國統綱領」——這三樣都和「統」連繫。

（但最極端激進的台獨又不同，現在最激進的可能是許慶雄，他認為你如果沒有制憲、正名、公投，這不只不是讓台灣處於未定論狀態，而是根本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許慶雄這樣講可能是恨鐵不成鋼的氣話，也可能是他的信念。）

無論如何，陳水扁的方式跟我們推動台灣主權已經獨立，立場是完全不一樣，他要把民進黨又拉回去未定論。但人家未定論是要衝，他的未定論是不要衝，「不排除統一」，兩者方向相反但基礎一樣，倒也真古怪。

未定論、主權已經獨立、維持現狀三種路線的問題，我大概前後探討了十年左右，完整的意見，比較早的寫在《共同體：世界圖像之下的台灣》這本書，書中探討了李登輝、陳水扁如何攪和民進黨主流。那本書是2005年出的，之前都是零散的文章，我把這些路線戰略的討論集成這一本書的專章。

去年底（2012年）我替民進黨寫一個兩岸關係的政策報告，就是運用了這個架構。現在的民進黨在我看來，三條路都有人在

走，有人一以貫之；有的三路線混成一團，搞不清楚；有的隨機應變就是糊塗應變、隨便應變。

基本上游錫堃理路比較混雜，原來是保守的維持現狀派，後來葉國興帶他走，講未定論、制憲公投、推動〈正常國家決議文〉，跳回早期台獨路線，延續舊金山和約的未定論精神，很堅持。另一個是姚嘉文，跟我一路都是「主權已經確定」的立場，但主權既然已經獨立，以後要怎麼辦？姚嘉文比我激進，他認為要制憲，我認為制憲的問題不用現在馬上處理。在我看來，主權已經獨立這個主張已經漸漸變成主流。另外就是謝長廷的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他很努力，不放棄，但並不是主流；當然，不要忘了陳水扁上台時講的「四不一沒有」也是不獨，維持現狀，但不排除統一。

陳水扁如果不是一連串弊案、黨內威信全失，我認為他不會放棄不武不獨立場。他走上激進路線其實是學毛澤東，要動員紅衛兵來保衛他。這很清楚，2005年縣市長選完以後，從十二席掉到六席，大家都嚇壞了，都怪到他頭上，隔天立刻就眾叛親離，包括正義連線的郭正亮、他故鄉的王幸男、李俊毅都修理他，說要他退黨，他躲兩週不敢出來，那時只有我敢替他說話。因為那時候大家不是躲起來不講話，就是跟著媒體和憤怒的支持群眾跑，我去立法院，大家都等著聽以前「最愛罵陳水扁」的林濁水現在怎麼講。我認為局面敗成這樣，昨天投完票，陳水扁就要有個說法的要求不切實際，因此建議大家給他時間、空間，讓他好好想一想，想出來如何領導大家。結果他就在除夕發表演講，記



林濁水先生（右）與主訪者合影。

者聽完要問我感想，我沉重而洩氣地說：「他的做法是：訴求激進路線、不求施政績效、動員紅衛兵、鞏固自己權力。」

接著，他廢統，訴求制憲、公投，開始衝，一衝，一群死忠台獨激進群眾就圍過來了，紅衛兵既然圍在身邊，就沒人敢動他。民進黨從此一路衝，衝到游錫堃的〈正常國家決議文〉通過，最後就把民進黨衝倒了。2005 - 2008年，游錫堃做主席，推〈正常國家決議文〉，要正名處理掉他以前堅持要救回來的，被台獨黨綱否定的「中華民國」國號。

影響兩黨競爭的四個價值

我給中央黨部的報告指出，最影響到民眾對民進黨與國民黨支持的是四個價值，第一個是「主權確保」；第二個是「兩岸和

諧」；第三是「兩岸交流」，尤其是經貿交流順暢；第四個是交流後產生的「分配問題」，這四個價值我分別把它擺在四個象限中，他們是互相連動的。上帝就是這樣安排的，民進黨在一、二十年之內注定在四項中只會贏兩樣，國民黨也是贏兩樣、輸兩樣。

「主權確保」是民進黨贏，我認為謝長廷在這一點上看錯了。他認為主權議題要跟隨國民黨，民進黨才有希望。其實相反，例如國民黨 2012 年選舉丟出一個和平協議，過幾天就趕快收回，還說要公投，那就是他們知道主權議題要跟著民進黨才會贏，既然如此，民進黨還自己要放棄自己的主權立場？沒道理。

「兩岸和諧」是國民黨贏，和平協議為什麼贏會變輸，因為四個價值兩黨各有優勢，但在優勢象限走過頭會連動傷害另一象限的價值，和平走到底就變協議，就會碰到主權，民調就會一直掉，這是國民黨的罩門，怎麼會是民進黨的罩門？也因此要注意到和平是民進黨的罩門。如想在優勢的主權象限贏更多，盡量衝，衝到北京、美國翻臉，和平重傷，總體加起來，反而輸掉。

國民黨提兩岸和諧，經貿會順利，這是事實，但經貿太順暢，企業家就會出走，台灣人就失業。2004 年我是政策會執行長，幫阿扁助選，我計畫寫了申論這道理的小冊子，他不用，一直到 2008 年被洪美華拿去長仔那邊用。小冊子中我強調說，經貿順暢，生意人賺錢方便，投資就會在那邊，會造成台灣人失業。

2004 年利錦祥負責台中的選舉，他常被民眾罵你們民進黨鎖國，我告訴他說，當國民黨罵你鎖國，那是在送票給你，他說

為什麼？我舉個簡單的例給他聽，有個公司老闆，沒出國過，有一天他說，聽說杭州很漂亮，想去杭州觀光看看，這樣一講，整間工廠就鬧轟轟了，擔心老闆是真的要去杭州玩還是要把工廠遷過去？老闆只不過是要去大陸玩，員工就人心惶惶，說不要鎖國，票不跑掉才奇怪，我叫他用這點去宣傳，效果很好，台中的得票破紀錄。

ECFA 的影響

如果兩黨對中國問題都處理的漂亮，四象限處在均衡狀態，兩黨就不容易分出輸贏，如果一黨處理得好，一黨處理不好，輸贏才會顯現出來。例如民進黨用「分配」角度處理 ECFA 的問題，衝過了頭由贏轉輸，就像馬英九想要用「和平」衝更多票，反而衝到輸。

ECFA 簽訂前朝野全力攻防，綠營的策略會議我參加不下十次，我一再強調，談判牽涉到產業戰略的競爭，要小心處理，但沒人要理我，民進黨在眾多經濟學家建議下強調 ECFA 簽了會令台灣「大企業得利，中小企業和農民重傷」，我說民進黨這樣攻擊那穩死的。

他們依據的是經貿的通則，依通則，自由貿易雙方都是哪個比較利益優勢的地方就可以充分發揮，劣勢就會死，就是好的越好，犧牲差的，好的再來照顧差的，自由貿易的基本精神就是這樣。若照這個精神，學者們說大企業得利，中小企業受害，農民

受害，是對的，而且也符合台灣這一、二十年的兩岸經貿經驗。但我說，走到今日，兩岸經貿已經發展到這樣，中共一定會反面操作，他們要產業升級，競爭對象是台灣大企業，所以一定不會給你的大企業利益，但保護中小企業及農民，讓小利搞統戰何樂而不為？我的意見在黨內或在親綠智庫中開會時，都沒人理睬。

ECFA 簽出來，大企業沒有一樣讓的，台塑、裕隆、友達、高端的精密機械，這些產業都快哭出來了，農民卻覺得，好像不錯喔！完全跟我講的一樣。這個涉及到統戰，更重要的是涉及中共的產業戰略。這個戰役持續一年多快兩年，每天戰，民進黨從群眾演講戰到立法院。這是一個國、民兩黨的大會戰，雙方用很多本錢下去戰，到最後民進黨由贏轉輸。對協議民進黨只好說概括承受，但一個月後又反悔，說主權完全受到傷害。一個 ECFA 前面戰得那麼慘，後來認輸，又反悔，天大地大的 ECFA 這樣搞，對選舉當然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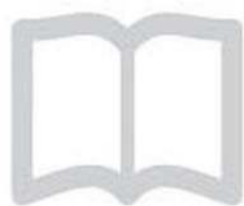
【陳忠信：包括張榮豐等人說，他們沒有政治目的，說主要是經濟目的，我說一定附帶政治目的。所以他們的思考基本上都是政治考量的。】

我覺得對於 ECFA 不要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這是致命傷，基本上，站在支持但嚴格監督的立場，戰到宣布投降也不好。

近期台美關係的變化

【陳忠信：2012 年的選舉，現在塑造得好像都是中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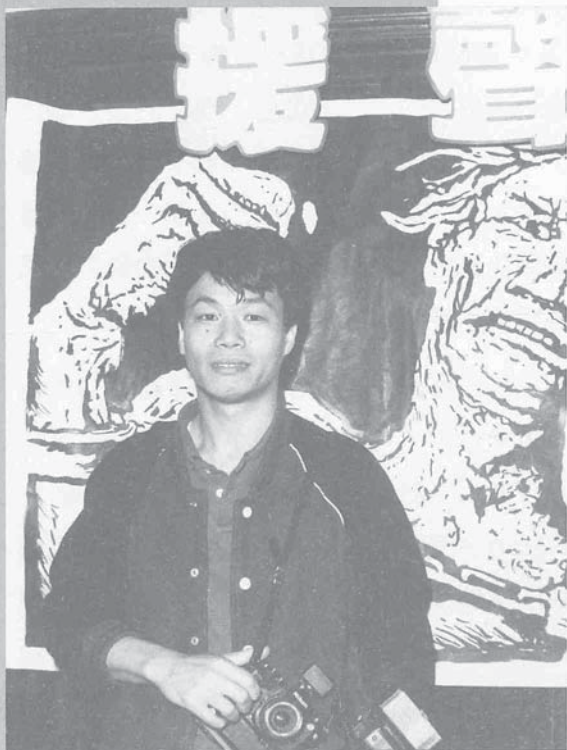
沒弄好才輸掉，蘇、蔡都好，現在給外面的人看起來，每一個看起來比扁還偏激。中國因素有沒有影響？有，但是現在其實是人家做出來的「勢」。我昨天去參加統派幫陳映真出的一本書的活動，他們就是在塑造一個往統一走去的勢，孫子兵法說的勢。現在問題就是，一個月前有一條很有趣的新聞，看起來是閉門會議，但事實上是《中國評論》在美國寫的報導，說美國一些退休官員及智庫學者說，2016年要想美國不介入台灣選舉，那是不切實際的，這個態度，這個人講話是有份量的，我甚至懷疑他有官員的身分，至少有政策份量。那就是很清楚的態度了。】



此頁空白

用影像見證台灣民主運動

邱萬興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彭孟濤

時間：2013年8月19日 10:20 - 12:10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星巴克咖啡
(建和門市)

邱萬興，1960年生於桃園縣觀音鄉，私立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1985年林正杰競選台北市議員期間，在其競選總部幫忙寫大字報、畫漫畫，同年進入《八十年代》擔任美編工作，從此踏上黨外之路。九二八創黨當天，在圓山飯店全程紀錄創黨的過程。民進黨成立後，也繼續參與《黨外公報》及《民進報》的美編和攝影，直到1989成立「小邱工作室」，專事選舉文宣的企劃與設計工作。2005年，與好友張富忠將自己過去從黨外到民進黨時期關於民主運動的傳單和文宣集結出版，名為《綠色年代》。

踏上黨外之路

1960年，我出生在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觀音村是靠近海邊的客家聚落，附近有一座很美的白沙岬燈塔，現在的觀音鄉已成為蓮花的故鄉。我小時候不會說台語，幾乎都聽不懂，大家都講客家話，直到上了國中，有一群原住民從石門水庫一帶被遷移到大潭新村，班上才有原住民同學，此外，草漯附近的學生也來觀音國中讀書，從那時開始才接觸到一些講閩南語的同學。

我在家排行老么，上有五個哥哥。父親50歲、母親40歲時，才生下我，所以我和我大哥差了十九歲。我從小家裡生活清苦，祖父與父親兩代都是觀音老街上的打鐵匠。從我父親以上的祖先都不識字，家中也沒有田地，因為我的祖先們太晚才從中國廣東移民來台，所以大部分的農地都耕耘不到，因而我家的土地是跟觀音甘泉寺承租的，只有土地上面的那棟矮房子才是我家的。我家的打鐵舖是西曬的矮房子，而且因為打鐵的關係，家中有一個打鐵的火爐，夏天熱得好像烤箱，所以我父親一年到頭都穿內衣，夏天打赤膊，冬天家裡則是很溫暖，所以他也沒穿過外套，連毛線衣也沒有。

我小學時候就很愛畫畫，就讀於桃園縣觀音鄉觀音國小與觀音國中，美術比賽常常得第一名，之後進入復興商工美工科就讀。其實在讀復興美工之前，由於家中很窮，加上我也不知道有復興商工美工科，所以我原本是在省立龍潭農工電工科就讀。一開始之所以會讀龍潭農工，是因為省立學校學費非常便宜，假如要讀私立學校，家中不允許，因為沒有錢，所以我上面的五哥

只有國中畢業，四哥從小就送人做養子，其餘的哥哥則只念到國小，畢竟家中無法負擔學費，像我家老三原本有考取省立中壢中學，只可惜念了一學期，父母就沒錢供應三哥下學期繼續讀書。

龍潭農工電工科所教的科目，全是水電接電線與焊水管知識，不僅如此，學校下學期課程還教導我們如何爬電線桿，我想到那可能是將來的工作之一，就有點害怕，我發覺自己對電工毫無興趣。我曾經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我不希望我以後的人生就是爬電線桿與水電工。

我後來會去私立復興商工美工科，是因為龍潭農工電工科的一位同學介紹的關係。那位同學很喜歡寫書法又愛畫畫，跟我很要好，他也知道我很愛畫圖，我們常一起幫班上畫海報與節慶壁報布置，所以某個假日他就邀我一起到台北縣永和市來看復興商工校區，參觀這個全國最具規模與特色的美術工藝、設計學校。結果我一看就喜歡上這個學校，回到桃園觀音，馬上就跟我哥哥和母親說我決定要休學去念美工科。有趣的是，本來那位住在中壢的同學是要約我一起去念美工科，結果後來他因為父母不同意，反而不敢休學重考，他一聽到我要辦休學，嚇了一跳。當時我人生抉擇決定的很快，隔沒幾天就到學校辦理休學，那時大概是一年級的下學期第一次月考之後。

私立復興商工美工科那時很難考，安排二天的考試時間，第一天考學科，第二天考術科；畢竟要和來自全國各地很會畫畫的學生一起競爭，不過復興美工有個好處，就是以術科基礎為重，不會很重視學科，而我那時素描基礎很強，在考術科時，考試的

科目是畫靜物素描與水彩，我畫得很像，水彩畫的很好，我記得考完後我還在考場內稍微逗留，看一下別人的繪畫作品，結果發現他們都畫輸我，所以我自認考上應該不成問題。

進入復興商工美工科後，由於學校比較不重視學科，所以數學只需讀到一年級，二年級以上就不用讀數理科目，英文與國文也只是點綴幾堂課，幾乎沒有困難的科目，就是以平面設計、素描、水彩、油畫、版畫、攝影、室內設計、印刷、雕塑為主，這些科目的訓練，也為我們打下很好的美學與設計基礎。幸好有大哥的支持，願意讓我在他那裡工作，寒暑假半工半讀才能完成學業。

1979年畢業，剛好是美麗島事件那一年，80年代以後，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百花齊放的年代，我們班有一位同學



1979年，與復興美工美三忠班同學合影。（邱萬興提供）

綽號「小蝌蚪」的黃志堅，他的父親是嘉義縣一所國小校長，很死忠的國民黨員。黃志堅也是我們同學裡，最早踏入黨外圈子的人。1981年底，黃志堅同學因為好友一通電話要他幫忙，「寧為黨外」的林正杰第一次參選台北市（大安、城中、龍山區）市議員需要人手幫忙，黃志堅同學就開始為林正杰助選，隔年就去許榮淑創辦的《深耕》雜誌擔任美術編輯，他說：開始當美編時，時常接觸到陳文成博士被警總約談後，陳屍台大校園內，死因真相未明的報導的相片，他也有點擔心害怕。¹一九八三年轉戰林正杰創辦的《前進》週刊擔任美術編輯，因為同學間互有聯絡，所以就一個拉一個，到黨外雜誌社做美編工作，像王玉靜、劉韓畿同學就先後進入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²雜誌社，有的到《雷聲》雜誌擔任美編，他們都是我復興美工同屆的同學。

1. 1981年7月3日任教於美國卡內基美侖大學數學系的陳文成博士，被發現陳屍於台灣大學校園內，死因為何至今未明，是為陳文成事件。由於陳文成在美國支持台獨運動，並曾捐款給《美麗島雜誌》，引起情治單位的注意。返台以後，於7月2日被警備總部約談，未曾返家，隨即被發現陳屍台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引起海內外的震驚。陳文成任教的卡內基美侖大學，也有兩位教授應邀來台瞭解陳文成命案。9月22日美聯社駐台北記者周清月在報導中，引述陳文成父親陳庭茂的談話，表示病理學家魏契（Dr. Cyril Wecht）曾對陳文成屍體進行驗屍。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對此大為不滿，要求美聯社更正，美聯社雖與新聞局溝通但不為接受，周清月被禁止一切採訪行動。有趣的是，9月24日魏契在美國召開記者會中，則公開明確的表示他曾經針對陳文成的屍體進行第二次驗屍，這也是陳文成事件發生以後，間接引爆台灣新聞自由的問題。參見薛化元撰，〈陳文成事件〉，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831。
2. 《八十年代》由康寧祥、陳永興所籌備，於1979年6月間創刊。是當時「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政論刊物。由康寧祥任發行人兼社長；記者出身的司馬文武（本名江春男）擔任總編輯；陳永興結合了一批大學裡的學者教授擔任該雜誌的幕後智囊及撰稿人；參與編輯工作的多屬年輕的新生代，包括康文雄、陳忠信、李筱峰、林進輝、范巽綠等人，後來林濁水、林世煜也加入。《八十年代》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說：「八十年代就在眼前，……我們深信，這是一個集體參與時代，是一個群眾智慧的年代，不是一個敲鑼打鼓、捧拜英雄的時代。在變動的世局中，

相較於他們，我是較慢才進入黨外雜誌社工作。1985年，林正杰連任台北市議員，在戒嚴時期，黨外的新聞被媒體封鎖，黨外人士選舉都流行以演講、戰報和民主牆來宣傳自己的理念，在黃志堅同學的號召下，我們一群復興美工的同學就到林正杰市議員那邊幫忙，因為我們不但會用麥克筆和廣告顏料寫大字報，還很會畫時事漫畫來諷刺國民黨，所以在當時台北市議員選舉中，林正杰的民主牆是黨外市議員中最有看頭的！吸引大批的支持者圍觀。林正杰的競選總部位於和平東路和基隆路口附近，我們每晚八九點就進入總部開始畫大字報，那時都是義務幫忙，不領薪水的，當時我們還常被情治單位跟監警告恐嚇。

我因為從小右耳就聽不見，不用當兵，1979年畢業後，直接考入香港華僑投資海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上班，做房地產美術完稿工作，做了四年後離開建築業，1984年又和復興美工同學做了一年的神像雕塑工作。一開始我覺得雕塑很好賺，上班族一個月薪水約一萬多元左右，但雕塑一個月的平均收入大概有五到六萬元。我記得當時有接到幾個案子，是基隆的「十八羅漢洞」雕塑，每個案子酬勞高達二、三十萬。雕塑做了一年後，雖然覺得收入不錯，但覺得很辛苦，夏天在做雕刻翻模時，塑膠材料內含玻璃纖維材質，接觸到皮膚會又癢又痛，所以後來覺得太辛

我們不願被任意擺布，我們必須爭取生存的權利」。創刊的兩個月後，另一本「黨外」運動的刊物《美麗島》也相繼創刊。《八十年代》與《美麗島》這兩本雜誌代表著當時「黨外」運動的兩條路線——前者從事批判性的論政，但沒有與群眾直接結合；後者則採群眾街頭路線。1979年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八十年代》也遭池魚之殃而被查禁及停刊一年。後來原班人馬改以《亞洲人》及《暖流》雜誌繼續發行，仍遭禁。《八十年代》復刊後，內部參與人員稍有變動，繼續發行，其間數度遭查禁，於1988年停刊。參見李筱峰撰，〈八十年代〉，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55-56。

苦，我就不想再做了。1985年，透過復興美工劉韓畿同學的介紹，我進入《八十年代》雜誌社當美術編輯，開始踏上黨外之路。

擔任《八十年代》的美編

黨外雜誌的美編流程是，每個禮拜四晚上八點以後，我們美編人員才會進入雜誌社，在此之前像主編徐璐小姐就得把每篇稿子的文字部分整理好，《八十年代》的美術編輯工作，在我進入之前是由劉韓畿一手包辦。以前很多雜誌社都只有配備一個美編，因為他一人要編六十四頁內文，加上彩色封面與封底，所以他必須非常敏捷地貼稿，幾乎沒辦法休息，也沒有辦法有太多思考的時間，就是一拿到稿件，就得埋頭苦幹快速完成。由於劉韓畿一個人太忙，體力無法負荷，就找我加入《八十年代》。那時美編人員的待遇是一個晚上一千五百元，一個禮拜只要去一天，就是每個禮拜四晚上進入雜誌社，然後就一直通宵熬夜趕稿到禮拜五早上六點，完稿後再送去製版印刷，禮拜六書局就一定可以看到黨外雜誌了。

《八十年代》雜誌，是我第一個工作的黨外雜誌社。那時的《八十年代》，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徐璐擔任執行編輯。一九八六年，康寧祥準備東山再起，要參加台北市立法委員選舉，所以，他要正式進入選舉的時候才結束雜誌社。我記得當時去雜誌社，樓下其實隨時都有警總人員在監視，所以我在1985年以前都住在我二哥家，但進入黨外雜誌社之後，就自己在外面

租房子，而且我都會再三叮嚀房東，所有要找我的人，都告訴他沒有這個人，當時人家要找我，我都用電話連絡對方。在那威權統治的敏感時代，這是不得已的做法。

在進入黨外雜誌社之前，我對黨外其實並不陌生。我是桃園縣觀音鄉的客家人，一般都認為北部客家人是國民黨的鐵票，其實不然。1977年，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那一年，就曾經徹底翻盤過一次。我剛好在台北讀書，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觀音鄉將近九成的選票都投給許信良。至少到1992年之前，很多民進黨立法委員候選人，還能囊括七成的選票。以當時全台灣北部的客家鄉鎮而言，桃園縣的楊梅、觀音和新屋等沿海客家鄉鎮，可說是民進黨的鐵票區。儘管現在已不比當年，近幾次桃園縣的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的候選人，大家還是都想擠進楊梅、觀音、新屋、大園這個沿海選區來參選，畢竟這是綠營主要鐵票區嘛！我記得從我有投票權開始，就不曾投過國民黨，因為我的所有兄長，都在投黨外人士，而且我們觀音鄉的人對國民黨都沒有什麼好感，歷屆的觀音鄉長幾乎都是民進黨籍。由於這個淵源，所以之後我進入黨外雜誌社，可以說是「無縫接軌」！

當年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能在觀音、新屋等客家鄉鎮獲得那麼高的支持，我想他在選縣長時所提出「肥料送到家」的政見，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事實上，「肥料送到家」對鄉下的農民來說很重要，讓他們覺得真的有被政府照顧到。以前農民必須親自到農會，用牛車把肥料載回家，相當辛苦，所以改成由農會把「肥料送到家」，對農民來說自然是莫大的恩惠。³

《八十年代》週刊結束後，也因工作關係，接觸不少黨外重要幹部。我就到台北市議員周伯倫創辦的《新路線》雜誌社上班。其實在《八十年代》工作時期，我已認識許多黨外雜誌的美編人員，因為那時我們會到處去串門子，包括《前進》、《雷聲》、《自由時代》等雜誌社都會去，所以我在民進黨創黨以前，就兼職幾家黨外雜誌社的工作。有的雜誌社創刊號出完就倒了，《台灣與世界》週刊出個幾期就倒了，有些連雜誌名字我都忘記了。我除了在《新路線》週刊幫忙擔任美術編輯，周清玉國代也請我編《關懷》雜誌，台灣人權促進會關懷政治犯的陳菊也請我編《台灣人權》雜誌，有時候我還會跑到高雄去幫吳昱輝編黨外雜誌。

創黨前夕投入《黨外公報》

1986年，我擔任周清玉和謝長廷的文宣設計，那是我第一次幫黨外候選人做選舉文宣。當時我從黨外雜誌轉到「黨外公政會」上班。因為《新路線》週刊被警總不斷查禁、查扣，周伯倫也不堪虧損，經營不下去，沒幾個月就倒了。那時，黨外公政會理事長顏錦福議員請賴勁麟來編《黨外公報》，因為我和賴勁麟在《新路線》共事過，他就邀我一起去《黨外公報》。黨外公政會的總會地點在立法院旁、青島東路上的一間小辦公室，《黨外

3. 許信良在擔任桃園縣長期間（1978-1979）實施了兩項重要的政策：「服務到家」與「立即辦中心」。其中「服務到家」包括到家收購稻穀，以及肥料送到家，這也是許信良在省議會經常質詢的重點政策。參見林哲藝計畫主持，台灣省諮議會編著，《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許信良先生訪談錄》（台中：台灣省諮議會，2004），頁41-43。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遠見，1998），頁72-75。

公報》其實是在民進黨在九二八圓山建黨後，10月4日才有創刊號出版，在此之前我和主編賴勁麟就已經開始做前置作業。所以很有趣的是，民進黨在創黨以前還沒有《黨外公報》，而是圓山創黨以後才有《黨外公報》創刊號的發行！發行主要目的是，讓更多人知道，黨外在做什麼？「民主進步」是什麼？

《黨外公報》週刊像傳單一様，四開大小，二色印刷，一份賣十元，賣得非常好，那時黨外公政會總會，沒什麼募款進來，因為立委與國代的選舉關係，那時，已經幾乎彈盡援絕，《黨外公報》初期銷售量約四到五萬份，最高曾經衝破每期十萬份以上，因為大選的因素，《黨外公報》成為民進黨演講場最暢銷的宣傳補品，靠《黨外公報》賺了不少錢。不僅達到宣揚黨外理念的目的，甚至就是靠著賣《黨外公報》的盈餘，發工作人員薪水，及推動民進黨在全國舉辦巡迴演講的經費。《黨外公報》解散時，還結餘四十幾萬元給民進黨。

我在《黨外公報》編一期有1500元的酬勞。那時《黨外公報》的工作人員，包括我在內，賴勁麟、王作良、郭文彬、枝伯（林樹枝）、陳清泉等人，領得酬勞都不高，都不會打字，但稿子難免有錯字，需要改正，枝伯就問我說：「你女友會打字改稿嗎？」我說會，於是我就請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當時在台北市南陽街補習班上班的女友廖紫妃（現在的太太），在每個禮拜四的晚上，即《黨外公報》出刊前的晚上，一起幫忙改字與校對，然後給她每期500元酬勞。

在《黨外公報》除了擔任美術編輯外，我也要負責攝影工作。

以前我在《八十年代》不用拍照，撰稿人會附照片過來或是用漫畫來取代。《八十年代》沒有攝影記者編制，不像《前進》與《自由時代》等雜誌社，有專業的黨外攝影記者如余岳叔與宋隆泉等前輩。在戒嚴時期，黨外雜誌工作人員要拍照也很困難，總統府、行政院等重要的公家機關，有憲兵部隊駐守，連外觀都不能亂拍照，必須拍了就跑，不然憲兵會追著你跑。像之前我曾和黃志堅一起去拍照，我騎摩托車，他坐後座，相機拍了幾張就立刻騎走。

見證九二八圓山創黨

黨外人士早就已經有準備要組黨，從7月開始，祕密組黨十人小組就緊鑼密鼓地在周清玉家聚會組黨，周清玉對在她家討論組黨的事，他們都守口如瓶、保密到家。那時十人小組中的周清玉、謝長廷要選國代與立委，要我幫忙設計文宣，他們都叫我跟在身邊幫忙攝影紀錄，所以像我們這麼接近他們的人也不知道祕密組黨的事，我是一直到九二八當天，民主進步黨宣布組黨時才知道的。其實，黨外公政會就曾陸續提出組黨的主張，也舉辦過好幾場組黨說明會，1986年8月15日晚上，黨外人士在台北市中山國小舉辦「促進行憲與組黨說明會」，吸引數萬群眾聽講，場面至為熱絡，尤其民進黨創黨前的林正杰的坐監惜別會，在全台各地舉辦的街頭狂飆，更印證了台灣人民對一個新政黨成立的期待，鼓舞了黨外人士。

民主進步黨九二八圓山創黨當天，枝伯要我去會場做影像紀

錄，因為《黨外公報》創刊若是沒有照片，版面會很難看，林樹枝那時在黨外公政會總會擔任秘書工作，也幫忙寫稿，陳清泉擔任 1986 年黨外選舉後援會游錫堃省議員秘書，黨外公政會很多聯絡事宜都由他們二人負責，枝伯有二次坐黑牢的經驗，因此他做事會比較謹慎小心，口風也比較緊。黨外那時有編聯會及公政會兩大系統，兩邊的人我都認識，但有趣的是，那時我們做美術編輯的不能成為編聯會的會員，只有文字編輯才可以，所以圓山創黨時，必須繳費 500 元才能開會，負責收會費的是林秋滿，只有編聯會及黨外公政會的會員才能簽名進入會場，而我是美編就不行，因此，只有我和林秋滿是民進黨圓山創黨當天，不能簽名與繳費成為創黨黨員的工作人員。

當時黨外人士要租借場地開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樹枝曾四處去台北市各大飯店租借場地，他們都怕國民黨找麻煩，聽到黨外人士要借場地都會一一拒絕。最後請魏耀乾（1950 - ）醫師去台北圓山大飯店借場地，以台北市牙醫師公會的名義來租借場地，說是要召開牙科醫師大會，才能順利借到開會場地。台北圓山大飯店是蔣宋美齡的關係企業，在國民黨的飯店召開組黨會議，實在夠諷刺。

1986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這個歷史性的一天，原先對外的說詞，只是推薦黨外人士競選 1986 年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的誓師大會，由後援會召集人游錫堃省議員主持，向社會各界推薦黨外二十名立委及二十二名國代候選人。我一整天都在台北圓山大飯店的敦睦廳做影像紀錄，當時我是可以在會場裡面拍照的工

作人員。不過黨外雜誌和幾家對黨外友好的媒體記者能夠在開幕式時拍照。中午過後準備討論組黨會議時，決定清場，就怕警總人員混進來，於是檢查會員名牌，關起門來開會。在以競選為名的掩護下，準備召開組黨會議，決定清場，所有媒體都被請出去。那時開會過程不開放給媒體記者採訪拍照，組黨開會時，來自全國的英雄好漢，只為了討論名稱，就可以爭辯很久，也有人擔心害怕。朱高正的臨門一腳，「要大家不要再爭吵了，今天一定要建黨」，最後才採用謝長廷提出來的「民主進步黨」。有空檔時，我也會去陪這些媒體記者在一樓的咖啡廳聊天。黨外後援會代表共有一百二十三人一同簽署組織「民主進步黨」發起人。組黨會議結束後，我幫忙排椅子在敦睦廳講台前，下午六點多由組黨發起人費希平與謝長廷、尤清、游錫堃、顏錦福、黃玉嬌等人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了！」

1986年底周清玉、謝長廷要選舉，都叫我跟在身邊幫忙攝影，周清玉要選國大代表連任，周清玉以台北市第一高票連任國代，謝長廷在台北市增額立法委員選戰中，原本聲勢最好，但最後卻輸給康寧祥和吳淑珍，以台北市最高票落選立委。

黨旗與黨歌的由來

民進黨的黨旗是建築設計師歐秀雄設計的，我後來編輯綠色年代專輯時，有去基隆親自訪問過他。歐秀雄說：「那支民進黨黨旗，其實早在1985年就有的，那是1985年黨外選舉後援會的

旗幟。」在此之前，黨外選舉後援會並沒有旗幟，我記得以前的黨外候選人選舉，他們的旗幟上沒有 logo，只有寫「黨外」兩個字。只有 1978 年的張富忠曾為黨外選舉設計一個人權標誌。其實當時黨外的美術人才太少，雖然從 1977 到 1980 年代，黨外許多重要的選舉文宣和傳單，都是由張富忠設計的，但張富忠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後，黨外就沒有專業美術人才了。80 年代以前的黨外傳單都是紅黑兩色，1981 年之後，才有張富忠的太太 LuLu（范巽綠）幫黨外的台北市議員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和康水木設計黨外第一張綠色傳單。

黨旗原樣是參考大英國協米字國旗，再加上台灣圖形，但後來黨外許多人反對，說是新黨都還沒組成，自己就先四分五裂了，因為感覺不好，所以後來就改成現在的模樣。一般人都認為這代表台灣在十字路口，但其實最初的涵義，按照歐秀雄的說法，是因為他自己信奉耶穌基督，所以才會改成「台灣背著民主的十字架」的圖案。由於周清玉也是基督徒，所以 1985 年周清玉就邀請歐秀雄設計。後來「一個十字，各自表述」，這支旗幟也被黨外人士一致承認。1986 年 10 月 13 日，民進黨召開工作委員會，建黨十八人工作小組就決定把那支 1986 年黨外選舉後援會的旗幟，作為民進黨正式的「黨旗」。

民進黨第二任黨主席姚嘉文，曾經公開徵求黨歌，當時群眾上街頭都會唱歐秀雄創作的「勇敢個台灣人」來鼓舞大家的士氣。原本那首歌要作為民進黨的黨歌，不過創黨元老費希平立委反對，因為歌詞中有句「受外邦統治了數百年」，沒有通過。當時

費希平立委是民進黨的大老，講話很有份量，大家都很尊重他，但他不贊成台獨，所以後來又討論幾次，都不了了之，因而民進黨就沒有「黨歌」。

從《黨外公報》到《民進報》

組黨十人小組中，費希平立委和傅正教授二人份量很夠，如果沒有他們，民進黨要成立恐怕很難。當時大家都很尊敬他們。以費希平立委來說，一個外省人，又是資深立委，能夠和黨外人士互動熱絡，而且又在黨外擁有很高的地位，依我來看，真的很不簡單！至於傅正教授，我對他印象很好，他在黨內有「太史公」的稱號，我和他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共事三年多，他為人執著，我記得每次民進黨中常會、中執會開會，包括開會情形、每個人的發言內容，傅正教授都會詳細地紀錄下來，而且他還會注意每個來開會的中常委與中執委的遲到早退，相當有趣！

那時民進黨每次開會，為了編《民進報》，我都必須在會議室拍照紀錄。創黨之後，《黨外公報》發行十二期，就變成《民進報》。那時，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與秘書長黃爾璇都覺得《黨外公報》應該要改名，包括很多支持者也覺得很奇怪，明明民進黨已經成立，為什麼還叫作《黨外公報》，因此 1986 年 12 月立委與國代選舉完，正式結束第十二期《黨外公報》，隔年一月，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發行的《民進報》正式創刊，由謝明達擔任首任總編輯，林濁水任總主筆。

我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一共擔任三年的攝影及美術編輯工作，直到1989年5月才離開中央黨部。解嚴前後，大家愛看《民進報》，是因為覺得很稀奇，過去新聞封鎖，既沒有有線電視，三台也不會報導民進黨的新聞，所以黨報那時有固定的訂戶。此外，《民進報》幕後也有不少的支持者會提供金錢贊助。

桃園中正機場事件

許信良在美國組黨後，就一直想測試國民黨的底線，宣稱要闖關回台，1986年11月底，許信良與謝聰敏（1934-）、林水泉、艾琳達（1949-）就想從美國經由日本的成田機場搭機闖關回台，可是最後沒有成功，國民黨不讓他回台。其實我們在看以前的「黑名單」，許信良也好，陳婉真也罷，要闖關回台，國民黨雖說他們是叛亂犯，卻不抓人，反而讓他們原機遣返，真的是既荒謬又矛盾！當年許信良回來要給國民黨關，國民黨卻不關他，像後來陳婉真偷偷從中正機場闖關，在桃園機場內也是被抬著出去又原機遣返，不過，1989年台獨聯盟準備遷盟回台，它的海外與島內盟員反而一一被抓，國民黨政策的搖擺，有時候真令人摸不著頭緒。但我想國民黨當時會抓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李應元等人，可能是因為擔心獨盟遷盟回台，會迅速壯大台獨的聲勢。

1986年許信良會回台，是因為在民進黨創黨前，他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但後來民進黨已經成立，他的海外新政黨

對島內來說就變得不稀奇了，所以他那時才會決定要闖關回台。其實許信良會回台，坦白說也是為了替他弟弟許國泰的立委選舉造勢。11月30日當天，為了要迎接「黑名單」許信良的闖關歸鄉，來自全台各地的許多民進黨候選人都率領數千群眾前往桃園中正機場接機，各路人馬先到中壢市許國泰立委競選總部集合，早上九點由八十多歲的高雄縣老縣長余登發（1904 - 1989）率領群眾，從中壢步行十幾公里往機場前進，令人十分感動。

以前的遊行和現在的完全不同，在戒嚴時期，所有抗爭是要面對憲兵部隊。憲兵部隊各個人高馬大，鎮暴裝備齊全，戴防毒面具，手持齊眉棍，握銀色盾牌，讓人不寒而慄。我常笑說我們以前的街頭遊行，是和國民黨的正規憲兵部隊在對抗，台灣經過政黨輪替後，現在街頭抗爭比較溫和，鎮暴警察這幾年比較不敢



1986年11月30日，為了阻擋許信良闖關回台，國民黨派出大批軍警，出動鎮暴裝甲車，封鎖通往桃園機場的道路，發射催淚瓦斯對付接機民眾，邱萬興先生在鎮暴部隊前，紀錄這場棍棒、石頭齊飛的桃園國際機場事件。（邱萬興提供）

隨便打人，以前憲兵則會直接揮棍痛毆民眾，所以我一直覺得戒嚴時期，敢上街頭的人都很勇敢，畢竟隨時會被打，憲兵部隊都受過正規鎮暴訓練，和現在警察完全不一樣。

桃園中正機場事件當天，國民黨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封鎖機場道路，警民雙方爆發互丟石塊的衝突，我和周柏雅（現任台北市議會副議長）撐著雨傘擋住空中飛來的亂石，忍受紅色水柱與催淚瓦斯的襲擊，保護周清玉國代的安全，周柏雅的手背還被警方丟來的石頭擊中受傷。我還必須拿相機做全程的抗爭紀錄。因為那時為了編《黨外公報》，也拍了不少照片。那天，在機場前一公里處，警方就架起了拒馬，警察站在拒馬後面，憲兵鎮暴部隊被安排在拒馬前面，憲兵持齊眉棍和瓦斯槍站在最前面，後面有裝滿紅色藥水的消防車直接對群眾噴射強力水柱，兩旁還有多輛軍用運兵裝甲車來回穿梭，直升機又在上空盤旋，對地面廣播並空飄傳單，要群眾趕快回家。那種肅殺的氣氛，真的很嚇人！

當天，軍警施放催淚瓦斯與消防水柱想要驅散群眾，消防車噴出來的是紅色水柱，可以對群眾點名做記號。水柱一噴，鎮暴部隊立刻使出了催淚瓦斯。當時吹東北季風，鎮暴部隊全部帶上防毒面具站在上風的位置，示威群眾則在下風處，想跑都跑不掉！只要一被噴到，眼睛想睜都睜不開，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催淚瓦斯的震撼！不過催淚瓦斯及強力水柱的攻擊，不但沒能驅散群眾，反而更加激起示威民眾的怒火，許多人就撿起路上的石頭朝警察那邊丟過去。這時憲兵部隊沒有驅離動作，仍是整排站在那裡，製造威嚇的效果。後來因為警方和群眾之間互扔石頭，

滿天石頭飛舞，衝突似乎又要一觸即發，江鵬堅眼看情勢不對，不少民眾流血掛彩，為了避免衝突繼續擴大，他就請一些女性候選人，像是周清玉、許榮淑、張溫鷹（1950 - ）、蕭裕珍、余玲雅、翁金珠（1947 - ）等人，手持鮮花站在最前線，把群眾和鎮暴部隊隔開來，於是混亂的場面才得到控制。事實上也不是真正隔離，只是不要讓群眾繼續向前挺進，所以當時鎮暴部隊站在原地不動，有些民眾還是可以在鎮暴部隊前面走來走去，甚至還有人站在道路防護欄上，相當有趣。

我還記得當天下午，突然開進十幾台警車要進入中正機場內，分明是故意來製造衝突，因為很多群眾一看到警車就很「賭爛」，一定會想翻警車。我們都知道，這絕對是國民黨故意設下的陷阱，警方人員有無線電，不會不曉得前面的道路已被鎮暴部隊用拒馬封鎖，強行開進群眾裡面，一定是國民黨嫁禍的技倆，目的就是要刺激民眾的反感。那時我有到後面觀察，當天有很多國民黨派來的假暴民，想趁機製造動亂，果然有許多激動的民眾按捺不住，當場把警車給翻倒，旁邊的群眾拍手叫好，準備點火燒警車。我就趕忙去告訴江鵬堅律師，後來他馬上叫一組糾察隊去把警車顧好，並警告群眾不准點火燒車。因為只要警車一被燒掉，我們就會變成了暴民，憲兵也會立刻開始打人。最後總算沒有燒車，但還是翻了幾輛過來。

桃園中正機場事件可說是民進黨創黨後，最危險的一次街頭運動，這次的示威行動，有綠色小組與林炳煌紀錄的整個抗爭的實況錄影帶，在這次大選中發揮了很大功效，以小眾媒體對抗三

台電視，拆穿國民黨的謊言，讓國民黨的抹黑技倆破功。這時民進黨才成立沒幾個月，正是最脆弱的時候，國民黨千方百計的在找抓人的口實，只要一個不小心，被醜化、扭曲成群眾的暴力事件，就很可能遭到鎮暴警察的鎮壓及逮捕。

五二〇農民運動

1988年5月20日的農民事件⁴，我也有全程拍攝抗爭過程。農民只是上街要求保護農民權益，那時李登輝剛接任總統不久，其實你看那場農民運動，國民黨那時對農民很殘暴。如果國民黨不要動用憲兵部隊鎮壓，我想那場農民運動絕不會變得那麼激烈！這也是解嚴後最嚴重的一場街頭流血衝突事件。

雲林縣農民權益促進會所發起的農民請願運動，由總指揮林國華帶領農民北上請願，從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集結出發，沿著南京東路向西型，在1988年還是以憲兵部隊駐守行政院、總統府等公家機關，直到隔年才慢慢改變，在此之前國民黨都是用憲兵部隊來對付黨外及各種街頭運動。

4. 1988年5月20日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主導南部農民北上請願活動，由林國華擔任總指揮，蕭裕珍擔任副總指揮。提出：全面農保與養保、肥料自由買賣、增加稻米保證價格收購面積、廢止農會總幹事遴選、廢止水利會會長遴選、成立農業部、農地自由買賣等七項要求。結果發生遊行民眾與警方的嚴重衝突，稱為五二〇事件。當日的衝突始於下午兩點，在立法院前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而後歷經多次衝突，次日凌晨，憲兵隊展開驅離行動，介於警民之間要求和平的學生首當其衝，遭毆傷、逮捕。但被驅散的群眾仍與警方發生零星的衝突，總計130多人被捕，96人被移送法辦。這是戰後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請願行動，而警民衝突之激烈也前所未見。最後由學者介入進行所謂的五二〇調查報告，反駁檢調單位有關遊行民眾預藏器具進行暴力行動的指控。參見薛化元撰，〈五二〇農民運動〉，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156。

本來農民示威的最終目的地是總統府，但總統府前早已佈署鎮暴憲兵部隊，中山南路的道路也架設了層層拒馬，因此遊行隊伍不可能再往總統府前進，只能停留在立法院抗議。現在的遊行都有流動廁所，以前沒有，而且立法院四周也沒有廁所，那時抗議的農民尿急想進入立法院如廁，卻遭到鎮暴部隊阻擋，因此才會爆發嚴重的警民肢體衝突。

下午二點多，農民在立法院請願時，總指揮林國華被立法院內衝出來的鎮暴部隊打得頭破血流，到台大醫院稍做包紮後，他又重回宣傳車上指揮，下午三點，警方的鎮暴消防車，開始朝群眾第一次噴射強力水柱，來驅散群眾。

當時的詹益樺⁵ 還憤而拆下立法院的橫匾，那時我就在他的旁邊。像三台電視記者台視、中視、華視與《聯合報》的攝影記者，絕不敢站在群眾這一邊，只敢站在鎮暴部隊後面拍照，我們這些黨外的攝影記者反而敢衝在前面拍攝紀錄，因而比較能拍到珍貴的畫面。由於在場的黨外攝影記者都互相認識，詹益樺要拆招牌前特別吩咐我：「小邱，我要拆立法院招牌了，叫他們不要拍！」所以你看詹益樺拆招牌的畫面沒有人拍，掉下來的那一刻才拍。我當時告訴其他攝影記者不要拍，怕會成為證據，害詹益樺被關。

5. 詹益樺，嘉義竹崎人，民進黨黨工，是鄭南榕理念的支持者。曾經擔任過遠洋漁船的船員，在1988年五二〇農民運動時，曾拆下立法院的招牌，1989年鄭南榕自焚之後，他隨即北上。5月19日詹益樺在參加鄭南榕喪禮時，帶著預藏的汽油在總統府前引火自焚，自殺身亡，繼鄭南榕之後自焚，履行自己的理念。參見薛化元撰，〈詹益樺自焚事件〉，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997。

林國華為了前進總統府抗議，所以當時經過忠孝東路警政署與行政院，有人拆掉警政署門口招牌，這時行政院內的憲兵鎮暴部隊立刻衝出來在街頭打人，轉眼間群眾和軍警就在中山北路、忠孝東路一帶打得天昏地暗、不可開交！當時我正站在林國華的總指揮車上攝影，一看到憲兵鎮暴部隊衝出來，就趕忙跳下車。

傍晚時林國華又帶著隊伍從忠孝東路去總統府，到了台北火車站前的城中分局就被鎮暴警察阻擋下來，於是群眾就在城中分局前面坐下來抗議，阻擋所有車輛通行。那時已是晚上七點半，警方為了要讓忠孝東路這條馬路暢通，所以近千名鎮暴部隊與霹靂小組開始強制驅離民眾、抓人，總指揮林國華父女與副總指揮蕭裕珍等二十餘人因而被逮捕。在城中分局前要求「和平、放人」的大學生，在靜坐中也遭到憲警無情的鎮壓，被警方押入城中分局的《民進報》總主筆林濁水與大學生都慘遭刑求毆打。這是解嚴以來持續最久的一場街頭巷戰，長達十九小時的攻防戰，直到隔天清晨七點才平息。

當時我和《台灣民主》雜誌的黃嘉光，站在城中分局前的一台宣傳車上拍照，看到鎮暴部隊衝過來，我趕快跳離宣傳車，他因為腳行動不方便，沒辦法馬上跳車。眼睜睜看著黃嘉光在宣傳車上被警方逮捕。黃嘉光被抓去關了三個月才開庭，仍難逃檢警惡意控告，警察指控他在宣傳車上丟石頭，為此我還去台北地方法院替他作證。我對法官說：「宣傳車上哪有石頭？去哪裡撿石頭？黃嘉光是在宣傳車上拍照紀錄，指認的警察在夜晚遠處看到是拿相機的手，不是丟石頭，不然可以去檢查他的相機，裡面底

片一定都還在！」在我作證後，黃嘉光才被無罪釋放。五二〇農民抗爭運動，成了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受害者最多，也是最嚴重的流血衝突事件。

成立小邱工作室

我因為曾幫周清玉和謝長廷設計選舉文宣，而且 1985 年也有幫忙林正杰寫大字報，也曾去吳祥輝的民進周刊上班過，累積了不少選戰經驗，加上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工作的關係，認識不少全國各地的政治人物，而到了 1989 年，很多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上班的人，像是盧修一、李逸洋、周柏雅等人都要參與選舉，周清玉與尤清都想參選縣長，他們都想請我幫忙做文宣，當時我覺得選舉宣傳企劃設計的工作好像可以做，於是便決定辭去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工作，和我太太在台北市富陽街底成立自己的選舉文宣工作室，名為「小邱工作室」。

小邱工作室成立之初，適逢 1989 年縣市長、省市議員及立委選舉，所以當時的客戶包括台北縣長候選人尤清、彰化縣長參選人周清玉，以及競選立委的盧修一、魏耀乾、許國泰、戴振耀，還有參選台北市議員的周柏雅、顏錦福等人，當年我幫十個人做文宣，九人當選，這樣亮眼的選戰成績，大家都認為我很會做選舉文宣，堪稱福將，也確立我的品牌與定位。所以很多民進黨候選人喜歡找我做選舉文宣。1993 年的縣市長選舉，我曾為十幾位民進黨籍的候選人設計文宣傳單，從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

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我記得最南做到高雄縣長余政憲，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廖大林贏朱高正

讓雲林選出第一位真正民進黨立法委員，來為農民爭取權利，這個鮮明的商品定位，凸顯出廖大林的角色使命感，是這次選戰最成功的策略運用。使清新學者形象的廖大林在歷經縣長及國代連續兩次選戰失敗後，能順利登上 1992 年雲林縣第二屆立委的榜首，廖大林得到 66,017 票。

當年選舉，朱高正是第三次參選。朱高正第一次選舉，就高票當選，第二次則是和民進黨中央黨部祕書長黃爾璇教授競爭，他那時完全不把黃爾璇教授放在眼裡，朱高正一個人就席捲雲林縣一半的選票，因為朱高正在立法院是出名的超級戰將，把國民黨的萬年老賊罵得狗血淋頭，大快人心。以前民進黨在全台各地舉辦國會全面改選運動演講會，朱高正都是壓軸演講。當時我在民進黨中央黨部上班，朱高正立委要我跟著他，做他的身邊保鏢，所以我和他很熟，經常去他家，甚至連他演講會後，上廁所都要我陪在旁邊等他。包括他在五二〇農民運動，在城中分局協調警民衝突時，遭到十幾名警察圍毆的事，我都曾紀錄下來。

1992 年立委選舉，美麗島精銳盡出，盛況空前，民進黨許多民主先進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張俊宏、呂秀蓮都投入這場重要的選戰，民進黨提名的雲林縣立委候選人廖大林博士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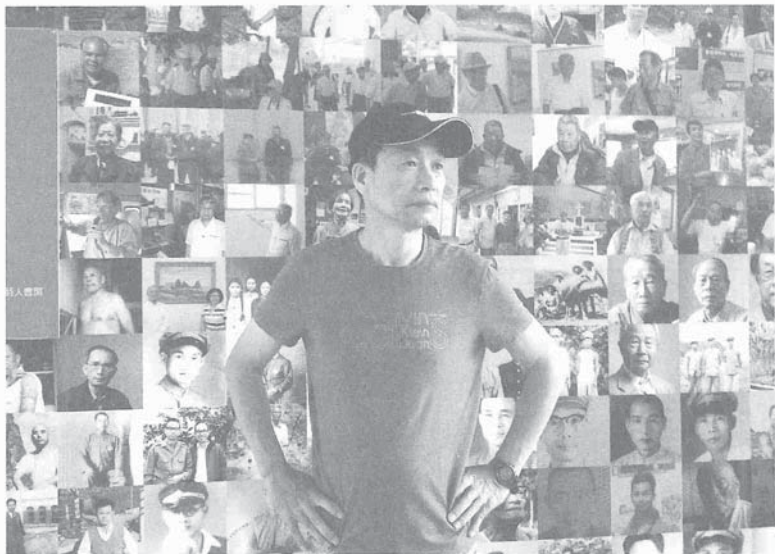
第三次參選的朱高正立委。朱高正那時挾著兩屆立委的全國知名度與犀利口才，但已退出民進黨，另組「社民黨」。朱高正很看不起廖大林這個人，他認為廖大林在雲林縣長和國代選舉二次都落選，憑什麼來選立委！廖大林口才又不佳，朱高正及前民進黨雲林縣黨部主委、助選員對他嘻笑怒罵，還在政見會上消遣廖大林，「只要民進黨提名的廖大林能贏他朱高正一票，他就叫廖大林『阿公』，若他贏廖大林，廖大林只要叫他『阿爸』就可以了」。結果廖大林就請我幫他做文宣，因為我對朱高正立委很瞭解，最後廖大林以雲林第一高票當選，贏過朱高正。我想那次是廖大林從政以來最風光的時刻，因為第一次當選雲林縣立法委員，又贏過朱高正！

出版《綠色年代》

在民進黨成立之前，黨外很多街頭運動的傳單、選舉文宣，都是張富忠設計的。有一天我和 LuLu 在聊天，她說：「你們兩個人應該可以出一本書。」因為黨外很多文宣都是張富忠設計，從民進黨成立後，大部分的傳單、文宣都是由我設計的。於是我就和張富忠將自己所設計、珍藏關於民主運動的傳單和文宣集結成冊，取名為《綠色年代》⁶，並於 2005 年出版發行。

2005 年《綠色年代》新書發表會時，所有民進黨的大老，像是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姚嘉文、陳菊等人，我們都有邀請來演講，唯獨總統府方面我們一概婉拒。

6. 張富忠，邱萬興編著，《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 25 年》（台北：印刻，2005）。



2004年，邱萬興先生攝於綠島人權園區。（邱萬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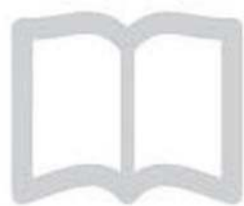
三年多前我因為心臟手術，就把小邱工作室結束。那時我時常覺得胸悶不適，就去台北醫學院附設醫院檢查心血管，結果發現有兩條主動脈堵塞，且堵塞的位置無法裝支架，因此醫生建議只能做心臟繞道手術。當時馬上轉院到國泰醫院做繞道手術，開刀七個半小時，一切順利。

我和我太太 1988 年結婚，婚後育有兩個小孩。老大是女兒，今年 24 歲，也是念私立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現在已經在工作上班，從事建築的 3D 動畫設計。兒子今年台灣大學土木系畢業，9 月要到日本當交換學生，回來再讀台大土木研究所。

我急流勇退，結束工作室後，和我太太享受退休生活。我想會心血管堵塞，其實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生活緊繃所引起的，

過去從事多年的選舉文宣設計工作，經常三更半夜要和候選人開會，有時候參選人遭到對手黑函攻擊，我們就要馬上回應，若處理不好，還會被候選人罵到臭頭。此外，選舉大家都是拚了老命在選，有時競爭對手發文宣攻擊，我們這邊就要立即回應，所以工作壓力特別大，久而久之身體當然會出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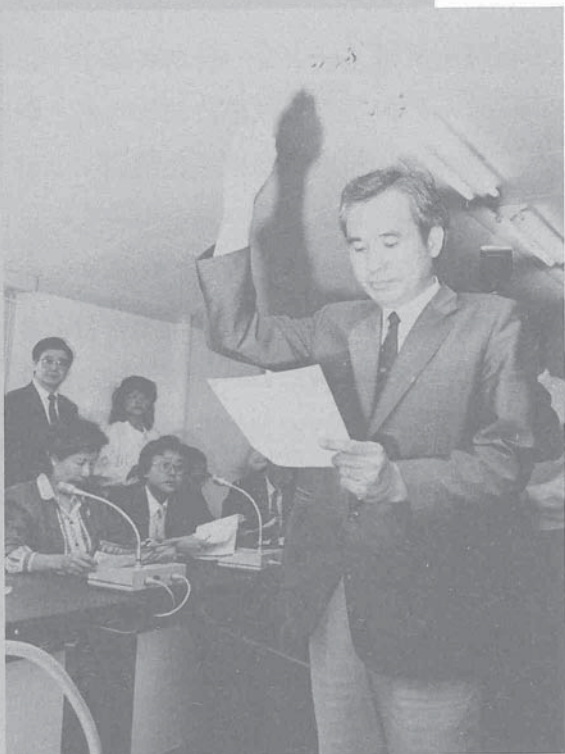
現在的選舉，傳單的作用恐怕已不如往昔，很少人會想看傳單，我想如今大多已被網路、電子媒體與帆布廣告給取代了。以前的傳單，只有兩個顏色，很素雅，而且標題都很聳動與震撼！選民都愛看，不像現在的傳單，五顏六色，太過花俏，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也沒什麼人要看了！



此頁空白

推動民主改革，展現新氣象

姚嘉文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簡佳慧

時間：2013年7月31日 15:10 - 17:10

地點：台灣國家聯盟（台北市青島東路）

姚嘉文，1938年出生於彰化縣和美鎮，由於父親熱心支持黨外，從小接觸選舉活動。1962年考進台大法律系。1972年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貧民問題，次年與林義雄等人創辦「平民法律服務中心」。1979年與黃信介、林義雄、施明德、許信良籌辦《美麗島雜誌》，12月因「美麗島事件」判刑12年，在獄中撰寫《台灣七色記》。1987年假釋出獄，不久即當選民進黨第二屆黨主席，1992年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2002年民進黨執政期間，以國會少數黨次通過任命為考試院長。

父親支持黨外

我 1938 年出生在彰化縣和美鎮，小學念的是培英國小，日本時代叫作「塗厝厝公學校」，聽說是平埔族原住民的地名，戰後改為「塗厝國校」。中學六年讀的是職業學校。在我們和美鎮這個窮鄉僻壤，能夠讀到初中就很不容易了。一般初中畢業不是就業，就是考師範學校或職業學校。1962 年我虛歲 25 歲考進台大法律系，所以發生「彭明敏自救宣言事件」時，我還在台大就學中。由於我父親是黨外人士，相當活躍於黨外助選活動，我從小就常在各種選舉場合中聽演講，所以對國民黨印象很差，但也不是很瞭解。當時彰化最有名的黨外人士就是石錫勳¹，他是文化協會成員，參加第一次縣長選舉時是衛生局長，選舉完後，遭受政治迫害，被國民黨判了八年，後來保外就醫。他們那一批人，到了 1978 年我回鄉參選國代選舉時，差不多都投入助選，是彰化黨外的傳統勢力。

我們在大學讀書是以法律的觀點看問題，第一個是憲法，第二個是國會，我們還組織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社」，但沒有在學

1. 石錫勳（1900-1985），彰化縣人。1922 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長年從事反抗運動，歷任台灣文化協會理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1923 年治警事件發生，遭到搜查並扣押，後被判罰金百圓。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仍繼續留在該會。此外，亦曾任南亞製粉株式會社社長。戰後之初，被推為彰化市接管委員會主席、彰化市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彰化分團主任等職，1946 年當選彰化市參議員。自 1954 年起，以無黨籍身分三度競選彰化縣長，均告失利。1957 年與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高玉樹、楊金虎、許世賢等人發起組織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但其申請遭到駁回。1960 年參與以雷震為首之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被推為 17 名召集人之一。1963 年參選省議員，高票落選。1968 年被青年黨提名為彰化縣長候選人，旋因涉及彰化顏尹謨案，遭判刑 7 年。經抗日老友蔡培火奔走營救，獲保外就醫，避居高雄。參見陳君愷撰，〈石錫勳〉，收於許雲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273-274。

校登記，主要是跨系討論事情。1964年時我們已經感覺到政治上出現很大的變化，所以大家很感到興趣，因而集合法律系、政治系、社會系、商學系、哲學系……等各系的學生，每週由一個學系輪流主持討論問題。每個學系有興趣的話題都不太一樣，例如政治系討論的是國會法統問題，國會如何代表法統？國民黨的理論是什麼？法律系則是討論憲法修改問題，憲法的穩定性和憲法的變動。其實我們當時也沒有很深入地瞭解，只是覺得這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當時的「彭明敏事件」對我們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彭老師剛被釋放出來時，我們也有去看他，但並沒有很深入地參與。那時我整個腦袋想的都是以後要當律師，雖然當律師更會去注意社會問題，但並沒有很積極想瞭解，彭老師也沒有對我們多說什麼。

由於我服完兵役才去念大學，所以大學畢業後直接考研究所，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違章建築在私法上的地位」。其實我原本要寫的題目是有關《威瑪憲法》，但因為題目太過大膽，沒有教授敢指導我，我當時好奇的是：「為什麼《威瑪憲法》會產生納粹政府？」但是相關資料很少，也沒有人敢指導我；就算有資料，也都是德文，我看不大懂；會德文的人也不見得想去研究這個問題，加上系主任對我說：「憲法是政治系研究的問題，不是法律系研究的範疇。」所以我就研究「違章建築」的問題。進大學之前，我當兵的那三年都在準備檢定考試，所以一進大學就已經具有報考高考的資格。之後我從大一開始考律師，考了好幾次，都沒考上，大三那年就沒去考，一直到大四那年準備考研究所，結果卻同時考上律師。

研究貧民問題

開始當律師之後，我擔任律師公會理事，參與推動公會的改革工作，到美國柏克萊時，我已經在大學當講師。我的律師事務所設在杭州南路，同時也是我的住家，後來又在南昌街租房子。美國的亞洲協會² 每一年都補助一些台灣人進行各種不同議題的研究，1972年他們要研究「貧民問題」，因此補助對象的條件就是要會英文，社會領袖，例如法官、教授……等，要對貧民問題有興趣。當時律師界大都是研究海上保險、財產訴訟問題之類，沒有人在做貧民問題的研究。由於我從小生長背景和周遭環境幾乎就是貧民區，再加上我經常去找住在違章建築裡的一些朋友、親戚蒐集資料，他們也會委託我幫忙處理一些事情，那個地區如果要想免費的律師一定就是我了。後來法律界的人也都知道，因此要找對貧民問題有興趣的人，自然就找到我這裡來了。

美國亞洲協會提供我一年的研究經費，除了在舊金山柏克萊大學上課研究，另外半年在律師公會，半年在貧民法律援助基金會。美國有很多政府和民間合資的機構從事貧民法律服務，也就是政府補助民間。這是黑人民權問題受到重視之後相關的立法。

-
2. 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 是亞太地區有影響力的非營利、非政府、無黨派的民間機構，宗旨是促進美國與亞洲之間的民間交流，增進亞太地區民眾、領袖和機構之間的相互瞭解。亞洲協會致力於在政策、商業、教育、文化和藝術等諸多領域加強對話、鼓勵創新。該協會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洛克菲勒三世 (John D. Rockefeller III) 於 1956 年創辦，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目前在美國的休士頓、洛杉磯、華盛頓特區、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菲律賓的馬尼拉、印度的孟買、韓國的首爾，香港和中國上海設有分支機構。作為美國與亞洲之間主要的民間社團組織，亞洲協會也是美國對亞洲外交關係的「白手套」。美國對亞洲政策的一些重要變動，都會在亞洲協會的活動中放出探測球，白宮及國務院的退休高官及大使往往就職於該協會高層。參見 <http://www.baike.com/wiki/%E7%BE%8E%E5%9B%BD%E4%BA%9A%E6%B4%B2%E5%8D%8F%E4%BC%9A>，點閱日期：2013 年 8 月 29 日。

我在柏克萊上課時，他們指定題目，要我研究都市化之後的貧民住宅問題，這和我的碩士論文有關係，但是美國討論的面向相當廣泛，相對於台灣，我們的資料太少，看到的只有違章建築，討論的方向也大多集中在司法訴訟上；美國則是探討生存權、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等等，真的令我眼界大開。

在舊金山我遇到一些台灣同鄉，有很多是原本就認識的，也認識幾位台獨聯盟的成員，所以最少兩個禮拜就會去參加一次他們的活動。至於張富美（1938 - ）則是到 1980 年代我出獄之後才認識的，那時我太太在當國代，我要找民國三十六年中國第一屆國大代表選舉的資料，有人告訴我史丹佛大學那裡有，安排我去找張富美，當時她還特別帶我去找《大公報》，印了很多選舉資料回來。根據這些資料，後來我為周清玉寫了一本小冊《「法統」黑面紗》³。

幫忙「協志會」寫章程是 1973 年我在舊金山時的事，我認識裡面的幾個人，當我去找他們時又介紹其他人讓我認識。他們當時苦於同鄉會功能不彰，主要是同鄉會都是找學長當會長，學長因為年紀大，或者有些人個性不適合辦活動。我建議他們不要這樣做，除了會長，要設副會長，還要有理事、總幹事。總幹事要找比較活躍，資淺、年輕的學弟，因為資淺的比較願意跑腿，熱心辦活動。我將在台灣很熟悉的理事、總幹事、副總幹事這種制度推薦給他們，他們就請我幫忙寫章程。其實這種制度就是台灣一般政府社團法規定的制度，早已行之有年，運作得很好。

3. 周清玉寫作、姚嘉文校正，《「法統」黑面紗》（台北：關懷雜誌社，1989 年）。

國會全面改選

其實我到柏克萊時，研究的雖是住宅問題，但重點放在貧民的法律服務。我的專長是貧民住的問題，但他們希望我把重點放在服務，而不是議題上，所以我一方面繼續研究自己感興趣的住宅問題，另一方面也把他們要求的貧民法律服務帶回台灣，因此我的報告是寫法律服務。在柏克萊研讀之後，才知道不論住宅問題或法律服務，涉及的問題面其實很多。我的報告提到一個觀念，後來也引起爭議。我認為台灣的律師真正幫助貧民不應該只是法律服務。除此之外，台灣沒有社會福利法、勞工法……等，加上還有戒嚴法存在，不能成立社團，因此律師只從事法律服務是不夠的，要推動法律改革。而推動法律改革也不夠，因為修改、制定法律的是國會。台灣的國會對台灣的貧民問題沒有興趣，他們感興趣的頂多是大陸救災，甚至是香港的「調景嶺」。當年無論是立法院或國民大會，對台灣現存的貧民問題都不感興趣，所以我在報告中提到「要政治改革，國會全面改選」。

我把這份報告寄到台灣之後，台大教授馬漢寶（1926 - ）老師要求我把這部分刪掉，他說：「這個不好，不要提到國會改選，寫到法律改革就可以了。」我們接受這個研究經費補助，一定要交報告，美方當然是希望我們寫這個制度對台灣有什麼幫助，美國的制度就是律師免費，由公家單位或是社會、學校出錢，提供資源，由律師所提供法律服務。我的看法是，在台灣光是提供免費服務恐怕不夠，我們必須做法律改革，修法、立法，甚至解除戒嚴，如果要做到這樣，就要進行政治改革，國會全面改選。我

後來沒有刪掉。

1973年，我剛要回台灣時，世界法律會議在雅加達召開，其中有一個議題是討論貧民法律服務。或許亞洲協會有贊助這個會議，主辦單位知道我在研究這方面的問題，他們也邀請我去做報告，並補助我一千美元出席費，所以我就先去歐洲一趟，再到雅加達。我在發表論文時，在場的美國、英國、香港、日本律師都反對我的看法，可以說只要是比較正常民主國家的律師都反對，包括印度律師也反對，都說我超出範圍了。律師就是律師，政治改革、國會改選，不是我們這個會議的議題，也不是我們做律師的義務。我們說「法律服務」是指：律師如何依法律提供服務？至於贊成我的看法的，就是韓國、印尼這些國家的律師，尤其是印尼的律師對我講最多話。韓國律師也說：「沒有錯，如果法律不好，國會如果不正常，律師只是提供免費服務，真正幫忙貧民是不夠的，貧民問題是政治問題。」

我在美國柏克萊到處聽演講、看書，愈來愈覺得貧民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台灣的違章建築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國家的政策要如何去照顧貧民？

在美國的那段研究經歷，還有和當地台灣同鄉會、台獨人士的討論，使得我對台灣的制度愈來愈有批判性。有一天，他們找我去演講的題目是有關國安會的議題，我記得當時國安會組織章程中有一條，國家安全會議是總統主持，決議以後交總統批可後實施。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點出如果國安會議可以管到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找他們來開會之後，決議由總統「批可」後實

施。總統的權力太大，外交、國防部長，司法院長等等都來開會，開會之後的決議，總統如果不批，也行不通，總統沒有主動的獨裁權力，至少也有被動的獨裁權。我點出這個問題，開始探討台灣的制度問題，當時還沒有討論到台灣的定位問題。我的報告裡面也充滿了這種意識，國會如果不改選，對貧民的幫助其實很有限。

碰觸政治問題

至於我實際的碰觸政治問題是和郭雨新有關，以前我雖然愛發表言論，但是不幫人助選。1975年郭雨新要選舉，他可能和林義雄說，他不想再當省議員，要讓林義雄去做；但郭要選立委，林必須幫他助選，林義雄因此來找我。林義雄和我同期考上律師，和我的關係不錯。

那年我剛好參與編寫《台灣政論》，有一天青商會在中山堂開會，我是青商會的會員，張俊宏和康寧祥也都是青商會的會員。那時我不認識黃信介也不認識郭雨新，只認識張俊宏和康寧祥。張俊宏當時在煩惱他們要辦的《台灣政論》沒有地方辦公、做編輯的工作，我說：「要不然來我的事務所。」那時我太太在美國，1974年我從美國回來後第二年，換我太太去，一樣是亞洲協會的研究邀請，所以家裡只有我和女兒，空間很大。事務所在住家隔壁，於是就從事務所空出一個房間給他們使用，後來才和張俊宏比較熟。

我在《台灣政論》的頭銜是法律顧問，主要是看他們編輯的文章裡面有沒有牴觸法律，有沒有法律觀念上的錯誤。張俊宏也向我邀稿，我寫了一篇關於憲法規定，考試要論省籍的問題。當我開始撰寫時，找了我的學生姚立明（1952 - ），我說：「我沒有時間，你去圖書館幫我查考試院歷年的年鑑資料，每年高考錄取者的省籍分配。」那時姚立明和他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太太很認真地去幫我找資料。我寫完之後，又去調其他的資料補充，我很小心地寫這篇文章，並在《台灣政論》發表。

我那篇文章的論點是：所有被錄取者都在台灣服務，應該要照成績來錄取，而不是論省籍，因為我在讀高商時學過統計，所以有資料數字的統計概念，我做了一個各省籍錄取名額的統計表。文章發表之後，轟動一時，聽說蔣經國還在立法院氣到拍桌子罵我說：「都是中國人，誰考上不是都一樣嗎？為什麼要計較？」我原本對蔣經國沒什麼印象，他這句話反而讓我對他印象深刻，他怎麼會講這種話？我就是認為不要計較，考上就是看成績，哪有在分省籍的？那時也有人警告我：「蔣經國一定會把你抓去。」

後來有一位考試院的人寫信給我，說裡面的資料有錯誤，我又寫了一篇，稍微修改一下，再補充一些軍人轉任公務員的資料，發現問題更加嚴重。當年招考財經統計人員，全台灣才錄取四到五人，軍人轉任卻錄取四百人。當年中國大陸的軍人來台灣，幾乎上校以上都可以轉任公務員，等於另外一種考試，那種考試當然比較好考，所以我又再寫了那一篇。

因為寫了這篇文章，我和康寧祥、黃信介、張俊宏、黃華（1939 - ）等人變熟了，後來郭雨新也來我的事務所，大家就這樣認識了。我和康寧祥變得更熟，康寧祥是當時《台灣評論》的社長，我常去他萬華的家裡坐，和其他的黨外人士打成一片。1975年立委改選，剛好是老蔣死的那一年，台灣的政治掀起大波瀾，蔣經國準備要接班，台灣政治氣氛很特別，我難免也受到影響。大家常常在康寧祥家裡討論：小蔣會不會當總統？怎麼接班？國會是不是應該增加人選？即使不全面改選，增額也應該要多一點。

擔任法律顧問

當時郭雨新和康寧祥都要參選立委，黃信介是第一屆補選終身立委所以不必參選，因此他去助選也要我去當郭雨新和康寧祥他們的法律顧問。當時的選舉大家都不設法律顧問，老康雖然口頭答應，但傳單上並沒有寫，我的名字被塗掉了，變成空白；反而郭雨新的傳單上有我的名字。我當時也強調自己不參選也不幫人家助選，但當法律顧問可以。結果那年郭雨新的選票被動手腳，竟然出現八萬多張廢票。第二年，郭雨新已表態不選1977年的省議員，他推薦林義雄參選，林義雄找我說要寫一本書，將郭雨新那次選舉及訴訟的經過寫出來。因為我比他有編書的經驗，他就將已寫好的資料拿給我，法院訴訟的資料部分由我整理。

1976年初郭雨新開始打選戰官司，那時我們都有偷偷錄音，書裡的法庭問答部分是我整理的。書編好之後，我和林義雄討論書名要用什麼？當時我出主意說要取名為《虎落平陽》，因為郭雨新是議會五虎將之一，他是宜蘭人，宜蘭又有蘭陽平原之稱。結果因為這個書名，林義雄也被國民黨責問，是不是影射他們是狗？（所謂「虎落平陽被犬欺」），林義雄也寫了一篇文章反駁，說「誰欺負郭雨新，誰就是狗」。其實書名是我取的，結果是林義雄去辯解，因為他要選舉。

1977年我將戶籍遷到宜蘭幫林義雄助選。當時助選不但要登記，而且要戶口設在那裡的當地人才可以幫人助選，不過倒是沒有限制要住在那裡多久，只要申請當天戶籍在那裡就可以。後來這條規定修改了，只要有去登記就可以助選；後來連登記都不用，就這樣經過好幾次的修改。台灣的政治運動，可分為人權運動、民權運動、主權運動。在民權運動當中，我們都在注意「選罷法」，我也在幫郭雨新助選過程中經歷過——從選罷法規定助選員要當地人；到後來任何人都可以，戶口不必遷移；到最後，連助選員的限制都可以取消；接著也不須選監小組；然後是公辦、私辦的規定也取消，就這樣一步步修改。

民權運動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在選舉制度上，我呼籲大家注意選舉中的競選制度，慢慢地所有的選舉活動，候選人只要想演講，隨時都可以演講，由集會遊行法去處理，選委會不能干涉。1977年，那年的政治氣氛很好，那年有五項公職選舉同時舉行，包括林義雄、張俊宏等，很多人都當選，我那時擔任十三位候選

人的法律顧問，一大堆人都當選。緊接著就有彰化同鄉希望我回彰化參選，我沒有答應，因為光是助選就已經超出我的自我約束，我的本業是教書和當律師，當立委就沒辦法教書，也沒辦法當律師，我覺得教書和當律師比較自由。我在輔大教書，如果當立委，可以在學校兼課，但不能當律師。所以他們要我當立委，我不答應，他們說：「那當國代好了。」我說：「當國代還可以。」就回彰化去選國大代表。

關心國家局勢

那時常和康寧祥、郭雨新、黃信介、張俊宏，黨外人士如康水木等人在一起吃飯聊天。我們最常吃飯的藉口就是慶生，為了避嫌，不想讓警總找麻煩，大家就找慶生的機會聚在一起，當然警總還是會派人監視。總之，很多聚會、應酬都不是很正式的，都是聯誼性質，有些人是從南部上來的。當時很多人對國家局勢都很關心，退出聯合國、老蔣過世、美國是不是會和我們斷交？70年代斷交的國家一大堆。黨外人士聚會時，也會討論誰去哪個地方參選，他們要我去選立委，我沒有意願，頂多是選國代，當時很多人想選立委，例如黃順興（1923 - 2002）、張春男（1941-）……等，都有參選意願，他們都是現任立委和國代。一般人比較不會想去選國代。那時立委是大選區，國代是小選區，因為立委人較少，國代人較多。彰化應選名額是兩個，當時我回去選國代時，氣勢不錯，本來不助選、不參選的我，就這樣一頭栽了進去。

1978年11月，為了選國代，我寫了一本書《護法與變法》⁴，書的前面幾頁有寫為什麼我要參選國大？那本書現在存量不多，我記得那時印了一千本，一本100元，成本15元，很快就賣光了。當時很多書都被禁，這本書沒被禁。那時的主要訴求就是戒嚴、法律、國會三者，不過沒有那麼明確。所謂「變法」，因為國會全面改選也是憲法，所以會牽涉到修改憲法和戒嚴的問題。書裡面有提到為什麼要解嚴？在修改憲法部分，注重的是國會全面改選，那時還沒有討論到國土問題的層次。

那年因為與美國斷交，導致選舉中斷，我們本來認為會馬上恢復，那時呂秀蓮呼籲要「恢復選舉」，我們是主張要「重辦選舉」。差別在於，我記得那時全國選五十六位國代，我們希望要增加名額，重新登記；呂秀蓮是呼籲恢復選舉，所以我們和她有一些衝突。呂秀蓮一直發表文章，發表宣言要恢復選舉，因為當時是暫停選舉，原本立委、國代的任期到了，總統便以緊急命令宣布立委、國代延長任期。

成立五人小組

停止選舉之後，因為選舉期間還是把焦點集中在國會和戒嚴問題，討論得很熱烈。停選後沒多久發生了「余登發事件」⁵，之後引發一群人在高雄橋頭遊行，許信良也因為參加那場遊行，導

4. 姚嘉文，《護法與變法》（台北：姚嘉文，1978）。

5. 1979年1月21日高雄黑派的領導人余登發及其子余瑞言，因涉及匪諜吳泰安叛亂案「知匪不報」，及影印日本《朝日新聞》中有關中共政權領導人的言論，被指「為匪宣傳」遭到逮捕。次日，黨外人士緊急聚會發表「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

致 1979 年 7 月 1 日桃園縣長被停職。接著又爆出林義雄說國民黨是叛亂團體，他被修理之後，事情愈鬧愈大，有時會有抗議、遊行活動等等。黃信介提議組一個五人小組，這五人小組主要是辦活動用的。那時《台灣政論》也已經停刊，施明德對外募了一些錢，在台北市仁愛路租了一間房子設立黨外總部，作為黨外聯絡之用，後來在活動期間，大家就討論要再辦一份雜誌。

當時有消息透露，蔣經國同意開放一間雜誌社，其實那時候設立的也不只一間，包括後來康寧祥的《八十年代》、《亞洲人》等等。當時我們為了這本雜誌的名稱談不妥，本來我提議「台灣正論」，但新聞局不肯通過。因為主管單位是台北市政府，有三份申請書，其中一份要給警總，一份要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市政府的部分會轉給行政院新聞局。這位承辦人員後來當了外交官，他告訴我當時不准的原因。他說，他們同意給黨外發行一份雜誌，但是名稱不能有「台灣」二字。

有一天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在我家吃飯，我太太周清玉在廚房忙著煮飯，她剛從美國回來，她說，既然不能用台灣二字，她搭飛機回來時，從上空看到台灣好美，那就叫「美麗島」好了，所以《美麗島雜誌》的名稱是我太太取的。後來我們又把申請書拿出來，我的事務所有打字員，也有助理幫忙謄稿，也有油印機，

書」。同日下午許信良、林義雄、施明德、邱連輝、姚嘉文、陳婉真、陳菊、黃順興、王拓、陳鼓應、張春男、邱茂男等人，並在高橋橋頭展開政治性的示威遊行。這是在野人士在國內戒嚴體制下，首次公開的示威行動。雖有抗議，余登發父子仍被軍事法庭判刑確定，而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也因此被停職處分。不過，余登發父子被捕並不只是個人的事件，因為原本預定在同年 2 月初，全黨外人士即以為余登發舉辦生日晚會為名進行聚會串聯。余登發被捕也意謂著，當時黨外人士試圖以余登發作為重要領導人物結集力量的企圖遭到挫敗。參見薛化元撰，〈余登發事件〉，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 340。

必要時再拿出去大量印刷，所以很多文書資料都在我的事務所處理。我們再送出申請書，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新聞局的人說，「美麗島」這名稱聽起來好像觀光雜誌，就准了。

五人小組是我、黃信介、林義雄、施明德還有許信良，許信良在國民黨準備要抓人的時候就出國去了。當時停止選舉後，大家人心惶惶，也在猜測會不會很快又恢復選舉，我的競選總部也沒有停止運作，康寧祥則是將競選總部收起來，我們問他，他說：「你三八，哪有可能再選舉？總統已經下令延長任期了。」我們是認為怎麼可能，一定會恢復選舉的，結果真的沒有再辦選舉，直到一年後才恢復。那段期間的演講活動、政見說明會已經慢慢冷卻下來，一直到「余登發事件」發生才又熱了起來。大家開始擔心「誰是下一個？」因為不可能只抓余登發，於是大家開始發動遊行，「橋頭遊行」就是許信良策動發起的，這段經過，我在《風吹美麗島》⁶那本書裡有詳細的描述。後來他們找我去擔任余登發案件的辯護律師，我的介入也愈來愈深，事後有人告訴我，他們沒有抓我怎麼行，一定會抓我的。

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我心想當律師的人，對選舉、政治的事不是那麼瞭解，所以我們五人小組在談到政治層面，都是許信良和張俊宏在講，我負責擬聲明稿或處理一些法律程序，林義雄不太管事，施明德則是負責跑腿、聯絡的工作。後來余登發被抓走後，整個政治氣氛都變了，原本余陳月瑛（1926 -）是比較保守的，沒有參與政治運動，她也必須要站出來了，她找我去幫忙辯護。我幫余登發辯護之後，7月許信良就被正式停職。許信

6. 姚嘉文，《風吹美麗島》（台北：前衛，2008）。

良面臨停職懲戒，我們又開始辦活動，7月雜誌執照出來，我們就開始設立美麗島雜誌社，從九月發行到第四期就被沒收了，第一期發行七萬份，接著九萬份、十一萬份，第四期印了十三萬份，每期都是兩萬份、兩萬份地在增加，但是第四期沒有發行，因為我們都被抓去了。

「乒乓球理論」、「暴力邊緣論」

當時台灣各地都設有分會，我們稱為「服務處」，我們的組織分為社務、編務和基金會三個部分。我負責基金會，包括各地方基金會的組織成員和財務；張俊宏負責編輯部，魏廷朝（1935 - 1999）當時是副總編輯，負責寫稿和修稿，我也參加一些編務工作；社務方面，社長是許信良，負責連絡社務委員邀請演講和辦活動。

各地的演講及活動越來越熱烈，我們是反對暴力，我提出一個理論，就像打乒乓球一樣，不能出界，出界就 out；但如果打 safe，或打太中間，對方一下子殺過來會招架不住。所以打球一定要打在角落的地方，但不能出界，出界就是暴力了，這是我的「乒乓球理論」，也是所謂的「戰爭邊緣論」、「暴力邊緣論」。其實我不喜歡暴力，但是警總卻故意說我們是主張暴力。那時施明德在高雄，他引進海外的一些理論，說要發起群眾運動。其實「高雄事件」事前我們完全不知情，當時我們四處演講，想要喚起民眾，我們天真的想法是這樣。當然也有很多人發起要暴力，

要暴動，我本身並不主張做這樣的事，我的興趣是到處演講、宣導力量。施明德和一些人——我聽說是警總的人——覺得不耐煩，認為這樣不夠，要弄一場很大場的，有攻擊性的、運動性、群眾性的、街頭性的活動，但他通知我們的是：遊行和演講。

其實我們從台北下來的，包括林義雄、呂秀蓮、黃信介、張俊宏，都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那時施明德和他太太艾琳達，還有一些教會人士，在規劃帶一些彩帶、火把……等。照理說，高雄不是施明德在指揮的，他是在台北賣書的總經理，地方業務不是他管的，事先有人在主導這些事，後來是場面失控了，才拉他去處理，我很訝異怎麼會變成這樣？我抵達時間大概是下午四、五點，比呂秀蓮早到，我記得第二天還要去彰化出庭，因此還帶了公事包，裡面放律師袍。

當時是施明德拖我進去新興分局，因為我們被鎮暴部隊包圍。我們先在服務處開會，我看到黃越欽，我那時感到很奇怪，他怎麼會出現在那裡？他是我研究所的同班同學，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國民黨派來的。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他也跑進來坐，那時也沒有「保密防諜」的觀念，黃越欽看我們拿著一份地圖在討論，遊行路線要怎麼改？我提議到十字路口，在現在捷運美麗島站那裡演講，警方不同意我們右轉，我們就左轉，大家也同意了。後來大家拿著火把遊行，要左轉的時候，忽然整個停下來，國民黨那邊派人包圍，現場有人就在那邊演講。施明德拉我進新興分局時，警總的人一直對我們照相、錄影，我也不知道要跟誰說話。後來電視報導「姚嘉文在那裡指揮暴動」。

當時施明德進來說：「已經失控了」，他怕死了，不知道怎麼辦！我說：「要不然就讓他們在那裡演講，反正群眾來了，演講完就解散。」他們說：「不行，要馬上解散。」我說：「不可能，人這麼多，要怎麼解散？讓我們演講一下是會怎樣？」他們還是說：「不行，馬上解散。」我說：「你那邊不讓我們去，這邊也不讓我們講，要怎麼解散？」後來有人喊：「在放瓦斯了！」我們就出來了。

出獄當選黨主席

「美麗島事件」我被判刑十二年，服刑七年一個多月，1987年被放出來。我是年初出獄，年底才出版長篇歷史小說《台灣七色記》⁷。我在獄中已經差不多都寫好了，一直寫到二二八、二次世界大戰，資料沒有那麼明確，寫不下去了，就寫「前記」，其實是「後記」，記述獄中寫作的經驗。台灣歷史我有興趣的題材還有「霧社事件」和「二二八事件」，不過很敏感，我又資料不足。我知道「霧社事件」對原住民而言是大事情，但資料不足，所以都沒有寫，等到出獄之後才處理。那時候在獄中已經寫到第七本，我就休息一下，將一些寫作經驗和過程寫出來，哪知道才寫好，就放出來了。

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小時候念的是私塾，讀了一些漢學，四、五歲就會用漢字寫信，一直到小學、初中、高中的國

7. 姚嘉文，《台灣七色記》（台北：自立晚報社，1987）。

文成績都很好。在高中時期，有一位對我很好的吳姓國文老師對我說：「你不要當文學家，去考律師，當文學家沒有辦法生活，考律師可以賺錢，以你正義的個性很適合念法律。」我們學校有商事法課程，我是成績最好的，吳老師知道我對法律的邏輯思考方面應該不錯，就叫我去準備檢定考試，我就照著報名簡章上所要招考的科目，買書來看。

第一年國文和國父遺教有考過，一直考到第五年，包括當兵期間也請假出來考試，直到全部成績及格通過，才去念大學。我在大學的時候認真研究念法制史，從商鞅變法到王安石變法、清末變法，中國的四大變法，王莽變法雖然失敗，也算是一種變法。我對清末變法很有興趣，曾經到圖書館找清朝的《東華錄》等，讀了很多資料，後來寫了一篇學士論文「清末新法律運動」。後來律師要考法制史，很多人都栽在那裡，我對這部分反而很有把握，會考上律師，這也是原因之一。我的興趣是在歷史，老師說服我去當律師，但我還是念念不忘歷史和小說，所以有關法律小說或是訴訟方面的電影，我都很喜歡看，我也很喜歡看歷史小說。



美麗島大審時期的姚嘉文先生。(周嘉華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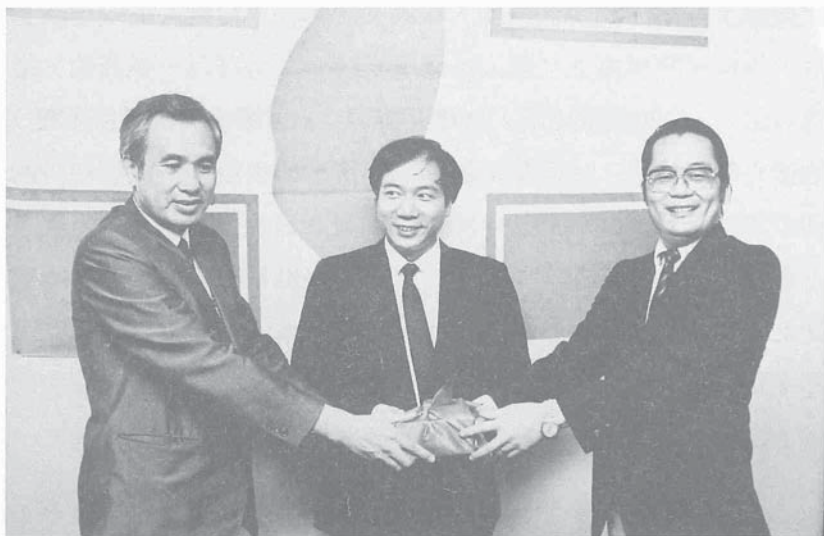
1987年1月，我出獄之後，江鵬堅找我入黨，我忘記當時是為了什麼原因遞補中常委？我先當中執委，再遞補為中常委。我剛出獄，大家對我也不錯，黃信介、張俊宏當時也還沒有出來。呂秀蓮出獄之後，一直到我當主席，她都不想入黨，她不想屈人之下。黃信介也是很晚才入黨，我在當中執委、中常委時，他還沒出獄。我正月出來，2月28日參加一項紀念活動，在那裡宣布入黨，後來也到黨部去宣誓入黨，接著就遞補中常委。我之所以一出獄就當選民進黨主席，最主要可能是我和邱義仁他們很熟，那段時間相處愉快，加上剛從「美麗島事件」坐牢出來，比較受到尊重。我的競選對手是許榮淑，她那時候已經是立法委員，聲望很高，來勢洶洶，但是大部分的人認為，比較適合領導的還是姚嘉文。

江鵬堅的困擾

那時第一屆黨主席江鵬堅面臨一個問題，「到底民主進步黨是個什麼黨？」因為國民黨、共產黨、美國黨、日本黨都在問，我們是什麼黨？這是個嚴格的黨，還是稀鬆的黨？它的任務是要做什麼？它的任務和其他國家的政黨有何不同？我告訴他一個觀念：「民主進步黨是一個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組織。」江鵬堅很喜歡這句話，因為他一直困擾著，如果民進黨只是一個選舉政黨，他認為這是不夠的。因為政黨是一個國家體制正常時，才著重於選舉，而民進黨一路走來，是全面在推動改革，包括戒嚴、言論自由、國會改革等等，這個制度如果沒有動，如何正常選

舉？現在民進黨裡面的領導者，差不多都沒有這個觀念。如果對改革這個體制沒興趣，就只能在這個體制下選舉。我在那時候就主張國會要全面改選，否則改選席次也要增加，選罷法也要修改，不是在現有的制度下選舉。

江鵬堅對民主進步黨裡面有很多公職人員想參選感到困擾。以康寧祥為首，他們都對選舉很有興趣，黨提名，選舉助選；另外一股力量則是認為，民主進步黨要追求獨立、改革體制、解嚴等等。所以我出獄之後，江鵬堅一直和我保持聯絡，特別是他在當黨主席時，在中常會討論很久，結論就是：「民主進步黨應該是一個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組織，選舉是其中的任務，但不以此為限。」當時大家都接受這個理論，所以每一位黨主席開始在討論台灣的問題在哪裡？江鵬堅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黨章問題。蔡有全在政治受難者協會提出「台灣應該獨立」的主張之後，



1987年12月，接任民進黨第二屆黨主席。（邱萬興提供）

就被抓去關了；江蓋世提案「台灣應該獨立」應該要放到民進黨的黨綱裡，作為黨的主張，那時江鵬堅還不敢，他認為這樣做太激烈，因為國民黨都敢到政治受難者協會抓人了，民進黨好不容易才成立，手段不宜太過激烈，他擔心這個黨會被摧毀。

我和邱義仁、吳乃仁等人討論時提出一個觀念：「台灣應該獨立」是主張；「台灣現在是中華民國的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是現狀。現狀和以後的主張，哲學上分別稱為「是然」和「應然」。我提出這個觀念，到處說服：「我們台灣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還是中華民國的？都不是，是我們的。」這是「是然」問題。如果台灣是中國的，我們就要脫離中國；如果是中華民國的，我們就要推翻中華民國；如果我們不是這兩國的，我們就是維持獨立，這要先弄清楚。

我認為李登輝也不喜歡當時的氣氛弄得太亂，所以就向江鵬堅提議，提出一個替代決議，決議文上寫：「台灣人主張應該獨立，這是言論自由；台灣人可以主張統一，也可以主張其他，這是自由。」江鵬堅要處理「台灣應該獨立」這個替代決議很困擾，他擔心如果通過，這個黨可能會受傷害；如果沒通過，對海外的獨派無法交代，這就是1987年的11月9日民進黨提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決議文的原因，這也是我的構想。我的理論是，台灣人可以主張獨立，也可以主張統一，或其他的主張；你不贊成是一回事，但可以主張。這個決議文解決了江鵬堅的困擾，同時請傅正負責到各地聽黨外的意見，把爭議往後拖延。

等到李登輝政權穩定了，他比較沒有那麼認真在「反台獨」

了，警總沒多久也解散了，郝柏村（1919 - ）雖然來勢洶洶，但是氣勢也漸漸薄弱，反台獨的氣氛沒那麼嚴重時，我才開始提出「四一七決議文」。四一七決議文很保守地說：「台灣不是中國的，未來如何，還是經由公民投票。」就只是在處理「是然」，沒有處理「應然」，「應然」是黃信介當主席時處理的。我很簡單的說明，常常記者也搞不清楚。

四一七決議文

四一七決議文的「四個如果」是阿扁強迫加進來的，他當時是台北市議員，還沒當台北市長。那時候黃信介已經入黨，張俊宏也入黨了，阿扁擔任中常委，專門在修理我。那時李登輝要黃信介來接黨主席，張俊宏、黃煌雄（1944 - ）和阿扁結成一黨在反我。我的黨主席任期是到9月，因為之前曾說過，一年後要處理這個問題，我說：「先不去處理『應然』，『是然』先處理，才不會那麼嚴重；我們從事政治的人，不能太過激烈。」我們也判斷得出來，當時李登輝不希望我們那麼激烈。這個理論後來在南北慢慢擴散，大家也慢慢能夠接受。

我準備提案時，黃信介要我去找阿扁，張俊宏當時都聽阿扁的，阿扁說：「如果不把『四個如果』加進去，我會在黨員代表大會中鬧到無法通過。」那時南北各派系都已經溝通好了，我說：「如果要把這『四個如果』加進去，一定有人會反對，因為『四個如果』與決議案本旨不合。」台灣主權獨立，國民黨是無法接

受的，但我們是寫「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這是有些閃避的寫法，國民黨也不太敢反對，他們總不能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我們也沒提到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報紙也使不上力，黃信介和張俊宏也沒有反對，但是阿扁堅決反對，他堅持「四個如果」要加進去。我說：「陳律師，你想想看，這樣下去會前後矛盾。」他說：「不管，你如果沒有加進去，我就要在會場鬧。」那時黃信介、陳永興（1950 - ）、張俊宏、黃煌雄他們都是同一黨的，只要一個個站起來發言反對，案子就不會通過。我只好說：「我回去研究看看。」

回去之後，我找邱義仁、吳乃仁和林濁水討論，林濁水非常反對，後來我對阿扁說：「要不然放在說明欄，不要放在本文」，他沒有意見，於是我就加在決議文後面，本文只有寫「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來阿扁常常說：「這個四一七決議文，就是在說四個如果。」這是他在講的，看內容就知道，四一七哪有在講四個如果？有人甚至笑說：「這是在牛肉麵裡加冰淇淋，不倫不類。」但是阿扁堅持四一七就是「四個如果決議案」，他的「四不一沒有」也是從這裡來的。

這一個妥協的結果到黨員代表大會時，林濁水還是不贊成，我請邱義仁去說服他：「我們是向社會宣傳台灣主權獨立就好，裡面怎麼寫不要緊，要不然這個提案沒有通過，我這個當黨主席的會很失敗，黨也會很麻煩，獨派也會感到挫折。」我當時對阿扁很不諒解，我說：「大家都在為民進黨打拚，你只考慮到個人的聲望，還提一個不倫不類，邏輯思考矛盾的主張。」但他也不

管，就只是放話：「姚主席，你如果不准，我絕對不會讓你的提案通過。」我只好屈服。

台灣要制定新憲法

其實在 1988 年，當時還沒有提到國家，只講到主權而已，我們的理論當然是國家，但是公開的理論只講主權獨立，也沒有說不屬於中華民國，就一步一步來。真正再進一步是到 1990 年，後面的「大陸不是我們的領土」，接下來是「台灣要制定憲法」，那都是黃信介當主席時提出的。黃信介雖然曾說反對台灣獨立，說獨立要開除，但是後來李登輝的立場也沒那麼強硬了，起先他說：「我是中華民國總統，怎麼可以讓台獨份子在台灣活動？」1988 年我們在新店舉辦世台會夏令營，李登輝就公開說：「我是中華民國總統，世台會搞台獨，我怎麼可以讓他們回來？」我回答記者說：「依照集遊法規定，室內活動不需要分局長同意，更不需要總統同意。」記者一聽也哄堂大笑。李登輝當然是政治動作，確實當時有很多人沒辦法回來，但也有很多人回來。當時回來九十幾個人，那是世台會第一次在國內舉辦夏令營，那次我太太在青年公園舉辦一場「台灣之夜」晚會，大家唱到「黃昏的故鄉」，全場都哭了出來。

當時我的確在主導民進黨的台獨論述。第一波我們先講主權，不去強調國家，因為時機還不夠成熟。我說：「我們不是中國的」；等到黃信介當主席時，又提出一個決議文說：「大陸不

是我們的」，那是兩年後的1990年。當我們準備提出這個決議文時，郝柏村很緊張，他放話說要抓人，還派人去和我太太說如果通過就要來抓我。他知道是我起稿的，但還是通過了，也沒有真的來抓人。再來是「民主大憲章」，接下來是「台灣憲法」，同時國家的觀念出現了。

其實國家的觀念早就有了，但是呈現在黨的文獻中，是台灣憲法草案，那時就有國家的觀念出現。接著就有新國家運動、新政府運動、新憲法運動，台灣是個國家這個觀念就慢慢跳出來了。但很多人就開始質疑：「台灣哪是一個國家？」、「國旗、國歌是什麼？」、「哪一天是我們的國慶日？」……，所以我也接受1992年陳隆志（1935 - ）教授在美東夏令營提到的「演進獨立說」，所謂的「台獨進化論」、「已經獨立說」的理論，從海外到台灣島內，漸漸被接受，變成民進黨的主流觀點。

1992年我當選彰化的區域立委，接下來1995年、1998年兩次競選都落選，因為我太太原本在當省議員，她在當不分區立委時，我也參選立委，人家就說：「夫妻都去選立委，這樣很不好」，於是就沒選上。後來我太太當省議員，我再選也沒有當選，落選兩次以後，我就不再參選了。

其實不是彰化不好選，最主要是我太太在當省議員，加上謝聰敏回去參選，他對民主也很有貢獻，我就知道我選不上。還有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全力在打擊台獨，1992年和1995年兩次選舉，台獨和非台獨鬥得很厲害，我可能是他們指定必須消滅的對象，所以我也聽說很有人拿錢叫大家支持謝聰敏，不可以支持我。

除了我太太已經在當民意代表、我被醜化等因素，加上我重視國會論政，比較沒有在跑地方婚喪喜慶，例如我在立法院當司法委員會召集人，開會時國民黨立委都沒來，人家打電話來邀我回去參加彰化的喜宴，我說：「我在開會」，人家也會說：「其他立委沒去開，你為什麼不能回來？」說實話，我對地方的婚喪喜慶也沒什麼興趣。選舉是要跟人家交際、喝酒，我比較沒辦法適應，後來我就決定不再參選，讓我太太去選。後來我太太也沒有選上，因為和新潮流翁金珠等在地方的競爭，當初叫我不可以再選的主要就是翁金珠。

1997年我去清華大學當兼任副教授。之前也曾在台南神學院和台北的台灣神學院教授台灣歷史與台灣政治。那時我雖然沒有當立委，但還是擔任民進黨中執委、中常委，積極參與黨務工作，從南到北各地黨部都有在走動，一直到1998年以後才漸漸淡出，畢竟新人輩出嘛！

出任考試院長

2002年我經立法院同意出任考試院長，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以立法院的政黨結構要通過不容易。那時候阿扁就說：「你只管去拜訪每一個立委，其他是我們的事情。」他和柯建銘（1951 - ）、馬永成（1965 - ）在操盤。我知道的是，像有的立委說：「好啊，投姚嘉文可以，但是貸款要讓我出來」……之類的，有人會討東西。我是聽說，但我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錢？他

們叫我不管，我就負責去拜訪就好，無論是國民黨或哪個黨，都去他們的服務處拜訪，包括屏東、花蓮、中部、台北到處跑。其實也滿有趣的，國民黨的人很歡迎我，對我也滿友善的，和我聊天、照相，有說有笑，但要不要投票給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台灣的政治其實沒有那麼對立，不會因為你和我不同黨，就敵視對方。雖然在立法院互相攻擊，但私底下服務處之間的關係都不錯。

基本上，考試院有三項工作，公務員的訓練、考試和退休，退撫基金。退撫基金因為是銓敘部在處理，我也不熟，我只負責不要出問題，以前曾經發生過事情。他們操弄也不著痕跡，像託人家去買股票、基金，那都在合法的範圍，所以在我任內都沒有發生問題。

值得一談的是考試出題目這部分。因為那時很多人反應，例如典試委員和命題委員，一定要南北東西，公立和私立，男性女性均衡。當然有些南部的委員，很想當典試委員，但請他來開會就不想來，我就告誡說：「你如果不來開會，就不要答應來當典試委員，每次你們都在批評都是台北的政大、台大、中興的，你們南部的私立學校也要，真正請你們來開會，你們又不出席。」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還好，評分委員、閱卷委員，那也要花一點精神。我打電話告訴他們：「你如果答應要當，就要來開會；如果來開會，我們會發車馬費，不要煩惱交通費的問題。」典試委員則是一定要出席。

第二是考試科目的問題，院長是要負責高普考的部分，我提

議國文不要再出古文的題目，建議出題目要想像公務員需要的公文能力和語文能力，不要出《詩經》、《史記》之類的；也不要出那種「為什麼要反攻大陸？」之類，太過政治敏感的題目。國文就考公務員所需要的語文能力，這是我們考國文的真正目的。那種古文和當公務員無關，不要出這種題目，例如《易經》第幾句，第幾個字怎麼發音，不要出這些有的沒的。

還有在原住民部分，我也花了很多精神。我在全台灣辦了四場原住民人事政策研討會，包括後來的法官訓練，要請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去上這方面的課。本來我是認為原住民的問題要呈現在我們的人事制度，包括考試、訓練，後來我說：「要不然弄個法官也要有原住民。」他們說：「叫原住民自己來考。」我說：「沒有保障，他們也考不上。」但是後來司法院讓步，請原民會來上課，讓法官知道原住民的問題。後來中國文化史、中國史地、中



2002年姚嘉文先生出任考試院長。（邱萬興提供）

國外交史、中國近代史都改成「本國」，當然要把「本國」改成「台灣」，絕對不會通過。那時候很多人都很敏感，會說我們「搞台獨」，我就說是「本國」，「本國就是中華民國」，就這樣通過了。那些教授也問我：「本國是在指哪一國？」我說：「你自己去想。」我也提議：「本國外交史，你可以考馬關條約，也可以考南京條約或是台灣五口通商，不要去考瓊瑋條約，伊犁交涉或恰克圖條約那種題目，這和我們沒有關係。」又例如美國「台灣關係法」或是「舊金山和約」這類，和台灣比較有關係的，儘量出這類的題目。

十八趴又回復

最困難是十八趴的改革，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黨務年資和公務年資合併的問題，民進黨把這件事弄得很大，我查出來剩不下幾個人，結果搞得大家很緊張。我說：「不可能一筆勾銷，要不然就是讓立法院通過。」立法院沒有辦法通過，就把問題推到我這裡來，他們罵我，說我不肯處理，民進黨裡面的文化很差。事實上，這種身分的人沒幾個，因為黨務人員轉任公務人員，都是很早以前，這二、三十年來很少了；若不是二十年前就轉任，哪有可能現在退休？該退休的也已經退光了，我告訴他們不要去處理這個，他們都不肯聽。當然像胡志強（1948 - ）已經退休，錢也領走了，在選舉期間被揭出這個問題，民進黨要求他退還這些錢，行政院長謝長廷要求他要退回、追繳，我說：「那不是追繳的問題，如果去掉黨職等於不能退休，因為不夠年資。」十八趴

的問題，我有做了一些小部分改革處理，勉強通過。好不容易通過，馬英九當選之後又了改回去，以後又改回。現在實施的是我的提案，也就是減少十八趴的成數，領到的退休金不要比以前任職期間還多，也就是「所得替代率」不能超過以前幾成。

相較之下，考試院其他政策就沒有什麼很大的變革，只有一些文化上的改革。譬如我常舉一個例子，有人寫信來建議改革一些制度，我們考試院的職員都會回信說：「所請與現行制度不合，怨難照辦。」真是笑話，民眾就是對現行制度有意見，要我們研究，我們可以說：「贊成或不贊成」，或是找他們來討論，開個座談會，請他們吃個便當，聽聽他們的意見也好，怎麼可以寫：「與現行制度不合」，這種文化實在是還有待改進。以前考試院都不太愛處理這種陳情案。後來只要有人來信建議，我都會請他們來，大部分的意見都可以得到解決。

例如有一次，某位地價鑑定師應考人來信說特考錄取名額太少，考選部也不肯增加，理由是怕降低水準。我就跟考選部建議說：「一年考兩次，成績抓嚴一點。」他們就滿意了。像現在護士人員太少，考試院醞釀說要增加錄取名額，但也有人反對，會說：「護士少不是錄取上的問題，是待遇不好的問題，很多人有執照，不願意去上班；如果降低錄取標準，水準就會變低了。」這就是一個爭議。我記得我處理過類似的問題，那都是民眾來陳情之後處理的。另外就是縮減舉辦國際會議。有一些國際會議找幾個外國人來，不知道在講些什麼？報告隨便寫一寫，一次經費都要花好幾百萬公帑，又吃又住，我認為開那種會沒有意義。

原住民公務員

我開會都很準時。在人事升遷方面，我沒有帶外面的人進去，我認為公務員就是替國家做事，不是在養他。保障公務員，不是他身體不好、生活有問題也要保障，不能有這種觀念。公務員就是要執行職務，沒有執行職務的必要就不要聘請。至於原住民方面，我們不是為了優待原住民，而是原住民的特殊性質，需要由原住民來處理比較適合；而不是同情、優待他們的觀念。原住民如果對原住民事務不行的話，也不能聘用。

當然由漢人去處理原住民的事務一定會處理不好的。我常常講一個理論，馬可仕（1917 - 1989）下台後，艾奎諾（1932 - 1983）的小叔當參議員，有一次他去民答那峨島和獨立運動的人談判，希望他們不要再做獨立運動：「到底是什麼事讓你們不高興？新政府和馬可仕不一樣。」他們說：「你們從警察局長、老師、教育局長、新聞局長、法官都找天主教徒，沒有我們回教徒。」我舉這個例子，我說：「不是他們特別愛回教徒，而是天主教徒要處理回教徒的問題處理不好。」所以原住民問題也要這樣看待。

以前國民黨很歧視原住民，原住民的土木行政到目前還有三十幾個職缺沒有人去考，因為考試題目竟然是出「高樓地下四層的结构」。我和出題教授辯論，我說：「你出這個題目，他們山地不需要」，他說：「他們做幾年之後就會轉到都市了，以後到都市也要審查高樓建設。」這話聽起來好像也有道理，問題是，

本來考試是為了要任用，不可以隨便亂調動。本來規定六年才可以調，改成三年就可以調；本來是派駐在山上，現在三年就調到台北，到了台北就要審查高樓，所以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我當資政時很注意外交問題，所以全世界能跑的地方都儘量跑。我都很低調去拜訪，發現他們這些外交官對台灣的問題不懂，又不敢講。像〈舊金山和約〉，他們幾乎都不知道。有的知道這個和約，但不知道有何意義？知道的人也不敢講，不敢和中國的外交官在一起談話辯論。我敢，他們不敢；我敢和中國人聊天，他們不敢，都閃得遠遠的。最主要是，這些國民黨任用的外交官過去堅持「漢賊不兩立」，我和中國人是平等對待，但他們會認為「那是共匪，不可以和他們來往」，像這種情況很多。

包括在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巴西，我也一一去拜訪駐外單位，所以在外交官考試的部分，我就強調要考舊金山和約，考什麼是日本交流協會？什麼是 AIT？他們的性質是什麼？之類的問題。可以考駐外國的定位之類的問題，不要去考瓊瑋條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交涉的結果。雅爾達密約也不要再考了，大學時代有念就可以了，觀念有就好，考試就不要再考了。

參政運動者與改革運動者

民進黨建黨時，基本上建黨成員是雜菜麵，不是志同道合的人，都是反國民黨或是非國民黨的集合，裡面大致可以分為二種類型，一種是參政運動者，一種是改革運動者。參政運動者就像

張俊宏、周滄淵（1936 - 2013）、邱連輝、黃信介、許信良……，他們都是要選舉的。至於蘇貞昌、阿扁他們這些律師，本來沒有要選舉，所以參政運動者其實也分為好幾種。當初這個黨是改革運動者在帶頭，包括江鵬堅、我，雖然黃信介那時也在討論建國、制憲……等等，差不多從許信良開始，就變成參政選舉機器，他喊出「選舉總路線」之後就不再討論任何政治改革。百姓開始失望，民進黨碰到難關，因為只是談選舉，選舉要靠提名，提名就會有衝突，社會大眾就會覺得「你們民進黨和國民黨不是一樣嗎？」大家都是為了選舉利益，看不出有什麼不一樣。

民進黨裡面還有合作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嚴重。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贏了，國民黨就有很多人加入民進黨來參選，結果很多選上的縣長、立委也是亂七八糟。因為民進黨缺少建黨時的改革精神，很多海外以及國內政治受難者家屬，那些曾經被國民黨欺負的人，想要有「台灣出頭天」的新氣象和情都沒有了，只剩下選舉而已。例如蘇貞昌選台北市長，就是一個例子，不只是他，他還不是最嚴重的。他選台北市長時只說蘇貞昌有多好，也沒有提到市政如何改革？國民黨的執政如何？「九二共識」的問題也不談，也不批評馬英九，這是一個例子。又例如某一個選區民進黨有四位候選人，彼此互相攻擊。我以前選舉時，黑函都是黨內發出的，不是國民黨發的。我們一直罵國民黨，國民黨說：「我們沒在發黑函啊，誰發的，你們應該最知道。」現在改為單一選區，情況好了一點。但是單一選區制度，根本就是要輸國民黨。以前彰化縣選十個立委，最少當選四個，後來變成四區，彰化縣沒半個當選。「單一選區」就是林義雄的主張。阿扁選上總

統之後，自己兼任黨主席，整個黨就壞掉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民進黨除了參選之外，好像不再注重建黨精神或是人民的期待。黨員代表大會也不太愛開，四、五百個人開一個多鐘頭的會議，除了介紹候選人，每個議案都是交中執會。觀察這十幾年來的黨員代表大會，和我們當初的黨員代表大會所討論的議題都不一樣了。那時候黨員和代表來，氣氛都很熱烈；現在大家坐在那裡，差不多都是派系，提名要用全民調還是怎麼樣？結果一面倒，甚至中常委也不來開會，還花很多錢，這個黨變成一個競選機器。

黨務要先改革

2012年總統競選期間，大家都在質疑競選總部沒有說出大家關心的問題，我就覺得，小英選總統，她的理念到底是什麼？大家也不知道，沒有讓人家覺得她有一個清楚的理念，和國民黨有什麼不同？只是強調她是女性，第一位女總統。如何激起熱情很重要，以前監票是一群人組織好要去監票，現在大家都不願意去監票，熱情都沒有了。熱情沒了，當然對國民黨比較有利。所以2016年要選總統，我覺得民進黨雖然氣勢很好，但我很懷疑能夠打敗國民黨。

現在蘇貞昌的理論是要先執政才能改革，不在其位，難謀其政，所以要先選上。許添財（1951 - ）也說：「先加入聯合國以後再建國。」一些奇怪理論都出來了，他們的意思就是：「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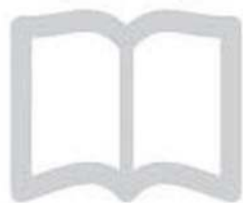
要再說這些了，統獨問題不要再處理，先讓我們選上再說。」他們也確實都當選議員、縣長，所以感覺這招有效。我以前在選國代時，他們要我罵同是黨外的對方是假黨外，我說：「為什麼？」他們說：「因為他的媽媽是國民黨的。」我說：「我回來彰化選舉，目標是國民黨，槍口要對外。」這種選舉，同志之間只要把你打下來，我就上了，因為國民黨選上一個，黨外也可以選上一個。現在立委是每個選區選一個，提名階段就發生這種問題，民進黨總統提名也是會再面臨一次，所以我不是很能苟同。

一個黨能夠讓很多人捐錢、出力，是因為這個黨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改革成果。以前說解除戒嚴、總統直選，都有一些新氣象出來；現在要做什麼，都沒有提出來。如果只是顧選舉，什麼都不說，怕得罪國民黨，怕得罪誰，都在顧財團的錢，當然人民會冷。游錫堃講「國會過半，比總統當選更重要」，可是國會過半，就碰到提名問題，提名能不能開誠布公？沒被提名到的，願不願意幫忙助選？這都是一種文化。沒被提名的，要幫忙站台助選，這樣黨才有辦法勝選；如果黨內提名沒過關，就和對方變成仇人，這樣被提名的怎麼會選上？看別人沒選上反而高興，這是什麼心理！？

文化很重要，所以我認為黨主席最好是不要參與選舉，比較容易領導，比較不會被人家說：「你做什麼事都是為了自己。」從阿扁開始就犯了這種錯誤，他說總統候選人一定要兼黨主席，所以謝長廷選總統時也當黨主席，蔡英文也當黨主席。阿扁其實有很多觀念不正確，但是因為沒有人敢挑戰他。他當總統兼黨主

席，對黨並沒有好處，候選人當黨主席對黨也沒有好處，整個黨務都停擺。蔡英文在當黨主席去選舉時，整個中央黨部都停頓，黨工都去幫忙助選了，黨務都沒人在處理。什麼是黨務？黨如果走選舉總路線，選舉機器，黨務就是助選。但是黨務應該有自己的工作，政黨外交、訓練、黨紀、黨組織、黨重要政策的討論……等，這些都是黨本身的重要工作，選舉歸選舉，黨要有自己的發展目標。

現在只要選舉一到，就會發現整個黨務都沒人在管了，所有人員都派去助選，錢也拿去助選了。如果黨的定位是要推動改革，提名之後，要選的儘管去選，黨的黨紀、重要政策的研究、政黨外交等等，要繼續運作才對。黨的定位就是政黨的任務，以前入黨要宣誓，要檢查，現在都不用了，甚至有些黨員你問他加入什麼黨，他也不知道。



此頁空白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洪奇昌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嚴婉玲

時間：2013年8月20日下午

地點：台北市青島東路台灣產經建研社
辦公室

洪奇昌，1951年生於彰化，台北醫學院畢業，入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預防醫學組攻讀碩士，之後留學加拿大，就讀於多倫多大學社區醫學研究所。1983年返台後，加入黨外編聯會，先後擔任第三任副會長及第五任會長，其後成為組黨十人小組及十八人小組成員，並與邱義仁、吳乃仁、劉守成等人成立新潮流系。1986年當選為第一屆增額國大代表，1989年又當選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此後連續擔任立委至2005年為止。2007年接替張俊雄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2008年5月卸任。

生長背景

我是 1951 年生，彰化人。6 歲就來台北，主要是因為在鄉下時，家境很困難，我爸後來就到台北打工，住在打鐵街 41 巷 6 號，也就是承德路過了縱貫道，是巷子很小條的社區。我的父母用生命盡最大的努力供給小孩無虞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在經濟很貧乏的時代，我們的前輩像我父母都是這樣，我非常以他們為傲。我爸 1914 年生，去年過世了。我媽 1917 年生，不識字。他們那一輩都走過日本時代、國民黨接收、執政，如果去看舊照片就會發現，我爸媽也都是走街頭的。

我在長老教會長大，所以對宗教、台灣的本土意識、早期的醫療宣教士例如馬偕（1844 - 1901）、蘭大弼（1914 - 2010）牧師等人都是很熟悉。我們家族受蘭大弼醫師的照顧，從我的曾祖父開始變成教徒。我爸念過三年漢學，來台北學車漁網，從台北去淡水學車網，當網仔師傅賣網子、漁網。他對台灣沿海很熟悉，走過很多地方從淡水沿北海岸到金山、石門、基隆，他是有走過北海岸的老人，也是國際特赦組織、彭明敏之友會的參與者，中年以後成為長老教會長老。我的爸爸媽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很投入子女的教養及教會的服侍工作，都是很敬業的人。

求學歷程

我是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在家裡排行最小，所以我最受祝福，身分證上雖然是寫四男，但我只有一個哥哥，有兩個很早就

過世，父母親生九個小孩只剩六個小孩。就是因為鄉下很貧瘠，沒有田可以做，父親才來台北做工。

1957年我來台北以後，進日新國小就讀。我念建中的時候，牯嶺街對我影響很大，那個時代還沒有光華商場，舊書攤都在那，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東西，例如可以看到陳獨秀的東西，還有胡適留下來的《努力》、《奮鬥》雜誌。比較現代的雜誌像《自由中國》，《自由中國》出到23卷第5期，我只差一期就收齊了。然後就是《文星》雜誌和文星出版社出的小冊子，再來就是《大學雜誌》。

建中在美國文化中心的旁邊，所以美國文化中心、牯嶺街、教會都影響我很多。我對台灣歷史以及亞洲的歷史，尤其一次大戰前後很有興趣，包括清末民初那時，例如1911年革命、1914年一次大戰、推翻沙皇、1919年五四運動等。林瑞明（1950 - ）曾經寫過一本《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與郭正昭合著），我覺得王光祈的東西應該做更多蒐集、更多闡述，去瞭解這樣一個地質科學家。他從英國回來，從安南、越南沿著往上，走過雲貴高原，去探勘瞭解，丁文江（1887 - 1936）也是。我對少年中國也很有興趣，像少年中國的一群人，有一部分共產黨，一部分國民黨，一部分青年黨還有一部分科學家，像曾慕韓（1892 - 1951）、左舜生（1893 - 1969）、陳啟天（1893 - 1984）、李璜（1895 - 1991）等人。我在建中的時候，每年五四我們幾個同學都會去胡適墓園，他的《胡適留學日記》、《四十自述》我都唸過，但我都沒保存，我的書都是需要的人就來拿，有一次有人說阿菊的

書送給洪奇昌怎麼會跑到舊書店。我太喜歡那段歷史了，一次大戰前後的東西文明。我那時也看《傳記文學》，因為那是歷史的東西，教會相關的就是看史懷哲自傳，還有就是林挺生的協志出版社出的一些西洋資訊，還有文星出的一些東西。

對我來說，醫學是一種專業。我爸對我說，我們家庭就是這樣，你要有一個專業，所以我家也有護理人員。作為一個精神科醫生我比較強調人文、社會、存在。那是人的核心，也是政治的核心。政治不是騙人的藝術，政治的運作是要創造最大可能，是整合的藝術，但政治基本上是哲學。我建中畢業後考上北醫，畢業後進入台大公衛所預防醫學組，和涂醒哲（1951 - ）是同班同學，陳建仁（1951 - ）部長高我們一期，但他是動物系過來的，涂醒哲是台大醫科。碩士畢業後我去加拿大，但在台大念碩士時，我在馬偕做 R1、R2（實習醫師第一、二年），同時在當全職研究生。那時精神科醫生很少，我當全職的學生跟住院醫師，非常感謝同事楊錦標醫師，他幫我 cover 白天的工作，我幫他分擔晚上的工作。

我是 1976 年到 1980 年在馬偕當住院醫師，1980 年到 1982 年在加拿大念博士，1983 從加拿大回來。不過在 1977 年時就幫 Nori（施明德）他們助選，在學生時代很自然就去幫忙助選。

創辦編聯會、新潮流與組黨

編聯會只有五任會長，第一任是林濁水，第二任是張富忠，

第三任是邱義仁，第四任是吳乃仁，第五任就是我，我同時也是第三任的副會長，我當第五任會長時民進黨就創黨了。編聯會每半年就改選一次，一方面是輪流訓練，一方面是風險分擔。桃園事件、中壢事件我都在現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的時候，疾風在中泰賓館鬧場我也在，我是被警備車弄出來載出去的。

黨外公政會跟編聯會幾乎是同時成立，公政會就是尤清、謝長廷弄的。老康先前有《台灣政論》，出到第五期，然後就是《八十年代》。有一份歷史文獻叫《我們的政治主張》，是編聯會出的刊物。那是接近創黨時我們有一個政治主張，五項主張都有細項，那個就是現在民進黨的黨綱，創黨時的黨綱就是引用這些。黨章的部分比較接近謝長廷的公政會弄的。

創黨有十人小組跟十八人小組，姚嘉文在坐牢，我們在周清玉家開會，主要是黃爾璇老師為主，那時我是新潮流會長，副會長是李勝雄（1941 - ），總幹事是喇叭（邱義仁）。有一個六人政治小組負責寫黨綱，包括郭吉仁，我覺得他是很 humble 的人，後來他就投入勞運了。

從中央黨部辦公室門口的那張照片，可以看到老康的體系，游錫堃、蘇貞昌、周滄淵，費老還有傅正比較是八十年代系統、江鵬堅，然後就是受難者家屬像清玉姐，還有受難者，陳菊是第一個出來的，再來就是黃爾璇、我、喇叭。我跟喇叭站在兩邊，表示我們最年輕，代表編聯會。

喇叭、乃仁、世煜一開始在許榮淑那邊辦《深耕》，有人說從那裏拉一部分人出來辦《新潮流》雜誌是由我出資，我只能說

不記得了。其實這些都是分工，台灣的政治就是要這樣。現在年輕的一代也是，他們今天弄公民不服從運動、非暴力抗爭，讓我們想起像 60 年代的一些運動，想起像 Saul Alinsky 的《反叛手冊》和《激進的號角》。在 1981 年我去美國受訓的時候，就去過金恩博士發表 I have a dream 演說的 corner。

那時辦雜誌一定賠錢，警總一旦整期查扣，你就會賠上二、三十萬，還要馬上轉到另一個印刷廠加印，所以那時在顧印刷廠的人和印好以後做物流的這些朋友們，也是很重要的參與者，有他們才能把這些資訊散布出去。

我們成立《新潮流》時也是輪值當總編，六個人輪流，喇叭、楊碧川、吳乃德、吳乃仁、劉守成，第六個我忘了。國圖有完整的《新潮流》。我說我不識字，之所以由我當會長是因為我參加的算早。《新潮流》編輯台上有六個主編，還有一些其他的義工、參與者，陳文茜（1958 - ）當時也是其中之一。新潮流從雜誌變成是一個有宣傳、政治論述、主張的團體，後來有人說就變成是一個政團，那是個美好年輕的時代，跟現在已經不一樣。

我覺得組織政黨是必要的。當時要突破的就是 1949 年開始宣布的戒嚴，在戒嚴的時代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我們要去追求形式的自由，辦雜誌就是追求言論的形式自由，組黨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組黨的部分可以問長廷跟喇叭，那時對黨的組織是有一些討論，是要柔性政黨還是剛性政黨？後來走向柔剛並存，最後還是走向柔性政黨。

當時有一些分工，還有做會員手冊，我覺得那個會員手冊封面很好。我很不喜歡留照片，但現在老了就會覺得應該要留一些，我剛少算了老賀（賀端蕃）。〈我們的政治主張〉裡面提到，我們是中間偏左，環境、生態跟經濟發展就是強調經濟發展不能毀壞生態，生態的永續是更重要的，這裡頭也提到基本經濟主張及組織運作的模式。

轉戰南北四個縣市

我跟喇叭可以說是「相害」，乃德組黨完就回去念書，喇叭留下來，畢竟黨需要有人處理黨務，黃爾璇和樺柑（江鵬堅）也希望他留下來。喇叭當副秘書長，然後就叫我去選舉，他做我的總幹事，我去選台北縣。後來我去台南選，也不是我決定的，前妻廖碧如還去幫我遷戶口。1987年有六一二事件，1988年有五二〇農民事件，我被檢察官提起告訴，我1989年1月去美國，9月回來，沒有趕回來開庭，就變成通緝犯，但我是去參加亞特蘭大的會議，還去拜訪中華民國駐亞特蘭大的代表林尊賢，我說我沒有逃亡，我人在華府，他也對我很好。那時還沒定讞，所以我可以選舉，那時因為六一二事件，江蓋世、長廷及我三個人被起訴，江被判刑、服刑，我跟謝則是緩刑。

我總共選了四個地方，台北縣國代和台南市、台中市、台北市的立委。2010年五都選舉時，我就笑說我選過四個。民主化運動帶來台灣的主體化運動及整個社會的認同跟政治主體性的形



1987年六一二事件中的洪奇昌先生。（邱萬興提供）

成，這是反對運動過程中我親身的體驗。我們當時的訴求是老法統，為什麼這些老人還在？1986年還有七百多個國代，立法院還有三百多個，南京法統為什麼可以代表台灣？所以第一個就是廢除戒嚴，因此有五一九的行動。我們在龍山寺張貼貼紙，反戒嚴的貼紙，不斷地宣傳。

我們突破了戒嚴、黨禁、報禁，然後就是對老法統的正當性提出挑戰。我們提出新國會主張，終於在1992年完成國會全面改選，不過這是體制內的路線。盧修一、戴振耀、李慶雄、葉菊蘭（1949 - ）等人後來成立新國會政策研究中心，我把放在我家的《自由中國》雜誌全套搬過來陳列，後來就送給別人了。

對民進黨轉型的看法

我覺得政治是一個很機構化的東西，當你進入體制，許信良的選舉路線成為黨的總路線，我也進入體制，那時老法統的體制還在，我們去衝撞，它就轉型或消失了，後來就以退職條例讓老代表老委員優退，然後在台澎金馬進行全面改選。1992年不管在立法院、國民大會都改選，那就是台灣新的民意，再配合廢除臨時條款，我方片面解除戰爭狀態，兩岸關係就產生改變，民進黨又不斷進入地方選舉和中央選舉，包括1994年的省長選舉，1996年彭明敏先生代表民進黨的總統選舉，我們成為進入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政黨。

進入體制還要不要反體制？這就進入修憲的架構，這個體制歷經幾次修憲，但還是不能完成一個新憲法。這個過程就是解嚴、新國會、總統民選、新憲法、新國家。我手邊還有1986年的一張選舉傳單，是別人幫我保留的，上面說不要豬仔總統，讓人民親手選出總統。

八次修憲面臨一個很critical的狀態，台灣算不算一個獨立的國家？我覺得是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雖然跟其他國家形式有所不同，但我的國家不容被否定。在不同的狀況下我的國家可以稱為中華民國或是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事實存在。1946年的南京憲法跟著國民黨一起到台灣來，雖然這部憲法凍結過，後來被解凍又經過八次修改，而且這八次參與修改的主體又是台灣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一起參與了這個憲法的修改，就是要去討論這個憲法的延續性。

我北京的朋友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我就跟他討論這算不算南京憲法的延續？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要求要制憲，制憲有很多種形式，艾奎諾在菲律賓制定一部新憲法，而我們台灣要制定的到底是怎樣的新憲法？台灣憲法的內容要如何有別於南京憲法或者中華民國憲法？現在我們有沒有制定新憲法的國際空間？有沒有內部高度共識？如何去形塑這個內部共識或創造國際空間，這都是我們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要想的事。每一個人要把他的想法說清楚，謝長廷也是。

我自己會跟中國大陸的朋友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的主權獨立是一個事實的存在，是一個歷史事實。但問題是我們又面臨一個很嚴酷的國際社會決議，就是 1971 年 2758 號中國席次問題的決議文，還有後來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還有 1979 年的台灣關係法。我覺得台灣關係法應該要列入國中教材，民進黨執政時，我提出將台灣關係法列進去就會知道台灣的地位是什麼？以台灣關係法來看，中華民國是不存在的。

我們要面對一個國際上的新環境，國際上所看的台灣是什麼？我們自己看的台灣是什麼？我們認同我們的國家，但我覺得在認同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包容，才有更長遠的可持續性發展。

對八年執政的看法

我覺得阿扁執政這八年裡面，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這兩部

分做得不錯，整個經濟成長從數字上的成長可以看出，那幾年也經歷了2001年的美國科技泡沫，2003年的SARS，也遇到產業外移的挑戰，但台灣的經濟成長仍維持在3到4的成長，失業率雖然曾經到6.1，但後來也逐漸下滑。薪資的成長速度是兩黨都要負責的，人均所得都過不了21,000美元，除非台幣升值到28才有機會到23,000，現在才20,700美元。兩個政黨都應該要去想如何創造更好的就業環境，提升薪資所得。我們的社會福利建立了可攜帶式的勞保制度，以前勞工退休沒有可攜帶式的勞保；另外就是國民年金。然後就是老農津貼，這維繫了農村社會的穩定跟老人的生命尊嚴保障，每個月六千元可以讓他們免於匱乏。

但我們現在面臨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是我們面臨令人恐懼的自由，經濟變得很不好，是不是我們的年輕人有一種面對匱乏的恐懼？這就是為政者要去思考的。中央黨部最近也在討論八年執政的功過。

海基會時期的兩岸經驗

我在海基會的時候，基本上保持著理性、務實、漸進、開放的原則。我覺得我們要理性去看待兩岸的經貿互動。每年有那麼多台商在中國投資及帶來約六百億到八百億的貿易額。對於三通，我採漸進開放，從春節包機開始做，到節日包機，到週末包機，到定期航班包機。對陸客來台，我們從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用漸進式的方式規劃陸客來台及航線，包括現在說的北方航

線截彎取直，到上海、北京，這些規劃我們在執政的時代都有做，還有澳門模式來進行這個規劃，並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就沒有進行兩岸經貿的規劃。

我們那時還有功能性的包機，遇到重大天然災害的時候、需要人道救援的時候，還有產業特殊的需要，就可以派上用場。2008年發生汶川大地震時，民進黨已經簽署了人道救援跟意外災害包機，所以台灣救援隊可以馬上啟程。那時我們有兩千多個台灣同胞在中國大陸旅遊，我們就用七四七飛機從重慶機場把他們載回來，那是我要卸任時做的。我很愉快地跟我的大陸朋友說那就是功能性包機。

我們在春節包機的機場上應該要進行貨運的，阿扁最後跟我說叫我做兩岸貨運便捷化，開放的原則是先貨後人、先海後空，兩岸貨運便捷化將使兩岸貨運物流的部分更快。我們當時有辦公聽會，吳榮義（1939 - ）也有來。但大陸的條件是要先人後貨、先空後海，他們有他們的戰略目標。不是說民進黨執政兩岸就不能開放，過去的歷史就證明不是這樣。兩岸貿易出口，在我們執政的時候是六百到八百億，2009年破一千億美元，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對於兩岸經貿也不可能去阻止。

中國因素對民進黨的影響

中國因素到底是不是我們民進黨的罩門？我覺得不必然。我們不可能限縮往中國的經濟活動，企業覺得往中國走比較有經濟

利益那是可理解的，也不是政策可阻擋的，問題是必須要有一些好的政策介入。陳師孟（1948 - ）當時說得對，我們不能阻擋廠商去大陸，但資金外流會影響就業及發展，他那時有說要徵國安捐，我曾經說這個政策是可推動的，但要講清楚。就好像引入外勞，每進來一個就要有多少的就業穩定基金，以改善國內勞工狀況。企業到中國投資，每投資十億或是一億，就應該要有多少錢提供給經濟部、經建會發展。這是有開放的意義在的，廣達想去，仁寶、正崙、鴻海要過去，可以啊！你為了你的企業利益過去，但你過去會影響台灣，你就要留下一些東西。

2007年是兩岸關係最不好的時候，當時我們在推正名制憲，兩岸互信基礎很弱，沒有進行實質性協商。2008年國民黨執政之後就開出兩張大支票，三通、直航之後簽署 ECFA，台灣的經濟就上來了。事後驗證，這兩項支票跟實質有很大落差，2010年到2011年的歐債問題，使中國外需導向的經濟及兩岸都面臨國際情勢成長停滯，我們應該反過來思考如何對應。

我個人認為，兩岸關係很難說，過去那種以製造業為主，只利用中國相對低廉勞動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過去這種兩岸經貿互動方式，雖然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帶來產業規模的擴大，但對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創新沒有帶來正面幫助。鴻海是去中國擴大規模，但還是以代工、提高製程、降低成本為主，沒有像宏碁說的往微笑曲線的兩端走。事實上往微笑曲線兩端走是非常困難的。在產業創新上，政府是不是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不是讓企業根據他的法則去創造產值、擴大比例。

尤其在電子資訊產業裡面，資訊通訊產業裡面 85% 都是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基本上這個就造成了台灣有八十萬的白領階級在中國大陸，卻沒有在台灣消費，台灣的內需消費市場就停滯，沒有製造就沒有創新、研發，這是不變的定律。當時說低階製造放大陸，高階研發放台灣，但沒有做到。所以這是台灣未來十年、十五年要面對的挑戰。

我覺得兩岸議題未必是民進黨單門，要看我們怎麼形成黨內共識跟檢討。90 年代初期是台灣有系統整合式的對外經營的黃金時期，因為中國大陸還沒有實力跟西方銜接，但台灣已經融在全球化裡面。那時台灣在製造產能、設計、行銷都處於優勢，那是李登輝時代，他當時判斷中國是不穩定的，他甚至多次說江澤民（1926 - ）的統治是不穩定的，所以當時有七塊論。我們也讓廠商以散兵游勇的方式自己去發展，讓民間走在政府前面，90 年代下半葉，企業就是有計畫過去，九七之後有黃金十年，尤其中國加入 WTO，貿易障礙打開後，他們的外貿大量成長，創造了三兆的外匯，1992 年時還不到三億。

處理兩岸問題立足於理性

回顧這二十年，可以對一些事做檢討。我們又沒辦法有效管制技術、資本、人員的流動，相反地，中國用各種有利的方式招商投資，像五免三減半之類的。但中國要承擔過度投資的後果，造成環境破壞、產業轉型問題。所以站在台灣的立場，我覺得處

理兩岸的問題還是要立足於理性、務實、漸進、開放的原則。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維護民主自由的法治，政治的安排是不可能跳躍的。我們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國際貿易量也不是小國，跟我們的邦交國比起來簡直是超級大國，但跟中、美兩國的關係比起來我們是小國，所以要想小國的生存之道，在國際關係裡面我們要怎麼找到我們的定位？

但這個積極的定位要符合政治現實、社會共識。今天台灣最大的社會共識是什麼？台灣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立憲的主權國家，雖然憲法經過修改不是很完整、不是很完美，可是它存在，任何人要推翻或否定這部憲法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國、民兩黨主要的不同是對國家的認同不一樣，我們的國家是兩千三百萬人、是台澎金馬，國民黨的解釋則還包括中國大陸、外蒙古，所以兩黨的差別應該是民進黨好好去想的。這可以去看 1999 年民進黨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2002 年台灣產經建研社的成立，是為了提供政府與民間對於公共政策的觀念溝通平台，促進產業與政府、學界之間意見交流，進一步形成政策、影響政策。因為那時民進黨是一個執政黨，要去想這些東西，即公共政策尤其是產經方面。我們有五個論壇：兩岸經貿、金融、產業科技、人力資源、投資環境。我們最 proud 的是我們有產經論文獎，是要跟台灣產業相關議題的論文獎。我們有一個評審委員會，裡面有三個中研院院士包括麥朝成、管中閔等人，獎金不少，也有很多重量級的投稿人。另外我們每年有景氣對策分析。但 2007 年我被媒體打得一塌糊塗，說

我沒有台灣立場，我想說我就做自己可以做的就好，所以就停辦論文獎幾年，今年我想恢復，但還要籌資源，要十到十二個工作人員才行，但我現在只有四個。

願意為實踐理想而奮鬥

張俊雄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彭孟濤

時間：2013年8月5日 15:00 - 16:20

2013年8月21日 10:30 - 12:00

地點：台北福容大飯店；和平東路自宅

陪同受訪：朱阿英女士

張俊雄，1938年生於日本，3歲回到嘉義。1956年進入台大法律系，1960年畢業，以全國第一名成績考取律師高考。後在高雄市執業，並擔任《台灣教會公報》理事長。1980年美麗島大審時擔任辯護律師，從而步入政壇。1983年當選第一屆增額立法委員，此後至1998年都順利連任。1986年參與組黨十人小組。2000年10月，成為首位民進黨籍行政院長。2007年5月二度受命任行政院長，直到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為止。卸下公職後，成為基督教更生團契的終身志工，發願餘生要獻給上帝，為監獄受刑人服務。

我的成長背景

我的父親在嘉義高中畢業後，到日本大學念法律系，我母親於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也去日大讀書，所以我在日本出生。我父親畢業後返台，所以我三歲時才跟著回到嘉義。我初中、高中都在嘉中就讀。我記得當時我參加演講比賽，得到第一名，但其中一位評審老師說，張同學不管是台風，還是口條都很好，但是他的國語發音不標準，所以後來我每天吃完便當，就到後面的植物園，對著樹木演講，練習發音，因此到我後來競選時，很多人都笑說張俊雄在講國語都沒台灣腔！

嘉中畢業後，我想念法律系，但我父親不允許。我父親告訴我，當時國民黨對法學院的學生不信賴，只信任軍法學校的學生，所以軍法官十年服役後，不需考試就可取得律師執照，但是法學院的學生卻沒有這項特權。他還說：「你如果讀法律，沒有通過高考，也無法從事法律工作。這樣你何必讀法律？乾脆讀別的科系！」不過，我卻不改其志，只填寫四個志願，即台大法律系法學組、台大法律系司法組、東吳大學法律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後來順利考取台大。

由於我已經知道將來會碰到什麼問題，所以一進入台大，我便到法學院註冊組，拿了四年的法律課程進度表，為了成為法律人，我自己編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法律專業課程進度表，特徵有兩個，第一是進度比台大法學院快，第二是選該科目最好的教授。所以1956年進入台大就讀後，大三第一次大專暑期集訓，隔年我畢業，當年只有律師高考，司法官那年沒考，結果一千五百多

人應考，台大法學院應屆畢業生將近兩百，只有兩人考取，其中之一就是我，而且我的成績在當年是全國第一。

台灣人不懂政治鬥爭

我從政多年來的觀察與心得是，像毛澤東、蔣介石等中國領導人，和我們這群從事黨外運動的台灣人之間，最大的差別是，他們講究政治鬥爭。台灣人比較憨厚，有政治理想，願意為理想的實踐而奮鬥，甚至願意為理想犧牲，但談到政治鬥爭，因為憨厚得不得了，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比，所以實在沒有資格參與政治鬥爭！

這是經過很多年以後，我自己回顧歷史，所發現到最為顯著的地方。以組黨來說，戒嚴時代就是不准組黨。當初我們有世界上最漫長的戒嚴，有萬年國會，沒有言論自由，只要違逆當道，就會被抓去火燒島關。在美麗島時期，黨外人士有政治理想，包括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也有推出候選人與國民黨競選，這都是政黨實質的工作，雖然沒有政黨的名稱，叫作「美麗島雜誌社」，但實際上就是政黨，所以當時美麗島軍法大審的八位受刑人，也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或 12 年、14 年的有期徒刑。而我們這群人，就是當年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律師，因此國民黨統治當局的見解，我們就很清楚。

美麗島政團，是「沒有黨名的黨」，也就是實質的政黨，我們既然知道執政當局對於組黨是那麼的敏感，但為什麼 1986 年

時，美麗島受刑人還在關，客觀環境與美麗島時期完全一樣，沒有任何改變，仍然是戒嚴，仍然是萬年國會，而我們竟然敢在9月28日在圓山飯店組織「有黨名的黨」。換句話說「沒有黨名的黨」的領導階層還在關，客觀條件沒變的情況下，為什麼我們還是執意要組黨？當初我甚至約我內人，游錫堃約他太太和兩個孩子到台北，把遺囑放在律師事務所保險箱裡面，準備等國民黨來抓人，所以從這一個事件本身可以看出，我們這批人有理想，願意為理想奮鬥，甚至必要時願意為理想犧牲，但談到政治鬥爭就是另一回事。

再舉一例。2000年政黨輪替後，我們把最有權力的行政院長一職，請國民黨籍的唐飛來擔任，這樣的政治動作背後代表的涵義為何？其實，我們當時的心態就是，歷經總統大選激烈競爭後，接下來大家應該為了這片土地和人民的福祉攜手合作，共同打拚，所以沒關係，總統我們當選，由陳水扁來做，至於憲法所規定最高行政首長，就請你們國民黨的人來擔任，那時根本欠缺政治鬥爭的敏感性。結果等到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他們的做法就是隨即把陳水扁關起來！連我也難免被秋後算帳！

我記得我第一次行政院長卸任時，在台北沒有房子住，因為我過去擔任多年立法委員期間，都是住在立法委員的會館，我的選區在高雄，至於我當行政院長期間，就搬到官邸，所以卸任了就沒有房子住。後來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他女兒搬到美國，留下一間房子沒人住，就讓我借住。直到有一天，法院來查封，因為那位房東生意做垮掉，結果來查封時，看到我住在那裡，有

點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和內人商量，既然法院來查封，我們無論如何要搬走，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擾。於是之後我就請我兒子貸款買了一間法拍屋，那時因為 SARS 的關係，房價大跌。當時有人問我真的是住法拍屋嗎？我說沒有錯。又有人問我難道沒有認識朋友在蓋房子的？我說朋友多的是，只是不想麻煩人家，所以我才去買法拍屋。

不料第二次政黨輪替後，這件事卻立刻遭到調查。理由是我兒子志弘去買法拍屋，涉及未繳贈與稅。志弘說我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我要去買法拍屋，但錢不夠，所以我爸爸給我錢，我媽媽給我錢，我們現在也同樣住在一起啊！但他們卻質疑，既然如此，你為什麼沒有申報贈與稅？不過我想這根本不是他們的重點，其實他們只是想查出我到底有沒有向財團拿錢！我說孩子買法拍屋錢不夠，做父母的幫助一些錢，乃人之常情。結果經過台北國稅局調查後，發現沒有問題，就向志弘道歉，並說：「你爸爸這件案子，不是我們國稅局可以做主的。」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比較兩次政黨輪替，第一次阿扁把行政院長請國民黨做，結果第二次國民黨卻是直接把阿扁抓起來！這在在證明了我一開始所說的，台灣人憨厚，有理想，願意為理想奮鬥，甚至犧牲，但在這種政治鬥爭上，根本沒有資格和他們較量。我想這是我從政多年來的深切體悟。

台大法律系的畢業生接掌政權

1960年我以第一名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然後參加律師高考，那時律師非常難考，台大當年只考取兩人，東吳、法商全軍覆沒，而我是以全國第一名考取畢業那年的律師高考。我想日本是先進國家，但日本統治台灣時，什麼學校都有，唯獨沒有法學院，所以當初我父親嘉中畢業後，為了讀法律，遠度重洋到日本大學念法律系，而我母親台北第三高女畢業後，也去日大讀書，所以我在日本出生。那時是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是先進國家，它尚且在殖民地不開設法學院，不允許自由的法律教育，國民黨來到台灣，不能像日本一樣沒有法學院，但是他們只相信軍事學校出來的學生，不相信法學院畢業的學生，所以他們用高考來限制。軍法官十年服役後，不需高考，直接可以取得律師執照，至於法律系畢業生，則要通過高考，才能從事法律工作。我就舉我畢業那年為例，應屆的台大畢業生竟然只有兩人考取，東吳大學、法商學院全軍覆沒。

後來我發現，第一次政黨輪替，擔任行政院長的我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總統府有陳水扁、呂秀蓮，也是台大法律系的，包括台灣最大縣的縣長蘇貞昌及高雄市長謝長廷也是一樣。這也難怪國民黨當年會不信賴台大法律系的學生。所以有人說過去陳誠與蔣經國在權力鬥爭時，蔣介石開始不信賴陳誠，為什麼？因為陳誠在他的行政院長官邸內，開始與自由派的學者有所往來。所以從這些政治鬥爭的歷史中來看，我的感覺是，當初你說台大的學生是「台獨」，以後果然取代你的政權也是台大法律系的學生。

長老教會和黨外運動的分與合

60年代我出來當律師，我是長老教會¹的，但當時長老教會和黨外運動是分開的，並沒有合流。70年代長老教會的三大聲明²，強調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而不是交由世界列強來代替台灣人民決定，除倡議人民自決外，在〈人權宣言〉中，更主張政府應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三大聲明的公開發表，都與當年的黨外沒有直接的關聯。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係台灣最大的基督教宗派。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 1865 年到達台南、1872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在淡水，分別展開傳教工作，皆以設立學校、醫院等為宣教策略。長老教會在教義上強調聖經的權威、萬民皆祭司、上帝的絕對主權；組織上以信徒選舉出來的長老治會，並以小會、中會、大會（總會）等不同層級的議會來處理教會事務。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宣教傳統不同而分成南部教會與北部教會，1912 年南北聯合成立「台灣大會」，1913 年正式決定使用「台灣基督長老會」為正式名稱。1942 年決議以台灣大會名義加入日本基督教團未成後，1943 年創立台灣基督長老會總會，並準備進一步會合其他台灣人的教派成立台灣基督教團，但是未能掌握組織教團的主導權。1944 年正式加入日本的宗教統合組織「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戰後教團解散，南北教會各自恢復運作，於 1951 年才正式合併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50 年代後展開原住民宣教。目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分為 20 個中會，其中 9 個為原住民中會。教會針對台灣現況危機而發表三次宣言：1971 年「對國事的聲明與建議」、1975 年「我們的呼籲」、1977 年「人權宣言」，內容為促請政府進行民主改革、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造成教會與政府間的關係極度惡化。1980 年總會總幹事高俊明因幫助美麗島事件要角施明德逃亡而被捕判刑，引發國際關切，教會也因此對社會與政治議題更加投入。1985 年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主張：「教會……是普世的，復在釘根在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以台語誦讀）。參見王昭文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1140。
2. 1971 年由於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密訪中國以及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加上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又計畫訪問中國，引發台灣社會嚴重危機意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該年底發表〈國是聲明〉，懇請國際社會尊重 1500 萬台灣人民的自決權利，並要求政府即刻進行政治革新。其後，於 1975 年底，有鑑於台灣在外交內政上節節挫敗、國民黨政府侵犯宗教事務（沒收台語羅馬字聖經）、宗教團體間互不信任，加上美國福特（Gerald Ford）總統計畫訪問中國，長老教會又發表了〈我們的呼籲〉，重申台灣前途應由全體住民決定，強

當時長老教會發行《台灣教會公報》，那是台灣最古老的報紙，那三大聲明都刊載在《台灣教會公報》。我那時參與長老教會的運動，甚至擔任公報社的理事長。當年國民黨當局沒收教會公報，沒收羅馬字聖經，我與發行人金輔政都參與其事，與警總周旋。

直到美麗島時期，長老教會才和黨外合流。當時已有不少年輕的牧師開始和黨外合作。最鮮明的例子是林弘宣（1942 - ），他是台大哲學系畢業，之後進入台南神學院，又到美國攻讀神學博士學位，之後返台，就擔任長老教會的牧師，並在《台灣教會公報》當編輯，而且開始積極參與黨外運動，於1979年擔任美麗島雜誌服務處的總幹事。

當時長老教會發表三大聲明，國民黨一直想要抓以高俊明（1929 - ）總幹事為首的一群長老教會的領導人，但囿於長老教會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組織，所以起初不敢輕舉妄動。直到美麗島事件後，高俊明才因幫助施明德逃亡而被捕判刑。當初高俊明告訴我，他並不認識施明德。可見長老教會和黨外運動本來並沒

調母語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呼籲政府與教會應互信、人民應團結和諧，並呼籲教會本身應謀求自立、強化普世關係、關懷社會公義。1977年正值美國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推動「人權外交」之際，其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卻計畫前往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有鑑於台灣1700萬人民的安全與自由受到威脅，長老教會乃於8月16日發表〈人權宣言〉，基於「人權與鄉土是上帝所賜」的信念，懇請卡特應「本著人權道義之精神」，在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時，堅持「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與自由」。文中更明確宣告：「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一宣言是台灣歷史上頭一個以人民團體的立場所發表有關台灣前途最明確的主張。參見鄭仰恩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宣言〉，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頁1140-1141。

有合流。長老教會是根據宗教信仰，認為國民黨的做法不對而發表三個聲明，但對於黨外的政治運動卻不介入。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後，呂秀蓮、陳菊、施明德等人都躲在林義雄家樓上，國民黨特務三更半夜衝進去抓人，眾人均被逮捕，施明德憑什麼能脫逃？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從他在美麗島軍法大審所做的陳述加以推敲。

施明德在法庭上宣稱他當時跳出圍牆後，發現四周都沒有特務，就一路走到仁愛路，到那裡剛好來了一輛計程車，他就跳上車揚長而去，之後並跑去找高俊明幫忙。為什麼那麼湊巧？所以我認為這是政治鬥爭的高招，他們的安排簡直天衣無縫！後來國民黨當局逮捕高俊明的理由，與長老教會發表的三個聲明完全無關，而是因為他藏匿叛亂犯施明德。當時有國際人士對於高俊明被捕有很多質疑，但當局透過公開的美麗島軍法大審，讓來旁聽的那些國際人士啞口無言，不得不接受高俊明藏匿叛亂犯的事實。換句話說，我的判斷是，當時國民黨刻意不抓施明德，讓他去尋求長老教會幫忙，然後再藉此將施明德與高俊明等人一網打盡，所以我才說這種安排果然是高招！

然而，終究是「人在做，天在喬」，由於美麗島大審是公開審判，台灣人民慢慢也開始瞭解到真相，原來這些人是為了台灣的民主、人權在打拚，而不是當局口中的暴力份子，以致於隔年的選舉，黨外大有斬獲，我想當初假如沒有公開審判，恐怕根本沒有這個結果。

林宅血案的疑點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的隔年，1980年2月28日又發生了林宅血案。如果你去翻隔天的《中國時報》，就會看到斗大的標題寫著，奩均說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³當時這則新聞一出來，一時之間各種傳聞甚囂塵上，甚至一度「大鬍子」還被認為就是兇手。我猜想，那時國民黨的陰謀是，殺光林家大小，只留一個活口奩均，讓她被發現時還一息尚存，沒有死，但救不活。想想五歲的小孩子，連重要的器官肺部都出血，怎麼可能救得活？然後他們再趁醫院搶救傷患時，搶先在《中國時報》刊登假新聞，到時只要她一死，就死無對證了，而那時就可以順利栽贓成是黨外自己的人殺的。

很多事情，我想當下看不明白，但事後回頭檢視，就能看出人家的高招！後來奩均被幸運救活，人家問她，她說她從來沒有講過那句話，而且那個兇手是她第一次看到的人。當時義雄嫂和我、江鵬堅一起參選第一屆增額立委改選，一方面她的丈夫被判12年有期徒刑，被關在軍事監獄，另一方面她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和婆婆慘遭殺害，再加上奩均看到兇手，又擔心她被殺人滅口，我看素敏當時的心情，只有悲痛欲絕足以形容。後來，林家人把奩均送到美國，想盡辦法不讓她知道阿嬤和小妹已經身亡，但終究紙包不住火，聽說奩均哭了幾個禮拜後，才發誓除非兇手被繩之以法，否則不再流淚！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結果到大學前從沒哭過；想想，這樣是不是活在仇恨當中，整個人格都被扭曲。

3. 〈林奩均告康寧祥和司馬文武 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中國時報》，1980年2月29日，第三版。

上大學後，奩均接受了信仰，她才願意把自己的身世說出來。她說她在大學時曾擔任志工，輔導過兩個美國小孩，那兩個小孩一開始很討厭她，我在想大概是因為她人格扭曲，所以很多行為孩子沒有辦法容忍，直到有一天，她把自己的過去告訴那兩個小孩，說完他們一起抱頭痛哭。後來奩均嫁給一位美國的傳教士，生了五個小孩，我告訴義雄說這是上帝加倍還你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台灣人太過憨厚，根本沒資格和國民黨進行政治鬥爭，而且回顧歷史，才會發現到人家在案件的安排、設計上的高招！

行政院長任內催生金融六法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蔣經國沒有抓人。不准組黨，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礎，所以1979年「沒有黨名的黨」的領導階層被補入獄，如今組織「有黨名的黨」，居然沒有抓人，意謂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弱化了。從而第二年7月就宣布解除戒嚴。從解嚴開始，台灣社會才逐步開放，然後才有國會全面改選，人民直選總統，甚至政黨輪替。

所以美國國務院 comment，從威權到民主，開發中國家裡台灣是成功的範例。為什麼？因為這過程中沒有經過暴民政治，也沒有經過軍人專政，好比今天的埃及，所以美國國務院才會說台灣是成功的範例。

2000年政黨輪替，同年10月我接替唐飛出任行政院長，成



2007年11月，張俊雄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全力推動「牽手為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邱萬興提供）

為第一位民進黨籍的行政院長。接任當時，英國經濟學人認為台灣會發生本土型的金融風暴。因為當時的呆帳率大約四成以上，而且全台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的淨值又多為負數。為了化解可能的危機，2001年我向立法院提出「金融六法」，但立法院未審議就結束會期。結果我便交待我的祕書長邱義仁，無論如何要要求立院召開臨時會，審查「金融六法」，我隨後也親自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1941 - ），告訴他英國經濟學人說台灣會發生本土型金融風暴，為了防範，我提出「金融六法」，如果遭到立法院凍結，萬一經濟學人不幸言中，到時真的發生本土型金融風暴，又該如何是好。王金平聽完嚇了一跳，後來臨時會召開，金融六法全部通過。

金融六法中針對日後健全金融制度的建立有一條法律，即「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金融重建基金的建立，就是

為了處理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退出市場。當時金融六法通過後，立法院有通過一附帶決議，即金融重建基金，應該要以基層的金融機構為優先適用對象，沒想到正中下懷。我當時正想整頓農漁會信用部，但立院誤判，以為我是要救王玉雲的銀行，所以通過此一附帶決議。

於是，我就根據此一規定，下令銀行接管那三十六家的農、漁會信用部，其中屏東抗拒，之後警察也動用公權力強制接管。從而，三十六家的農、漁會信用部全部被接管，然後方能進行整頓。當年國會選舉，民進黨成為立院第一大黨，雖然還沒過半，但那年與農漁會信用部相關的立法委員全部落選。

當時我下令接管三十六家農、漁會信用部，國民黨也啞口無言，因為我是根據立法院的附帶決議，以基層的金融機構為優先適用對象。經過我催生金融六法，推動金融改革，無論是金融呆帳率，還是本土型的金融危機都被化解於無形。此外，對於未來金融體系的健全，金融六法也很有幫助。

核四停建的風波

在我行政院長任內，因為宣布核四停建一事，引發立法院強烈反彈，從而使得內閣的施政舉步維艱。

核四的預算須經過立法院的審查通過，但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有一注意事項是，假如行政院覺得窒礙難行的話，由主管部會先做，再不行，則可報告院會予以停止預算執行。過去的行政

院長有多次停止執行的紀錄，在我任內就只有一次。所以 2000 年 10 月 27 日我宣布核四停建，就是根據這項法律程序。

不料宣布停建後，卻隨即遭到立法院的強力杯葛，他們認為張院長豈能貿然宣布停建，進而決議將我提交監察院彈劾。然而，當時我並未接受立法院的法律見解，我認為既然立法院依法通過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附帶此一注意事項，我當然可以宣布停建，況且從前的行政院長也不是沒有宣布停建的紀錄，而我則是第一次宣布。結果沒多久立法院又第二次決議，把我送交監察院彈劾。所以就變成行政院和立法院在此一法律見解上的衝突，不得不提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

2001 年 1 月 15 日大法官做出釋字第五二〇號解釋，指出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有權限可以停止預算執行，並不違法，但是程序有欠完善，就是我應當向立法院報告，並經立法院決議，才能宣布停建。

經過大法官解釋，認定行政院長並未違法，因此監察院也不得彈劾。此外，我也在 2001 年 1 月 30 日，到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第一次臨時會做核四電廠停建報告。在該份書面報告書中，我提出數項停建的主要理由，包括不建核四不會缺電、核廢料是萬年無解的難題、核災萬一發生，危機處理堪憂、核四合約中止損失尚低於續建投入成本等等，十幾年後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引起國人重新關心核四停建問題，現在大家提出應當停建的理由，事實上不脫我當年報告所提的各點，所以福島核災後，謝長廷還笑說，終於還給張院長一個公道！

例如我在報告中提到，「車諾比災變」，根據 1995 年的聯合國祕書處資料顯示，在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被污染的土地面積超過十六萬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五倍大！我還提到，我國核電廠所產生的大量高放射性核廢料，放射性衰退期為二萬四千年以上，而且至今我們尚未找到這些高放射性廢料的最終處置場，事實上世界各國至今仍未有妥善的處理方法。所以我說：「我們這一代不能自私自利到只為享用三、四十年核電的方便，而留下長達數萬年毒物來遺害自己的後代子孫。」除了核廢料的問題外，我也指出核災萬一發生，緊急疏散方案不足的問題。目前我國核電廠緊急疏散計畫區半徑係定為五公里，我認為這是不夠的，至少要二十公里。這次福島核災，就是規定二十至三十公里，鼓勵遷移。雖然我認為半徑定為五公里是不切實際的，至少要二十公里，可是當時我也很坦誠地報告說，不要說二十公里，就連規定的五公里我也沒辦法遷移。並且，我又提到地震因素的問題，我說核四廠興建採用的地震係數僅為 0.4g，但在九二一大地震後，情況已有改變，連一般建築物的地震係數均已提高，因此核四所用的地震係數偏低太多，核四實不宜貿然續建。

雖然我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二〇號解釋，到立法院做停建報告，但後來立法院仍是決議不准停建。不過我也與立法院長王金平達成一項協議，就是「非核家園」仍是我們將來長遠的目標。然後我在 2 月 14 日在新聞局召開記者會，向全民宣布核四復工。

當時外界不斷誇大停建的損失，但事實上核四停建的損失金

額是低於續建投入的成本。並且，當時台灣的電力供應在不建核四，又無替代方案的狀況下，也不會缺電，至少我們仍保有六年供電無虞的環境。何況，那時政府為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也已規劃好到時將採取的相關替代方案。

10月27日，就在陳水扁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連戰（1936 - ）在總統府會晤，討論核四議題的同時，行政院卻宣布核四停建。事實上，宣布停建這件事是我單獨決定的，總統事前不知道，全部責任由我行政院長一肩扛。因為核四停建，是陳水扁競選總統時的政見，至於行政院方面如何落實，細節部分我不便透露。總之我在10月27日宣布停建，事前已用心做過規劃，也盡量做到周延，要將衝擊降到最低，刻意選在星期五才宣布，也是為了降低股市震盪。

更生團契的終身志工

我第一次擔任行政院長是2000年10月到2002年2月，第二次出任行政院長是2007年5月21日至2008年5月20日。2007年那次，事實上早在2006年阿扁就希望我接替蘇貞昌，重新擔任院長一職。我記得當時蘇貞昌來我家，我勸他應當繼續擔任院長，否則政局會不穩定，那時北高市長選舉也尚未結束，我說選舉成敗一向由黨主席負責，你做行政院長不需負責，所以他當下便決定繼續擔任，然後我就直接打電話給阿扁，我說：「貞昌現在來我家，我勸他應該繼續做。」因此貞昌就繼續擔任行政

院長。直到他宣布參加 2008 年總統大選黨內初選後，我才接替他出任行政院長。不然原本在前一年北高市長選舉前，阿扁就要我接任，但我當時一直認為，這樣做對整個選情和政局穩定都不好！

2008 年卸下院長一職後，我加入更生團契⁴，並以終身志工的身分服務受刑人。一方面走訪全台灣各個監獄，針對受刑人做教誨的演講，另方面將重點放在與死刑定讞的人做個別對話。第一是希望他們反省悔改；第二是請他們很謙卑地向被害的家屬道歉；第三是勸導他們能夠捐贈器官遺愛人間；第四是詢問他們有什麼遺願，我們可以替他們完成；第五是透過談話的機會，試圖掌握這個人為什麼會成為死刑犯。此外，工作重點還有一個是放在煙毒犯。因為有人說，煙毒犯除非四根釘子釘下才會悔改，不然根本無法改過。

最後一個重點是被害人家屬的關懷。最動人的例子是游媽媽的故事。住在羅東的游媽媽，丈夫過世，留下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有一天她的獨生子參加烤肉活動和人發生口角，遭對方刺殺身亡。我聽游媽媽說，當時她每次出庭時都說，想與兇手同歸於

4. 台灣更生團契（The Prison Fellowship Taiwan），是國際更生團契（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的台灣會員。此服務團體於 1981 年 9 月 29 日由前退休宜蘭監獄典獄長陸國棟發起成立，以「向全國所有監所中的受刑人，傳揚耶穌基督救世福音，引導他們悔改歸主，藉著聖靈更新他們的生活，並幫助他們過基督徒生活，使他們出獄後，不再犯罪，促進國家社會的祥和安寧」為宗旨。1988 年起由總幹事黃明鎮牧師接掌團契工作，目前有十五個區會（桃園、新竹、苗栗、彰化、南投、嘉義、雲林、台南、高雄、屏東、基隆、宜蘭、花蓮、澎湖、金門）及台中更生團契，將近八十位全職駐監牧師及同工，及數百位志工投入監獄工作服務。參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4%E7%94%9F%E5%9C%98%E5%A5%91%E5%8F%B0%E7%81%A3%E7%B8%BD%E6%9C%83>，點閱日期：2013 年 8 月 21 日。

盡。那個兇手比她的孩子還小，而且根本不認識她兒子，就是因為一場口角，才釀成悲劇。游媽媽還告訴我，有次她煮菜，打開電鍋一看沒飯，心想明明有洗米，原來是米洗完沒放進電鍋，而是直接倒進馬桶，她當時甚至手上抱著洋娃娃，當做她的兒子。後來因為有義工，分擔她的痛苦，才讓她逐漸走出陰霾。三、四年後有一天，義工建議她到監獄探視那個受刑人。由於那個受刑人年紀輕，而且不是因為仇恨犯案，所以只被處以徒刑。雙方見面時，那孩子問：「游媽媽，我可不可以抱妳？」游媽媽說可以，結果一抱那孩子放聲痛哭！後來游媽媽還收那孩子當義子，如今他已大學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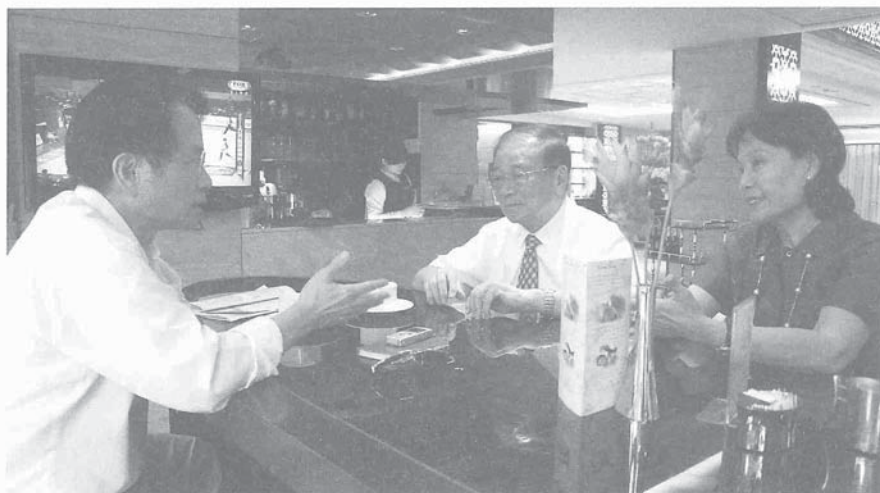
因為我是基督教更生團契的終身志工，所以我的一切工作、行程，都是由他們和法務部矯正司及相關監所聯繫安排。明天我就要去台北看守所探視兩名死刑定讞的受刑人。

【朱阿英：之前我們才到台中看守所看過林于如，她為了詐領保險金，接連謀害自己的母親、婆婆及丈夫，已經死刑定讞了。我們去看她，她說殺害丈夫她承認，但殺害媽媽和婆婆她不承認。記得三年前第一次去看她，張俊雄說他當律師那麼久，從未看過像她一樣心理防衛那麼強，幾乎無法溝通的人。

張俊雄是碰到林于如，我則是碰到媽媽嘴咖啡店命案的謝依涵。我很不解她為什麼殺死這對老夫婦，還能稱他們是乾爸爸、乾媽媽？犯下殺人罪後，為什麼看到我們，還能笑得如此爛爛地說：「謝謝妳們來看我！」當下我被她的舉動嚇了一大跳，回去後仍餘悸猶存，還得去尋求黃明鎮牧師的幫助。那天我去教會，

牧師問需要祈禱的人到前面來，當時我不自覺地就走向前，教會的長老們一看紛紛圍過來，瞭解我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何需要牧師替我祈禱。當時我對牧師說，我需要力量，不然做這件事工，我真的沒有辦法。牧師告訴我：「阿英姊，妳做這種事工，像這類病人妳沒有能力醫治她，唯有將她帶到上帝面前才有辦法醫治。」他又說：「妳要學會釋放自己，能做多少算多少，不然妳會受困而無法前進。」

我常笑說，我丈夫是讀法律的老先覺，刀槍不入，和黃牧師一樣，對於這種棘手的案例，都能應付自如，像我都快得憂鬱症了，真的很難過！慢慢地，我的角色從跟隨他，變成他的秘書、隨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做，絕對是「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到現在甚至可以陪著他一起去見死刑犯。】



一同接受訪問的張俊雄、朱阿英夫婦。

此外，我們也做針對受刑人家屬的關懷工作。許多受刑人家中，有十八歲以下的小孩，等於是家庭破碎。所以每逢聖誕節，我們也會徵詢受刑人的意願，假如他們願意的話，可以寫自己小孩的名字及住址，我們就會以他們的名義買點微薄的禮物送到他們家中，讓他們孩子感受到在監獄的父親，也一樣很想念、關心他們的。

【朱阿英：這個工作，是源自 1982 年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天使樹活動」，就是每當聖誕節時，教會會發給受刑人一張單子，請他們填寫自己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及家中地址，然後教會就會根據資料，分送禮物到他們孩子的手裡。我們基督教更生團契推動這項活動多年，做法是先由台北總會的義工將所有禮物整理好，再交由各地支援的教會負責分送到每一個孩子的家。像我住在高雄，就是負責高雄這個區塊。送禮物前，我們會先打電話聯繫。不過，一般來說，受刑人家屬就像驚弓之鳥，因為通常會找上門的，要嘛是受刑人的壞朋友，要嘛是來討債的，所以他們難免防備心會很重，一開始口氣大都不太好。

有一次我打電話到一個孩子的家中，對方劈頭吼道：「妳是誰？」通常我說是基督教更生團契的志工他們都聽不懂，我說我是教會的就聽得懂，對方又問：「那妳要幹嘛？」我說：「你兒子有禮物要送給你的孫子，你兒子叫作某某某……」他說：「哪有可能！我兒子被人關！」我說：「有，你兒子的名字是某某某，要送禮物給你孫子某某某。」他說：「哼，我才不會信，妳到底是誰？」我說：「不然你認識張俊雄嗎？」他說：「我知道啦！

他做過我們的立法委員！」我就把張俊雄拖下水，我說我是他太太，是教會的姊妹，你兒子因過失殺人，被判七年半，被關在澎湖監獄，殺的人是某某某，因為我講的都正確他才願意相信我。我又說你兒子的願望是，希望你的孫子在聖誕節可以收到一份禮物，這是你兒子送的。他說：「那要多少錢？」我說是教會出錢的，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父子間的關係好起來，我並請他轉告他孫子說，他爸爸送給他禮物，如果收到了，就寫封信謝謝爸爸。其實，按照過去的經驗，每個收到回信的受刑人都會感動不已。而透過這種方式，慢慢地受刑人與家人之間的親情都會修復。】

我的工作，原則上就是從宗教的角度，要求受刑人悔改，至於個案，雖然我是很資深的律師，但我從來不過問，不然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困擾。如果我覺得案情有爭議，就交給其他相關團體負責，我堅守不加過問的原則。我希望受刑人從內心真正地悔改，並且對受害者及家屬謙卑地道歉。我想，我的餘生就是要全心投入這份工作！

【朱阿英：最近我們遇到一位三十幾年的朋友楊先生，他說現在張院長雖然已經淡出政壇，但其實他在監獄所做的工作，對於我們民進黨是很大的加分。我想張院長是老律師出身，知名度也夠，又擅於演講，所以我就建議他朝這個方向走。】

當年我們追求的目標，包括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民選，甚至政黨輪替，都已達成。況且中華民國憲法實施至今，二十幾位行政院長當中，只有兩個人做過兩次，一位是陳誠，一位就是我。2008年卸下公職後，我認為政治應該要世代交替。所以當

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請我吃飯，要請我擔任黨公職，我都婉拒。我一直認為，我的餘生應當獻給上帝，專門去為那些被社會上唾棄、沒有希望的社會邊緣人服務！

天佑、天譴、天意是我的座右銘

許榮淑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林志晟

時間：2013年7月25日 14:30 - 17:30

地點：台北市青島東路3-2號3樓

（人民最大黨辦公室）

許榮淑，1939年生，屏東縣恆春人。幼年因疾致使視力受損，仍以優異成績考上台南師範大學家政系，並於就學期間結識張俊宏先生，隨後共結連理，與其夫投入《美麗島雜誌》社務工作，並親身經歷美麗島事件。後投入1980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順利當選，且連任多次。擔任立委期間，創辦《深耕》、《生根》等黨外雜誌，並接任FAPA台灣總會首任會長，亦為民進黨於圓山建黨時之宣誓代表人。2009年7月前往中國參加兩岸經貿論壇，被民進黨開除黨籍，同年創立人民最大黨，任黨主席。

我的成長背景

我是屏東縣恆春人，生於 1939 年 12 月 27 日，家中篤信基督教，為虔誠的教會家庭。父親從事教育工作，當過督學、校長，母親則從事裁縫工作。父母兩人都曾到日本留學，而我就是在日本懷胎，但返回台灣時為紀念母親學裁縫學校校名而把我命名為「榮子」。當時祖母經營了一家南源昌商店，在地方上遠近馳名，頗受各界敬重。

我家裡還有兩名雙胞胎妹妹，兩個弟弟，不過我們姊妹接連感染麻疹，高燒持續不退，不僅一位雙胞胎妹妹不幸於 5 歲時夭折；母親帶我前往屏東市醫治眼疾時，因爆發震驚全台的「二二八事件」，中途遂改往東港地區避難，以致無法順利就醫診療，造成視力嚴重受損，一眼幾近失明。

由於我的視力受到麻疹影響，遲遲無法復原，家中長輩憂心忡忡，經常利用上課時間帶我遍訪各地名醫，卻一次又一次無法得到滿意的診療效果，反而因為多次缺席課堂，造成課業成績始終無法提升。幸好明理的父親認為身體健康重於一切，好言勸我無須自責，養病為要。其實著名眼科醫師，並曾擔任《台灣時報》首任董事長的吳基福（1916 - 1985）先生就是我們的親戚，他從外國學成返台之後所醫治的第一位病患就是我。¹但與我同時感染麻疹的病患都陸續康復，我卻終究無法復原；後續也曾有一位

1. 吳基福是高雄旗山人，1946 年取得日本醫科大學博士學位後返台，創設高雄縣立旗山醫院，1950 年創辦全鎮醫療保險制度，開我國國民健康保險之先河。1953 年施行我國首次眼角膜移植手術成功。1969 年當選增補選立法委員，1971 年創辦《台灣時報》，擔任董事長兼發行人。參見「吳基福」，台灣大百科全書，<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363>。點閱日期：2013 年 8 月 8 日。

日本醫生應邀來台義診，母親特別帶我去試試，依舊未見成效。

說也巧合，後來有一位江湖郎中從我家門口經過時，告訴母親不必醫治我的眼疾了，因為我命中注定有此劫數，必定破相，才能存活，因此家裡就聽從這位算命師的說法，放棄替我治療眼疾。然而我雖然在校期間學業成績不是特別出色，也未曾補習，但畢業成績還算差強人意，所以學校老師紛紛鼓勵我繼續升學，父親則依然認為我的身體健康應重於其他事情，不希望我因為繼續求學而太過勞累。但我心想不妨一試，於是就開始準備升學事宜，學校師長也慷慨解囊讓想繼續升學的十餘位同學到屏東市去參加升學考試。沒想到結果只有我一位錄取屏東女中初中部，在恆春小鎮還轟動一時，還登上當時的報紙，13歲時就意外出名，這一切只能說是上天的巧妙安排。

我初中畢業後，父親建議我報考屏東師範學校，可是我的視力不佳，不符合應考資格，只能繼續念屏東女中高中部，並努力準備大學聯考。當時我選擇報考丙組，也就是現在的醫、農類組，擬訂第一志願為台灣大學護理系；而台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新成立的家政系，因與美國賓州大學建立交流合作關係，從師大畢業後就能出國深造，所以師大成為我的第二志願。聯考成績放榜後，我順利進入台灣師範大學讀書。不過當時社會氛圍普遍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如果讀到大學，或許會因為學歷過高，無法找到結婚對象。

我到師大就讀時，不用負擔太多學費，加上家中經濟小康，我算是班上同學裡頭家境較為富裕者，所以常常請班上同學吃點

小東西，交情也就日益深厚；由於當時讀大學的人數屈指可數，所以我大學還沒有畢業時，屏東女中校長就先寄聘書邀請我返鄉服務，不像現在流浪教師如此辛苦，必須四處奔波。當時師大規定畢業生需在教育界服務五年，所以我畢業後就返回母校屏東女中任教。

我從師大畢業後回到屏東女中任教，然後在 1967 年和張俊宏結婚，並且嫁雞隨雞，請調至台北服務；母親買了一間位於和平東路的公寓送給我當作嫁妝。由於母親送給我的公寓有五間房間，我和張俊宏使用一間作為主臥室，一間是書房，年幼的孩子合用一間，所以剩下一間是客房，餘下一間房間閒置，有時許信良等人來家裡時，就睡在空房裡。就當時的社會觀念而言，我 27 歲才嫁人，算是比較晚婚。我們後來育有四個子女，只有老二是男生。

說到我和張俊宏的認識經過，算是相當巧合。我就讀師大家政系時，張俊宏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念書，有一次他來參加師大屏東同鄉會活動時，我們兩人因緣際會認識，就開始交往。在這段期間內，我經常協助他搜集文獻，並督促他努力完成論文。後來他終於順利通過考試，拿到碩士學位。我用句比較開玩笑的說法，這個學位的光環應該分給我一半呢！

任職國民黨文工會

張俊宏取得碩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國國民黨文工會，許信良

則是在組工會服務。兩人都參加過革命實踐研究院，因而時有往來。其實張俊宏與許信良兩人個性迥異，竟然成為莫逆之交，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我印象所及，許信良說話常常結巴，有時還語無倫次，邏輯非常跳躍，與他的談話過程中想要一次就完全掌握他的語意並非易事，必須經過多次反覆思考，才能體會他的想法。有一次黃煌雄請我引薦他與許認識，但後來黃告訴我他實在無法理解許的說話內容；我則笑答說可能需要和他對話五次以上，才能稍微瞭解許的意思。藉由此例，不難想見許的口條猶有改進空間。不過，許的見解其實相當具有前瞻性，只是他看到的遠景有時不為他人所瞭解。

由於蔣經國提出「催台青」政策，希望培養台籍青年才俊，所以張俊宏與許信良、陳鼓應等人深受鼓勵，胸懷遠大理想，每日聚首討論如何推動相關工作，並積極投入《大學雜誌》的擴充改組工作。《大學雜誌》真正的工作人員並不多，雖然張俊宏擅長寫作及論述；許信良則給予論述方向；張紹文家有恆產，提供雜誌運作的經濟基礎；包奕宏則是時常關心刊物運作，但實際投身刊物發行人，是以何步正為主。

《大學雜誌》時期

當時為了節省經費，雜誌的辦公地點設在我家。我記得每當出刊之際，總是先由總編輯何步正在我家的餐桌上進行初步編輯工作後，再將文稿交給我幫忙校對，並由我的兩名子女協助後續

包裝。雖然《大學雜誌》的編委會中有楊國樞等人，不過他們只在開會時出現，並未參與實際的編務工作。有時與會者較多，但我們並不擔心這些人沒地方休息或討論。我印象所及，包括馬英九也曾來過我們家參加討論。

《大學雜誌》改組不久後，張俊宏及許信良等人發表了《台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書，受到台灣各界的矚目與重視，並引起美國國務院關注，進而邀請他們到美國訪問。因此，張俊宏就利用這個機會認真觀察美國國情。就在此時，張俊宏因接觸了美國社會的自由氛圍，對於台灣仍舊處於威權獨裁的政治體系深感憂慮，原本忠貞愛黨的思想已開始產生微妙變化。他雖然不願讓我知道他心中真正的想法，但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似乎也察覺他的轉變。

張俊宏從美國返台後，曾隱約向我提起有一位移居美國的陳姓民眾，商請他將一份錄音帶轉交給某人，結果錄音帶在機場入境時被海關查獲，他還必須寫一份報告向黨部說明此事。但是他對此事始終語焉不詳，我終究無法得知「錄音帶」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他後來整天和陳鼓應等人會商討論如何處理善後。我推測這份錄音帶應該與海外人權救援或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等敏感事情有所關聯。

張俊宏挾帶錄音帶返台一事，雖然在上司陳裕清（1918 - 1998）的力保下，總算化險為夷，但張因此滿懷歉意。他為了避免再度牽連無辜者，遂自己申請退黨，並將黨證寄還，不免讓長官陳裕清臉上無光。後來張俊宏轉和黨外領導者康寧祥接觸，開

始加入康的陣營。其實他退黨初期時整日眉頭深鎖，擔心工作沒有著落。

康寧祥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康寧祥於1972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的選前之夜，選擇在水門舉辦造勢活動，我和張俊宏也前往表達支持之意。我看到康在慷慨激昂陳述理想時，天空忽然降下傾盆大雨，康遂將遮雨棚拆除，與選民一起淋雨，並不斷重申他將和民眾並肩對抗國民黨的決心。此舉深受底下群眾的認同與肯定，場面極為感人。然而康於當晚演講結束後，猜想國民黨或將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形勢對他極為不利，所以當晚就寄宿我家，藉以躲避情治機關的追查。

而強調自己是「新生代」的許信良與包奕宏等人見狀後，不斷力勸李煥不應壓制民眾自主發起的群眾運動，否則一切努力將徒勞無功，甚至將影響民心向背。由事後的選舉結果來看，康能順利當選，顯示許信良等人的建言應受到黨政高層的重視與採用，否則在當時的威權統治環境下，國民黨掌握了國家機器，要從中操弄選舉結果殊為容易，康毫無當選的可能。

當時的黨外生態基本上是以康一人獨尊，眾人視他為黨外領袖，不過他缺乏組織化的觀念；而許信良等人或許因有參與青商會的經驗，比較具有組織化的想法；加上環境所限，如果缺乏整體選舉策略，缺乏後盾的黨外人士勢必無法競選成功，所以

許信良他們陸續將施啟揚（1935 -）、李鍾桂（1938 -）、柴松林（1934-）、張曼濤（1933 - 1981）、陳平景等人匯集於其麾下，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我曾聽過張曼濤似乎是國民黨派來的偵察人員的說法。日後張赴日留學，我一度想到日本探訪他，不過他已改名換姓，無法順利聯繫，只好作罷。

參選台北市議員落敗

受到許信良提出聯合陣線策略的影響，黨外陣營針對 1973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遂於萬華區提名康義雄、大安區提名張俊宏，另外還有陳怡榮、王昆和等四人作為黨外候選人，期能眾志成城，有所斬獲。他們的聯合陣線成為黨外陣營中第一個具有政團性質的團體。² 他們四人在選舉政見中公然提出：「何謂台獨？」的口號，造成情勢一度緊張，國民黨嚴陣以待。不過四人聯合陣線的選舉結果不盡理想，幾乎全軍覆沒，只有陳怡榮順利當選。據我側面瞭解，某人後來因故退出選舉，據說是受到國民黨以鉅額款項遊說所致。

張俊宏與康寧祥建立情誼後，受其鼓舞才在 1973 年競選台北市議員。但就我的認知來說，從他退黨並角逐台北市議員起，就是我們家中苦難生活的開端，例如他落選後，情治人員就不分日夜，24 小時全程監視我家的一舉一動；又或者某位曾任新店市市長的人士奉高層之命前來家中，意圖栽贓入罪，不過他被我

2. 1973 年台北市議員選舉的黨外四人聯合陣線為康義雄、王昆和、張俊宏及陳怡榮等四人。參見：<http://tw.myblog.yahoo.com/worldpeace-vision/article?mid=36&prev=37&l=f&id=6>，點閱日期：2013 年 8 月 8 日。

們的真誠所感動，才打消此意，我們陰錯陽差地逃過一劫。

1970年代的台灣政治形勢對黨外陣營逐漸有利，除了原即為國民黨黨員，後因爭取提名失利，乃自行宣布參選，故被稱為「四大寇」的許信良、蘇南成（1936 -）、洪昭男（1943 -）、曾文坡（1935 - 2002）等人；加上郭雨新呼籲黨外人士應該培育新血，所以栽培林義雄於宜蘭競選省議員，黨外選情日漸看漲。

轉戰南投省議員

在此種態勢下，張俊宏角逐台北市議員失利後，遂接受康寧祥的建議返回南投為參選第六屆台灣省議員提前暖身，預作準備。而來自桃園的黃玉嬌、嘉義的林樂善（1932 -）等人也都於此時乘機加入選戰。看到許信良、張俊宏等原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知識份子願意脫黨參選，康寧祥非常高興，認為他們有助於打破過去國人對於黨外只是一群草莽組成的迷思。

其實張俊宏返回南投參選前，自己知道因他長年在北部求學及工作，對於地方生態並不熟悉，加上曾經兩度擔任南投鎮鎮長的父親張慶沛也對此事不表支持；在種種資源缺乏的狀況下，早已做好落選的心理準備。果不其然，他回到南投籌備競選工作時，只有田秋堇、陳菊等人不遠千里由台北到南投襄助，其餘工作人員寥寥可數，選情堪慮。

不過萬萬沒想到曾任《大學雜誌》社長的陳少廷（1932 - 2012）寫了一本《政治蒼蠅的嘴臉》大肆詆毀張，且四處散播此

書，意外引起當地民眾反感，造成張的知名度水漲船高，一時之間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此外，張個人辯才無礙，長相體面，大家爭相參與他的演講會，希望能目睹本尊究竟是何方神聖，結果終於促成張俊宏高票當選。

其實我和陳少廷有同鄉之誼，與陳夫人也常有往來，對於陳怎麼會選擇在選舉時刊行這本小書一事，我心中也倍感訝異。可想而知，陳與張的關係自然勢如水火，兩人形同陌路，漸行漸遠。然就我自己的看法而言，這本小書應該是黨部要求陳少廷寫的。選舉結束後，勝選的張俊宏成為知名人物，陳少廷則承擔了一身的罵名，他自己也相當懊悔淌了這攤渾水才對，但我依然肯定他昔日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的努力與貢獻。

競選監察委員

在這段風起雲湧的歲月中，許多黨外運動的重要決策與結論都是在我家完成討論後，再由專人前往黃信介府上向他報告，並聆聽他的裁示。黃有一個優點，就是相當尊重大家的意見與想法。他總是笑瞇瞇地聽著大家送來的決議，只要沒有明顯錯誤，幾乎一律照准。黃生性寬容大度，是一位相當令人敬重的長者，特別是在關鍵時刻的指令很少出錯，著實令我衷心欽佩。

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由於黨外人士時常到我家中開會或聊天，都稱呼我為張太太，我也竭誠以待。日子久了，他們認為我相當貼心；加上我雖然有眼疾，不過記憶力還不差，把大家的電

話號碼背得滾瓜爛熟，所以經常替他們居中聯繫，深得眾人信任，周清玉還時常笑稱我比電腦還要可靠。因此，後來我被稱為省議會第七小組的黨外陣營徵召，要我競選 1978 年 12 月舉行的第一屆第二次增額監察委員，希望可以牽制國民黨提名的唯一女性監察委員候選人郭吳巧合，護送男性候選人張賢東（1936 - ）當選。我遂向當時任教的南門國中辦理相關請假手續，全心投入選戰，並由這些黨外人士帶我辦理登記手續。

由於當時國民黨提名的郭吳巧合是唯一的女性監察委員候選人，形成同額競選，只要獲得任何一位省議員的支持就能當選；但我參選後，她必須獲得兩票才能選上。而我能掌握的票數，除了張俊宏以外，我的妹婿廖泉裕（1938 - 2008）雖是國民黨籍省議員，但他向我保證必定會投給我，所以我至少擁有兩票。後來林義雄也表示他要將原先支持同為黨外陣營的張賢東的一票轉給我，我等同掌握了三票。換言之，郭吳巧合必須獲得四票以上才能勝選，顯示我的牽制發揮作用。可把張賢東護送上壘成功。黨外競選策略之運用，十分有智慧。

與此同時，黨外各級民意代表競選名單大致抵定，各候選人遂分成兩波助選團，一波往北，一波往南，四處替台灣各地的黨外候選人加油助選，最後在台中會師，我也隨著他們南征北討。這樣難得的經歷有助於我瞭解當時的台灣黨外政治運動概況，並與趙綉娃、傅文政（1942 - 2003）、蔡介雄（1939 - 1997）、邱連輝（1932 - 2010）等省議員結為好友。當時我雖然身為監察委員候選人，但我過去長期在杏壇服務，素無當眾公開演講的經驗，

因此張俊宏擬了一篇文章讓我背誦，要我在政見發表會或造勢場合中宣讀。還好我將文稿背得滾瓜爛熟，所以沒有出什麼差錯。

此外，還有一段插曲也值得一談。呂秀蓮原先想爭取立法委員提名，經過康寧祥的協調後，改由張德銘競選立法委員，呂則爭取國民大會代表。後來因為1978年「中」美斷交，蔣經國頒布緊急處分令，正在進行中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延期舉行，所有候選人停止一切競選活動。因此，這些候選人除了繼續要求儘速恢復選舉外，又組織了「中央民意代表候選人聯誼會」經常聚集，擅長唱歌的邱垂貞（1951-）就唱著「一隻鳥仔哮揪揪」等膾炙人口的歌曲替大家助選。不過，邱在美麗島事件時遭到殘酷的刑求。此外，聯誼會還出版了一本名曰《講不完的政見》的小書，而呂秀蓮也於此時開始嶄露頭角，展現政治才能。

1979年1月，發生高雄橋頭事件，張俊宏等人決定南下聲援余登發父子，並神色肅穆地對我說此行生死未卜，不曉得是否能夠安全回來，要我做好心理準備。幸好上天保佑，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他們都順利回到台北。橋頭事件平安落幕後，生性積極的許信良認為如果黨外沒有創辦雜誌作為發聲管道的話，黨外勢力會逐漸瓦解。張俊宏等人也認同許的建議，遂積極籌辦《美麗島》雜誌，並前往康寧祥處徵詢他的意見與看法。

然而事與願違，個性謹慎保守的康寧祥並不完全同意此事，所以他們就轉而請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出任社長，黃天福與呂秀蓮為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林義雄、姚嘉文則是法律顧問，陣容十分堅強。美麗島雜誌社遂於1979年開始正式運作。

《美麗島》雜誌與「美麗島事件」

經過一陣子緊鑼密鼓的籌備後，《美麗島》雜誌創刊號終於準備出版。這時許信良不斷強調應該要舉辦一個極其盛大的酒會宣傳此事，大家也都同意他的建議，於是決定在9月8日假台北市中泰賓館舉辦創刊酒會。由於我當時是監察委員候選人，必然要向與會群眾致意，因此也盛裝出席。但是沒有想到極右派的《疾風》雜誌社成員李勝峰（1953 -）等人在館外聚眾抗議，並向館內參與進行酒會的人士投擲石塊、電池等危險物品，此即所謂的中泰賓館事件。

其間王昇託人找我們出面和他溝通討論如何善後此事。可是我心想只有我一個人恐無法勝任，於是請許信良設法，最後由張俊宏、許及我三人前往和王昇會面討論，遂建議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由側門離開，避免爆發更嚴重的衝突，且讓衝突儘早落幕。隨後，王昇邀請我們三位吃飯，不過他在宴席間說話時，已透露出中泰賓館抗議一事，只是一個小小的警告。果不其然，在王昇的施壓下，許於茶會結束後不久就帶著家人出國進修了。我推想王一開始找我的原因，應該是我擔任教師多年，社會經歷與想法相對單純，所以他覺得我比其他黨外人士好應付所致。

其後，美麗島雜誌社無懼獨裁統治的壓力，依舊努力到各地舉辦活動，例如設立分社，舉辦座談會等等，希望藉此宣揚民主政治之可貴。唯此舉不見容於當政者，所以雙方關係更形劍拔弩張，頗有山雨欲來的情勢。直到12月9日那天爆發鼓山事件，兩造衝突情形更加嚴重。

由於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計畫在高雄舉辦遊行演講活動，但遲遲未獲得有關單位同意。經眾人商議後，特別是施明德及艾琳達的力排眾議，大家堅持照原訂計畫進行。此時，高雄方面的成員有鑑於鼓山事件的教訓，於是不停地打電話聯絡台北的相關人員，希望他們排除萬難，無論如何在 10 日要下來共同參與活動。

10 日清晨，張俊宏就開始聯絡相關人士，準備南下支援高雄方面。或許是上天眷顧，雖然國民黨政府已於往南沿途設下崗哨，戒備森嚴，企圖攔阻我們前往南部；又加上沒有司機願意冒險載我們到南部，無疑對我們形成莫大的障礙。然而我雖有眼疾，較少親自駕駛，卻沒想到前不久才透過陳鼓應夫人幫忙考取的駕照，意外於當天派上用場。張俊宏就要我開車送他及陳忠信（1949 - ）、張富忠到高雄參加活動。

我們四人會合後，就從台北直奔高雄。沿途如果遇到崗哨時，他們三人就低頭躲下，藉以逃避查緝。幸好沿路平安，沒有被攔下。等我們抵達時，已經接近晚上六點了。在從台北出發的旅途中，黃越欽（1941 - 2009）不斷地透過各種方式與我們聯繫，十萬火急地催促我們盡快趕往現場，並耳提面命地要我們謹慎小心，不要掉入國民黨設下的陷阱；未曾同行的包奕宏也一直提醒我們必須特別留心。我事後回想，自己的膽子還挺大的，沒有駕駛經驗，居然敢開長途。

我們抵達高雄時，黃越欽立即上前招呼我們，並告知施明德的隊伍已經出發，只有邱連輝還在現場準備。因此，我們立即從

後面趕往隊伍前端，希望勸說領頭的施明德等人將火把收起，避免被有心人利用或無辜肇生事端。在趕赴前面的途中，我看到許多流氓或者由國民黨喬裝的可疑份子，將路旁的鐵柵欄拔起來作為武器，與遊行隊伍發生暴力衝突；走到一半時，還看到邱連輝在路旁演講核能及環保問題。我後來聽說邱因聽聞黃越欽不斷強調此次遊行將釀風波，他及某些成員遂將原先由艾琳達準備的（披肩）三色彩帶收起來。

在隊伍行進的過程中，呂秀蓮不斷地向路旁的居民高聲呼籲，希望他們別漠視自己的權利，應該為了自己及全台灣人民挺身而出。她的聲調語氣慷慨激昂，加上口才流利，確實感動許多人，所以自發參與的群眾越來越多。等到我們抵達圓環的現場時，已經是人山人海，約有數萬人之譜。我也聽聞人在隊伍前端的施明德為保護群眾安全，前往警局和警方交涉。我記得康寧祥原先不打算出席這場遊行，但在高雄方面的積極邀請下，他不但打算自己親自前往，還上台演講呼籲鎮暴部隊退後，停止放催淚瓦斯。當時演講完的人就到圓環附近的咖啡廳休息。

在康寧祥等人演講的過程中，我就扮演「傳令兵」的角色。當時氣氛十分緊張與危急，我不斷地穿梭在鎮暴部隊及遊行群眾間，將所見所聞匯報給正在咖啡廳休息的康寧祥等人。沒想到後來鎮暴警察發射催淚瓦斯，一時群情激憤，就在大同路上和警方產生嚴重衝突，棍棒齊飛，我的腳也被踩了好幾次。不過可能是我初生之犢不畏虎，覺得自己只是無名小卒，警方應該不會對自己痛下毒手，所以也不怕發生意外，不停地在隊伍間穿梭來往。

等到群眾激情稍微退卻，鎮暴警察也離開後，在咖啡廳的黨外領導人士就開始討論要如何善後。這時，康寧祥率先發言，表示眾人應該離開高雄，轉往台南避禍，於是大家陸續出發，並住宿在台南。在前往台南的途中，張俊宏認為此次事件影響頗大，大家可能遭遇牢獄之災，康寧祥也十分擔憂黨外人士遭到逮捕。不過姚嘉文較為樂觀與天真，他覺得國民黨政府應該不會出手逮人。

隔天上午，我們很關心此事的後續發展，所以立刻到街上買報紙，探聽政府動態，但是報紙上的訊息異常平靜，對於昨天的事情隻字不提。因此，姚嘉文勸大家放心，應該沒事了，於是我們就驅車趕回台北。不過，天有不測風雲，我們回到台北後，才真正體驗到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與殘酷。我一回到家，就發現家裡周圍有情治人員日夜輪流看守，電視新聞也開始出現譴責暴力份子的說法。我們心知大事不妙，國民黨政府即將開始逮捕黨外人士。面對這種變化，姚嘉文提議到他家開會討論如何肆應後續發展，我也跟著參與，只是情治人員依舊如影隨形跟著我們。沒想到他們的動作非常迅速，立即於13日清晨展開全國同步的逮捕行動。

當時張俊宏和我因憂心不已，無法入眠，所以沒有更換睡衣，而我們的四歲么女就躺在我們兩人中間。13日清晨五點多時，約有二十餘位軍方及情治人員，分著軍裝及便衣衝進我家準備逮捕張俊宏，並高聲吆喝我們不准動。蜂擁而入的情治人員並不等張俊宏穿戴整齊，不僅隨即將張押解出門，也翻搜家中各

處，使得在我們家幫傭的老人家驚嚇不已。此時，我不但大聲斥責他們，要求他們不得任意裁臧；更竭力讓自己的情緒鎮靜，趁著情治人員不注意時，走到家中後方，用便條紙寫下康寧祥的電話放在準備上學的大女兒口袋內，請她藉由上課途中打電話通知康寧祥、王拓及姚嘉文等人。

康寧祥接到通知後，隨即轉通知其他有關人士，陳鼓應等人於十一點多時紛紛趕到我家確認情況，隨後又陸續傳出各地受害者名單，簡直哀鴻遍野。而王拓接到電話通知時，本想穿戴整齊要來我家探望張俊宏，但他一下樓就遭到逮捕。而姚嘉文則是好整以暇，穿著整齊後才讓調查局帶走。不過姚嘉文被調查局人員帶去「遊街」示眾，是所有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唯一一位被迫遊街示眾的苦主；呂秀蓮及陳菊兩人雖從雜誌社高樓一躍而下，依舊被捕；施明德則往屋沿順利逃脫，不過後來仍被找到。張俊宏等人被捕後，我們這些家屬四處奔走請託，希望吳三連等有力人士能夠提供奧援。

家屬處境與救援行動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張德銘拿著一份由他親擬的辯護律師名單來找我，希望我依照他的名單敦聘辯護律師。一開始他安排擅長理論的謝長廷及蘇貞昌兩人擔任張俊宏的辯護律師，不過某次在張德銘府上討論此事時，周清玉認為張的建議不妥，應由謝、蘇二人擔任姚嘉文的律師。由於我對張德銘提供的律師團名單不

熟悉，覺得由誰擔任律師差別不大，就同意和周清玉交換辯護律師，改由常到我們家的尤清替張俊宏辯護。經過一陣討論後，只有施明德一下子找不到適合辯護的律師。後來知道尤清與施為同學，所以交給尤辦了。

某日，我因體力不支，在周清玉家的客廳睡著，一驚醒時已下午六點多。因家中有許多從南部來的政治犯家屬等候我回家，所以我清醒後立刻趕回家中。當我七點多即將踏入家門時，范政祐的如夫人從陽台看到我，急得如熱鍋上螞蟻般，從陽台處大聲叫我不回家，有情治人員準備抓我。當我聽到這個警告後，急忙轉身離開。沒想到真的有警察正要走過來逮捕我，於是我就拔腿向外跑。

由於我當時剛學會開車不久，不擅在狹小巷弄中停放車，因此將車子停在杭州南路上，所以當警察開始追我時，我下意識就想往外跑到停車處開車。但我不曉得怎麼回事，我快跑到車子附近時，突然轉身跟警察握手，並請他們別抓我。這時警察也被我弄糊塗了，傻傻地矗立在原地，不知該怎麼回應。於是急忙開車，並打電話給關中溝通，算逃過一劫。

值得一提的是，在張俊宏等人被抓後，我家中時常收到騷擾電話，有時責罵我們是政治犯，破壞國家安全；有時是威脅口語，要我們準備好棺材盛裝自己的遺體；種種騷擾，不一而足。有一天，我數日未眠，卻再度接到這種電話，就怒氣沖沖地以極為粗鄙的字眼朝來電者破口大罵，並說我們所準備的棺材，是要抬去向總統府抗議的。我之所以會如此憤怒，是因為這些家屬每天在

我家中哭哭啼啼，愁雲慘霧，如楊青矗（1940 - ）的母親就多次向我哭訴楊的為人正直，國民黨政府十分可惡等等。

翌日，關中、黃越欽及康寧祥等人都來電關心，並勸我不要激動，要我有事慢慢說。由於我已經忘了昨日臭罵騷擾電話一事，所以初聽到他們的來話時，實在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後來回神，才發現原來我昨日的怒罵生效了，他們真的害怕我抬棺材去總統府抗議。因此，我心生一計，將計就計乾脆串連這些政治受難者家屬到總統府抗議。不過，家中隨時有人在錄音，我怕走漏消息，所以將想法寫在紙條上傳給家屬。這也是我日後與關中友好的原因，算來他救了我一條命。

隨後，黃信介打電話給我，表示立法院將收起保護傘，他隨時會被捕，要我努力勇敢扛起為美麗島受難者爭取清白與自由，以及照顧家屬的重責大任。我聽完後，不禁涕淚縱橫，也不曉得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擔起這份責任。但幸好我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在向上帝祈禱後，我擦乾眼淚，鼓舞自己永不退縮，一定要和可惡的國民黨政府力抗到底。

美麗島事件發生不久後，國民黨的相關人員不斷欺壓我們家屬，例如有一次我要去探望張俊宏，好不容易向校方辦理好請假手續，但監獄中的承辦人員卻翹著二郎腿，只顧著抽煙喝茶，四處裝忙，不願意幫我們申辦探視手續，所以我心中十分不悅。直到某日我再度去探訪，猶遭到此種不公平的待遇時，遂忍不住將報紙捲起後，用力擊向他們的桌子，並斥喝他們不配為公務人員，藉以表達我的憤怒；而在場的監獄人員看到也大吃一驚。



黃信介先生與許榮淑女士。（邱萬興 提供）

當我宣洩完怒氣後，知道此舉恐惹禍上身，後患無窮，引起許多不必要的困擾，所以我立即前往拜會林洋港，並表示是我先生犯罪，並不是我觸犯國法；我也告訴他我是公立學校的教師，算是廣義的公務人員，為何這些獄卒對我採取這種惡劣的態度？後來林向相關人員訓誡，告知他們「罪不及妻孥」的道理，要求他們善待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事情才有所改善。

幸好有林洋港出面主持正義，才讓我得以稍微緩口氣，否則原先我在校園時，不僅被校長賴晚鐘（1929 - ）要求我每日撰寫悔過書；全校也沒有任何一位師生敢和我私下往來，真是痛苦不堪。而賴晚鐘要求我寫悔過書一事，我認為自己沒有犯錯，堅持不寫；他則態度凌人，強逼我寫，兩造僵持不下。我在一怒之下，向他強調不用他操心，我自己會辦好辭職手續，結果他反而嚇一跳。最後，我放棄參選監察委員，並於出馬競選 1980 年的第一屆立法委員第三次增額選舉時才正式辭職。不過我始終沒想

到，我和賴晚鐘兩人竟然後來會同時競選立委，並雙雙當選。其實我們兩個關係算是比較密切，不僅同是師大校友，也是立法院同事。日後王金平、陳哲男（1941 - ）、廖福本（1938 - 2012）、賴晚鐘及我五人，曾被師大選為傑出校友。

當選增額立法委員

我在辭去台北市立南門國中的教職後，便轉而投入 1980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並於當時的第三選區，也就是中彰投選區參選。當時總共有七位黨外候選人參與這次選舉，不過沒有人願意和我聯合競選，我只好前往拜託張春男和我結盟，設立聯合陣線，沒想到他非常高興地同意這件事。他是個相當有正義感的人，並告訴我他會幫我跟周清玉製作廣播錄音帶，讓我們能夠順利參選。

張春男善於演講，造勢場合動輒數萬人專程前往聆聽他的演講；而拙於言語的我，沒想到反而因禍得福。因為大家認為張的演講魅力十足，不用擔心選票問題，應該將票投給不擅言詞的我，所以我意外當選，張卻落選。我記得最後一場造勢晚會時，現場來了五六萬人之眾，而時任張俊宏辯護律師的尤清也來到現場替我們加油。然因現場群眾太多，他無法從場外走進來，只能由民眾如同推球般地將他從場外推到講台上。他的學經歷豐富，長相又玉樹臨風，讓現場的黨外人士對其讚許不已，掌聲如雷。因此，我當選後不久，隨即要進行監察委員選舉時，余陳月瑛與

周滄淵遂邀我一起出面向張賢東協調，請其讓賢退出監察委員選舉，由尤清代表黨外出面競選，並獲得張首肯。

尤清神奇當選監察委員

當時尤清必須獲得五票以上，才有憑藉抽籤當選的機會。其中屬於黨外的票源部分，被視為黨外成員之一的蘇洪月嬌的一票已擬投給特定候選人；何春木雖然事先已與他人談妥，但經過尤的競選幹部不斷央求下，最後終於答應投給尤；傅文政及其妻趙綉娃兩人表示他們夫妻無論如何只能提供一票，另外一票必須投給特定人士，所以是「一票投給理想，一票投給現實」；再加上余陳月瑛、周滄淵及邱連輝三人，所以總共握有五票。

然就現實態勢而言，黨外人士再怎麼滿打滿算就是只有五票，這已經是黨外發揮最大團結效力的成果了。因此，我和高俊明牧師娘及一群關心黨外人士在省議會中不停地向上帝祈禱，希望上帝能夠展現神蹟，拯救台灣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投票結果著實出人意料。由於國民黨候選人內訌，造成張貴木（1936-）的票「一票兩投」，使得翁鈴只拿到四票意外落選，而由兩位無黨籍的尤清和周哲宇以五票當選，其餘他人則是以六票當選。³ 這種結果除了說是上天的旨意之外，找不到更好的解釋了！最有趣的是，尤清競選監察委員的費用大約不到新台幣兩千元，是用來搭乘台北至台中的火車車資，加上從台中到省議會的計程車費。尤清之所以搭乘計程車，是因為沒有人敢出面說要接

3. 尤清參選監察委員補選之經過，另可參見余陳月瑛，《余陳月瑛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2000），頁183-185。

送黨外人士，但他勝選後就有許多人爭相獻殷勤了。

尤清的勝選對黨外陣營是一大鼓舞，比我們自己勝選還要高興。因為當年連聲勢浩大的郭雨新在國民黨強力打壓下，都無法贏得監察委員一職，直到數十年後，才有第一位黨外監察委員出現。雖然周哲宇名義上也沒有黨籍，但他是由林洋港刻意安排的。就我自己的認知來說，尤清實具備擔任總統的能力，是個極為優秀的人才。說起來我們兩個算是遠親，他必須稱我一聲姑婆呢。

訴求台灣自決 多次當選立委

張俊宏因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後，我於1980年第一次出馬角逐立法委員，並順利當選，其後1983年的選舉也連任成功，但是競選過程可謂備嘗艱辛。因為公公堅持不讓我參選，我也就不便回去南投繼續造勢，只能選擇以大台中地區及彰化縣作為競選根據地。國民黨就乘機在南投地區廣發黑函，將我描繪成一個不孝的媳婦，只顧著自己的政治利益，全然不尊重公公及婆婆，以致我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局面。

幸好台中的名醫張深儒先生不斷鼓舞我，勉勵我必須為了台灣人勇敢往前邁進，絕對不能放棄，也幫我安排各項競選事務，我才能堅持參選到底，所以我相當尊敬張先生。經過艱苦的選戰後，我順利當選區域立委，並和當選監察委員的尤清於中中彰投四地分別成立五個聯合服務處。

我和尤清在台中第一個服務處成立的當天，所有相關的情治及政工單位都派員到場監視，甚至一度查封服務處，不過我們兩人一點也不畏懼。其後，國民黨政府對尤的監察委員身分投鼠忌器，因此後來仍讓我們陸續設立南投、台中縣，以及彰化與員林等服務處。我們總計在四地開設五個服務處。

我之所以能夠多次高票當選，其實與我提倡「台灣自決」有密切關係。由於在風雨飄搖的恐怖統治年代中，許多黨外人士心中雖然有著倡導台灣自決的想法與企圖，但礙於社會壓力，不敢輕易開口，甚至將政見上的台灣自決口號抹去，以求安全。可是我並不在乎國民黨政府的打壓，反而光明正大地在我的服務處寫著台灣自決，並且提出「自決，自決，自己的命運自己決定」的口號，替支持黨外的民眾吐露真實心聲。因此，我每次選舉都高呼這個口號，以爭取選民的認同，進而獲取他們的支持。特別是1989年舉辦的第一屆立法委員第六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我自行統計開票結果，共獲得21萬多票；雖然在關中的強力控制及干擾下，官方最後顯示的票數只有19萬多票。不過即便以19萬多張選票而言，仍能說明我獲得多數選民高度認可的事實。

外界稱呼我「鐵娘子」，是因為我無懼警總等情治單位的龐大壓力，依舊成立選民服務處；也和我創辦雜誌正面和國民黨交鋒，以及我在立法院常常發表犀利言論有關，以致國民黨轄下的輿論媒體經常圍剿我，但我依然堅強面對難關。因為這種大無畏的勇氣，與同時代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 1925 - 2013）作風頗為相似；而為了

凸顯個人特質，以利競選，所以黨外同志就送給我這個稱號，結果「鐵娘子」稱號從此不脛而走。

不過，我也有脆弱的時候，特別是每次我受到國民黨媒體的無理抨擊時，都會向義光教會的牧師們吐訴心聲，或是上台向教會裡的兄弟姐妹表達想法；但有一次他們居然拒絕我上台說話，讓我內心感到非常委屈及挫折，感覺自己孤立無援，所以我當場在聖殿中淚流不止。

我在立法院質詢國民黨官員時，底下常有國民黨籍未曾改選的老立法委員用鞋子敲打桌面發出噪音，或以高聲謾罵我是叛亂份子家屬的方式，企圖干擾我的質詢。後來，我主動在每週二、週五的立院聚餐時替老委員夾菜，希望緩頰彼此間的緊張關係。一開始他們具有強烈戒心，帶著異樣的眼光看著我，但時間久了，我們的關係越來越融洽，不僅相約看我如何罵國民黨，還私下稱許我講得對！

接觸「海外台獨」成立 FAPA 台灣總會

其實我對海外台獨人士並不熟悉，不過國民黨時時緊盯著我是否利用出國期間和台獨份子接觸，甚至還預先寫好逮捕公文，只要我一和相關人士有所互動，情治單位就準備立即抓人。事實上，我和張燦鎰（1936 - ）等人素不相識，只認識郭雨新而已。有一次記者問我怎麼都和台獨份子往來時，我只能向他們坦白說我實在不知道誰是台獨份子，是他們在各類台灣同鄉會活動時，

主動來和我握手致意；郭正昭教授也出面替我解圍，希望媒體不要亂扣我帽子。後來，我為求自保，每次參加海外同鄉會時，都會主動詢問台下是否以台灣鄉親身分歡迎我來演講？如果同意的話，請他們站起來表示歡迎，不然國民黨屢屢想找機會栽贓，污蔑我總是和台獨份子勾結往來。

我記得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和周清玉及顏尹謨到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作證，希望美國介入台灣遲遲未廢除戒嚴惡法的困境。在向美國國會說明的內容中，有一條是台灣應推動總統直選，被視為禁忌話題。而此條本為周清玉負責陳述，不過她臨時因故無法出面表述，只好由不諳英文的我硬著頭皮，把由美國台灣同鄉會提供的稿子逐一讀完，在旁的台灣同鄉們也為我捏了一把冷汗。雖然我的發音不甚正確，但當我逐條唸完後，仍獲得如雷掌聲，美國國會議員還稱讚我才是說出了台灣人的真正心聲。

不過在威權高壓的統治環境下，並不是每位黨外人士都願意站在第一線和國民黨對抗。如當時蔡同榮因名列黑名單無法返鄉，只好在美國全力推動 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相關活動，以爭取台灣獨立。當他想要將 FAPA 遷回台灣時，卻沒有人敢主動協助。最後蔡與彭明敏等人趁我訪美時請我幫忙此事，我遂義不容辭地接下這個重擔，並於結束訪美行程回台時，在機場宣布將成立 FAPA 台灣總會的想法，當時《民眾日報》也對此事大肆宣傳。

由於我有立法委員的言論免責權保護傘，在提出成立 FAPA 台灣總會後，我亦於立院開議時，向時任外交部部長的章孝嚴

(1942 -) 提出質詢，詢問他 FAPA 是否屬於台獨組織？同時，我也陳述我自己的立場，認為 FAPA 應該是遊說團體 (Lobby Group)，不宜混為一談。後來政府並沒有進一步打壓與干擾，所以我就正式成立 FAPA 台灣總會，並由我接任首任會長。這算是台獨運動的一大突破！

我認為章孝嚴在外交部長任內對我頗為尊重，我向他索取因涉入台獨而被列入黑名單的清單時，他多半盡力配合，並在能力範圍內予以解禁，所以我到現在還是跟他有良好互動。不過他擔任台商協會會長時，因自忖為蔣家後裔，未能親切與對岸合作，進而產生隔閡，以致於 2003 年兩岸首度春節包機時，他無法代表台商協會上台致詞。最後是由我居中折衝，才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衝突與麻煩。

「負債經營法」

由黃石城 (1935 -) 與尤清創辦的《深耕》⁴ 因經營不善，發行至第三期時已虧損一千多萬，所以他與尤清商議後，認為我是最適的接棒人選，就轉而徵詢我是否有意承接，我也表示同意。不過我在接手之前，就向他們兩人言明我當下無力解決債台高築的困境，他們兩人也爽快地說一切從零開始就好，不需要我去承擔之前的債務。於是我開始積極思考如何改善營運狀況，甚至連傳統的姓名學也列入考量。經某位姓名學老師建議後，我在

4. 《深耕雜誌》之發展經過，可參酌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 (1981.6-1983.2)〉，
《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5 期 (台北：2008.3)，頁 159-208。

耕字的井字中加上一點後成為井字，沒想到真的從第一期開始就賺錢。

一開始大家並不看好我發行雜誌一事，即連黨外大老康寧祥也十分狐疑，不但多次問我訂戶在哪？還勸我別太過天真，其實我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雜誌發行初期時我並沒有多餘資金，但創刊號的印刷費就要三十多萬，我只好將立委薪資六萬多全數投入外；還以一年原價六百特價五百的方式廣邀了一千多位訂戶，獲得五十餘萬的資金，用以應付初期所需各項資金。我戲稱這種方式為「負債經營法」。我必須感謝印刷廠老闆張榮華的協助，願意讓我開立三個月的支票，待我可以收齊現金後，先支付稿費與人事費，等到第三個月時再將前面兩期的利潤付給印刷廠，給我不少方便。整體說來，我辦雜誌不但沒有賠錢，還賺了不少錢，並且培養了不少新生代的菁英，增強黨外民主運動的生力軍。

林世煜與邱義仁

這系列雜誌中的要角包括了林世煜及邱義仁等人。林的個性非常強悍，有時看到不滿意的稿子，會將稿件揉爛後直接丟進垃圾桶。他曾直言我將深耕的耕字加上一點是迷信的行為。由於我對此事十分堅持，所以他也讓步。但整個發行過程中，他只讓了這一次，其他都是我聽從他的意見。

有一次我以三萬塊的高薪聘請林亞卿替《深耕》提供建言，但林世煜對林亞卿的建議並不認同，並且氣到拍桌，我只好私下

再請林吃飯，互相溝通。不過後來林世煜還是聽從林亞卿的建議，逐漸調整《深耕》不足處，因此《深耕》發行量蒸蒸日上。經由上述種種例子，不難想見林的個性十分倔強，但才華洋溢，是不可多得的才子。

而雜誌的另一靈魂人物邱義仁，原先是由許信良推薦給康寧祥，但康因故未能重用，於是許又多次打電話給我，向我再三強調一定要重用邱。面對許信良的要求，我十分為難，因為雜誌業務部分已無缺額，因此我就請他擔任我的司機兼助理，跟著我南北奔波。不過我們是一人開一趟，並非由他一人獨自承擔。由於他有肺病，所以他除了領助理費外，我還另外補貼給他五千塊錢。這也許是後來即便外界有人批評我時，他不曾開口說話的原因之一。

邱義仁相當擅長將各項資源串連在一起，成為一張緊密的資源網絡，特別是我下鄉進行選民服務時，他會替我詳細紀錄整個過程，並撰文發表在《深耕》，如此還可以領稿費，可謂一舉多得。然而《深耕》的分裂，也是因為他從美國帶回獨立思想，促使《深耕》內部產生質變，引發路線之爭，導致原任社長林正杰無法認同，遂自行另立門戶，創辦《前進周刊》。

至於眾所皆知的《深耕》「批康」風潮，並不是我所能掌握或主動策劃的。由於我每週末都必須下鄉進行選民服務，所以編輯群就定期在每週六上午，將幾篇可能遭到查扣或查禁的文章交給我做最後確認，以示尊重。我看完後覺得如果還在我的能力範圍內可以應付的話，就交給他們刊登發行。其後，他們可能為

求快速出刊，不免便宜行事，在未讓我看過或未授權的狀況下，刊載了幾篇引發爭議的文章。不過事已至此，責難他們也於事無補，只好自己出馬向這些「中槍」的人致歉。後來他們接連得罪了黃越欽、吳豐山等人，我逐漸招架不住，只得一再要求他們必須審慎行事。

雜誌分裂 邱義仁另創《新潮流》

《深耕》停刊後，邱義仁向我表示他為了不讓我繼續為難，將會篩選一些不具公職身分的人協助籌辦新刊物事宜，請我務必同意他的想法。而我的個性比較爽朗樂天，聽到邱的建議後，不疑有他，遂同意他的建議。於是他就利用《深耕》的基礎創辦了《新潮流》，但有近半的原《深耕》成員卻未被納入。當我得知此事後，隨即去找邱義仁瞭解整個經過。邱說這只是他們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一起繼續努力。而他們在找尋伙伴的過程中，採取民主投票的方式篩選參與成員。不過投票後，眾人都不願意接受林世煜加入，因此只能婉拒他。林被新潮流的成員拒絕一事，他也無能為力。林世煜獲知此事時，非常憤怒，不僅向我詢問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還拍桌怒吼道：「我被邱義仁出賣了，從此不參與政治了！」就此淡出《深耕》及政治活動。

邱義仁後來發現林退出編輯團隊茲事體大，所以來向我致歉，並再度說明他們另起爐灶的原因與意義，並建議我另辦《台灣廣場》，由于良騏任總編輯，以收容那些沒有被列入《新潮流》

的成員。不過沒想到甫接任總編輯職位的于良騏，在《台灣廣場》第二期時刊出一篇〈蔣經國給媽媽的一封信〉，引起軒然大波，並惹惱蔣經國，很可能造成國民黨政府準備對我下手，但沒想到恰巧發生江南事件，轉移了他們的焦點，我和于良騏變成「癬疥之疾」，從而逃過一劫。換言之，可以說陳啟禮（1941 - 2007）救了我一命。

《深耕》在多重因素交相影響下，被迫停刊，改名為《生根》；不過《生根》也遭遇許多麻煩，遂又更名為《伸根》，最後又異動成《台灣廣場》等名稱。雖然我的雜誌屢被查扣，但也讓我體會到台灣人民的善良，因為總是有無名氏將款項匯入指定專戶表達支持之意。順帶一提，當時稿費的算法普遍為一字四角，但《深耕》稿費優渥到一字一元。

事實上，林世煜及邱義仁兩人是因為對鄭南榕（1947 - 1989）的態度不同而埋下分裂的導火線；又加上林正杰與其他人的統獨理念不一，才導致《深耕》分裂進而走向停刊的命運。此外，當時又產生「雞兔分籠」的問題，致使黨外人士對《深耕》頗有微詞。雖然陳永興醫師曾設宴款待我們，藉以安撫眾人，但邱不以為然，還在席間高聲說：「砲口對內成名較快。」陳對邱的回應感到十分意外，以致大家對邱的信任感開始動搖。直到他後來被警總帶去約談數日後飭回，黨外人士才對他略微恢復信心。經過這些風波之後，我對經營雜誌一事感到意興闌珊，就把雜誌交給陳永興醫師接替主持。值得一提的是，我一直以開放心態經營雜誌，期許黨外雜誌可以相互合作，共同推動民主改革，

所以我還主動提供加班費，讓我的編輯成員前往其他黨外人士創辦的雜誌幫忙，希望改良它們的經營不善問題，並提出聯合辦公室的構想，但後來整合無效就作罷了。

創黨元老

1986年9月28日，「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二樓召開黨外候選人後援會，這時朱高正提案組黨，獲得在場黨外人士的熱烈響應，並由我代表宣誓。隨後，由時任立委的費希平召開記者會，向外界宣布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隨後我成為民主進步黨建黨十八人小組成員之一。因此，我算是民進黨創黨的主要元老之一，一度還因為蔣經國過世時，黨主席的姚嘉文在美洽公不及趕回，由我出任代理黨主席。



許榮淑女士（前排右二）於1986年圓山創黨會場。（邱萬興提供）

順帶一提，蔣經國過世時，我擔任黨的代理主席。在得知小蔣逝世的重大訊息後，我立即通知中常委及各重要黨外領袖到中央黨部召開中常會，商量應對之策。結果沒想到此時尚未辦理入黨的黃信介等人，被邱義仁擋在會議室門口。邱向他們表示他們並未入黨，不是黨員，所以沒有參與會議的資格。黃信介當下大吃一驚，只好立即辦理宣誓入黨，這讓我尷尬不已。可是平心而論，從此事看來，邱十分具有膽識與魄力，敢向黨外前輩提出質疑及挑戰。

意外被開除黨籍

不過，天有不測風雲，我於 2009 年前往中國參加兩岸經貿論壇時，一開始只是抱著善意前往瞭解中國，順便到香港辦理私事，卻沒想到意外釀成軒然大波。報紙說我和范振宗（1942-）曾回嗆民進黨黨中央，其實並無此事。我對此事深感委屈，因為同行者共 11 人，其他 9 位都擔任黨職，卻只有我和范兩人被開除黨籍。其後范覺得人格受辱，遂於黨中央在 7 月開鋤前自行宣布退黨；而我接到通知時則為時已晚。

坦白說，我也太大意，認為自己不僅是創黨宣誓代表人，也繳交過兩萬元的終身黨員黨費，黨中央應該不會對一位年事已高的創黨黨員開除黨籍，以致錯過黃金處理時間。我收到開除黨籍通知時，內心十分氣憤，也對民進黨感到灰心。回想過去我時常勸張俊宏說：「陳少廷栽培了你的政治生涯，如果沒有他，很難

有你。唯有採取此種樂觀態度，才能化解深植內心的心結。」因此，我自己現在也常說如果沒有蔡英文開除我的黨籍，怎麼會有「人民最大黨」的出現？甚至於 2009 年成立人民最大黨時，有五百多位群眾前來加入，表達支持，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人民最大黨」的最大特色就是跨越黨派門戶之見，允許黨員參加其他政黨，也不收黨費，全民都可以是我們的黨員，以柔性訴求爭取大家的認同與肯定。外界謠傳我接受共產黨的鉅額資助，或是我在中國經營企業等等，全是空穴來風，惡意中傷，我也無意辯解。我現在經營人民最大黨，鮮少向外募款，絕大多數是依靠我的老本。我開辦人民最大黨已四年，共花了我四千多萬，負擔相當沉重。事實上，我沒有主動頻繁前往中國，都是中國各界邀請我才前往與會，多數時間還是在台灣基層走動。其實我是很知天命的人，一生的座右銘是：「天佑、天譴、天意」，意即一切變化都是上帝的恩惠，特別是錢財乃身外之物，上帝要給我們的話，非常簡單就能獲得。我不斷告訴自己只要身體健康，就有希望及未來，其他無須特別在意。

2013 年才與張俊宏正式離婚

事實上，張俊宏非常大男人，他出獄後，對外界頻頻以「許榮淑委員的先生」的稱謂介紹感到極度不滿，我只好商請諸位朋友直接稱呼他前省議員張俊宏，別刻意強調立法委員的先生。無奈這種比較心結已造成，所以只要有人在聚會中提及夫以妻為

貴，他就受不了，回家後會無故發脾氣。而我因受到傳統文化影響，基本上相當尊重先生，心中並不以為意。後來才知他有個特務的外遇對象，因此借題發揮，以建立為惡的理論基礎罷了。

雖然我不曾插手張俊宏的生活私事，也不在乎他鮮少負擔家計重擔，但兩人的長期摩擦終究對家庭生活產生重大衝擊；加上他聯合外遇對象對我個人清白的污衊，更讓我無法接受。因此，直到今年年中，我們兩人才正式離婚，結束數十年的婚姻關係。幸好，在我的含辛茹苦下，一子三女不僅都拿到國外名校碩士學位，也十分孝順，孫子現在在美國讀書，我可能隨時當曾祖母了。而媳婦願意信奉基督教，也是因為看到我一路受到同黨同志或其他居心叵測之人的欺騙，仍能逢凶化吉，化險為夷，必有神蹟保護，所以願意受洗成為教徒。

與媽祖十分有緣

有趣的是，我雖是一位虔誠的教徒，媳婦也因為我的緣故成為信徒，但我和媽祖十分有緣。約三十年前，我到福州買了雕刻藝術品時，意外買到沉香雕成的媽祖神像，師傅還建議我前往湄州媽祖廟旅遊。沒想到湄州媽祖廟住持突然向我表示我領有媽祖令，是帶有天命之人，注定要幫助媽祖到台灣進行媽祖信仰交流，所以將媽祖令旗交給我，於是我也同意幫忙。所以我回到台灣後，立即透過管道聯繫時任省議員的曾蔡美佐（1945 - ），希望取得她的協助，惜因黨派之別未能成功。由於我是基督徒，對

於媽祖信仰所知有限，加以未獲得曾蔡美佐的幫忙，也不知道有其他媽祖廟能幫忙，不知從何下手，遂將此事擱下。

經過十多年後，我和友人到台南一間尚未正式對外開放的媽祖廟拜訪時，在與該廟黃姓住持聊天的過程中，突然驚覺答應湄州媽祖的事情尚未完成，於是立即聯絡友人，十萬火急地完成當年湄州媽祖廟住持交付的任務，並準備將媽祖令旗繳回湄州媽祖廟。沒想到約此同時，有另外一團從新店出發的媽祖廟也要將媽祖印信交回。媽祖的令旗與印信在冥冥中能夠不約而同地一起回到祖廟，只能說是造物者的奧妙安排。此外，在我將媽祖令旗放在地下室的這段期間，因蒐集紫砂壺、雞血石象牙、玉鐲作為投資工具，卻損失慘重，據說就是因為媽祖令旗麾下有許多天兵神將，所以吃光了我的俸祿。而曾蔡美佐後來遭到司法判刑，聽說也是因為沒有認真完成媽祖交付的工作。

在上述種種巧合影響下，即便我是虔誠的基督徒，仍不免認為有媽祖的存在。是以，在完成繳交媽祖令旗的承諾後，我也參與了許多次媽祖的相關工作，如彰化知名的南瑤宮一度面臨被拆除的命運，是我出面與有關單位交涉才獲得保留；我也曾經捐了十九尊檀香刻成的媽祖神像給惟覺法師（1928 - ）收藏。

從黨外小妹到直轄市長

陳菊女士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彭孟濤

時間：2013年7月16日 16:00 - 18:30

地點：高雄市政府市長室

陳菊，1950年生於宜蘭縣三星鄉的農家，世新專科學校畢業。大學時期因為家族的緣故，成為郭雨新的秘書。透過長期建立的人脈網絡，將台灣被封鎖的民主運動資訊傳遞到海外，並從事島內政治犯的救援工作，也因此被國民黨鎮定，1978年第一次被警總逮捕，次年又因美麗島事件二度被捕。1986年假釋出獄後成為組黨十人小組、十八人小組一員。民進黨成立後，在黨內先後擔任中評委、中常委等職。2006年當選高雄市長，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後的首次選舉，陳菊以過半的高票當選首任大高雄市長。

出生三星平凡農家

我於 1950 年出生在宜蘭縣三星鄉。據我所知，我的家族世世代代都住在三星。我阿公的年代是做佃農，不過因為克勤克儉的努力，有了點積蓄，後來就買田自己耕作。我記得小時候家中有十四甲的土地，農忙時非常辛苦。由於我阿公的年代很重男輕女，所以我姑姑很小的時候就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因為他們覺得養女兒沒用，自己的女兒是別人家的「媳婦仔」。當時這種觀念在鄉下很普遍，因此包括我的大伯母、二伯母及我母親也是「媳婦仔」。

我家是典型的大家族，阿公是家中的掌權者。由於我阿公、父親累積不少田產，所以我這一代基本上生活無虞，而且家族在家鄉也頗受敬重。我家雖擁有十四甲田地，但並非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而是屬於自耕農，所以我伯父等親戚都必須下田耕作。我的家族共有三、四十人，大概到我高中時才分家。早期與伯父母、堂兄弟姐妹們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由於家族重男輕女，女孩子讀書不被鼓勵，彷彿男孩子讀書是應該的，而女孩子本來就不該讀書，所以我記得堂姊們多半只有小學畢業，之後就得靠自己努力，並未得到家中用心的栽培。至於我則受我二伯的兒子，亦即堂兄的影響較大。因為他書讀得不錯，讓我覺得為何我不能念書？後來分家後，我的父母較有自主權，所以我就能自由地讀書，不受家中傳統觀念的限制。不過我從小讀書不算在行，我的父母也沒給我什麼壓力，有時我考了第一名，也很少引起家人的關心。值得一提的是，我人緣不錯，無論是和鄰居、同學，還是

和家中長工、鄉親父老都能相處融洽，還有人形容我是天生外交命。

總之，我自幼生長在一個平凡樸實的農家，雖稱不上富庶，但衣食無缺。到了1960年代，由於台灣農村日益沒落的關係，家中田越多就代表越辛苦，畢竟務農很難賺錢，所以家中便希望我去當小學老師，因為老師這個職業在三星很受到尊重。我記得我小學一年級的老師對我很照顧，她經常勸我母親要讓我升學，而我的家人都很尊重我的老師，因此對我有些期望，希望我當老師。從三星初中畢業後，我雖然有報考花蓮師範，但因為沒有認真準備，因此也沒考取。大致說來，我的求學過程很普通，成績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壞。後來我的堂兄到台北讀書、到台中讀大學，使我很羨慕。他們在外地求學時帶回不少讀物，所以我以前就看過很多小說，也讀過一些柏楊和李敖的著作。

我自己沒有親哥哥。原本有個哥哥，但他剛出生不久就去世了。我還有一位大姊。我父親當年被徵召到南洋當七年的日本兵，當兵前由於家族認為我們這房沒有男生，所以我二伯就把他的兒子過繼到我們這房，就是我那位堂兄。我家一共有五個兄弟姊妹，除了我上頭的大姊以外，底下還有武進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分家後，過繼到我家的堂兄，雖然有分到一部分財產，但後來和我們的關係變得不大親密。

我高中時本來就讀羅東高中，但後來因為頭城高中比較重視體育，而我初中的體育成績還不錯，所以就進到頭城高中。因為我運動細胞發達，參加縣運等運動會都有不錯的表現，雖說不

曾想過要當運動選手，但每次參加運動會，看到運動員瀟灑的模樣，還是讓我相當羨慕，不過後來讀高中，看了很多雜書，就覺得自己並沒有很想成為職業運動員，所以後來就沒有致力於運動方面的發展。而我的高中生活也就這樣平順地度過。

我高中時，家族分家，每房約分得三、四甲土地，但務農真的很辛苦，所以我父母比較期待我當老師。不過我自認從小就不是努力向學的人。我記得大學第一次考取文化，但我父親要我重考，沒想到越考越差。這恐怕是因為沒有補習的關係。而當時我對自己的人生其實也沒什麼規劃。我想這段時期對我影響較大的是我父親。我父親生性善良，他雖到南洋當了七年日本兵，但返家後他幾乎不曾告訴我們當兵的艱苦，只有一直告訴我們他都不敢殺人，所以才能平安回到故鄉。

後來我到世新專科學校念書時，家境已不如往昔，畢竟以農為業不容易賺錢，所以家裡的人，尤其是我母親不太希望我讀書，而是希望我能找份工作來貼補家用。不過在那段期間，我的小學老師及堂兄給我不少鼓勵，父親與三姑也給我很多支持，讓我能順利完成學業。

擔任郭雨新秘書

我人生中最大的轉變，莫過於成為郭雨新¹的秘書。我的家庭是一個平凡的農家，我的阿公、伯父及家族，很自然地就支持郭雨新。其實在我生長的那個年代，宜蘭的三歲小孩都認識郭雨

新。當地人都曉得「郭雨新的春牛圖」，這是他每年農曆春節時家家戶戶分送的文宣。郭雨新在宜蘭擁有很高的民間聲望，大家對他很崇拜，也非常尊敬。記得每次省議員選舉，他幾乎都是最高票當選。我的家族坦白說就是他的支持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他的「樁腳」。我還記得，我家是郭雨新在三星的一個據點，選舉期間，我家都會炒米粉，請那些來家中聽郭雨新開講的左右鄰居、支持群眾用餐。

這段期間有個人很重要，人稱「鱸鰻叔」，他是我的鄰居，與我父親從小結識。我記得郭雨新每次到我家，那個人都會跟在身邊。大約是我到台北一年之後，當時郭先生有位秘書突然辭職。由於郭先生在議會的相關工作，都有省議會的專業助理協助，但郭先生在北市農安街的住所，平常會有非常多好比民眾陳情的書信寄來，從前都是由這位秘書負責，而他離職了；過年時，郭先生和鱸鰻叔在我家聊天，他們聊到這件事，便對我說：「既然妳在台北，如果禮拜六、禮拜天有時間，就來我這裡幫忙。」他會找我，可能是覺得樁腳的女兒值得信任的關係。當時我想，我一點政治意識都沒有，或許文筆還算流暢，就這樣在因緣際會下，我到了郭先生農安街的家中幫忙。

-
1. 郭雨新（1908-1985），宜蘭人。1934年台北帝國大學農林專門部畢業，1934年至1939年間任職林本源興殖株式會社。1940年年赴上海經營新泰宏洋行，1946年回台。1947年至1949年任職台灣省茶葉公司，1949年至1951年任台灣省參議員，1951年起至1971年任台灣省臨時省議員、四屆省議員。任內關切促進合作組織設立加強農產運銷、人權問題等相關議題，1960年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後成為新舊世代反對運動人士的聯繫者。1972年棄選省議員，1973年參選監察委員以零票落選。1975年競選增額立法委員，因遭作票致落選，1977年獲准離台赴美。1979年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訴求台灣政治步向民主。著有《青果紀事》。參見任育德撰，〈郭雨新〉，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8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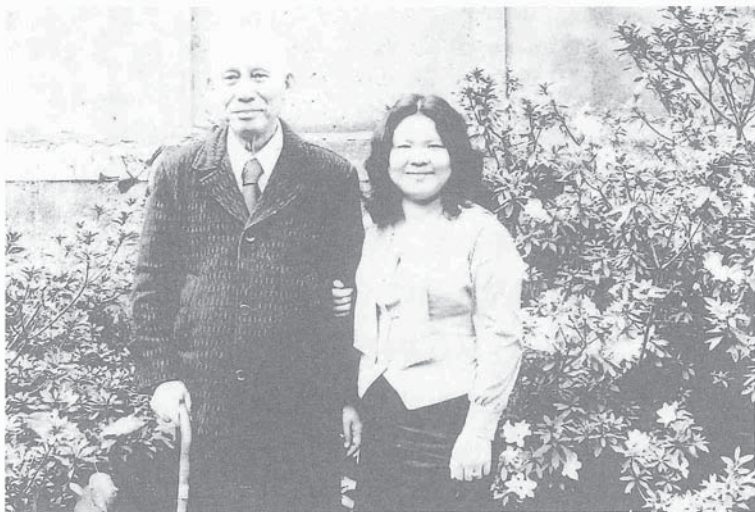
郭先生家中有位八、九十歲的阿嬤（郭雨新的母親），還有他太太，及較小的兒子郭時南等人，而我等於是他家的小妹一樣。有客人來，我負責招呼，平時就負責整理書信，他真的有非常多的書信，我就坐在他客廳的辦公桌前整理。而我就在那裡認識了田爸爸（田朝明）和田媽媽（田孟淑），田爸爸是郭先生的家庭醫師，就住在雙城街和農安街交叉口，他們來的時候就坐在客廳聊天，並且每次都把收音機打開，開收音機的用意是為了防止情治單位的竊聽。我在那裡還認識了雷震、余登發，可以說當時所有黨外人士我沒有不認識的，他們常在郭先生家中進出。

當時我每週六、日到郭先生家中幫忙，郭先生是基督徒，每週日都會去帶阿嬤一起教會做禮拜，而我會送他們到門口，並牽著阿嬤的手。有一回我突然發現，當郭先生的車子開走，對面的鑽石大飯店有輛車居然跟在郭先生的車子後面。我在郭先生家幫忙時，他總是叮嚀我：「囡仔人有耳無嘴。」此外郭先生家中的電話是被錄音的，所以他也吩咐我要謹慎。而我看到有人跟蹤郭先生，就覺得發現新大陸一般，等他做禮拜回來，就立刻把有人跟蹤他的情況向他稟報，他聽完只問我一句：「妳會怕嗎？」其實，我當時根本沒想到怕不怕的問題，而是不知道要怕什麼？於是我當下回答：「我不怕！」郭先生聽了之後說：「妳不怕很好！強將之下無弱兵！」他的意思是叫我不怕。自從知道他被人跟蹤，以後郭先生的進出我都會特別觀察周遭。

在這樣的環境下，讓我知道，我的成長過程就是一直處在被監視、跟蹤、錄音的狀態中。這對我人生影響很大，我的一生從



陳菊女士與郭雨新先生合影。(邱萬興 提供)



陳菊女士與雷震先生合影。(邱萬興 提供)

未接觸過這個以外的世界，我就在那樣的環境中長大成人，也在那裡認識了黃華、顏明聖、楊金海等黨外人士，使我的一生很不一樣，好壞不知道，就是異於常人，然後也使我的心境在年輕時就被迫變得老成，因為我瞭解太多黨外的事情。例如郭先生和雷震先生要會面，我都會負責到雷先生家通知見面時間。此外，他和立法委員齊世英（1899 - 1987）很要好；還有與青年黨的朱文伯（1904 - 1985）也很要好，他辦了《民主潮》，是我年輕時經常閱讀的刊物。這些人時常來郭先生家中聊天，我都坐在客廳沙發後的辦公桌前聽他們講話，所以我好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他們談論很多事，但我都守口如瓶。他們看我這個鄉下來的囡仔憨憨的，什麼都不懂，郭先生也覺得我很乖，對阿嬤很孝順，信件都整理得很好，也會幫忙回信。總之這段每週六、日到郭先生家中幫忙的經歷造成我不一樣的人生，而我回家也不會和我父母說這些事，我的家族都對郭先生非常尊重。

黨外的小妹

後來郭先生的政治事業陷入不順利的情況，參加監察委員選舉失利，在立法委員參選與否之間掙扎著，我看得出來他那時非常痛苦於做出抉擇。後來，他終於決定參與 1975 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他的選區很大，涵蓋基隆市、台北縣和宜蘭縣，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充分感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與壓迫。而郭先生最後決定要參選的原因，似乎與他前一天去拜訪吳三連先生有關。吳三連先生是郭先生很尊敬的前輩，他對郭先生任何階段的決定都

有很大的影響力，無論是 1973 年的監察委員選舉，還是 1975 年的立法委員增額選舉，我想郭先生在做人生重大決定時，通常會找吳三連先生與齊世英先生商量。

當時，田爸爸的女兒田秋堇在台大哲學系就讀，由於年齡相仿，而且在同樣的環境中長大，因此我們很自然地就彼此認識，成為很要好的姊妹。因為秋堇的關係，我們認識了一群台大的學生，包括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謝明達、蕭裕珍、周弘憲、周婉窈（1956 - ）等所謂「黨外新生代」。因為郭先生要參選立法委員，國民黨就在宜蘭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他，所以我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假如能夠由這群台大學生穿著台大的制服為郭先生發傳單，應能大大提升郭先生的正面形象，於是我便帶他們到宜蘭發傳單。結果我們到宜蘭時，發現警察竟然亦步亦趨，跟在我們後面，非常恐怖，對學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我想郭先生的參選，大概對邱義仁、田秋堇、吳乃德等人都造成很大的影響，當時包括林正杰、范巽綠等東海大學畢業的年輕學生也加入我們助選的行列。

後來這群年輕人因為我的關係，慢慢地認識郭先生，其中也包括康寧祥。康寧祥後來創辦《台灣政論》，我還記得，當時我、謝明達、周弘憲、林正杰等年輕人常到《台灣政論》的編輯部，也就是姚嘉文的住所，編輯部在姚雨靜的房間。每期《台灣政論》一推出，馬上就銷售一空，因此那段期間大家都覺得很振奮，彷彿看到了希望，不過我們大概都沒去細想接下來可能會遭到怎樣的打壓。

當時，我們還特別安排雷震先生與許信良見面。1977年許信良脫黨參選桃園縣長，我記得我當時看過雷先生寫給許信良的一封信，裡頭有一句鼓勵的話「無黨一身輕」，讓我印象深刻。那時許信良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雷先生希望和許信良見面，於是我就帶許信良、林正杰、張富忠、田秋堇等人到雷先生第二個太太位於松江路的居所，與雷先生一起吃飯，那是一個很愉快的聚會，但出來之後我們每個人都被跟蹤。此外，郭先生要與雷先生見面時，不會利用電話通知，而是透過我以跑腿方式傳口信，那時警總大概也以為我只是猴死困仔，所以也不那麼重視我的行蹤。我記得我到雷震家，只要一開始按門鈴，對面監視他的警總人員馬上就知道，然後拍照存證。所以後來我學會從雷先生家旁邊的一個麵店轉進他家，包括日後我帶三宅清子及日本的人權工作者也都是從那邊進去，若從正門進出，絕對會被監視。回憶這些過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總之我從那個階段開始，大概就註定了一生要和這些黨外人士在一起，我沒有什麼選擇，包括那時《台灣政論》大大小小的事，需要人負責串連，把張俊宏、老康（康寧祥）等人結合在一起，我想我就是扮演那個角色的人，可以說我是黨外的小妹！

救援政治犯

1977年郭雨新出國後，我們心中已預感郭先生大概不會再回來了。事實上當時郭先生的政治事業被打壓得很厲害，郭伯母已經先前往美國，然後郭先生才跟著出國，我和老康、姚嘉文、

張俊宏到機場送行時，就感覺我大概不會再見到他了。郭先生出國後，海外台獨運動及台灣黨外活動也變得越來越蓬勃。1977年，台灣舉辦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我們這群黨外新生代也加入黨外候選人的助選陣容，邱義仁在雲林蘇洪月嬌競選總部幫忙，我和賀端蕃等人在南投幫助張俊宏，林正杰、范巽綠在中壢幫許信良，田秋堇、蕭裕珍在宜蘭。後來發生「中壢事件」²，我們每天都互相打電話聯繫，有說不出的興奮，當時大家每天好像都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

當時我們認識不少在台灣的美國人，也因為艾琳達的因素，認識了美軍顧問團，所以當時我們便透過他們，設法將台灣各種資訊傳送到國外，在日本就寄給黃昭堂（1932 - 2011）、三宅清子、Lynn Miles 等人。也透過美國從事人權運動者，把資料寄到美國。包括雷先生的若干回憶錄，也藉由郭先生當時的家傳到海外，不過後來在海外的處理情況，我就不大清楚了。當時還有一些資料，我們也寄給在香港創辦《七十年代》的李怡（1936 - ）。我記得當時我們竭盡所能地從雷先生家中搬資料，並把它們寄送到海外。至於在政治犯救援工作上，我想日本的黃昭堂及羅福全

2. 1977年11月19日舉行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其中桃園發生多起選務人員舞弊事件引起民眾不滿，而引發中壢事件。當時，特別是中壢國小投票所的主任檢察員范姜新林，更被直接點名涉嫌妨礙投票及舞弊。由於抗議群眾不滿警方處理方式，最後演變成為大批群眾火燒警察局事件，直到選務機關正式宣布原屬國民黨違紀參選的許信良當選桃園縣長，事件才告平息。由於在此一事件中，國民黨當局並未強力驅散抗議的大規模群眾，使得台灣反對運動的群眾路線開始受到政治人物的重視。而在此一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內部也發生重大的權力改組，原本為蔣經國左右手之一的李煥，失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民黨組工會三大主任的職位，退出政壇的第一線。相對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在此一事件之後，更為蔣經國所倚重，因此當時有所謂「李換（煥）王升（昇）」之說。參見薛化元撰，〈中壢事件〉，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154。

天晚上，國民黨軍警所使用的催淚瓦斯已經瀰漫到雜誌社裡，因為美麗島雜誌社就位於中山一路與大同二路口，那時我接到美國打來的電話，我記得後來我向對方說：「我已經沒辦法講電話了，瓦斯味道很嗆鼻！」我1986年出獄，1987年到美國聖地牙哥時，他們還留有當年的錄音資料。總之美麗島時期，就是透過「台灣之音」，將台灣的重大消息即時地傳送到海外。

第一次被捕的經過

那時我們不但將很多雷先生的重要文件送到國外，而且也蒐集不少政治犯的家書及名單，並設法寄到海外。其實我們對海外的台灣人及人權團體不夠清楚，例如我很早就認識黃昭堂，雖不曾見過面，但我常寄東西給他。當時我只是盡可能地把台灣的訊息讓海外瞭解，我其實不知道也不認為自己是做什麼禁忌的事。直到1978年有一天，我突然發覺自己被警總特務跟蹤。我當時在青田街租房子，他們居然在深夜到我屋內進行搜索，翻箱倒櫃，意外搜出不少「反動書籍」、政治事件資料與跟海外聯繫的信件，不過他們沒有立即逮捕我，只是開始跟蹤，所以我第一時間就去找姚嘉文求救。我告訴姚律師說我出事了，姚嘉文因為正要去開庭，所以就載我一起去法庭，同時要我轉達秋堇，趕緊與他聯繫。

姚嘉文開庭時，我就在一間他安排的休息室內等待，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秋堇過來，情急之下我便趕忙跑到台大羅斯福路

附近去找她，在那邊也有我們認識的一群美國朋友。到了之後，我告訴他們我出事了，並請她趕快去找我的神父，同時也請美國朋友通知美國大使館，於是他們便分頭展開。後來，天主教 San Marino 教會有一位神父來保護我，並負責載我到台中另外一位 San Marino 教會的神父那邊，然後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的郭佳信神父開車來接我，並安排我住在教堂後面修女院的房間。天主教 San Marino 教會比較激進、進步，和弱勢的人民站在一起，在北美洲和左派較接近。他們的神父為了在台灣各地服務，都會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或台語。那位郭神父現在已經八十幾歲，我們至今仍有聯繫，他每次回來台灣時，他過去的學生、所收養的小孩都會主動聯絡我，我都會邀請他們來高雄作客。

在我躲進修女院的同時，警總也對我展開全面通緝。郭神父收養很多貧困的孩子，其中一位有點智能不足的小女孩，無意間讓警察得知我就住在那裡，所以大概隔天天主堂就被大批特務團團包圍。他們不停地敲擊房門要我開門，我說神父來我才要開門，據我所知，當時神父跪在教堂，我想他大概也知道這一天總是會來臨。過了一、兩個鐘頭，神父終於進來，他當時語帶哽咽地對我說，他知道我一出去就會被逮捕，他有為我祈禱，也有打電話通知美國大使館，反正就是講一些安慰我的話，而我也向神父交待一些事情。我和神父談完後，神父一出門，我就立刻被抓起來，神父眼見特務的粗暴動作，還在旁邊大聲斥責：「怎麼可以對女孩子這樣！」那時台灣的高速公路可能剛建好，所以我記得我被逮捕後是從彰化上高速公路，一路開到台北博愛路的警備總部。

我在警總被監禁十三天，在這段期間他們不斷追問我他們搜獲的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我想我當時已有了至少會被判十年的心理準備，不料最後他們卻以我年少無知、誤入歧途的理由而把我釋放。但後來美國大使館的人才告訴我真相，原來是美國政府用售台武器換回我的自由的。我第一次被捕時，在美國的郭先生和許多在海外長期聯繫的人權團體的好朋友，都盡力營救，真沒想到過去從事政治犯救援工作的自己，有一天也會被別人救援！當然被關押的這十三天，是對我個人人生的一大考驗。我記得我父親將我交保後，一直求我從此不要再管政治，他還說我們家族幾代以來沒人管政治，怎麼會突然出了一個像我這樣叛逆的女兒，而我今天出事，當然會使我家族承受很大的恐懼與壓力。其實我當時也對父母很過意不去，所以獲釋後，我曾一度對前途感到迷惘，不知該何去何從。

然而，我從小就在黨外的環境中長大，我的人生除了和這群人在一起之外，完全沒有和其他人共事的經驗。雖然在美國的郭先生曾建議我出國念書，讓自己清靜一下，但那時正值海外台灣人紛爭最嚴重的時候，郭先生和海外台獨團體的關係相當對立，如果我選擇此時出國，恐怕會使我在海外過得跟在台灣一樣痛苦，因為面對海外台灣人的互相鬥爭、攻擊，我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邊？海外台獨運動當然沒問題，但郭先生當時自認還有機會返回台灣，所以他使用海外台灣人的民主運動的名義，結果卻遭到張金策（1943 - ）等人公開批判為妥協派。對我來說，我實在不願捲入海外台灣人的紛爭當中。

美麗島事件二度被捕

島內的《美麗島雜誌》開始發行時，施明德請我趕快回來幫忙，於是我回台沒多久就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編輯委員與高雄市服務處副主任。早在美麗島事件前，我就將我的戶籍遷到高雄施明德三哥施明雄的家。雖然當時我不知道會不會投身選舉，但Nori（施明德）那時的用意或許是希望我藉此把南台灣顧好吧！後來發生美麗島事件，我二度被捕。因為已有第一次被捕的經驗，所以這次我變得比較從容，無所畏懼。

我被捕後，最初被關在景美的軍法看守所，因為他們還在繼續抓人，兩三天後我們就全數被移送到安坑的調查站。我記得有一天我聽到有人喊肚子痛，一聽聲音我就知道是姚嘉文，後來我也聽到陳忠信等人的聲音，才知他們也被關在這裡。其實那時我根本不曉得安坑調查站長什麼樣子，因為我們被押解時，除了手銬加身外，臉上都被罩上一層眼罩。在安坑整整關了兩個月後，才被押往景美看守所，前後加起來大概住了六、七個月，包括判刑以後還是住在那裡。這段過程對我而言無非又是人生另外一段刻骨銘心、痛苦不已的歲月。我們回到景美看守所後不久，就被依「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到軍法審判則被處以十二年有期徒刑。我想美麗島八位受刑人大概就數我最年輕。

關於被捕的經過與美麗島大審的過程，我想一般人也許都略知一二。但我想強調的是，在那期間對我們最大的衝擊，莫過於二二八的「林宅血案」³，尤其是在第一時間，我們居然沒能知道這個慘絕人寰的悲劇。畢竟在坐牢時，外界的一切訊息完全被封

鎖，既不能看報紙，也不得聽收音機，僅被監禁在小小的牢房中，每天一大早就被提出去接受疲勞審訊而已。

我記得林宅血案的前一天的2月27日，我們第一次獲准接見，我的家人來探望我，在我隔壁剛好是義雄兄。當天義雄兄的太太和妹妹帶著義雄兄的母親來看他，隔著玻璃我還與義雄兄打招呼。在我接見完被帶回看守所牢房時，我聽見林義雄的母親離開前一直喊道：「我兒子是冤枉的！我兒子是冤枉的！」不幸的是，隔天開庭就發生林宅血案，然而當時我們卻完全不知道。後來有一天，我收到他們送進牢房的起訴書和開庭通知書，突然發現林義雄寫著保外，當下我雖然覺得納悶但也沒有深究，況且那時家屬也無法告訴我們這事，所以在這期間，我對林宅血案可說是渾然不知。直到正式開庭的那天，姚嘉文、周清玉等人在軍事法庭上做最後陳述時才把這件事公開。此外，我們也看到林義雄戴孝穿著黑衣，就在那一刻我們才知道了林宅血案。由於我和林義雄是宜蘭同鄉，我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甚為深厚，林家雙胞胎及奐均與我也很親近，所以林宅血案對於坐牢的我而言，更是倍加痛苦。不過再怎麼痛苦，也遠不及痛失至親的林義雄！

-
3. 1980年2月28日，身分不明的匪徒闖進因美麗島事件被捕的原省議員林義雄家裡，刺殺林氏的母親及其三名女兒，除長女林奐均重傷急救後倖存外，其母及一對孿生女兒均告死亡。此一事件發生後，由於時值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的敏感時期，傳言甚多。由於發生血案前一日，林義雄母親在會見林義雄之後批評國民黨有關單位刑求，而且當時林宅處於全天候情治單位的監控之下，發生此一事件自然有人質疑是情治單位或政府內的極右派策動此一血案，但直到今日仍無確切的證據足以破案。此一事件發生以後，政府方面透過沈君山出面先使林義雄交保處理善後，隨即便向林義雄表示，可以使他不必參加軍法審判。唯林義雄始終拒絕，獲准交保的他，並在軍法大審開始時由兩位辯護律師陪同，要求准予同時參加審判。參見薛化元撰，〈林義雄家屬被害事件〉，收於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491。

在仁教所的日子

在景美軍法看守所期間，我和呂秀蓮被關在一起，判刑確定後不久，我們兩人再被移監到土城的仁愛教育實驗所。我們被關在新蓋好的牢房，新牢房中間有一個很小的庭院，那是我的活動空間，可以到那裡走來走去。我記得牢房的圍牆很高，然後天空上面都架滿鐵絲網，宛如鳥籠一般，雖然看不到外面的風景，但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我們在牢裡只能看《中央日報》，甚至敏感的部分還被剪去，電視也只能看華視的「莒光日」。我記得每次受邀的學者都在節目上譴責美麗島事件。那時我們很喜歡看宣揚反共意識的雜誌，因為到後來都是在罵黨外，所以我們就能從中得獲得黨外的訊息。有一天，呂秀蓮請她姊姊送放大鏡，但我們不能讓獄方知道我們用放大鏡的真實意圖，所以在接見時呂秀蓮就這麼向她姊姊說，我們在牢裡邊打毛線、做手工藝，邊看電視打發時間，怕會傷到眼睛，所以需要放大鏡。但其實放大鏡的用途，是用來看雜誌內的插圖。例如雜誌要罵《自立晚報》的某篇黨外文章，旁邊一定會附上那篇文章的圖片，但是因為太小了，所以需要放大鏡。當時哪怕只看到一點畫面，都覺得彌足珍貴。

我記得有一次家人送食物來，用《中國時報》包，可能因為太油了監獄管理員就沒有換，我和呂秀蓮就在看整張油漬漬的《中國時報》，也看得津津有味，可說那種對外界資訊的渴望是非常強烈的。還有一次吳三連、紀政（1944-）和沈君山代表「中國人權協會」來探視我及呂秀蓮，吳三連送我們很多武俠小說，

還帶了食物給我們。看到他我馬上眼眶泛紅，他問我們有沒有需要什麼，我說我想看《自立晚報》，三老轉頭問警總的人：「《自立晚報》是合法的報紙，我送報紙來可以嗎？」警總的人回他：「再說再說。」就沒下文了，反正就是不行。

坐牢滿五年多後，1985年呂秀蓮以「保外就醫」名義出獄。美麗島事件八位受刑人出獄時間都不一樣，最先出獄的是林義雄，其次是呂秀蓮，然後是林弘宣，他也是以「保外就醫」名義出獄的。呂秀蓮能先出獄，是因為甲狀腺癌復發的緣故，另一方面我想與孔傑榮（Jerome Adan Cohen, 1930 - ）等人在海外替她聲援也有關係。

呂秀蓮離開後，對我最大的改變是，我從此沒有說話的對象，我自己一個人被關一年，這對我的坐牢生涯也是一項重大的考驗。自己一人獨處一年，沒有機會說話，所以出獄後，剛開始講話都非常吃力，畢竟太久沒講話，幾個月後才比較好。

我關了六年又兩個月才假釋出獄，接著出獄的是姚嘉文和黃信介，最後才是Nori。出獄後，我記得乃仁給我一筆錢做環島旅行，但我大概只有「部分旅行」。因為與外界隔絕了六年多，所以在旅行過程中，我驚覺台灣的變化很大，例如我坐牢之後回來宜蘭，車子是走濱海公路，但六年前尚無濱海公路，只有九彎十八拐的北宜公路。記得行經濱海公路時，我聽到了久違的海浪拍擊聲，後來我寫自由的滋味還有提到這段故事。

成為建黨小組的一員

出獄後，由於過去我長期從事人權工作，周清玉的「關懷中心」便來找我去幫忙，之後江鵬堅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也希望我過去，我考慮再三後，決定去「台灣人權促進會」。因為我認為「台灣人權促進會」是一個比較制度化的人權團體，當然「關懷中心」也做很多對政治犯的關懷工作，但它那時的組織型態是以清玉為主，所以我決定到「台灣人權促進會」。

我坐牢回來後，周清玉、江鵬堅及我的老師傅正等人請我一起吃飯，並討論組黨的事，愈討論大家就愈覺得這件事很重要，也感覺組黨時機幾近成熟。後來人愈找愈多，就形成所謂的「十人小組」。起初我們大多在清玉家中集會，每一次見面大家就約下次見面的時間，大概都不會以電話通知，所以這中間如果有人走漏消息，我們一定查得出來，且會給予公開譴責。在這種壓力下，大家都不敢洩漏消息。在組黨過程中，我想不只是傅正很重要，每個小組成員都很重要。

出獄後不久，我很自然地成為十人小組的一員。我想我人生的每一個軌跡幾乎都在黨外的航道中，不曾離開過，可說就是喝黨外的奶水長大。當時黨外有公政會與編聯會兩大系統，我很自然就和編聯會較為接近，因為當年周遭的年輕人都在編聯會，很自然地大家就聚在一起。其實公政會和編聯會所代表的兩個世代我都認識。所以嚴格來說，我既不屬於編聯會，也不屬於公政會，我很自然就成為建黨小組的其中一員。

十人小組後來變成十八人小組，將編聯會和公政會兩個不同的路線結合在一起。當時我們想國民黨可能會抓人，所以有秘密約束，沒有被抓的人絕對要繼續組黨。當時我們還分成三批，即第一批願意被抓，第二批願意被抓的人有誰，名單都有排出來。我則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認為只有我剛坐牢回來，但我說你們都被抓了，剩我一人也沒有意義！在這過程中，我覺得最可貴的是，每個人都有當仁不讓的決心，為了理想無不爭先恐後，爭取當那第一批被抓的人，那時理想性真的很高！

擔任高雄市長

民進黨建黨成功後，我連續擔任四屆中評委，後來又當了中常委，我想我在黨內的資歷豐富，大概是扮演一個調和鼎鼐的角色。我於1991年當選高雄市的二屆國大代表，後來阿扁當選台北市長，我就去台北市政府擔任社會局長四年，1998年阿扁市長連任失敗，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我又轉任高雄市社會局長。原本我答應謝長廷到民政局服務，但高雄的社福團體抗議，他們覺得我在台北市社會局長任內做得不錯，希望我到社會局，所以後來我在高雄仍是繼續擔任社會局長，而在社會局工作我當然也駕輕就熟。謝長廷當選兩年後，阿扁當選總統，2000年我就受邀入閣擔任勞委會主委，直到2005年9月15日卸任。

2006年，我獲得民進黨提名參選高雄市長，當時正值阿扁總統執政末期，整個政治大環境對民進黨很不利，所以讓我選得

十分辛苦。此外，我的對手黃俊英，本身是教育界出身，中山大學教授，曾經擔任高雄市副市長，形象清新，所以和這種人競爭更是倍感艱辛。最後我也僅以一千多票的些微差距勝選。我競選連任，是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升格後的高雄市長選舉，當時的對手是楊秋興（1956 - ）與黃昭順（1953 - ）。這次選舉可以說是我政治生涯的另一次衝擊，但最後我還是以過半選票當選為高雄縣市合併後首任大高雄市長。

高雄是一個移民的城市，有人是來自雲林的高雄人，有人是來自澎湖的高雄人，我則是來自宜蘭的高雄人，所以高雄這個地方包容性很強。像我的背景，我從來就是在黨外長大，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與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相連，無役不參，包括坐牢，所以我回高雄參選，我不需要跟我的選民說我是誰，我做過什麼，他們都知道我是誰。也因為我們一路走來很辛苦，所以最後也得到高雄市民對我們高度的肯定信任與支持。我是宜蘭鄉下的囡仔，人生有很多的轉變，參與了每個階段的民主運動，最後選擇在高雄參選。過去我有豐富的執政經驗，包括在台北市及高雄市做過局長，在中央也做過部會首長，所以回到高雄，可以將我的經驗加以貢獻。

高雄不但是一個重工業的城市，也是一個海洋的城市。謝院長做過五年多的高雄市長，愛河一部分的整治大家有目共睹，和吳敦義（1948 - ）相比，高雄人對他讚譽有加。所以我們執政的前兩年，可說是在強人之後，政績不容易突出。但是從第三年開始，我們不但有若干政策收到成效，也讓市民逐漸看到高雄未來

的方向。高雄已從重工業的城市，逐漸演變成為一個適合居住的城市，在空間的革命上我們做了許多努力。在謝市長時代有愛河的部分整治，我們上任後繼續在愛河、前鎮河、後勁溪等地做空間的改善工程。此外，我們也在政策上強調高雄是一個對於弱勢者友善的城市！我想過去我在人權工作的背景，在這中間都會被突顯。尤其是縣市合併後，高雄市面積比東京都還大，有 2,947 平方公里，是全台灣最大的直轄市。如何拉近城鄉差距，如何增進基礎建設等等，都是我們未來仍須繼續努力的方向。

拆除蔣介石銅像的始末

阿扁總統執政最後一年的 2007 年，阿扁宣布將考慮中正廟的存廢問題，引發軒然大波。我記得有一天小馬（馬永成）打電話告訴我台北方面處理中正廟一事不太順利，但我的決心很明確，就是要將這座銅像完全移除。

當時的文化局長是路寒袖（1958 - ），這項業務的執行是他的主秘以及一位郭處長。在移除前，我們雖做了一些準備，但後來的拆除過程仍面臨一些障礙。因為每次經過都不曾正面看它，只知道有座銅像在那裡，低估了這座銅像大小對拆除工作的影響，沒想到竟是如此龐然大物，有幾層樓高！

原本我們計畫晚上八點動手，把文化中心包圍，在天亮前處理完。我們也等國民黨籍的議長出國才動手，不然他們肯定會施加壓力。不料我決定拆除的當天，消息竟提前曝光，因此馬上

就接到議長等人的關切電話。但我既然已經宣布要做，就絕不罷休，任誰打電話來阻止都沒有用！

事前雖已做了相當準備，拆除時我也在市長室內親自坐鎮指揮，但那時才發現到蔣介石雕像不但外面包銅，裡面還有水泥柱，而且體積巨大，最後只好從雕像胸口開始切割，並切成十八塊。其實我們事前準備應該要更細膩，如此把蔣介石銅像「肢解」，多少會引起風波，不過我們全部承擔。我想既然拆了，就沒有後退的餘地，必須把它處理完。

拆除的工程花了兩天，這中間我們被國民黨籍的市議員、立法委員罵得半死。拆除過程中，我責成苓雅分局長務必做到：第一絕不能流血，第二在執行過程中任何人都不許進入，一旦有人接近必須立刻驅離。因此分局長還慘遭前來抗議的國民黨立委黃昭順、市議員林國正（1966 - ）等人的強力圍剿。銅像拆解後，我們隨即聯絡大溪鎮長，他們也很歡迎將銅像遷移至大溪放置，所以文化局主秘就押車將銅像送到大溪。

拆蔣的過程，我們大概被國民黨及泛藍媒體罵死了，但我們都淡然處理。除了蔣介石銅像的拆遷外，我們也將「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的舊名改為「高雄市文化中心」，雖然民進黨並非議會多數，但我們仍是毅然決然改名，因為我認為文化中心屬於市民共享，就法的立場，當然我們地方政府可以決定，文化中心是屬於高雄市的，不是中央管轄的。在這件事上儘管國民黨罵我罵得要死，但同時因為我拓展了文化空間，所以也得到另一部分人的信賴與支持。高雄不需要有「偉大人物」的存在，孫文（1866

- 1925) 我們尚可忍耐，後來我們又默默地拆除不少蔣介石的銅像。後來我想，事前的準備工作可以更加周全。但那時我想當第一塊被切除時，就已展現我的決心，任何人想阻止都無效，我很清楚就是要拆除！

如今我想高雄市沒有人會再提起拆蔣的事，畢竟大家會覺得高雄市文化中心很自然，那裡不但可以供人展覽，也可以作為很好的表演空間，2012年翁倩玉（1950 - ）的版畫作品就在文化中心盛大展出！

與中國的互動

2009年5月我到中國推銷高雄世運，走訪北京、上海，分別會晤了上海市長與北京市長。與北京市長郭金龍（1947 - ）會面時，談到高雄的經濟發展，我提到全球金融風暴對我們的影響，就脫口說出；「『我們中央政府馬英九總統』對此感到非常大的壓力」。其實雙方在對談中是很自然的，我那時也沒有刻意強調，後來當然台灣社會會覺得我在中國敢說「馬英九總統」值得嘉許，但其實我當時講那些話是很自然的。

世界運動會主席團不希望把政治帶進世運會中，認為我應該到世界各地宣傳，邀請大家參與世運會，因此我不可能獨漏中國大陸不去。在那時的氣氛下，我認為世界運動會應該邀請中國大陸一起參與。

世運會結束後不久，莫拉克颱風侵台，造成八八水災，重創

高雄。在八八水災過程中，我同意達賴喇嘛來高雄，中國大陸覺得是很大的挑釁。事實上，2009年達賴喇嘛訪台的經過有些曲折。高雄市並非災區，所以一開始是達賴喇嘛基金會主動對台灣方面表示達賴喇嘛很感謝台灣人，一知道台灣發生這麼大的災難，尤其小林村一夕之間滅村，因此希望能來台灣替罹難者祈福。基金會也與在印度的達賴喇嘛聯繫，並安排好訪台的時間。但台灣方面原本聯絡的單位臨時退卻，所以基金會便透過我認識的一位朋友，直接到高雄市找我幫忙。對於達賴喇嘛基金會及藏傳佛教的信徒來說，達賴喇嘛是崇高的法王，他們對其信仰的忠誠度絕對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所以突然出現莫名的變數，他們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先來高雄市政府尋求協助。當時他們問我方便接待否，我說不會不方便，不過高雄市並非災區，他來恐怕名不正，言不順。經過一段時間的集思廣益，大家終於決定以民進黨執政縣市，即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縣市長的名義，聯合邀請達賴喇嘛到台灣訪問，慰問災民、為災民祈福。

於是，2009年8月30日達賴喇嘛搭機抵台，隨即搭乘高鐵南下高雄市，那時我也親自接待。隔天他前往水災重災區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慰問災民，由楊秋興縣長陪同，之後到屏東縣林邊鄉，則由曹啟鴻縣長接待。

總之，達賴喇嘛在高雄的一切由高雄市政府全部負責，也概括承受。為了達賴訪台，我想後來北京方面也對我很感冒。在達賴訪台事件後，緊接著9月又發生熱比婭（1947 - ）紀錄片的

風波。當時高雄市電影圖書館原本計畫於 10 月的高雄影展播映流亡海外的中國大陸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卻立刻引起北京方面的反彈。其實一開始我根本不知道熱比婭是誰，況且每年高雄影展都是由策展單位負責，市長不管這個業務，就連新聞局長也未經手。我想我是一個開放的市長，在我主政下的高雄是一個任何展覽都被允許的城市。只不過經過達賴訪台事件，沒多久又發生熱比婭紀錄片事件，也影響到對岸近年來對高雄市的態度。

那時有部分台派人士希望藉由紀錄片的放映，進一步表達支持熱比婭的訴求，但我想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做法，就是很自然地讓電影如期播出。其實我看完電影後，也覺得沒有想像中的精彩。我們那時的處理態度很堅決，就是「我們要放映一部電影，無須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經過這些事件後，北京政府對於高雄相當有意見。

面對中國因素的挑戰

今天中國崛起，日漸強大，世界各國都受到她很大的影響，台灣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也期待台灣內部能凝聚共識，來面對對岸的影響。

以 2010 年五都選舉為例，在選舉過程中，我們才知道原來有那麼多來自中國的力量在背後影響。幸好我們在高雄四年的政績不少，並且讓市民有深刻的感受，才讓我們成功穩住縣市合併

後的大高雄。

我在 2010 年的選舉中能夠大勝，我想除了要感謝高雄人，能清楚辨別政治人物的人格、信用外，另方面我也要感謝高雄人能夠瞭解我們的辛苦。未來我們市府團隊一定會加倍努力，絕不會辜負高雄市民對我們的支持！我不認為我在高雄是外來人，我是來自宜蘭的高雄人，就像很多人來自屏東、台南、澎湖一樣，所以我在市政上非常努力用心，我想這是我在高雄應該做的事。此外，我是一位專業、專職的市長，絕不做生意，事實上我一生從來不曾做過賺錢的事！

2016 的總統大選，中國一定也會發生影響，民進黨要重返執政，我想只要黨內有誰有能力團結內部，有智慧、有能力帶領台灣面對與中國的關係，既能維護台灣的主權，又能發展與中國的正常關係，我就會給予無條件地支持。中國是我們的鄰居，不管喜歡與否，她就是在那裡存在，並影響我們的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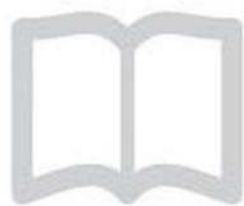


陳菊市長在高雄市長辦公室受訪的情景。

與各宗教友好

我和不少宗教有密切的關係，天主教在我參與民主發展的過程中保護我，和基督教長老教會則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一起打拚，我們家裡的人則是台灣傳統的民間信仰，佛、道都有。我個人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也沒有皈依哪個宗教，但我和各個宗教都很友好，不過現在在我的辦公室裡佛像比較多，或許比較有緣吧！

我現在吃得比以前素，但大概與宗教信仰無關。我上任市長的第一年，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加上生活作息尚未調適，睡眠不足，而我也沒有特別注意自己的血壓，所以有一天我突然發覺自己走路歪一邊，到醫院檢查後才發現左耳的腦幹有些微阻礙，而且血壓過高，自從那次住院一個多月以後，我的生活和飲食習慣就開始有顯著的改變，現在除了雞肉之外，其他肉類比較少吃，也儘量多吃蔬菜水果。換句話說，主要是為了身體健康而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經過那次的生病經驗，我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會生病！



此頁空白

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游錫堃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儷深教授

紀錄：林志晟

時間：2013年6月25日 15:30 - 17:30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70號13樓之3（游錫堃辦公室）

游錫堃，1948年生於宜蘭縣冬山鄉，因家貧輟學，復以半工半讀方式，考取致理商業專科學校國際貿易科夜間部。因對郭雨新的崇拜及自身民主理想，決定從政，當選第七屆省議員，與謝三升、蘇貞昌三人被譽為省議會「鐵三角」。1986年7月加入建黨十人小組，參與籌組民進黨。1989 - 1997年，出任宜蘭縣第十一、十二屆縣長。1990年，與宜蘭地區文教和企業人士共同創立「仰山文教基金會」。2002年擔任第十八任行政院院長，全力推動各項交通建設，推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蔚有成效。¹

我的成長歷

我生於 1948 年，宜蘭縣冬山鄉人。先父游木溪，先母黃秀菊，家中世代務農。因幼年家中長輩忙於農事，所以五歲時就學會照顧弟妹、除草、扛水與煮飯等家務工作。我的求學歷程較崎嶇，小學就讀於冬山國民學校（今冬山國民小學）。我印象中讀高年級時，有一位花蓮師範學校畢業的林姓教師在課堂上不斷地強調反共抗俄、英勇國軍以一擋十等觀念，我深受影響，在長期潛移默化中，對於「收復大陸故土」一事感到熱血沸騰，遂立定志向當飛行員，希望能報效國家，殺朱拔毛。

初中就讀於省立宜蘭中學初中部（今國立宜蘭高級中學），但 13 歲時，父親不幸去世，為協助家中生計，讀完初二（14 歲）後便輟學在家協助母親務農，農閒時則出外打零工，賺取微薄工資。我輟學擔任農夫五年後，於 19 歲以同等學歷考上縣立羅東商業職業補習學校（今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就讀羅東商職夜校兩年半後，為準備參加大學聯考，於 1970 年 2 月轉學至台北私立西湖商工補校，同年 6 月畢業。

我在輟學務農期間，深受母親教誨逐漸奠定我日後為人處世的基本信念。母親平時即叮囑我「寧可晚冥拖，毋通早時磨」的工作態度，形成我養成「今日事，今日畢」的做事原則。我記得有一次與母親討論插秧日期時，為追求完美，意欲延後日期兩三

1. 關於游錫堃前院長之成長歷程至主政宜蘭縣府時期，另可參酌林志恆，《蘭陽之子游錫堃》（台北：天下遠見，1998）；陳慶堯，《文化·宜蘭·游錫堃》（台北：遠流，1998）；余玲雅、魏早炳計畫主持；陳世宏協同主持，《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游錫堃先生訪談錄》（霧峰：台灣省諮議會，2006）。

天，將田土耕耘得更軟爛後才進行插秧，但母親卻說：「播落去就水，緊播緊水！」要求我把握「立春」的最佳時節。因為此時秧苗生長快速，越快完成插秧越好，有利於未來提早收成及下一期稻作的播種。而母親這段融合短、中、長程一起思考的模式及對話，造就我日後做事把握時效，「順天時，盡人力」的風格。

我於1970年自西湖商工補校畢業後，參加大學聯考落第，遂入伍服兵役。1972年退伍後，考上致理商專（今致理技術學院）夜間部國際貿易科半工半讀，先後擔任震旦行、大西洋裝潢設計公司營業代表、利台紡織公司帳務員等工作；1975年，我從致理商專畢業後，又進入國泰信託投資公司擔任六年的營業員。國泰信託的價值觀：「信心、忠實、奮鬥」、「事在人為」，及其工作內涵訓練我在職場中待人處世的基本態度。由於我在台北無親無故，拜訪客戶無法採用「緣故法」或「介紹法」等方式，所以只能用「直衝法」，我經常每到一棟大樓就直搭電梯至頂樓，再走樓梯下樓，從下樓的過程逐層逐戶拜訪客戶。我曾擔任八年的外務員，由於這種工作的性質需開拓業務及與陌生人寒暄交談，所以這八年的寶貴經驗對我日後從政甚有幫助。

政治意識啟蒙

我記得初中時適逢省議員選舉，有位王姓同學父親支持郭雨新，王同學曾手拿郭雨新的宣傳單在班上宣講郭雨新的事蹟，讓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我於務農之際，也常在碾米間、雜貨

店聽到鄰人對郭雨新的讚賞，郭雨新因而成為我心中欣賞的政治典範人物。由於郭雨新是中國青年黨，在崇拜郭雨新風範的影響下，我於 18 歲便加入中國青年黨，入黨後看遍青年黨相關的刊物與書籍，諸如《民主潮》、《現代國家》，青年黨創黨元老曾琦（1892 - 1951）、李璜與左舜生等人的回憶錄，還有黃順興與朱文伯的著作，及郭雨新的《議壇縱橫集》。² 透過閱讀青年黨刊物與青年黨人的回憶錄與相關著作，我逐步建立自身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基於對郭雨新的崇拜及自身形成的民主政治理想，埋下我日後熱衷選舉並步入省議會問政的動力；郭雨新先生是我政治意識的啟蒙者！

約 20 歲時，有一次為了幫助一位省立農校留級生，遂自告奮勇前往台北拜訪郭雨新，而這一次拜訪也使我與郭雨新建立關係。我在成功嶺服兵役時，曾經兩度前往省議會拜訪郭雨新並餐敘，也曾一同在省議會園區內散步。1973 年，我擔任中國青年黨宜蘭縣黨部委員，由於郭氏多次返回宜蘭參加開會關心黨務，我有機會和郭雨新更密切地接觸與學習。1975 年，郭雨新準備競選第一屆立法院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此時我剛從致理商專畢業，在台北國泰信託公司上班，利用工作之餘努力在台北縣幫忙郭雨新助選。

其實早在 1969 年（20 歲），我就有為反對人士拉票、發傳單的經驗。台灣實施「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理立法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增選及補選，曾任三屆宜蘭縣縣議員的賴茂輝，一向被視為郭雨新的嫡傳子弟，以中國青年

2. 郭雨新，《議壇縱橫集》（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69）。

黨黨員身分出馬競選國民大會代表，並提出「七大控訴」指出：「一、為什麼台籍同胞人口一千萬人，國民黨不提名本省籍同胞參加競選副總統？二、為什麼台灣省主席不依照憲法規定由人民直接選舉？三、為什麼台灣省主席不指派本省籍同胞擔任？四、為什麼國民黨之經費由政府負擔？五、為什麼全省二十一縣市，縣市警察局長本省籍同胞只有一人？六、為什麼中華民國駐外大使從不派本省籍同胞擔任？七、為什麼大陸撤退來台已二十年，到現在還不能反攻大陸？誰該負責？」賴氏對時政勇於批評，言人所不敢言。³ 當時我剛有投票權，不但把生平第一票投給他，並且積極為他助選，開完票後，賴氏以懸殊的差距落選，不久之後，他就被以與民意代表貪汙有關的罪名入獄。不過這樣的經驗不但沒有澆熄我從政的熱情，反而加強我心中推動政治改革的決心。

1980年我就讀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夜間部時，登記為黃煌雄參加第一屆立法院第三次立法委員增額選舉的正式助選員。當時法律規定學生不得替人助選，因此學校知道我到處演講後，向我勸誡不得參與助選活動，否則將遭受退學處分。於是我致電黃氏，告訴他我面臨退學威脅無法再幫忙。但黃在電話中誠懇相求，表示選情危急已臨近投票的關鍵時刻，請我無論如何幫忙到底。聽到黃如此誠意請託後，我一方面慮及黨外大局、一方面一時心軟口快，竟然承諾繼續助選。後經校方通知如果不自行辦理退學，將由學校直接開除論處，我只好自己前往辦理退學手續，中斷了我曾經朝思暮想多年才實現的大學生涯。

3. <http://tw.myblog.yahoo.com/jw!M6fXyA.UAhbUWtn8y0oEwZPh/article?mid=20&prev=21&next=19&l=a&fid=1>，點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27 日。

黨外運動時期的省議員

1977年，我決定參選第六屆台灣省議員，爭取為民喉舌的機會。當時我想要參選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要實踐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的理想；其次，是因崇拜郭雨新的政治風範而心嚮往之；其三，林義雄宣布參選宜蘭縣縣長，黨外無人準備參選省議員。

當年我就一直堅信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但在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府實施黨禁、報禁，只允許二個「花瓶」政黨—中國青年黨與中國民主黨予以點綴。因此，反對國民黨的我認為既然不能籌組新黨，在野人士應藉青年黨之名參選公職（等於現在之借殼上市），並希望在當選之後，於議會中善盡監督、制衡國民黨，以實現政黨政治的目標。

當我投入省議員競選活動半年後，林義雄也從要競選縣長轉而宣布參選省議員，我們票源嚴重重疊。後經黃信介及宜蘭地方黨外前輩居中協調，眾人咸認林義雄大我七歲，資歷較完整，於是希望先由林義雄代表黨外參選，由我擔任他的競選總幹事。為加強黨外團結及避免兩敗俱傷，我同意接受黃信介等人的協調。

在林義雄成功當選、我輔選任務完成後，經由時任美麗島雜誌副總經理的謝三升（1943 - 1997）引介，我開始和美麗島政團接觸，並與施明德等人結識，經常出入美麗島雜誌社。我與美麗島政團建立正式關係，是於1978年10月，擔任美麗島雜誌社宜蘭分社籌備主任，負責在宜蘭地區發送及拓展美麗島雜誌，正式

進入美麗島政團，並成為其中一員。後來施明德結婚並有意辭職赴美，謝三升還向黃信介推薦我接任總經理，我自知能力淺薄無法勝任，不久美麗島事件發生，此案當然也煙消雲散。

美麗島事件及林宅血案發生一年多後，懷抱民主政治理想、為民服務熱情的我，並未因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等的國民黨政治迫害而心生畏懼，反而視死如歸，毅然決定延續宜蘭蔣渭水（1891 - 1931）、郭雨新、林義雄等先賢前輩的不妥協精神及未完之民主志業，於1981年3月辭去國泰信託的職務，返回宜蘭冬山全力投入該年的第七屆省議員選舉，並自許「蕃薯栽」，以「番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澆」作為競選口號。

當年宜蘭地區和省議員選舉，國民黨方面有陳汨汾（1935-）、官來壽（1930 -）參選，黨外方面除了我表態有意參選外，尚有張川田（1945 - 2006）、陳定南（1943 - 2006）等一共三人。黨外各地要角等為解決我們三人的競選衝突，遂由時任立法委員的黃煌雄出面協調，但黃氏的協調僅成功一半，因陳定南與官來壽同為三星人，兩人票源嚴重重疊，陳氏在國民黨公布提名官來壽後就決定轉選宜蘭縣長，黃氏自然協調有成，而我與張川田先生相持不下，各自決定競選到底。

不過當年「全國黨外助選團」的一項決議對我的競選非常不利，該決議規定任何縣市有「全國黨外助選團」的現任立法委員的成員時，該縣市的支持對象應尊重這位立法委員的意見。當時宜蘭縣選出之省議員席次只有兩席，有史以來黨外只有一席實力，但宜蘭縣籍立法委員黃煌雄卻主張推出兩位黨外候選人，而

實際上他又集中支持張川田。此時，我參與黨外運動已有數年，與康寧祥、費希平、尤清、張德銘、周清玉、黃天福、許榮淑等黨外領導人士熟識，並早就完成一一拜訪，獲得他們承諾助講，因此我多次商請黃氏允許我自辦大型演講會，但他一直不同意，使我的大型演講會無法辦理，以致選情陷入困境。所幸後經當時黨外領袖康寧祥立委力挺方能突破困境，最後僥倖以 41,631 票低空掠過，當選第七屆省議員。

我擔任省議員後，與謝三升、蘇貞昌三人在省議會採取聯合質詢，經常同進同出，因此外界稱我們三人為省議會「鐵三角」。我們三人屢屢在質詢的前一晚便提早住進會館，運用晚上的時間討論質詢議題，然後各自回房進一步準備所需資料，次日早上再交換意見。在第七屆省議會期間，不管是質詢、預決算審查、省政考察均可看到我們並肩作戰的身影；那段期間，三人合作無間，努力監督省府、關心民瘼、宣揚民主、追求法治，尤其是「地方自治法制化」，更是我們極度重視的議題之一。

當時地方自治有名無實，民主憲政虛有其表，如省政府的「適法性」便有三大問題：一、組織法源違憲：依據 1947 年頒布的憲法規定，應由國會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再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法》規定省政府組織；且省政府應設省長，並需民選。而當時台灣省政府所依據的《省政府組織法》係 1927 年制定的，該法無論在形式及實質上皆是違憲的；二、官派省長違憲：依當時《憲法》第 113 條明文規定：省設省政府，置省長一人，省長由省民選舉之。省長產生方式，是由國民先選

舉省民代表，再召開省代表大會制定《省自治法》，再依該法民選省長。但 1985 年時，行憲已達 38 年，台灣省長依舊官派，明顯違憲；三、預算違法超額：如果不談違憲，單從當時的《省政府組織法》的規定來看，省政府預算編列嚴重違法；省政府委員法定編制上限 11 位，但預算編列 23 位；省政府組織依法應為四廳二處，但預算編列 17 廳處，嚴重違反省政府組織法規定。

在我們提出省政府適法性三大問題後，雖經過三年鏗而不捨的努力，台灣省政府與中央統治當局仍無絲毫改革跡象，既不願修正《省政府組織法》使其合憲，亦不願刪減我們指出的「違法超額預算」使其合法。因此，我遂和其他 13 名黨外省議員，以集體辭職方式，抗議國民黨公然違法違憲，強行通過超額省府委員預算。由於「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礎石」，這次的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引發朝野震撼，終於促成八年後通過《省縣自治法》，並於 1994 年完成省長民選。對我來說，此舉一方面向全民突顯了省政府違法違憲，及地方自治法制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國民黨統治合法性與正當性不足。是以，我這次的辭職不但對連任沒有任何負面影響，在第八屆省議員選舉中，反而以 88,555 票高票當選連任，比之第一次當選 41,631 票，選票成長一倍有餘，意味有更多民眾信賴與支持我。

鑑於民選的省議會相較於未全面改選的立法院，其民意基礎較具代表性。為推動台灣民主改革運動，身為黨外的我們，希望透過在省議會中的問政突顯全國性議題，一方面喚起社會輿論的注意；另一方面，若省政府無法處理，則可將該項議題轉呈中央，



1986 第二屆民主實踐研究班合影。(邱萬興 提供)



1986 年游錫堃先生在黨外選舉後援會中發言。(邱萬興 提供)

使民情上達。我抱持著這種理念問政，在兩屆省議員任期內，提出一千餘件議案，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就全國性議題方面，多關注中央憲政體制、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問題，例如解除戒嚴、萬年國會、林義雄宅命案、美麗島事件大審、言論自由、黨禁與報禁問題，而教育、農業、公害、財金、宜蘭發展，也是我關心的問政面向。

我與蘇貞昌、謝三升三人在省議會的質詢原則，有一項特點，即所謂三分之一制。因為我們認為自己雖然是省議員，但對推動台灣民主化有一份責任與使命感，因此將質詢時間分為三等分，三分之一議論國政、三分之一討論省政、三分之一關懷選區建設。例如我編著的《民主路鄉土情》⁴一書中，就記載著我曾經針對國家語言及文化政策提出相關建言。由其內容可得知當時的政府與社會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建構付之闕如；至於其他一大部分的省議員，多半只關注自己選區的建設問題，減少討論至國省政層面，如此一來，其問政層面與縣市議員不同的幾希？

民進黨的「圓山組黨」

由於我在1981年以「黨外」當選台灣省議員，此後一直維持黨外身分，直到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成立後，才成為民進黨黨員。省議員八年任內積極參與台灣民主運動，那時年輕力壯、滿腔熱血與理想，除在宜蘭以「省議員游錫堃服務處」之名，辦理很多批判政府、宣揚進步價值的活動外，全國各地凡

4. 游錫堃，《民主路鄉土情》（羅東：游錫堃，1989）。

與解除戒嚴、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環境保護、教育改革、農工運動等有關的演講活動，只要時間許可，我幾乎無役不與。

我的故鄉宜蘭縣一向被稱為民主勝地，曾經出現過多位全國知名的「反對運動型」的政治領導人物。他們從未錯過參與組織全國性反對黨的機會，因此宜蘭縣可以說是一個有組織反對黨傳統的地方。1927年蔣渭水成功地組成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台灣人政黨「台灣民眾黨」、1960年郭雨新為雷震組黨七常委之一、1979年林義雄為美麗島政團五人決策小組成員。因為這樣的傳統，自擔任省議員起，我不但憧憬政黨政治的實現，也一直以宜蘭先賢為榜樣，把突破黨禁、組織新黨視為己任。

1986年前後，菲律賓、韓國相繼民主化；菲律賓有「人民的力量」要求馬可仕政權下台；韓國有「百萬人簽名修憲請願運動」，強烈撼動全斗煥（1931 -）政府，兩國的民主浪潮對台灣人民及黨外力量有極大的鼓舞作用。此時適值國內經濟快速發展、民眾生活改善、社會漸趨多元、人民政治意識不斷提昇、民主改革呼聲不斷、在野力量逐漸茁壯，這些均有利於新黨的誕生，把組織反對黨視為使命的我，當然認為機不可失。

民進黨的前身是黨外，黨外的組織化開始於1983年成立的「黨外選舉後援會」。該會由三十多位黨外中央民意代表、省議員及北高市議員共同組成，召集人為費希平，我則擔任秘書長。該會成立之目的，在於代表黨外決定名額、推薦候選人並助選；兩年後，又成立「1985黨外選舉後援會」負責縣市長、省議員推薦及助選。黨外因此逐漸累積全國性的選舉經驗與社會基礎。

1986年，黨外為因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再次成立「黨外選舉後援會」，8月24日經過投票，我當選全國召集人。擔任召集人讓我有機會進行多年的心願—組織新黨。於是我以該會為基礎積極準備後來被稱為「圓山組黨」的籌組事宜。為了方便組黨工作進行，我在當選「1986黨外選舉全國後援會」召集人後，立即做了參選9月初改選的公政會第三任理事長的準備，後因顏錦福（1938 - ）遭受國民黨迫害有案在身，以選上公政會理事長可讓國民黨不敢輕易抓人為由獲支持，我以一票之差落選，雖然當時感覺我的組黨計畫有點受挫，但幸運的是最終並未影響我組黨工作的進行。

我審定時勢，堅定地準備著「圓山組黨」。當時我30多歲，性格衝動，雖對美麗島事件記憶猶新，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為了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願效先賢視「關」如歸，依計畫進行組黨的準備包括組黨時間、地點、人數、場合及方式等工作。因怕消息走漏胎死腹中，所以「積極籌備」而「守口如瓶」；就連與我每週固定開會的「十人秘密組黨小組」成員，我也隻字未提。直到組黨前一日的預備會議才讓少數十餘人知道此事，當然翌日晚上負責朝野溝通的相關中介學者，陶百川、胡佛等在獲悉組黨消息後會「咸表震動」，並表明「毫無所悉」了。

「嚴守秘密」是「圓山組黨」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由於黨外人士過去利用各種機會向民眾做組黨重要性的論述，到1986年已經喊了許多年，組黨已經成為台灣民主化支持者多年以來的期待。彼時雖說小蔣已經有比以前開放，但在戒嚴體制下，繼續停

留在言論層次還好，一旦真正展開組黨行動，國民黨還是會出手，「公政會」就是例子，所以我一定要嚴守秘密；問題是除了嚴守秘密外，我還是有必要讓社會大眾對新黨突然出現有心理準備，所以一有機會，我就不斷強調選前組黨的必要性，並且在「圓山組黨」的一週前，9月20日出刊的《噶瑪蘭周刊》第二十期專訪中，還以「談選舉與組黨」為題，提出「黨外很多人說要組黨已經說很久了，再等三年，對民眾實在無法交待」；「今年是組黨最好時機」；「要期待國民黨自動放鬆，期待他開放黨禁，那是不可能的事」；「用實力逼它開放黨禁」等言語，由這些可以知道我早已不斷的，用各種方法隱隱約約暗示「九二八圓山組黨」的計畫了。⁵

黨外宣佈組織「民主進步黨」

昨提出黨綱草案及組織構想

【台北訊】由一百卅餘位黨外人士發起組織的「民主進步黨」，廿八日下午宣佈正式成立，並提出黨綱草案及組織構想，推定七位組黨工作委員，即日起將籌備在今年底以前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一百卅餘位黨外人士，原由尤清、張春祥等黨外人士發起，滿定了多數的黨外公職人員及黨外知名人士，他們在經過多次的會商後，昨天乘黨外選舉後援會在圓山飯店召開大會推選年底選舉候選入集會之便，再次兩度會商，終於在圓山飯店舉行記者會宣佈了上述決議。

七位組黨工作委員分別為：費香平、尤清、謝長廷、游錫堃、蕭萬長、黃順耀、傅正，並由費香平擔任召集人。即日起將針對「民主進步黨」的黨章草案及其相關組織進一步研究規劃具體細節。臨時總部設於目前公政會現址。

據立報報導，民主進步黨的黨綱草案分為三大部分，即：(一)基本綱領，(二)行動綱領，(三)政綱。其中基本綱領又分為四大條，分別是：(一)民主自由的憲法秩序，(二)獨立自主的對外外交，(三)公平開放的社會，(四)創進進步的教育文化；(五)和平獨立的對外外交。

至於行動綱領則以黨外編聯會「組黨工作小組」擬定的一百廿四條政綱草案為主。

此外，張春祥因個特極黨派。昨天的記者會由費香平主持，尤清與謝長廷分別擔任發言人，尤清指出，黨外組黨是行使憲法保障的權利，現行法令並未限制人民組黨的權利。

謝長廷則指出，「民主進步黨」是開放性的一般民主政黨，將設黨紀專制行使權力，與民主集中制不同，理應尊重對黨內事務與組織關係進行仲裁。他同時說，民主進步黨與海外「台灣民主黨」並無關係，但因組織關係進行仲裁。任何個人如認同該黨政綱願志加入，並無排除限制的必要。

謝長廷同時說，「民主進步黨」的黨名不冠以「中國」或「台灣」的字樣，主要是為了避免「中國話」與「台灣話」之間的糾紛和爭論。他同時說，民主進步黨與「台灣民主黨」之間的糾紛和爭論，在少數股黨多數之明多數尤應尊重少數。他相信，黨外組黨對執政黨所一貫號召的階級鬥爭，將有正面作用。

《中國時報》有關組黨的報導（1986年9月29日）

5. 游錫堃，〈訪一九八六黨外選舉後援會執委會召集人游錫堃談選舉與組黨〉，《噶瑪蘭周刊》，20期（宜蘭：1986.9.20），第六版至第七版。

我一直主張「選前組黨」才能成功。這是我與當時宜蘭縣議員游振亮觀察「中國民主黨」及「美麗島政團」組黨失敗的經驗，經過數年思考討論所得之結論。因此，我認為如果在 1986 年選前不組黨，可能就要等到 1989 年才有機會了。因為選舉之後，台灣將長達三年沒有省級以上公職選舉，缺乏選前組黨機會。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選後組黨，但一定增加更多風險，極有可能與圓山組黨產生不同的結局。

當時「十人秘密組黨小組」於 1986 年 7 月 3 日成立，每週五晚上在周清玉家開會一次，我於 7 月 10 日加入。其成員為費希平、傅正、江鵬堅、張俊雄、尤清、周清玉、謝長廷、陳菊、黃爾璇及我等十人，主要工作為研擬黨章、黨綱，以備未來有一天黨外組黨之用。我曾把「選前組黨」這個主張在十人秘密組黨小組會議中提出，但並未獲得討論與決議。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黨外人士雖無人訂定日期、展開組黨行動，但已漸漸凝聚選前組織新黨是最好時機的共識。

眼看距離 12 月的選舉只有四個月，黨外雖有多人高亢公開倡議組黨及秘密研擬黨綱，但並無更進一步的組黨行動。因為組黨一發動，成功固然可喜可賀，不成功除了主其事者被判個十來年是免不了的，還可能讓一群人被捉、被關，美麗島事件前車可鑑，這就是為什麼當時國內眾多黨外領袖推動組黨，僅止於停留在言論自由層次，例如公開呼籲、演講、寫文章、研擬政綱等。

也許有人會好奇，為何選擇以「黨外後援會」為基礎進行組黨？組黨為避免國民黨政府打壓阻擾，必須事前嚴加保密。既然

保密就不可能以組黨名義公開邀請各地黨外要角參加，何況當時是政府嚴禁組黨的戒嚴時期，如果以公開方式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組黨，敢來的人可能也不多了！而黨外後援會從 1983 至 1986 年已經有三次推薦及助選經驗，獲得大多數黨外支持者的認同。該會在選前舉辦「候選人推薦大會」活動，是集合全國黨外人士於一堂最好的機會。大多數的黨外政治人物都會樂意出席這個重要會議。利用這個大會討論並決定組黨，不管是人數、份量、代表性都夠。既使有少數一、二人不贊成，也不敢在現場發言反對。

其次，為何決定「選前組黨」？因為以「黨外後援會」為基礎組黨，被推薦的所有候選人都是「新黨份子」，國民黨如果不抓候選人，等於新黨組黨成功；如果抓候選人，候選人可以前仆後繼。候選人如果不幸被捕，「新黨」（黨外後援會）可以立即替補推薦人選；若無人可補，也可以請候選人家屬披掛上陣。以 1980 年的周清玉旋風及 1983 年的方素敏旋風為例，可知選前抓人對國民黨選舉極為不利；再者，平時國民黨迫害異議份子都會羅織罪名，如果選前黨外候選人集體被抓入獄，人民很容易就認為國民黨是因為黨外人士籌組新政黨及選舉因素抓人。換言之，候選人不易被羅織罪名，加上選舉是當時台灣的政治熱季，在黨禁、報禁年代可以說是言論假期，本就會獲得人民極大的關注，引起社會廣泛熱烈討論；而國際社會也高度關注台灣民主自由與選舉，國民黨如果在組黨宣布後輕舉妄動，當然得付出極大的代價，因此，此時組黨相對容易成功。

最後，為何選擇九二八組黨？因為當天是教師節，既是國定

假日也是長假（第二天補假），黨外後援會成員出席人數會比較多，國民黨情治人員心情較為鬆懈；距離投票日還有兩個多月，如果國民黨動手捉人還來得及補推薦候選人參選，於是我決定於當日辦理候選人推薦大會並藉機進行組黨。會議地點圓山大飯店是托魏耀乾醫師以牙醫公會名義訂席。圓山大飯店是當時全國最氣派、聞名國際的飯店，有別於過去黨外集會，不是社區活動中心，就是學校禮堂；訂到圓山飯店除了比較不會遭受其他莫名的各種因素干擾外，組黨消息也較不容易被封鎖。

為了九二八的推薦大會順利，我們在9月27日有一個黨外後援會的預備會議，它也等於是「圓山組黨」的預備會議。在預備會議中，出席的黨外要角不但接受我組黨的建議，還達成了以下的共識：

- 一、明日黨外後援大會，先完成立委、國代推薦、授旗程序及通過共同政見後，立即變更議程（不必重新簽到）討論組織新黨事宜。
- 二、變更議程的提案由尤清在會中提出動議，由我（大會主席）徵求全體出席會員同意後進行討論組黨事宜。
- 三、討論組黨的會議請國民黨遷台前選出的終身職立委費希平先生主持。
- 四、決定以「民主進步黨」為黨名，由謝長廷負責在會中提出動議。

民進黨「圓山組黨」消息一出，國際震動。由於保密到家，

國民黨政府有點措手不及。接妻小來省議會台北會館同住，準備當晚在台北被捕的我，次日（9月29日）一日無事。第三天（9月30日）康寧祥來電約我到費希平家商討後續事宜，決定成立七人小組以為因應；同一天國民黨政府仍由法務部長施啟揚出面，「重申政府嚴正立場，此時此地不宜組織新黨」。第四天（10月1日）的《中國時報》報導：「少數人士如不顧情勢擅自組黨，政府將依法處置，立場並無改變」，全國情勢依舊緊張，各種傳言不斷。直至蔣經國10月7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透露台灣將朝向解除戒嚴及開放黨禁兩方面邁進，訊息於翌日見報後，局勢才算穩定下來，也確定了「圓山組黨」事件雨過天晴，民進黨順利誕生。從九二八組黨之日到10月7日的這十天，就是重要的民進黨組黨「關鍵十日」，也是台灣民主的「關鍵十日」。

蔣經國宣布將解除戒嚴後，民進黨積極準備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為免橫生枝節，籌備工作仍然小心翼翼的進行，七人小組決定擴大參與，納入公政會、編聯會重要代表，成員從7人、10人增加到18人，並於省議會台北會館密集召開「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會議，⁶展開黨章、黨綱的研擬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工作。

「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中的邱義仁、郭吉仁、陳菊、江鵬堅及洪奇昌，被視為較具編聯會色彩，而編聯會日後乃轉為新潮流系。江鵬堅因不約而同受編聯會及十人秘密小組邀請參與研討

6. 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成員為費希平、尤清、康寧祥、謝長廷、江鵬堅、許榮淑、顏錦福、周清玉、張俊雄、邱義仁、周滄淵、黃爾璇、傅正、蘇貞昌、郭志仁、洪奇昌、陳菊、游錫堃。

組黨事宜，成為雙方共同接受的成員，成為日後以 13 票對 12 票擊敗費希平，出任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的重要原因。

迭經「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積極、慎重、密集討論後，民進黨黨綱、黨章草案，終在 11 月 8 日完成最後定稿工作，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向海內外正式宣布黨章黨綱內容。也派員負責前往各縣市召集地方黨員宣誓大會，並辦理宣誓入黨，選舉各縣市黨代表，且於 11 月 12 日在台北環亞大飯店舉行第一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民進黨建黨完成後，我雖連續擔任四屆中常委，但因於 1989 年當選宜蘭縣縣長，當時台北與宜蘭間交通不便，來往耗時。為專心推動縣政，乃於 1990 年辭去第四屆中常委，此後與黨務漸趨疏遠，直至 1999 年應林義雄主席之邀擔任秘書長才重拾黨務工作。

宜蘭縣長任內

由於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期間，僅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之跳板，相關建設未具遠見，也缺乏整體規劃的都市建設概念，相較於歐美、新加坡等地區的都市發展而言，台灣相對落後許多。我雖然求學之路坎坷，但在省議員任期內非常重視每次出國考察的機會，希望藉由他山之石，使宜蘭成為全國的模範城市；加上我認為在 1991 年開始動工的北宜高速公路，其影響不下於十八世紀末吳沙（1731 - 1798）率領閩、客籍移民入墾宜蘭，以及 1924

年宜蘭線鐵路通車，誠可謂雖然後發，毋寧是福，應把握機會進行全方位的高品質規劃與建設；此外，受台灣民主運動及解嚴影響，台灣主體文化價值有機會開始復健，必須要多加重視文化發展。因此，在這兩者的交互作用下，我在擔任省議員時，便開始思考如何加強本土文化與城市規劃，將宜蘭帶往一個有特色的美好未來。

但要如何落實這種理想是一個難題。我綜合參考國內外的發展經驗後，認為除了擔任縣長才有辦法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外，另外就是必須仿照美國政黨成立智庫，網羅民間菁英襄助縣政發展。職是之故，我當選後便利用選舉結餘款成立「仰山文教基金會」，作為宜蘭縣政府的智庫。這種官民合作的模式，可謂獨步全國。我卸任後，基金會的運作與動能相對弱化，遂轉型成為對縣政執政者的監督團體，例如對宜蘭縣政府擬提高建築容積率的批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此外，宜蘭厝的推行亦有賴於仰山協助。不過，我在縣長任內推行宜蘭厝時曾遭挫折，但這段歷程鮮為人知。當時我對歐洲英國、法國鄉下的建築風景頗為傾心，乃希望改造宜蘭的建築風貌，遂請時任縣政顧問，後升任政務委員的林盛豐替我設法規劃，期能令宜蘭建築成為可堪比擬加拿大、紐西蘭等地的美景特色。於是我提撥一筆經費，透過他人介紹，邀請國立中山大學的王教授主責，後來並未成功，只能暫且擱下。其後，擔任仰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的李添財董事長得知此事，認為這件事情不能停下，就向我建議不妨讓仰山嘗試看看。因此，我編列了450萬的

經費，請林盛豐教授督導，委由仰山規劃執行。該規劃案總共列了九間房子，每間有 50 萬的設計費，交由九位經過精挑細選的建築師進行規劃。建築師必須和業主進行多次詳商，討論房子所需具備的各項元素，而不是由建築師主導。

仰山之所以能夠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其關鍵原因之一，是仰山成員和我有相當默契。由於我在擔任省議員時，與一群長期關心本土文化教育的知識份子契合，他們經常群集在我的服務處，商討如何關心與推動農工文教環等社會運動，彼此腦力激盪，集思廣益，因此，我的服務處催生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改革團體，也成為我創辦《噶瑪蘭周刊》的重要基礎。例如支持縣長陳定南率領宜蘭鄉親反對六輕入駐蘭陽。當時陳定南與王永慶（1917 - 2008）先生辯論後，整體的後勤部隊例如文宣、演講、活動企畫、經費籌措都由我的服務處負責處理；其後反對蘇澳火力發電廠也類似。在我競選縣長成功創辦了仰山之後，這群知識份子就變成仰山的中堅成員及縣政智囊團。

其實宜蘭「反六輕」分為兩階段，前階段是陳定南縣長領導宜蘭鄉親對抗王永慶為首的台塑集團，後來王永慶知難而退；其後是在我縣長任內，六輕捲土重來，其勢有如排山倒海，我身為一個三級窮縣的小小縣長，要面對的是以李登輝、郝柏村為首的中央政府，以致連宜蘭縣另一位立委（國民黨籍）林聰明也不得不配合中央政策。

軍頭出身，以強勢聞名國際的郝柏村不但親自刪除北宜高速公路八十一年度全數預算使之無法動工，還聲稱「不讓六輕設

廠，闢路就沒有希望」，甚至在立法院公開表示「絕不容許任何縣市成為一個小的獨立王國」。郝氏的態度很明顯：要路就要廠、沒有廠就沒有路。

「反六輕」最終之所以能成功，雖然是縣長手中握有核發「建築使用執照」及「水權」兩張王牌，但最重要的還是宜蘭整體民意的支持。反六輕成功後，我也乘勝追擊，將無尾港劃設為全國第一個水鳥保護區，斷絕台電在蘇澳設置火力發電廠的機會，終於達成我們保衛山明水秀家鄉的心願！⁷

除了捍衛水木清華的家鄉環境外，我在縣長任內也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希望將宜蘭打造成充滿人文書香的城市，而宜蘭縣史館就是最佳的典範。當時與我並肩作戰反六輕的這群知識份子，建議我改變過去由文獻委員會修撰史料的模式，改為替宜蘭撰寫各項專史，以利典藏及流傳。對於這些建議，我極為肯定，遂編列相關預算。而當時規劃三十六冊主題專史，需要大量史料作為論述基礎，遂廣為蒐羅各方重要文獻資料。不過這些為數龐大的資料如果於寫作完成後就廢棄，殊為可惜，我遂以此基礎，決定設立宜蘭縣史館，作為典藏這些專史及相關史料的堡壘。

其後，宋楚瑜因見宜蘭縣史館對文化建設富有貢獻及意義，乃要求各地方政府比照辦理，於各該地成立相關單位。不過，宜蘭縣史館一開始並無專屬館舍，是寄居於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內推展業務工作。後來我編列五千萬預算於現在縣政中心旁建造縣史

7. 游前院長率領宜蘭縣民力抗六輕及蘇澳火力發電廠進駐宜蘭之歷程，可參見游錫堃，〈丹心照汗青—六輕撤離宜蘭 20 週年有感〉，《雪隧觀點雙周刊》，58 期（宜蘭，2011.3.24），頁 1-4。http://www.yilan.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2:no58-20&catid=3:newsflash&Itemid=56，點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27 日。

館專館，並以一棵大樹為營造概念，讓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於樹蔭下享受閱讀的快樂。不過縣史館的完工，並不是在我任內落成。這種情形包括了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北宜高速公路的各條聯外道路等等重要建設，都是在我任內開始進行規劃，歷經多年努力，方有今日之規模。我並不在乎各項建設是否於任內完工，即便我前任陳定南縣長未完成的羅東運動公園、冬山河親水公園等重大建設，我也積極予以完成。我的目標與想法僅是讓一件好的事情可以順利完成，嘉惠後代。

我特別要提到的是，現在頗受外界關注的蘭陽博物館，當年是由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張譽騰博士，以及現職「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的呂理政教授（1950-）兩人悉心規劃而成的結果。當時他們提供給我一個重要的觀念，希望讓宜蘭縣成為一個大博物館，將各類具有特色的小型博物館散居各地，成為博物館家族，藉以將宜蘭打造成深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空間，其中，縣史館即為重點館。其實，我經營宜蘭縣政都是用這種概念，就是把全縣當成一個社區、一個舞台、或一家企業經營，例如我辦理國際童玩藝術節，就是把整個宜蘭視為一個大舞台思考。

有人說，我國各重要國家博物館中，「國立歷史博物館」有歷史沒台灣；「國立台灣博物館」有台灣沒歷史；直到不久前開幕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才有歷史又有台灣。簡單講，「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規劃內涵才有台灣主體性思考，而這樣的思考，「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只能算第二家，因為不論從籌建起算或是從開館算起，我縣長任內規劃的「蘭陽博物館」都是台

灣第一家。

今年5月，台、日達成漁業協議，我感到欣慰，因為宜蘭漁民的捕魚權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釣魚台問題我一直很關注，這種因緣源自於幼年的記憶及經驗。我生長在宜蘭縣冬山鄉，孩提年節時跟著先母到市場挑選魚貨，先母會拉開魚鰓檢視，以確認新鮮度，並隨口嫌一下說：「這個魚，好像不怎麼新鮮哩！」這時，魚販通常會回覆一句：「啊！無人島的，哪會無鮮呢？」魚販所謂的「無人島」，就是現在所指的釣魚台，是個非常好的漁場。在冷凍設備還不是那麼發達的時代，從釣魚台捕撈回來的漁獲，就是「新鮮」的代名詞。

釣魚台是宜蘭漁民特有的漁場、無人島這個名詞從小就烙印在我心中（1972年內政部核定釣魚台屬宜蘭縣頭城鎮轄、任省議員時聽到李登輝宣示釣魚台主權屬於中華民國，自然而然堅信釣魚台是台灣的領土），及至擔任縣長時，為了釐清台日爭點、豐富我方論述基礎及研究如何照顧宜蘭縣漁民的捕魚權，我在1997年編列預算以宜蘭縣政府主辦，邀請台灣法學會承辦「釣魚台國際研討會」⁸。

辦理「釣魚台國際研討會」，另一個未對外公開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國際法學者的交流與研討，研究是否可以藉這個領土或漁權爭議控告日本國，讓海牙國際法庭接受審理，藉以釐清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這個研討會並不被中央政府祝福，因為當時李登輝總統曾托人帶來表達反對辦理的訊息。

8. 台灣法學會、台灣國際法研究會編輯，《1997 釣魚台國際法研討會論文與討論紀實彙編》（台北：台灣法學會、台灣國際法研究會，1997）。

擔任行政院長

民間企業任職及兩屆省議員、兩屆縣長的經驗，讓我對於各種基層事務與建設有深入瞭解，所以在行政院長任內能夠深入民間，確實瞭解地方需求，知道問題核心所在，而不被表象所矇蔽，進而節省公帑、有效監督與推動各項施政。就這點而言，是我們與馬政府的劉兆玄（1943 - ）、陳冲（1949 - ）等內閣最大不同之處。

治水工程是我擔任院長期間內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以基隆河為例，由於台北市甚早就升格為院轄市，建設經費相對充裕，所以針對與台北縣交界的基隆河段，以 200 年洪水頻率的規格興築堤防，使得基隆河沿台北市一側的堤防較高，以致水流只能宣洩到以 10 年洪水頻率規劃的台北縣境內，造成該縣水災頻仍，居民怨聲載道。

水往低處流，按照常理洪水氾濫會自然流竄於河流的兩岸土地，災害不會集中於一邊。但如果只有單邊築高堤，必將造成未築堤或築低堤的另一邊產生嚴重災害。此外，台北都會區也較欠缺「滯洪區」的觀念，以致有一些原就較為低窪地區一帶都蓋滿建築物，造成河川上游洪水無處滯留，快速往下宣洩，因此常造成中下游河水暴漲，釀成災害。

歐美先進國家治理水患是蓄洪、導洪、滯洪、分洪、束洪兼用，我國治水以束洪較多，這就是為何台灣到處都會看到河川直直的、堤防高高的主因，這導致人們失去親水的機會。例如大

直地區就是截彎取直，高築堤防，使水流加速往下，對下游的社子島造成洪泛壓力。過去政府以「束洪」的理念治理基隆河，造成後來防洪必須高築堤，堤防標準只有台北市十分之一的的新北市，每遇颱風豪雨當然就氾濫成災，屋毀人亡，其災損的代價相較於內湖、大直一帶因截彎取直帶來的效益還要高。因此，我擔任行政院長時，責無旁貸，編列了316億特別預算，期能徹底整治基隆河解決水患。而大家熟悉的員山子分洪道僅是其中一項治水工程而已，其目的在另闢渠道，提供分洪效果。

施政要揭示願景、設定目標、訂定策略、凝聚共識、發揮團隊精神才能大步往前邁進。我在內閣三年任內完成雪山隧道貫通、西部高速公路網通車、基隆河整治、中科營運、高雄自來水改善、九二一災害重建、金融改革等多項重大政績，就是因為我們是個有目標、有策略、肯努力的團隊。

此外，讓我感覺自豪的地方，是我察覺單靠工業經濟已不足以支撐台灣未來經濟發展與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因此我推動經濟升級與轉型，積極發展知識經濟，提出以「人本」、「永續」為核心價值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並設法在我的任內逐一落實。其中，人才培育是整體計畫的重心所在，我們藉由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為國家積極培養人才。

如何提升台灣研發創新能力，也是一個施政重點，所以我們又規劃國際研發創新基地，邀請英特爾、戴爾、微軟等企業到台灣設置研發中心。此外，另有文化創意產業計畫、產業高值化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數位台灣計畫、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

水與綠設計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等，⁹ 試圖從全方位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建設一個截然不同的新台灣。日後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所發表的愛台十二建設，內容多不出此範圍。不過在計畫推行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例如 2003 年的 SRAS，以及 2004 年陳前總統連任時遭遇槍擊等重大事件，就影響了觀光客倍增計畫。但整體而言，我們執政八年的整體績效是相當良好且有的！

對民進黨中國政策的看法

1999 年 5 月 8 日，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代會通過淬融黨內外專家學者的意見與看法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我時任黨部秘書長，黨主席為林義雄，制訂〈台灣前途決議文〉整個過程我皆參與其中。我認為一個傑出的政黨，有責任讓人民知道他們將把國家帶往何方？〈台灣前途決議文〉主要內容為描述現實狀態，而非揭示國家願景。因此我 2007 年擔任黨主席時，努力推動〈正常國家決議文〉，希望補足〈台灣前途決議文〉的不足處，提供台灣人民一個可以共同追尋的美好願景！

黨內部分領袖可能認為民進黨的核心主張台灣獨立、一邊一國等無法吸引中間選民、不利選舉，故對這些名詞噤若寒蟬，採用「台灣共識」、「九六共識」、「憲法一中」、「憲法各表」等口號模糊之，甚至連「正常國家」的願景都不敢言。如果連黨內領袖都不敢高聲宣揚自己的主張與理念，台灣人民如何瞭解民進黨的目標與方向？

9.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詳細內容可參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網址：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1570&ex=2>，點閱日期 2013 年 6 月 27 日。

我記得幼年時，家鄉耆老常指著東方一顆明亮的星，告訴我們那是真主星，並說每當真主星出現時就會「出真主」，有如歷史上出現朱洪武一樣；又說「出真主」會伴隨著30到50年的飢荒，但其後人民就會「出頭天」。

「出頭天」這三個字對台灣人而言，其定義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的改變。最早是「出真主」，其後認為是「組黨」實現政黨政治，接著是「台灣人作總統」，然後是「政黨輪替」，現在則普遍認為台灣成為「正常國家（正名、制憲、入聯）」，才是真正的「出頭天」。

我認為正常國家是台灣人最重要的願景，是「台灣民主運動」的「終極改革」，民進黨應該積極論述，努力「經營國會過半」，早日落實「完全執政」，實現正常國家的理想。

對民進黨 2012 總統敗選的省思

2002年2月我接任閣揆，距離2004年3月總統選舉只剩兩年兩個月，每思及最多只剩24個月，要把陳總統的政績表現出來，就感到壓力極大。

在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中，面對國內核四風暴後的朝野對立、國際網路科技泡沫化後的經濟蕭條，經濟成長率-2%（創歷史新低），失業率5.17%（創歷史新高），內閣團隊可說舉步艱難。

為了在短短兩年期間做出政績，幫助陳前總統競選連任，全

體閣員殫精竭慮、全力以赴，被稱「戰鬥內閣」。策略上除了著眼短期施政，以擴大內需方式推出 500 億救經濟、200 億救失業外，也思考中長程施政及政黨輪替後還未處理的「價值轉型」，推出「挑戰 2008 國發六年計畫」；並抓大放小，東南西北中各選擇一個與振興經濟或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重大建設積極推動，它們就是「東」雪隧、「西」部高速公路網、「南」高雄自來水水質、「北」基隆河水患、「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甚至有的日夜趕工，終於在大選之前全部完成，使 2004 年總統選舉時，幾乎聽不到民進黨沒有政績的聲音。

然而民進黨八年執政也有諸多該省思及檢討的地方，要檢討必須先說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就國際來說，全球化和中國磁吸加速、國際網路科技泡沫化及中國在外交上全面打壓，都是無法迴避的挑戰；至於國內部分，朝小野大的脆弱政權；沉重的歷史包袱，如金融逾放、財政負荷及專制政權的歷史遺緒等，加上災後重建工程艱鉅，如九二一地震重建、納莉風災復原、SARS 防疫等，均讓民進黨政府疲於奔命。

不過整體而言，民進黨執政相當有成效，包括了強化台灣主體性、深化民主內涵、軍隊國家化、情治中立化、落實進步價值、厚植國家實力、工業經濟轉型知識經濟等；但我們仍然有諸多需要檢討的地方，例如未成功改革權責不符的憲政體制及不公平的政黨競爭；執政初期缺乏中央執政經驗；閣揆更迭頻繁且更換時有如政黨輪替；錯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 1946 - ）上台時的美台商討國家定位機會等問題。因此，我認為未來重返執政

應該可以考慮下列事項：加強對台灣主體性的堅持、最好不找有意參選下屆總統者接任閣揆、儲備政務官人才、建立國際信賴，以及落實轉型正義等等。

其實就中國政策而言，我認為必須先清楚我們自身具備的優勢及劣勢。在中國尚未完全崛起時，國民黨政府就已經知道中共黨國主義對台灣的影響力至深且鉅，採取戒急用忍政策，但卻忘了積極強化我們本身的研發創新能力。現在馬英九的執政，對中國幾近全面開放而忘記全球布局，過度親中造成過度依賴，而傷害了台灣經濟主體性。當下台灣各級民意代表及社團幹部爭相登陸，接受中國款待，如果說對台灣發展沒有衝擊，這是自欺欺人。雖然我心中感到憂心，但這就是近年來的兩岸交流現狀，中國對台灣影響越來越大。

要扭轉馬政府帶來台灣主權及經濟主體性流失的危機，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民進黨國會過半。國會能夠過半，總統勝選自然水到渠成；國會過半，即使總統大選失利，也能確保台灣主權。以過去八年執政經驗為例，即便總統勝利，但國會朝小野大，重大改革如轉型正義、不當黨產追討等無法推行，根本不算是真正的執政黨！當然國家正常化的工作更不用談了。

當我剛開始推動這個想法時，許多友人及網友紛紛表示台北市、金門、馬祖、花蓮、原住民等席次勝選機率不高，幾近不戰已敗，因此實現國會過半的可能性不高。真的有那麼困難嗎？雖然我國現行制度「政黨競爭不公平」，國民黨擁有龐大黨產作後盾，不過我認為也不是沒有機會，民進黨現有 40 席、台聯 3 席，

泛綠共 43 席，但新北、台中、彰化等地有許多選區和國民黨票數相差不多，特別是總統、縣市長選舉綠大於藍的地區機會更高，只要重用人才、認真服務，紮根基層，一定有勝選的機會。想要全面勝選有困難，但要比本屆多贏 17 席，讓泛綠在國會穩定過半擁有 60 席並非不可能。關鍵在於中央黨部是否把重心放在「經營國會過半」。至於有人擔憂統獨爭議及兩岸政策還是會不利民進黨，我認為在小選舉區的立委選舉，重要的還是服務與經營，台灣主體性主張反而有利泛綠候選人得票，不用擔憂。

今年 5 月，我在民進黨的全代會中，提案建議在擁有兩席立委選區以上的縣市從速設立「區黨部」，除可深耕基層、強化服務、改善鄉鎮市區黨部裁撤導致黨員參與不足、基層組織弱化等問題；如能同時配合「2016 國會過半及總統勝選計畫」，可望早日實現重返執政，也可帶動 2014 年七合一選舉勝選。如果中央黨部願意落實，由專責人員在區黨部服務，各社運團體及及關心台灣主體價值觀的人民必會共襄盛舉，當能補強組織弱化的弊病。此提案可謂百利無一弊，卻未獲通過，甚為可惜。我實在很難理解為何中央黨部不願意推行這項政策？

一直以來，國內外對台灣主權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大約可分為「主權屬 ROC 說、主權屬 PRC 說、主權屬美說、主權屬住民說、地位未定論說、離日獨立說、隔離獨立說、演化獨立說、公投獨立說」等九種主張。其中「公投獨立說」除中共、美國、國民黨反對外，其他主張者都能接受，只是如果中國、美國持續堅決反對，既使民進黨重返執政，直接辦理獨立公投的困難度，仍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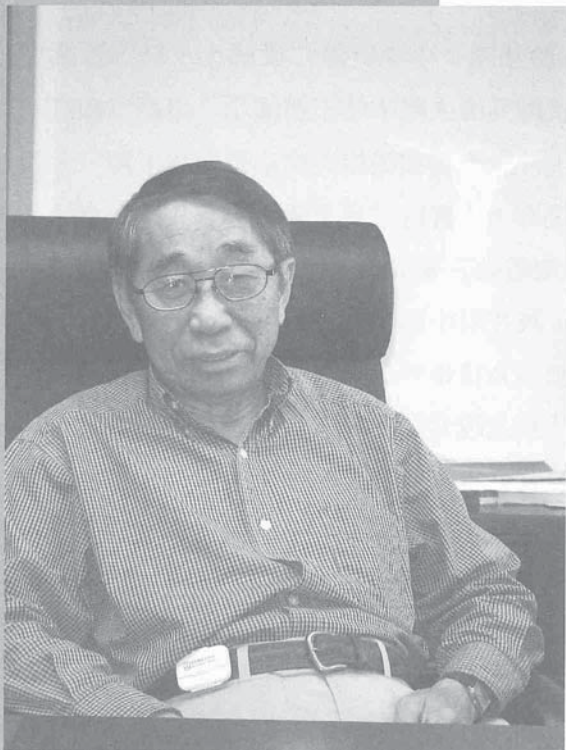
相當地高。

不必辦理公投而可以使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唯一途徑就是民進黨完全執政。完全執政後的總統領導全國人民，並可透過國會落實各項政策主張；所有不適宜的法律都可以在國會中透過立法程序制定、修正或廢止。只要實現民進黨完全執政，根本不必再進行公投挑動國際強權的敏感神經。所以，民進黨當務之急應該是腳踏實地全力經營國會過半，並藉以帶動總統勝選，早日實現完全執政。

我希望有一天，台灣大選開完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完全執政，那時不但中國沒有動武的藉口、美國也沒有干預的理由，台灣國家正常化就堂堂溪水出前村。

國民黨是對手，中共是敵人

賴義雄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林志晟

時間：2013年4月26日

地點：College Park Holiday inn

賴義雄，1940年出生於基隆，台灣大學土木系畢業後即赴美深造，1969年以優秀成績獲得美國西北大學博士學位，隨後在美執教多年。因1975年返台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時，受康寧祥囑託於美國推銷《台灣政論》雜誌，以及促成黨外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尤清等四人於1982年聯袂訪美，壯大黨外聲勢，遭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無法返鄉。2002年受邀回國出任國家實驗研究院董事長一職，並籌劃「科技台灣新國力」電視節目，向台灣社會推展科技教育。

我的簡歷

我在 1940 年出生於基隆，小學就讀仁愛國小，初中及高中都在師大附中讀書。我剛到師大附中時不諳國語，但高二和高三時，被教官選為司儀，升旗典禮和降旗典禮都是由我主持，並帶領全體三千多位師生高呼：「實行三民主義！中華民國萬歲！」等等口號。我其實不知道教官當初為什麼要選我，或許是我講話比較大聲吧！另外，我在附中時參加了射擊隊，還得過附中的乒乓球單打冠軍，也被選為模範青年。我於高一時，曾在基隆區打到第八名，本來要代表基隆參加省運會，但是有人說我是小孩子，不能參加，就指派其他人去參加了。後來我順利保送台灣大學土木系。當時大家都討厭上軍訓課，可是我對軍事甚感興趣，所以上軍訓課時，我都坐在第一排和教官對話。其後，我自台灣大學土木系畢業，入陸軍盪寇部隊服役，退伍後到台大擔任了一年半的助教工作。

1965 年 3 月，我到美國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繼續讀書，主攻水利工程及流體力學。我之所以選擇這兩項專業的原因，是受到 1960 年代美蘇冷戰對峙所影響。由於蘇聯率先於 1957 年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令美國人大為震驚，因此艾森豪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 - 1969)遂利用電視向全體國民發表演說，呼籲美國數理資優生，為了國家，不要讀醫科或法律，應該去讀理工科系，造成 1950 年代末期到 1960 年代初期時，美國挹注大量經費與資源投入理工教育，使得許多美國數理優秀的學生，都選擇讀理工科系。此外，由於美國投入

大量經費，留學生比較容易拿到獎學金，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兩種科目作為專業。許多台灣人到美國留學，也都選擇最熱門的流體力學（fluid mechanics）或固體力學（solid mechanics）就讀。

我在西北大學的求學相當順利，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於1969年時取得博士學位，後來到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擔任博士後。1970年前往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ilwaukee）密爾瓦基分校教書，時間長達十年。1975年對我而言，是人生的轉捩點，因為我參加了國建會（國家建設研究會）。¹雖然當時我已經流露出不滿國民黨政府的言論，不過生性使然，不喜歡被束縛，加上我意見也多，不想造成別人困擾，所以並沒有參與台灣獨立聯盟等組織。這期間張燦鑒曾兩度來我家找我，試圖說服我參加。我也坦白對他說：「燦鑒兄，我們是好朋友，你知道我的個性，也清楚我適合作什麼工作。如果我參與了聯盟，大概沒多久就會退出，這反而不利於組織發展。」

基於種族及社會身分等各項原因的考量下，其實我只曾參與

1. 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強在國際舞台孤立中華民國政府及對海外學者專家進行統戰。為此，中華民國政府為因應國際情勢的變化，號召海內外同胞團結，決定召開以海外學者專家為主的國建會，並於1972年舉行首次會議。當時的召集單位包括教育部及救國團，以後逐年召開。1978年，美國宣布不再承認中華民國，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為因應變局擴大參與，提高籌備單位層次，遂由行政院主持，並於1979年舉行兩次國建會，增列政治、外交課題。由於國建會觸及台灣政治改革等敏感議題，深受各方矚目。1983年以後，國建會討論的內容逐漸偏重科技發展、文化建設以及經濟建設等具體政策事項，而隨著國內政治改革的進展，言論自由日漸開放，國建會在台灣政治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成為歷史。參見薛化元，〈國家建設研究會〉，收入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瀏覽網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11/cca220003-li-wpkbhisdict002379-0714-u.xml>，點閱日期：2013年5月16日。）

同鄉會及教授協會兩個民間自治團體。我於 1980 年擔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 創會理事一職時，還在威斯康辛大學服務，但不久就辭職離開該校了，翌年改擔任副會長，而我也參與該會章程起草的工作。我認為在理事會的架構下，也要有研究、財務和出版等常設單位予以配合。我主要負責出版項目，並擔任編輯長達三年。其後，我在 2000 年從 TRW, Inc. 退休。

2002 年年底，因為國科會所轄的機構都要轉型為財團法人，所以當中所屬的實驗室乃於 2003 年轉型為國家實驗研究院。由於財團法人必須籌組董事會，而董事名單則是由行政院長指定，因此我被邀請擔任董事一職長達三年。2006 年時，我第一任董事的任期屆滿後，又出任無給職的董事長，但並未任滿。到馬英九上任後，我就立刻辭職，為期兩年半。就我所知道的財團法人董事長中，只有我是無給職，一毛錢也沒有領過，還必須為了預算問題時常跟立法委員們溝通協商。2007 年年底，受大同大學吳建國校長之邀，我前往該校擔任講座教授，這才有領薪水。在這段期間內，因為我與民視的蔡滄波很熟，便利用向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申請到的一千五百萬元經費，主持了「科技台灣新國力」電視節目，每星期播出一次，每次半小時，介紹不同的主題，一共持續二十六週，藉此推廣台灣科技發展。

然而我之所以想要籌劃「科技台灣新國力」這個節目，是有感於台灣媒體缺乏報導科技的人才，無法廣為宣傳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尤其是看到 2005 年 5 月 15 日刊行的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week*) 在封面寫著「Why Taiwan Matters」(為何台灣重

要？），² 並以相當篇幅討論台灣，顯示台灣在世界已佔有一席之地，特別是台灣高科技產業中有許多項目在世界執牛耳，可謂欣欣向榮。但是在台灣媒體不斷唱衰的情況下，台灣民眾對此並不清楚，也無從得知台灣科技業的成就與驕傲。我從 2002 年後陸續有機會返台，對此種狀況感到非常失望，所以就找機會跟蔡滄波（民視新聞部副理）討論此事。

不過蔡滄波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此事，因為媒體從業人員多數為人文科學背景，對科技產業比較生疏，不知從何報起，後來我就安排蔡去參觀新竹科學園區，他覺得很棒，但仍不知道如何報導，於是我才決定自己出面安排此事。而蔡夫人鄒明珊女士也積極奔走，幫忙找了不少年青人共同投入，並由我擔任指導。後來擔任華視總經理的小野（1951 -，本名李遠）看到這個節目也覺得很不錯，便跟我商量是否願意讓華視重播一年。這時剛好因為和民視的合約也到期了，所以我就同意了。

我與《台灣政論》

我於 1975 年返台參加國建會時，在會外結識了許多黨外人士。其中，透過我的小學同學，後來任職台大等校的林鐘雄教授介紹，輾轉認識了時任立法委員的康寧祥先生，他是我所結交的第一個黨外友人。當時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等人，已在籌設《台灣政論》雜誌，因此得以和這些人結為友人。在國建會開會

2. 瀏覽網址：<http://www.businessweek.com/stories/2005-05-15/why-taiwan-matters>（點閱日期：2013 年 5 月 16 日。）

期間的晚上，陳菊和蘇慶黎（1946 - 2004）常常來我下榻的旅館接我去和郭雨新、姚嘉文、張俊宏等黨外人士會面。

康寧祥曾請我幫忙在海外協助推廣《台灣政論》雜誌，而從1976年就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我也慨然允諾。此後，我就成為《台灣政論》的海外總代表，並在美國設立十六個地區代表。我印象中銷售狀況很熱烈，當台灣將剛出刊的第壹期寄來代銷不久，全美國就迅速熱賣四百多份。

我想《台灣政論》會受到支持的原因，是因為自從《自由中國》及《文星》被查禁後，台灣已經很久沒有一份批判國民黨統治的報刊雜誌。不過《台灣政論》僅發行五期，就政府被勒令停刊。當時國民黨政府在美國 DC 特區（District of Columbia）還設有大使館，所以刊物被禁刊後，支持民眾自主發動到駐美大使館的示威遊行。想當然爾，這樣的示威遊行並沒有任何效果。後來有人提議可以連署上書給蔣經國表達意見，不過我想到如果連署書都是台籍人士簽名，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可能沒有形成任何壓力，因此就聯合被視為自由派的外省籍人士的阮大仁、張系國（1944 - ）、黃默等人，作為共同發起人一起進行連署簽名。

當時我們除了連署簽名外，還發表一份聲明，表示為我們這些成員不分地域，是為了爭取台灣的民主與言論自由才群聚在一起。最後，參與連署的人數約有兩千餘名。媒體也在連署的過程中來採訪過，並指出我們這群人在美國表現出的抗議聲浪非常顯著，而阮大仁是時也常在《星島日報》的美東版撰文針砭國民黨政府。對於刊物被查封一事，不僅是台灣人民感到憤慨，海外的

自由派外籍人士亦同仇敵愾，所以給了政府相當大的壓力。

1976年1月，素不相識的江春男，透過經友人居中牽線，曾打過電話來找我，表達希望探訪我之意，隨後就到了密爾瓦基（Milwaukee）拜訪我。當時我心想：他是《中國時報》的記者，似乎和我的立場不大一致。不過我們在談話過程中，他曾表示《台灣政論》中談論外交事務的相關文章，其實都是他以筆名撰述的，因此我後來也覺得他的立場應該沒有問題。日後他就轉到《八十年代》擔任總編輯。同年2月，當時還是國民黨籍省議員的許信良也從舊金山來電表明他是張俊宏好友，張有口信託他代轉給我。我本來希望他在電話中講就好，但他認為還是要親自跟我見面，所以搭飛機來密爾瓦基跟我晤談，並深聊了整夜，直到翌日凌晨四點才結束對話。其實我心中十分納悶，如果張俊宏有事請他代轉，為何不在電話裡說清楚，非得大老遠地折騰跑一趟呢？

我當然清楚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的幹事，是李煥的部屬。因此，我推敲是李煥請他前來瞭解《台灣政論》帶來的滿城風雨究竟如何。由於大環境使然，對國民黨政府相當擁護的反共愛國聯盟（以下簡稱愛盟）勢力尚屬薄弱，而保釣活動正如火如荼，所以保釣人士一路壓著愛盟。所以我們在對話時，我就告訴他：「許先生，請你代為轉告李煥先生，如果《台灣政論》能無條件復刊的話，我賴義雄和友人願意出面與保釣運動的相關人士辯論，相信正義是在我們這邊。」

聽完我的話後，許信良立即翻開記載了好幾組李煥電話號碼

的筆記簿，馬上就在我家用我的電話打給李煥。我好意提醒他必須注意時差問題，不過他們兩人的對話很快就結束。許信良告訴我李煥認為此事不便在電話中多談，要求他立即返台報告此事，所以許立即搭乘第二天的飛機返回台灣。當然這件事情到後面不了了之，沒有一個結果。之後康寧祥到美國找我時，我曾告訴他這件事情，康寧祥才告訴我找錯溝通對象了。因為當時《台灣政論》一案是由王昇負責的，李煥只是想從旁瞭解而已，無法從中協助，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所以《台灣政論》也無法如我所願地復刊。厥後，康寧祥持續發行《八十年代》、《暖流》、《亞洲人》等雜誌。

「黨外四人行」訪美

1979年12月，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黃信介、姚嘉文等人相繼入獄，黨外重量級人士只剩下康寧祥沒有身陷囹圄，所以自然就由他成為領導黨外發展的核心人物，不過他也無法有所施展，心中感到非常低潮。當時因為《台灣政論》一案，我被國民黨政府所限制，無法回鄉探親，直到1982年3月家母過世，國民黨政府勉為其難，發給我單次簽證（single entry）返台奔喪。處理完家母後事，康寧祥約我去他家吃飯，並告訴我他想籌組黨外四人行訪美一事，請時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副會長的我能居中代為安排與協助，目的在於突破過去只能個人出國訪問的限制，希望能醞釀籌組政團之氛圍。於是我就利用該會將於田納西（Tennessee）召開年會之名義，正式邀請時任立法委員

的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以及監察委員尤清等四人聯袂於1982年前往美國訪問。

康寧祥等四人來美期間，他們先到休士頓參加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以下簡稱世台會），也在加州接受張富美等人的接待，不過他們主要目的，仍是在 DC 地區進行為期一週的訪問行程。他們四人列了一些想要的訪問對象名單，如曾擔任美國駐韓大使的 William Gleysteen 與後來接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 Paul Wolfowitz 等人均名列其中。當時我已經搬到 DC，所以也便於處理這些事情。康寧祥想會見 Gleysteen 的原因，是因為南韓總統朴正熙（1917 - 1979）被部屬金載圭（1926 - 1980）暗殺身亡時，南韓政局陷入一片混亂，一直要等到全斗煥接任韓國總統後，才結束亂局。而這段期間，正好是 Gleysteen 在南韓擔任駐美大使，韓國各界都積極與 Gleysteen 接觸。因此，康寧祥想瞭解 Gleysteen 究竟如何處理如此紛亂的政治局勢，想借重他的經驗，提供借鏡。

當時康寧祥在行前特別交代我，要到他們確定成行的當日才公布周知，避免事機洩漏，國民黨政府將百般阻撓。而在他們出訪前數日，美國國務院曾致電給我，詢問是否由我協助安排康寧祥他們訪美的相關事宜，並表示他們是否有需要協助？我也坦然回答：「他們到美國訪問是我安排協助的沒錯，而所有行程已大致抵定。但因經費不足，如果國務院願意協助的話，他們四人預計訪問 DC 一週，此部分的費用希望能由國務院幫忙處理。」最後國務院同意負擔此筆費用，並給予每人每天 75 塊美元的零用

錢。這解決了我不少的困擾，不然我就得四處奔波籌款。國務院此舉具有高度象徵意涵。

在他們來美期間的某一天晚上，我去他們下榻的飯店探視大家，閒話家常。我在跟康寧祥的對話中，語重心長地向他表達我的看法：「台灣黨外勢力派系林立，為何不整合眾人之力，組織一個政團呢，遴選一位主席帶領大家呢？」我的言外之意，其實是想勸他出來擔任這個角色。我們旁觀者做如是觀，認為應該成立一個組織。只是康聽完後笑笑地答覆我：「你在外頭看不清楚，不曉得這當中有多麼複雜。」雖然這件事情已經過了三十餘年，但仍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舉這例子，只是想說明早在1982年時，康寧祥已有不能單打獨鬥的想法，只是囿限於《戒嚴法》、黨禁、報禁等等不合理的規定，以致無法實現。而康等四人返台後，我相信蔣經國也應該意會到康究竟想要做什麼了，所以全力防堵他再次當選。因此，翌年進行第一屆立法委員第四次增額選舉時，訪美的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三人悉數落選，只由江鵬堅為黨外取得一席增額立委的席次，成為台北市唯一一席黨外當選者。尤清則是因為監察委員任期為六年，不必改選，所以沒有對他影響。

返台之路艱辛無比

1983至1986年黨外雜誌仍是蓬勃發展，銷售量也非常好，動輒上萬本。不過國民黨政府也不甘放棄，三不五時採行沒收手

段，但黨外也有對應之道，立刻就加印數量，回敬國民黨政府的霸道，也使得康寧祥陸續辦了三個廣為人知的黨外雜誌。然而《台灣政論》雖然被查禁不得販售，不過由於原來的人際網絡猶在，所以康仍委託我代為販售這些黨外雜誌。雖然1986年進行第一屆立法委員第五次增額選舉前我外祖母逝世，我試圖想要返台送她最後一程，但始終沒有獲得國民黨政府核發的簽證，以致無法成行。

當時我在美國常和主管亞洲或台灣事務的美國官員，如美國國務院台灣事務科長班立德（Mark Pratt）等人吃飯，他們聽到我未能返台奔喪，感覺非常沒有道理。他們數度詢問我原因，但我也無從說起。班立德聽到後表示，是否願意由他出面替我詢問狀況，我當然同意由他幫忙。後來時任駐美代表的錢復（1935 - ）致電給班立德，表示因我與康寧祥交好，加上家中時常宴請由台灣來的黨外人士，造成政府諸多不便，因此拿不到簽證。我當下覺得這理由十分荒唐，因為康寧祥並未犯法，為何我不能和他深交？家中時有友人造訪，為何不行？

然而對於因這種荒謬的原因而拿不到簽證一事，我心有不甘。所以後來我打電話給康：「我們相識多年，多半是你對我有請託，這回換我有事相求。」他問我：「究竟有什麼事情？」我便將國務院官員告訴我的話如數轉達給他。他聽了後好氣又好笑地說：「國民黨政府真是亂來。」我也不管他怎麼說，只希望他能盡力幫忙讓我可以返鄉送外祖母最後一程。過了兩天，協調處居然就通知我去辦理簽證事宜，我當時心想康寧祥還真是神通

廣大呢！拿到簽證後，我就立即返台。

我能返台，其實有一段偶然的插曲。由於章孝嚴某次因公到 DC 一趟，曾任美國駐台北新聞處處長的唐能理（Neal Donnelly）邀請他吃飯，並找我作陪，所以我曾在唐能理家和章見過一面，其中後來主管遠東事務的 Carlford 也是賓客之一。我依稀記得在餐會席間，有人刻意問章孝嚴：「台灣住民有高達八成是本省籍，外省籍僅佔約兩成不到，但國家權力幾乎全部集中於外省籍人士手上，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章回道：「我們並沒有省籍畛域歧視問題，一切唯才是用。」我聽到後心中十分不以為然，所以非常不客氣地高聲說：「章孝嚴先生，我對你十分失望。你此言意指台灣沒有人才，都是外省籍人士憑藉自己的能力獲得權力與地位。二二八事件時，你們戕殺了多少台灣人才與菁英，現在居然在這裡說這種風涼話！」之後他努力向我解釋與說明。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於 1978 年宣布「中」、美斷交後，美國政府召回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僅剩班尼德及唐能理兩名參事在台處理善後。我和唐能理認識，就是他結束在台任務後返美時於 DC 結緣的。而唐能理駐台十餘年的期間，積極收集台灣各地的神像，家中藏量之豐猶如宗教博物館，並於 2006 年出版了一本談台灣神像的書。³

在唐能理家中的會面已讓章孝嚴對我深刻印象，所以當我回到桃園機場時，康寧祥、江春男、鄭欽仁等《八十年代》雜誌的重要成員都到機場接機，而康一見到我就說：「義雄兄，如果你

3. 唐能理（Donnelly, Neal），《台灣的神像：一名美國文物收藏家研究紀事》（台北：藝術家，2006）。

家中事情辦完，煩勞你從基隆到台北一趟，章孝嚴想找你聊聊。」當時我也十分好奇為何已貴為外交部政務次長的章知道我要返台？康才向我解釋說不然我如何取得簽證返台？這時我才知道原來是我先向康請託，康又致電章，才讓我能順利成行。於是我向康回道：「可以在外面與章見面，但不要去他的辦公室。」所以後來我們約在來來飯店的咖啡廳見面，談了約兩小時之久。

1986年，我們全家返台奔喪。當時我女兒就讀大學二年級，兒子則是唸高中二年級，所以之前並沒有機會看看自己的美麗家鄉。因此，我處理完外祖母的後事，就帶著他們到中南部旅遊，藉此好好瞭解故鄉之美。由於當年我擔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所以返台時台灣媒體曾以「擔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異議份子賴義雄返台奔喪」等語句報導我回台事宜，並詳載我曾和誰會面，其中包括了林洋港，以及擔任過屏東縣縣長的張豐緒（1928 - ）等人，而這些見面場合都是康一手安排促成。我其實不清楚康的用意何在，但我曾經向他說過想要理解國民黨內部的想法。康或許也是想要讓國民黨瞭解我們這些海外台胞的所作所為。

與馬樹禮會面的影響：催生民主進步黨⁴

我記得1986年7月23日時，我們全家和親戚開車到高雄遊玩，而康寧祥與時任省議員的謝三升也由台北南下高雄作陪。旅

4. 關於賴義雄與馬樹禮的談話歷程，另可參見《新台灣新聞》週刊第433期。瀏覽網址：<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53866>（點閱日期：2013年5月16日。）

途中康趁機告訴我：「由駐日代表調回台灣擔任國民黨秘書長的馬樹禮（1909 - 2006）想和你談談。」我非常好奇他為何想見我，不過康說他也不清楚，只是代為轉達邀約之意。我向康說：「我7月26日就要返美，我們全家又是開車南下高雄，如果要和他見面，又得開車回台北，時間上可能不大允許。」但在康的力勸之下，我只好在翌日和他一起搭飛機到台北，讓我太太、孩子及親友自行開車返回基隆。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應該是搭計程車在1986年7月24日上午10點45分於國民黨中央黨部馬樹禮的辦公室和他見面。兩人稍事寒暄後，他就開門見山地講：「我素來相當尊重一位黨外人士，但近來這位黨外人士的言論不甚理性。」我對這句話不大明瞭，於是反問他：「有什麼言論不太理性？」他回說：「例如有人倡言應該要總統直選。」我心想這句話乃意指康寧祥了。

這是因為當時黨外有所謂的黨外作家編輯聯誼會（以下簡稱編聯會）與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討會（以下簡稱公政會）兩大團體，不過因為1983年康立委落選，並無公職身分，於是他和林正杰向公政會總會提出申請，另外成立公政會首都分會。由於同年即將辦理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康遂提出了「台灣民主時間表」。而康在這張時間表傳單（Flyer）中提出了具體的意見：第一年廢除《戒嚴令》，第二年開放報禁，第三年解除黨禁，第四年國會全面改選，第五年總統直選所致。

馬樹禮對於康寧祥提出總統直選一事頗有意見，於是我就問他為何總統不能直選？他認為這樣做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

我則表示只要多數國民大會代表同意修改就可以啦，為何不能修正《中華民國憲法》呢？我們兩人的談話進行了約一個多小時候結束，他邀請我共進午餐，我也應允，於是我們兩人就在他辦公室一面享用梅花餐，一面繼續對談。其實我心裡對這次談話也覺得十分納悶，一來為何總統不能直選？其次何以找我來談總統直選的事情？我後來再三思索，才想到中國人講話喜歡拐彎抹角，加上國民黨宮廷政治氛圍的習慣，他不便指名道姓，但我推測他的意思應該就是想透過我傳話給康？

此外，在我們的對話過程中，我曾經問馬為什麼能接受國會全面改選？他說這件事情與總統直選有所不同，並列舉了許多理由想說服我。然而當時社會輿論不斷出現檢討「老賊」國代的聲浪，加上這些年事已高的民代拄著拐杖，或拿著尿袋，由傭人推著輪椅前去開會的形象與畫面，更是令全民無法接受。所以我最後終於體悟了馬的絃外之音：透露了總統直選絕對不行，而國會改選應該是蔣經國民主化改革的最後底線。直到下午二點四十五分，我告訴馬有事需先離開，才結束這次長達四小時的對話。

我回到住處不久，康寧祥隨即來電關心我們談話的狀況，也立即趕來和我會面，於是我就將經過一五一十地轉述給他，並告訴他蔣經國的底線就是不能進行總統直選，但國會全面改選等其他要求應該沒有問題。當天晚上張德銘替我舉辦 46 歲的生日晚宴，準備了三桌酒席宴請賓客。當我抵達飯店時，尤清及謝長廷站在門口歡迎我，尤清還說我的面子夠大，重要的黨外人士幾乎都到齊了。而當時因為當時黨外派系林立，新潮流曾進行「批康」

運動，以致謝和康兩人關係降至冰點，也跟黃煌雄略有心結，所以他講這句話別有用意。

在這場餐宴中，由陳菊擔任司儀，並邀請我上台致詞。我心想機會難得，於是就說：「黨外人士應該要團結一致，特別是許榮淑及周清玉兩人的先生都還在監牢裡，如果妳們兩人還相敬如『冰』，如何說服大家一起努力？希望能藉由這次機會大家盡釋前嫌！」我權充了一回和事佬。後來李鴻禧也講話了，他說：「今天如果不是看著義雄兄的面子，我也不會出席。」由李的這番話，不難想見當時的黨外內鬥有多麼激烈。當晚康寧祥也喝了不少酒，但是他理智還清楚，後來也站起來發言，向大家告知我當日與馬樹禮進行長達四個小時談話，並表示稍晚會由我對大家表明細節。

宴會進行到約十時餘，包括許榮淑、周清玉、江鵬堅、黃爾璇等一行約十餘人，隨即轉移陣地到謝三升提前預定的飯店房間內談話，而我是我搭乘許榮淑的車過去。到了房間後，由於在場人士多是黨外重要成員，已經有籌組新政黨的想法，也具有相當信心，只是未諳蔣經國的態度，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深怕稍一不慎，過去的種種努力會一敗塗地，因此康寧祥要我將與馬樹禮的談話經過向大家說明，希望提供給大家作為組織新政黨的參考依據。我也表達了我個人認為蔣經國的民主化底線應該是反對總統直選，但廢除《戒嚴令》、解除報禁及黨禁，以及全面進行國會改選深具可能的想法。雖然我提供了這些資訊，但他們仍得自行決策與判斷。沒想到兩個月後，這群黨外人士甘冒犯國民黨政府

大忌的風險，在圓山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我想我與馬樹禮的對話內容，對於籌組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而言，或許不無催生效果。

1986年7月26日，我啟程返回美國。過了不久，台灣就開始進行立法委員選舉。而我透過報紙知道康寧祥在8月9日的公辦政見發表會中，邀請了正好在台訪問的美國民主黨總部執行長Brian Atwood一起參與，而這場政見發表會也變成康準備組織新黨的說明會，不過我並不清楚他在這場會議中的發言內容。我猜測康會這樣做，應該是受到我和馬樹禮對話內容，以及我自己一些想法及判斷所影響。

1987年，我的繼父過世，康寧祥也順利當選立委。我回台處理繼父後事時，康寧祥陪我出席李煥設宴於三軍軍官俱樂部的餐約。在這場餐宴中，李煥問我對於開放榮民返鄉探親的意見。而我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當然贊成讓這些年事已高的榮民返回故里探視家人。但沒想到我這番話居然出現在隔天的各大報刊頭條，大意为「海外異議份子賴義雄贊成榮民返鄉探親」。康告訴我應該是被國民黨利用了，因為他們推行各項政策前，常常需要有人為其背書，不過我個人倒是覺得這是好事，所以感到無所謂。事後回想起來，國民黨似乎喜歡透過中人傳話或表示意見，如馬樹禮找我談話即是一例，

與各黨人士的互動

1986年，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由江鵬堅出任第一任黨主席。當時我擔任「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後來江派朱高正代表民進黨前往美國參與美東台灣同鄉會所舉辦的夏令會，向在美台胞說明民進黨的籌組緣起與經過。至於美西的夏令會，則是由因《蓬萊島雜誌》事件剛出獄的陳水扁代表出席。至於為何選擇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出訪，是因為陳剛出獄時，只擔任其妻吳淑珍（1952 -）的國會助理，並沒有任何黨籍職位，不過隨後他即成立「民進黨改造委員會」。而江鵬堅也因為曾與陳共事過，瞭解他的個性，知道他如果沒有提供一個舞台給陳，陳必定不高興。但是陳出獄時，民進黨各項職位皆已有人選，所以只好請他代表民進黨前往美西訪問台胞。當時美西夏令會因台灣福音教會與長老教會無法順利協調，以致停辦數年。後來在相關人士與「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在1987年復辦，當然這過程中我也貢獻了一己之力。

陳水扁來訪的演講場次，當然被視為當年美西夏令會最重要的活動，約有千餘人共襄盛舉，於是大會請我主持這個場次的活動。等到他步入活動會場時，大家給予熱烈地英雄式歡迎。我主持時就簡單說幾句話，表示大家對陳律師已經相當熟悉，他這次來是代表民進黨向各位致意。講完後，我便將麥克風交給陳，自己也坐到椅子上聆聽他的演講。陳拿麥克風後，轉頭問我有幾分鐘可以讓他發表意見，我說九十分鐘。陳水扁向我點點頭示意後，就開始演講。我已經忘了他當時確切的演講內容，只記得他

在九十分鐘的演講中，批評民進黨的時間約莫佔了半數以上，讓我坐立難安，不禁心浮氣躁，臉色鐵青，心中也開始埋怨江鵬堅怎麼會派這個代表來美訪問，猶如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雖然我事先已知道他是民進黨改造委員會，內心已有準備，只不過沒想到他居然敢公開批評民進黨。

陳水扁講完後將麥克風遞還給我，我也做了幾句回應，告訴他這是民進黨的說明會，而不是他個人秀。他一臉詫異地回我：「這不是阿扁個人說明會嗎？」我心想這麼重要的事情，他怎麼可能弄錯？過了不久，我因繼父過世返回台灣，並隨即去找江鵬堅談話，並抱怨他所挑非人。江亦有苦難言，對我表示他用心良苦，也完全沒想到陳會如此。

再回頭談到朱高正。他於1986年以高票選上立法委員後，在立法院橫衝直撞，可謂不可一世，甚至被封為「國會戰神」。他在第一任的任期內，曾來兩度來訪DC，都住在我家，一次約莫十天左右。他住我家的期間內，常常請我建議他需要進行什麼工作，我也依照自己的瞭解提供淺見。某日，他跟我說他想去見錢復，希望我能陪同他一起前往，但我表示不願意，希望他自己去。後來在他的懇請下，我還是開車載他到了錢復的辦公室，讓他可以順利和錢復見面。當時，他講了一句話，令我永誌難忘，他說：「錢代表你很有才氣，將來我們民進黨執政時，也一定會好好重用你！」那時我坐在另外一側，聽到這句話後心中暗笑不止。我想錢復也一定對於朱高正的狂妄感到無奈。

又有一次美國國務院邀請十位台灣立法委員訪問美國，各黨

籍名額則依照當時國會席次安排，所以八位分配給國民黨籍，另外兩位是民進黨籍，便由黃天福及張德銘代表出訪。有一天，我去他們住宿的飯店聊天時，張德銘狠批國民黨，我便對他說：「德銘兄，你在我面前責罵國民黨是浪費時間，沒有意義，我也會罵。我希望聽到的是你如何提出具體的改革意見。我也想聽到國民黨內部的意見是什麼。不妨由你和天福兄明天約兩、三位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到我家一塊用餐閒聊，我也找一些美國朋友來交換意見。」他聽了後立即說好。

隔天，他們兩人找了饒穎奇（1934-）和謝深山（1939-）等人來我家，我則是找了班立德、唐能理等美國友人作陪。我記得當晚饒穎奇要離開我家時，停下來對我說：「我來過美國很多次，



賴義雄（第二排左二）於自宅招待來自台灣的貴賓。（賴義雄提供）

每次拜訪別人都要正襟危坐，然後互相寒暄幾句客氣話，接著互贈禮品並照相後就離開當地，從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輕鬆愉快，不需要繫上煩人的領帶，又能隨意聊天，令我十分感動。」

翌年，又換黃煌雄及尤清來美訪問，我便問黃煌雄我該如何接待，他告訴我像上回這樣的模式就很完美了，連國民黨人都非常羨慕，所以後來由黃、尤二人帶著洪昭男及吳梓（1939-）來我家聚會，我用一樣的方式款待他們四人。沒想到在口耳相傳的狀況下，我這種接待風格後來居然變成常規。

另外有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一提，就是我1988年返台時，已經相當熟識的朱高正想要設宴接待我，於是在立法院的大廳訂了一桌酒席。朱向我說他於情於理都必須要好好款待我一番，只是我想和他單獨二人再敘舊，還是跟願意與集思會⁵的朋友一起聚聚。我心想多認識朋友也好，於是就告訴他願意和這些朋友一起吃飯，於是我們就到了來來日本料理店用餐。他一踏進店裡，氣氛立刻熱烈起來，當時王金平也在場。我心想朱白天在立院議場聲勢驚人，晚上卻是另外一番模樣。

5. 思會原名為集思早餐會，於1988年4月22日成立，首任會長為饒穎奇，黃主文為副會長兼發言人。該會創會之初，共有20位立法委員加入此一團體。該會組成後，一方面堅定國民黨內部增額民意代表，希望主導立法院運作，改良由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支配的現狀，另一方面也代表國民黨台灣本土派立法委員勢力的結合。此後，集思會便成為國民黨內支持李登輝政治路線的重要團體，而與後來的新國民黨連線（新黨的前身）相互拮抗。由於該會不為時任祕書長的宋楚瑜所喜，該會成員於爭取國民黨內第二屆立法委員提名時遭到嚴重挫敗，以致成員逐漸淡出運作，甚至退出國民黨。使得集思會無論在國民黨內或於立法院的影響力逐漸衰微。見薛化元，〈集思會〉，收入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瀏覽網址：<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contents/012/cca220003-li-wpkbhisdict003102-0915-u.xml>（點閱日期：2013年5月16日。）

而吳梓當晚因需招待香港友人，無法趕到來來聚餐，所以就打電話給朱，希望他能帶我過去見吳。因此，來來聚會結束後，朱就帶著我和王金平搭計程車去一家酒店找吳。這時我才真正見識到何謂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酒家夜生活。我進去後看見吳梓將一疊鈔票放在桌上，隨意發給招待我們的女孩子。而吳當時對王金平說話的口氣，猶如在吆喝晚輩一般。後來王金平也曾到美國的家拜訪過。總而言之，集思會的成員有好幾位連續數年來美國時，都有來拜訪我。

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情，只是想說無論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或者其他沒有參與各黨派的黨外人士也好，白天在立法院為了各自的利益、立場或想法而有所爭執，勢如水火，甚至大打出手；但一到晚上，眾人又和好如初，稱兄道弟。所以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私下溝通處理的。不過這種現象我不清楚是否為社會大眾所普遍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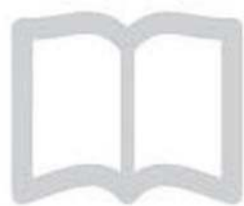
攜手同心一致對外

然而上述的這種現象讓我深有感觸，因為現在社會上瀰漫著「逢扁必反」、「逢馬必反」的藍綠對決氣氛，只會讓政局更形惡化，無論誰執政另外一方都會扯後腿，應該開始努力化解這種問題。雖然國民兩黨是政治上的敵手，但對岸才是我們最終的敵人。如果國、民雙方只是持續內鬥，遲早會被中共併吞，必須一致攜手對外。我們看看美國的共和及民主兩黨平時在國內也是爭

鬧不休，但只要遇到國家安全問題，兩黨立即團結對外。因此，當務之急，就是必須找出雙方的共識多多合作。我今年3月回台時非常高興，因為有許多國民黨籍的政治人物相當支持廢核運動。此外，如經典賽贏球時，不分藍綠，舉國歡騰，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有許多潛藏的共識想法，應該用「我們都是台灣」的想法推動台灣發展，才能解決中共對台造成的威脅，不然中共的恫嚇之舉恐怕沒完沒了。國民黨是對手，中共是敵人的這種觀念，一直是我根深蒂固的想法。

就我個人淺見，現在實在不宜喊出「台灣獨立」的口號。現在如果拋出一道命題：「是否願意接受中共統治？」我想應該有九成以上的民眾不願讓中共管理，這其實已經是一種共識。因此謝長廷所提出的「和中治國」理念，我認為是本末倒置了。因為他所提的一中憲法等等主張對我來說，完全都不重要，但他所提倡的和中治國，與連戰所謂的「聯共治台（獨）」則是相同的，恐怕都有出賣台灣的效果。

其實在冷戰時代，美蘇軍事對峙，雙方擁有的武器都足以毀滅對方一百次以上，如果一不小心，極有可能造成對方滅亡。而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仍有許多美國人在蘇聯從商，因此雙方常常進行不同模式的溝通，用以化解不必要的誤解，如美蘇熱線就是一個好的例子。所以要我們跟中共談當然可以，但是主權問題必然要堅持到底。



此頁空白

民主的包容，進步的取向

謝長廷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陳儀深教授

紀錄：簡佳慧

時間：2013年5月9日 9:30 - 12:00

地點：台北市民生西路（長工辦公室）

謝長廷，1946生於台北市雙連「打鐵街」，父親是中醫師。熱衷體操的謝長廷曾拿過全國中學運動會體操金牌，後來棄武就文，考進台大法律系。1971年考取日本獎學金，公費留學京都大學。因父親病重中斷學業回台，成為平民法律服務中心志願服務律師。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出任辯護律師。80年代投身政治，1986年9月28日於圓山飯店組黨時，提出「民主進步黨」黨名。參選公職從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到高雄市長，六年市長任內整治愛河、興建捷運、改善水質，第二任市長任內被任命為行政院長。

從打鐵街到京都大學

我出生在台北雙連地區，以前叫作「打鐵街」，廣義來說就是大稻埕一帶。我父親當年在民生西路、承德路口，現在我的辦公室對面開業當中醫師，現在那間房子還是中藥房，但已經改了名字。我小學念日新國小，中學就讀成功中學初中部實驗班。因為我初中就參加體操隊，所以也被編進實驗班。那時實驗班是直升，因為只教生活教育，沒有一般的課程，要參加聯考也不大可能，如果不能直升就是留級，所以我是留級生。後來我以同等學歷去考高中職校，當時叫「省立北商」（現在的台北商專），學校就在成功中學旁邊。到了高職三年級，我還是熱衷體操，曾拿過全國中學運動會體操單項金牌，總分是銀牌，也參加過省運。

當時有人要推薦保送我到師大，我那時候很迷體操，還向日本大使館借了「羅馬奧運」電影來看，內容描述日本體操選手小野橋在1960年參加奧運的訓練過程。看完之後，才知道台灣的訓練設備與訓練過程與國際水準相差太遠，根本不可能奪牌，於是放棄選手夢想。後來「棄武就文」改考大學。我的運氣很好，考上台大法律系。其實這不是我的第一志願，我當時的第一志願是商學系，因為我原本念的是北商。在當時台大商學系的大學聯考分數最高，雖然也有一度法律系是最高分。

我讀台大法律系三年級時考上律師；當兵時也考上司法官，同時並考上研究所。在台大法律研究所讀了半年後，1971年我考取公費留學，獲得日本文部省獎學金（那時台灣和日本還有邦交）。我心想很多實務的考試統統都考上了，所以想到日本京都

大學，挑戰比較理論的法哲學。

我當時是公費留學，比起其他留學生，生活過得還不錯。當年日本文部省認為日語要推廣到全世界很難，所以希望世界各國派人來日本學日語，用高額的獎學金吸引各國留學生。因為對象是全世界，必須一視同仁，不能因為是台灣獎金就給得比較少。我記得當時獎學金是每個月五百美元，折合日幣是十五萬元左右。原則是留學四年，但可以延長。我們是最後一批拿日本文部省獎學金的留學生，第二年兩國斷交之後，改為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1972年我才到日本不久，日本和台灣剛好斷交，大家都很不安，互相打探消息，當時的領事館在大阪，大使館則是在東京，看到人家在大阪的領事館排隊，我也跟著去排隊。大家心裡都在想：「沒有邦交以後怎麼辦？」也不知道以後護照、簽證還能不能用。沒想到後來護照的有效期限變成六年，所以我們都開玩笑說：「斷交反而比較好。」因為以前護照效期管制很嚴格，規定要一年一換，留學生在國外如果參加政治活動，都會擔心隔年護照會被註銷，回不了台灣。以前海外為什麼那麼多人回不去台灣？我相信護照問題是主要原因，國民黨政府利用護照管制不給他們延期。

在日本時，我和台灣的政治運動沒有接觸，因為我母親有個弟弟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抓走。當時是在台北市吉林路附近，晚上警備總部的紅車子把他帶走，從此音訊全無。隔了半年，才知道他被關在綠島；當年他只是個工人而已，他的鐵工廠總經理被

檢舉是匪諜，他就被判了十五年。所以在我們那個年代，從小父母就叫我們不要管政治。我到日本留學後，也是計畫回台灣後單純做個律師就好。因此，當年在日本的台獨運動，我都沒有參加。

見證京都大學反骨精神

雖然我在日本留學時期沒有參與政治運動，不過，在京都大學研究所裡面，也有同學是赤軍或激進派。記得剛去日本的第一年，「安保鬥爭」也在那一段時間風起雲湧；學生運動「東大事件」剛結束不久，京都大學的校園內到處都是標語，學生包圍校長要團體交涉、把銅像拉斷……等等。

在日本留學的那幾年，對我以後的思想影響很深。一開始我也覺得學生是在造反，但慢慢觀察，和同學談論之後，我的思想開始轉變。第一，京都大學在日本原本就是比較具有在野精神的學校，因為東京大學很多校友從政，相較之下京都大學比較具有批判色彩，也就是他們說的「反骨精神」。京都大學曾經發生很有名的「瀧川事件」，有一位老師被解雇，結果京都大學很多教授都跟著辭職，這些教授全部轉到一間小的學校——立命館大學，這所大學就成為了名校，這對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衝擊。

此外，雖然我在京都讀書，但我受到東京大學渡邊洋三（1921 - 2006）教授的影響很大，因為渡邊教授雖然很單純談民主，但他是採「人民主義」的立場，從主權在民的角度談，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渡邊教授的著作也很多，我常常看他的書，受他的影響

很大。我回台灣之後，當時也發生東吳大學的「黃爾璇事件」，那時我以為京大事件要重演了，東吳大學的教授可能統統都會請辭。結果大家竟然是去搶黃爾璇留下的職缺，我才發覺，台灣和日本怎麼差那麼多？

除了渡邊教授外，我在京大的指導教授是加藤新平（1912 - 1999），他嚴謹的治學態度讓我印象深刻。他每天晚上九點才離開研究室，害我都不敢離開。我那時剛新婚，很想早點回家看太太，但是看到加藤教授研究室的燈還亮著，我只好繼續待著，直到他的研究室燈熄了，我才出去和老師道別，趕快跑回家去。如果我一個禮拜沒有念書，就不敢看到他，因為他會問：「你現在讀哪一本書？跟誰一起舉辦讀書會？有沒有同學？有沒有跨系的……」，如果隨便回答他說在讀哪本書，他會記起來；萬一是他讀過的，他就會繼續問：「讀到哪裡了？」如果我又回答他，他就會再問：「有什麼感想？」總之，他非常嚴謹，我可能是他最後一個指導學生。後來他退休了，我在博士班時換了一位年輕的老師，他是加藤教授的學生，後來去美國研究。

當時加藤老師對我說過的話產生一些作用，他平常很嚴格，學生都不太敢和他說話，但是他每一年年底會和我們喝酒，喝到很醉時，就會講幾句平常不會講的話。有一次他跟我說，京大事件發生時他還很年輕，為了自保，講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實就是怕死；但是他說，這沒什麼可恥，這是考慮現實問題，所以他沒有參加。第二、他講過：「真正的幸福就是和你的家人、親人、愛人在一起，其他都很抽象，包括正義等等都太過抽象。」

平常加藤老師都在課堂上教我們正義。有一次他還說：「真理就是說服的成功。」他說社會科學只要邏輯很清楚，講到大家沒辦法反駁，你就是真理了；等到人家突然找到破綻，有辦法反駁，你就不是真理了。所以要去說服別人，讓大家都啞口無言時，你說的就是真理了。這些話很務實，他平常都講康德、新康德，講得非常深奧；但是酒一喝，就講自己心裡的話了。

至於做人處事則要歸功於劉旺才老師，他也是日本的律師，在台灣執業。他非常嚴格，思想非常精確。坦白說，現在的年輕人，有時候我聽他們說話毫無邏輯，覺得很可惜。

在日本的新婚生活

我是結婚後先一個人去日本，然後再回來台灣把太太接過去。第一年住在學生宿舍，之後才帶太太住在外面。當時台北市前市長黃啟瑞（1910 - 1976）的兒子黃書璋也在日本，他一邊教中文，一邊在日本皇居附近開了一家「蓬萊餐廳」，我太太因為無聊，就去那裡打工。後來學校放暑假沒事，我也陪她去打工。我太太年輕時長得漂亮，很多警察為了看她來餐廳吃飯。那間餐廳的廚師是以觀光名義在日本停留，廚師上菜時習慣用台灣話喊：「雜菜麵、豬肝麵……」警察聽到了就來查，結果這廚師被驅逐出境。當時餐廳只有一位廚師，沒有其他人可以煮菜，只好由黃書璋的太太、女兒，還有我太太三個人一起輪班，後來他們也拜託我幫忙煮菜，七天內就把廚房的秘訣傳授給我，所以我也

很會炒菜。過了一陣子，餐廳做不下去，也徵不到新員工，他們就問我：「要不要把餐廳頂下來做？」我那時已經在讀博士班，但是日本文科的博士學位很難拿，我就和太太商量：「要留在日本開餐廳？還是回去台灣當律師？」如果我當時留在日本，現在可能是名廚了。後來還是覺得要回台灣，主要是在那裡也沒什麼前途。我們離開之後，他們餐廳也沒有經營了。我們後來再回去京都，發現現在那家餐廳已經變成一家綠藻公司，應該也是黃書璋開的。

投入平民法律服務

1975年我開始準備回台，因為當時我父親得了肝癌。按日本的舊制規定，博士學位很不容易拿到，尤其是京都大學的文法科博士幾乎沒有辦法拿到，東京大學還有一點可能性。以前京都大學認為，博士是人生學問的頂峰，等到六十五歲、七十歲要退休了，才給博士學位，表示你的學問已經到了很高的境界。當時在日本大學要得到教職，只要有老師寫推薦函就可以，所以在各地區他們有各種學閥。學生寫論文，第一章就要引用老師的著作，一看就知道這是哪一個學閥系統的學生。

我那時和博士班的老師說：「我要拿博士學位，如果沒辦法拿到就要回台灣。」因為那時拿到碩士學位還可以回來台灣當講師，我的老師就說：「其實我也沒有博士學位；我的老師也不是博士；我老師的老師也沒有。」那時候和我一樣也是公費留學去

的蔡秋雄學長，他就毅然跑去東京的某個大學，十八年後才拿到博士。後來我遇到他，便問：「到底誰的決定才是正確的？」他說：「你是對的！」我說：「這也很難講。」東京大學的學生比較容易拿到博士學位，因為東大畢業的學生很多都在內閣服務，尤其是外交官代表國家出去，當然希望學歷比較高一點，而來日本的留學生，也是希望回國後擔任官職，以後可以和東大的校友互動，所以東京大學採用這個政策。

1975年我曾經回來一次，探視病重的父親；1976年父親過世，我們就全家搬回來了。那時我還很有熱情，就去參加陳繼盛成立的青年律師會，裡面有一個平民法律服務中心，我記得那時的主任是姚嘉文。我在那裡擔任平民志願服務律師，後來也當主任。我們這群青年律師定期有聚會，有時候會請林義雄、姚嘉文來演講。

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算是開始接觸政治實務，不過當時的民主運動，我都沒有參加。一直到1978年台美斷交，當時我還在台北市襄陽路當律師，才開始關心政治。當年陳鼓應和陳婉真在台大設置民主牆，我也有去看、去聽，還有去聽康寧祥演講。

當然青年律師會和政治還是有一段隔閡，我除了當平民法律服務中心主任，也擔任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顧問。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隔年抓了將近六十個人，一個被告如果需要三位辯護律師，至少就要一百多位。以當時的情況，不可能找到那麼多律師。當時服務中心只有三十位律師，也不是每一位都願意擔任辯護律師。坦白說，我那時就知道被告一定會找我幫忙辯護，

我太太跟我說不要介入，包括我的母親也反對。當時我就說：「如果他們沒有來找我，我不會自願去做這份工作；但是如果他們主動來找我，我拒絕的話，將來我這個律師會很難做。」因為人家會說：「強姦案、殺人案、強盜案你都在辦了，為什麼這個美麗島案你不敢辦？就是你怕死嘛！」

加入美麗島辯護律師團

當時是張德銘在統籌美麗島辯護律師的事情，聽說很多人都推薦我，所以來找我的人很多。我因為在平民法律服務中心做事的關係，和姚嘉文有幾面之緣。後來我在仁愛路的事務所看到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推門進來時，我就知道我的命運將會改變，可能影響我整个人生。我決定接下這份工作了後，當然要說服家裡的人，我就跟太太說：「所有會發生問題的，要嘛是選舉；要嘛是助講；要嘛是寫文章，這三件事沒去做，就不會有問題。沒有人因為辯護被抓的。」後來有一天，我太太突然跟我說：「你三件事都做了。」

周清玉來找我之後，我就去替姚嘉文辯護了。幾位辯護律師當中，尤清是留德，我是留日，我們都在陳繼盛那裡聚會研商，我曾經說過：「那是我最懷念的一段時光，那時候不會有人懷疑你有什麼動機。」因為我留學日本時讀過戰後日本的審判經驗，所以我就提出要用「事件辯護」的方式打這場官司，不要以「個人辯護」。若採用「個人辯護」，被告會說：「我又沒有喊打，

沒有喊衝，我那時坐在那裡沒講話。」這樣被告彼此間一定會發生矛盾。我們當時有一個共識，在法庭受審判的是黨外民主運動，我們是在為這個民主運動辯護，後來大家也採取這樣的態度去辯護。

這次辯護有幾個成功的地方，一個是當時採公開審判，主要是蔣經國有把握，認為被告最後都會自白承認錯誤，因為不認罪的話是唯一死刑。果然，剛開始每一個人都有一份自白書，我們也很驚訝，這些平常在演講台上很勇敢的英雄為什麼會寫自白書？上面還有簽名。我們去閱卷，上面的確是當事人的親筆簽名。我當時心裡產生了問號，因為我在日本也看過世界各國政治犯的例子，在美麗島事件之前，蘇聯也發生類似的案件，人權組織也譴責這是政治迫害，後來蘇聯公開審判，每一個被告都承認犯錯。當時有人說被告是被刑求，我認為不是傳統觀念的刑求，只是精神虐待，呂秀蓮自己也說是被虐待，把她當小孩子，故意叫她罰站，但是這樣做可以達到刑求的目的。

美麗島受刑人出獄之後，我曾經問過他們當時為什麼會寫自白書？結果沒有人要講，也沒有人願意講。最後只有張溫鷹講，後來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我認為她最坦承。但是在張溫鷹所講述的獄中經歷中，譬如女性監獄的廁所很髒，馬桶穢物溢出來也不幫她處理；在生理期間的時候不讓她休息，大概是這樣而已，不是我們想像的那種刑求、灌水等等。這是很巧妙的心理作用，持續讓你疲勞，讓你絕望，當你想睡覺時把你叫起來，針對人性的弱點，這一點他們很厲害。譬如告訴你，黃信介已經怎麼承認

了，或是告訴你：「馬上要回去了，別人都在等你，這個簽一下就好。」所以這些黨外的英雄都不願意提到自己的人性弱點被利用了。

我們那時就覺得，他們可能沒辦法否認自己簽的自白書。我們去看被告的時候，就把很多意見寫在卷宗上，並在卷宗上面寫著「其他被告統統否認」讓被告知道。最後只有陳菊一個人沒有被通知到，因為陳菊的律師平常沒有和我們一起，那是她親戚聘雇的，所以陳菊當時承認自白，其他被告全都否認。

所以，我認為那時候我有幾項貢獻，我們用事件辯護、否認自白，但是被關在監獄裡面六十幾天的人，怎麼有勇氣否認呢？所以要給他時間，恢復他們的勇氣，但有什麼時間呢？我們後來想到依照法律程序來爭取時間，因為開庭前每一個人要問明身分，譬如問黃信介：「你叫什麼名字？幾月出生？認不認罪？」問完的留在原地，下一個又問同樣的問題，最後帶回去，再一個一個帶出來仔細問，我們趁他們要離開之前，我就站起來說：「法庭，我有一個程序問題。」法官也嚇一跳問：「什麼事？」我說：「他們又不是軍人，怎麼在這裡審判呢？」法官好像覺得我很愚蠢，他說：「戒嚴法嘛！」我說：「什麼戒嚴法？戒嚴法也要有戒嚴令啊！我們什麼時候有戒嚴令了？」一旁的林輝煌，他是中興大學法律系，以預官身分進去的，他寫字條給法官，法官就念給我聽：「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我就回說：「不對，不對，那個東西沒有經過立法院通過……」結果就開始吵了起來。兩邊吵了很久，拖延了許多時間，讓被告有時間恢復勇氣。

因為他們一開始會認為，如果別人承認而自己否認，就是死刑了；甚至覺得自白書都已經寫好，就放棄了，關到底了；如果再否認，就是不知悔改。自白書上通常都是這樣寫「造成社會的混亂、不安，表示歉意……」但是我們在法庭上挑戰戒嚴法，質疑程序問題，讓他們瞭解整體和他人的狀況，慢慢恢復勇氣，後來被告就統統否認自白。後來楊青矗所寫的书裡面也提到這一點，當時《中國時報》有報導，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律師團投入選舉

為「美麗島事件」辯護之後，因為有受刑人家屬投入選舉，所以我們去幫忙助選，但是再一年後的選舉便後繼無人了。由於辯護律師在當時已經創造出知名度，所以情勢就變成辯護律師投入選舉。時間順序是：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周清玉選國代、1981年我們參選市議員。簡單地說，美麗島事件之後，第一批出來參選的是受刑人家屬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然後就是我們幾個美麗島辯護律師出來從政，蘇貞昌、陳水扁、我，尤清則是選監委。張德銘因為不是辯護律師，但是他和姚嘉文關係不錯，所以負責統籌幫家屬找辯護律師，我們也常常開玩笑說他和陳繼盛是藏鏡人，幾乎不曾出面，反而是我們這些人走在前面。

以前沒有黨外政團，1981年的台北市議員選舉時，我、陳水扁、林正杰三個人加上原來的五個人，提出一項共同政見：「黨

外、制衡、進步」，整句話是：「民主靠制衡，有制衡才有進步。」基本上著重制衡的道理，嘲諷萬年國代、嘲諷中央政府。我們那時的演講很受歡迎，所以八個人都當選，大概都是每一個選區的最高票。那時候民眾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民意代表出來，原本台灣的政治重心是在省議會，後來又到立法院，就是康寧祥他們。自從美麗島辯護律師出來參選台北市議員後，政治重心就全都在台北市議會。

構思籌組柔性政黨

當議員之後，因為接受過哲學訓練，我認為理想是要經過實踐。黨外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就是要建黨，美麗島事件之所以那麼多人被抓，就是因為要建黨；《自由中國》的雷震被抓也是因為要建黨。所以我在想：「黨外的目的就是要建黨。但是要怎麼建黨？」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作《黨外黨》，當時很多人都只會講：「雜誌要被查封了！怎麼辦？」「今天雜誌被查封了，哪裡又在抗爭。」沒有人思考長遠下去要做什麼？後來，我讀到林世煜在接受中研院訪談時說，我是第一個跟他提到黨外要怎麼走的人。

我記得我跟他談到黨外就是要組織化，既然沒有辦法立刻建黨，那就把政黨的功能拆開。政黨的功能是什麼？就是提名候選人、研究公共政策、宣傳理念。把這些功能拆開，負責研究政策的就是後來的公政會，宣傳理念就是編聯會，提名就是後援會，

組織就是後援會的分會。雖然這些組織還不是正式的黨，但是只要時機成熟，就可以建黨了，也就是沒有黨名的黨，所以我稱作「黨外黨」。我當時寫的《黨外黨》裡面，說明得很清楚。

坦白講，以前大家都講得很理論和高調。我比較有實踐性，我想到：「提名到底要怎麼提？」以前的做法是康寧祥和費希平幾位前輩推薦就是提名，因為大家相信康寧祥，相信費希平，他們有代表性，所以當時的做法是有它的道理。但是未來的參選提名，我認為應該有一個組織出來，當時我提出的「組織後援會」，是參考日本後援會的概念，因為成立後援會不必強迫大家加入。我的構想是，我和康寧祥、黃天福、尤清，四個人先成立後援會，黨外其他人也可以成立後援會。後援會的概念沒有獨佔性，各行各業都可以。而我們的後援會只拘束我們四個人，我們四個人在這個後援會，就不能再推薦別人，或幫其他後援會的人助選，最後再看人民認同誰推薦的候選人。大家各憑本事，各自發展，這樣都不會衝突。

我的想法是完全柔性政黨的方式。我把這個構想和費希平討論，但他是剛強的個性，他說：「哪有這回事？後援會就只能有一個，別人都不能再組後援會推薦。」他這麼一講，我就知道問題來了。我原本的後援會構想是，我可以成立後援會，你也可以成立後援會，假如我有辦法把黨外所有的公職人員或是學者，統統變成我的後援會成員，大家就知道我才是主流正統的；至於那些山寨的、仿冒的後援會，都沒有關係，選民自己會做判斷。結果費希平認為不行，他要求候選人一定要加入黨外後援會。最後

我只好妥協，照他的意思去推動，我是很有執行力的人。

成立後援會對於現任的公職候選人而言當然是吃虧，原本現任的就有知名度等各方面優勢，結果後援會推薦一個無名小卒之後，等於是兩個人平分資源，所以現任的候選人都反對成立後援會。當時全台各地成立了四個黨外後援會，幾乎都受到現任的公職抵制。當時的新聞報導說：「現任的公職跟後援會是『平行線』、後援會是『小孩玩大刀』，做不起來。」新聞還有評論說：「謝長廷陷入批判的泥沼中。」但是最後我還是做起來了，我也去省議會跟省議員蔡介雄溝通。後來 1983 年的選舉結果，四位現任的立委落選，所以我很不好意思，也結下了一些恩怨。

1983 年增額立委選舉時，黨外才六位立委，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許國泰，現任的幾乎全面落敗，而我台北市的後援會所支持的江鵬堅當選。有人說，因為江鵬堅和我同一個事務所，所以是我私心作祟。其實真的不是，我認為黨外陣營就是要組織化。大家都看得出來，他們因為抵抗組織化所以才落選。因為這次的經驗，後援會的成立變成必然的趨勢，1986 年就是用後援會成立大會的機會建黨的，所以後來證明我們走得方向是對的。但是那時候很多人抵抗，我常常在講：「抵抗啦！阻擋啦！最後都在潮流下崩潰了！」這是很現實的。

黨外路線之爭

1983 年 9 月 9 日編聯會成立，9 月 18 日黨外選舉後援會也

正式成立，1984年5月公政會設立，這些都是原來我規畫柔性政黨的步驟。我既是編聯會，也是公政會，更是後援會的成員，差不多可以說是靈魂人物。我在公政會擔任秘書長，1986年10月10日在台電大樓前的台灣第一場反核運動，就是由我們編聯會幹部發起的。

後來出現很多政黨路線的辯論，也有如何組黨的辯論，有人說要前仆後繼，十個人建黨被抓起來後，再十個上去，五個抓起來再五個。這說法聽起來很悲壯，但我不相信這一套。我認為要在人最多的時候組黨，要抓統統抓，就算被抓起來，只要這個黨名存在一天，每次選舉都用這個黨名，這個黨就會永遠存在。

公政會是1984年成立，設分會則是在1985年年底到1986年之間的建黨前夕。坦白講，那時公政會也是搖搖欲墜，因為國民黨不允許公政會成立，一直要我們解散。依照我的建黨理論，公政會設分會才有地方黨部，但是我那時也擔心編聯會也要設分會，這樣會造成黨外的混亂，因為編聯會的成員一開始是反對公職的，他們認為有「理想的黨外」和「不理想的黨外」。而我的思想是很一貫的，我認為「標準黨外」和「黨外標準」要分開，可以說標準的黨外是哪些人；但不能說黨外標準就是這個標準，所以我提出「民主的包容，進步的取向」的口號。我認為黨外就是要包容，黨外標準要寬廣。以利益派來講，只要對方認同就可以進來，但是如果這些人要來競選黨主席，標準就不一樣了，我主張「標準黨外」和「黨外標準」要放寬。

那時黨外明日之星票選，我都是第一名，我不僅是公政會的

秘書長，也是編聯會的成員，我一直力持要包容，不然黨外會很危險。因為我看到歷史上民眾黨、文化協會的例子，最後都是各個被擊破。所以我認為建黨之後要更包容，理想派要去包容現實派，這樣等於也是在保護自己。

所謂的「雞兔同籠」問題，一開始是有些黨外人士不信任公職，他們反對公職，就好像現在有些人講「拒絕投票」、「杯葛投票」一樣。但是現實就是你不投，別人還是會來選，只要民主繼續運作，永遠會有人來選，所以後來沒辦法，他們就說：「好，不反對公職，但反對公職掛帥」，也就是「當公職可以，但是公職要聽非公職的話，聽黨工的話，黨工要領導公職」。這個說法我不反對，所以我說：「好啊！你們反對公職掛帥，我們就不要掛帥，由你們編聯會來做。」他們後來說不反對公職，但是公職有分：理想的公職和墮落的公職，理想的公職是雞；墮落的公職是兔，現在是雞兔同籠。其實在我看來，這也是他們發展的一種策略。

當時我很小心處理這些問題，但最後也沒辦法，因為大家一直鬥，社會輿論一直捧我和陳水扁，編聯會說我們是理想的公職，批評其他的人是墮落的公職，導致1987年監委選舉的時候決裂了。當時我拒絕投票，因為那時流傳賣票，外面放消息說我們也有拿錢，我說：「那就拒絕投票就好」，反正我們的監委一定選不上，選得上一定是國民黨故意讓給我們的，國民黨如果給我們監委，一定是有條件的。當年林文郎（1945 - ）的姊姊林純子想要參選監察委員，他們就在我的北區發傳單，批評我：「自

命清高、羞辱同志，是民主退步黨」。因為我們沒有投票，很多群眾跑到議會來，罵其他去投票的議員是「豬仔議員」。坦白講，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其實民進黨在建黨之前就醞釀著這股「雞兔同籠」的情結，由於組黨的工作都是我們在主導，所以有一些前輩不服氣，有人就說：「我當了五屆的議員，你才剛來……」光是這個雞兔問題，黨外內部就分了好幾派，原本我和陳水扁、林正杰被歸類是雞派（理想的公職），後來剩下我和陳水扁；之後陳水扁因蓬萊島案被判刑入獄，剩下我一個人，接著進來一個顏錦福。

體制改革與改革體制路線之爭

1982年我從美國回來後，就瞭解建黨一事將面臨海外的競爭。當時邱垂亮認為台灣群眾運動或是民主運動遠遠落後於海外的同鄉運動。海外台灣同鄉有些優勢：第一、知識水平較高，很多台灣同鄉都是博士；第二、有資源，大家在國外經濟條件較好，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苦哈哈；第三、他們有路線，有理想，他們主張要建國，而台灣的黨外只是民主化運動。

當時我覺得如果建黨工作和海外的獨立運動掛勾在一起，會分不清楚，這對在台灣的建黨工作會非常危險，甚至沒有辦法成功。我們如果接受海外的領導，和他們無法切割，一定會被國民黨抹黑栽贓。我曾講台獨這個概念，廣義來講，每一個人都是台獨。我不是和台獨劃清界線，是和革命團體劃清界線。那時我做



1985年第五屆台北市議員選舉時的謝長廷先生。(謝長廷辦公室提供)



1986年參選增額立委選的謝長廷先生。(謝長廷辦公室提供)

了一個比喻，我們是要整修房子，不是要拆房子，但是很多人認為是要拆房子。所謂的「改革體制」和「體制改革」是不同的，如果照「改革體制」的路線進行，建黨可以成功，但是必須和海外的革命團體劃分清楚。

因為我們那時知識、金錢、路線都不如海外台僑，他們一定會主導我們，的確也有些人就被主導了，所以我才聲明我們是整修房子，是改革，不是革命。當時我也被嚴厲批評，如林正杰、新潮流班底的台獨革命團體就批判我，強調要走群眾路線。那時我也寫了一篇〈制衡路線的再肯定〉的文章，主張我們一開始出來要制衡，制衡當然包括群眾運動，但這是體制內的，和革命不一樣。

那時大家私下討論的時候，也搞不清楚到底要怎麼建黨。有人提出「階段論」，說是先群眾，再群眾風起；另一種是「遞補論」，一開始用合法的，等到這個體制千瘡百孔爛掉了，再把它推翻。我認為這些都不切實際，都沒有好好想清楚。我認為要革命可以，但革命有幾個條件。革命就是一個民族或社會的自衛，但革命要考慮會不會成功？成功之後有沒有辦法繼續維持？不能只成功兩天就被打倒了，這樣怎麼成功？再來，要付出多大代價？這三個條件想好之後，我們再來革命。

當時我們內部也有非正式的辯論，我認為都很不成熟，只是感情用事，主要是台灣人的「不甘願」，不願意認同現有的這個體制，但是沒有人仔細思考過。那時海外的運動團體，無論是史明或是《台灣青年》，他們比較有理論基礎，但是我認為那種主

張不太可能在台灣實踐，而且和我的想法是有矛盾的，所以覺得，必須先把這部分劃分清楚，才有辦法做事。

因為國民黨一直在宣傳「三合一敵人」，如果被他們抓到我們和台獨革命團體有聯繫，或是有金錢的往來，台灣島內的黨外統統會垮掉。因為海外團體也有在訓練，不過我們不知道在訓練什麼？後來說是「非暴力」的和平運動；再者，他們有資金，的確也有很多年輕人去接受捐款，再回來島內。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公開講清楚：任何個人去和他們接觸，都和我們沒關係。這樣我們的建黨工作才不會受到波及。

當然，如果我們推動改革或是民主體制，反而鞏固了國民黨的政權，那我們都是罪人，這也是我說過的話，但總是要嘗試。這些都是後驗的，將來有一天，也許會被認為是罪人，「當時革命就好了!？」但是後來我們有執政啊！至於這個執政機會沒有辦法維持或運用，那是其他因素的問題。

民進黨建黨十人小組

我們大概在 1985 年就開始要推動建黨計畫。1985 年底時，應該是在費希平家的聚會，談到準備組黨。現在的政黨政治大家普遍覺得很正常，但是當時我們是從無到有。我們參考國外許多政黨的形式，思考到底要建立什麼形式的黨？有哪些人要來參與建黨？要以什麼方法來建黨？當時我主張愈多人一起來建黨是最好，人愈多愈安全。因為從歷史經驗來看，我認為所謂菁英秘密

是行不通的。如果是秘密進行組黨的話，完全沒有人知道我們正在做什麼，假設突然發生意外，外界會有很多說法。但如果公開說明我們就是要建黨，在外面發生事情或是被攻擊，社會輿論也會說是國民黨造成的，所以我認為要公開建黨。

雖然建黨是公開的，但是這個建黨小組必須秘密進行。不能突然大家公開宣布建黨，一定是私底下先聚集一些人討論，討論哪一天要建黨，或是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建黨，不能不事先討論就突然宣布說要建黨。所以開始的時候一定有一個籌備階段，而這個階段必須是秘密進行的。但是 1985 年底的聚會時，我們發現已經有情資洩漏出去，我們也利用情治單位來探尋國民黨已經掌握多少，所以當時沒有繼續開會，直到 1986 年才開始新的小組聚會。

在 1986 年初開始推動建黨的時候，我們在費希平家中以及松江路 29 號我的服務處二樓聚會，也找了大概八、九個人來參加研究。我們當時在門口貼一張公告說「今天休假，服務暫停」。我們那時候連絡都不能打電話，而是一個人一個人用口頭講的。但是我們在第二次聚會的時候，就發現有情治人員在問，因為情治單位跟我們接觸也是公開的事情，甚至議會有認識的人也都在問我們組黨或是起草黨綱的事，所以我們就知道聚會的事有人洩露出去了。因此，在第二次聚會結束之後，就通知當天參加聚會的人說：「現在不計畫建黨，時機還沒有成熟。」

不久，大概二、三個月後，我們另外再找人來參加組黨會議。我們找了十個人。以幾個常常見面的人，例如我、尤清、費希平

幾個人發起，不是很正式的組織，只是聚在一起重新討論組黨的事。事實上，因為本來就有公政會，這是有組織的好處，如果沒有一個組織，想要談組黨的事情馬上就會被抓了。一開始的核心成員中，公政會就有很多位了，費希平一定會找傅正，傅正就會提到黃爾璇，因為兩人在同一個大學當教授，還有我跟尤清。第二次聚會的時候我們就找了周清玉，當時她在社會上的聲望蠻高的。周清玉跟我有關係是因為一起辦《關懷》雜誌。事實上許榮淑的《深根》雜誌也是很有政治力量，但是我們沒有找編聯會的成員。因為許榮淑在支持編聯會，所以她跟周清玉也有一點競爭關係，後來我們就沒有找她。也不是說她不適合，就是很單純地找大家都合得來的人。

那時候聚會地點就在周清玉家，當時姚嘉文因為美麗島案被關在監獄裡面，他有一個辦公室，聚會很方便。所以我們就去他在忠孝東路巷子裡的辦公室聚會。¹ 從那一次以後，就都沒有人在打聽我們組黨的事了，也沒有人知道我們聚會的事，所以我們就繼續開會，每一個禮拜都開會。那時候傅正很謹慎，他一直認為說這樣做會被抓，要把參加的人分成好幾批，第一批被抓還有第二批。不過其實當時已經沒有人了，再去找人就會被特務知道了，所以我們沒有再準備第二批了。我的想法是第一批抓了之後，就不會有第二批了，就好像是有十隻鳥在電線桿上，開槍打了一隻，還剩下幾隻？不可能還有九隻，一定每隻都跑光了。所以我主張組黨一次就要成功，人越多越好。你要第一批被抓之

1. 於周清玉家商談組黨時，在場的有費希平、黃爾璇、尤清、謝長廷、周清玉、江鵬堅、陳菊、傅正，決定以謝長廷提議的民主進步黨為黨名，並同意增加游錫堃與張俊雄。

後再上第二批，那國民黨不會第一批跟第二批一起抓嗎？我認為組黨也不需要以暴虎馮河的方式，我們就從公政會、地方分會，一步步建立起來，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再來改個名字就可以突破了，這是最實在的組黨策略。因為傅正曾經歷過自由中國組黨的過程，他總覺得如果第一批被抓之後，有第二批人就可以繼續組黨。但是在那個時代，國民黨的特務太多了，一件事只要有五個人在一起聚會就很難保密了，更不要說還有第二批，所以我們這十人小組真的很不容易。

編聯會那時候也在準備組黨，也在起草黨綱，編聯會也有這樣講，說他們要組織幾個梯次，前仆後繼投入組黨，但是後來也沒有這麼做。我們十人小組正式開始開會的時候應該是 1986 年的 6 月，我們重新聚會起來。那時候每次的聚會都在討論建黨的策略、黨綱，以及要什麼樣的黨，過程也持續都保密。這個建黨小組真的很可貴，整個過程都沒有人洩密，這點在二十五年後的法庭審理，調查局的幹員也說得很清楚，國安局、調查局事先都不知道組黨小組的情資。

和國民黨鬥智

在建黨前夕，國民黨其實已經對於公正會的存在感到有壓力，甚至想採取行動取締。當時很多學者都表示希望國民黨不要採取行動，那時候張忠棟、胡佛、李鴻禧、楊國樞等四位學者在中間奔波勸導，學術界的沈君山也在黨內外之間試圖溝通。國民

黨當時和黨外溝通的管道也很多，國民黨是以黨領政，所以直接與黨外的公開溝通，是把朝野溝通提升到最高層次。國民黨方面是由梁肅戎負責，梁當時是立法院副院長，也是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我比較不願意跟他溝通，所以黨外這邊的負責人是費希平。費希平在我們公政會中是重要的人物，我們都尊稱他為費老，他也是萬年國會立委的其中一員，跟梁肅戎都住在內湖的宿舍，所以由他們兩位負責雙方的溝通是比較適合的。但是費希平有時候會跟我說某個人比較難講話，想請我一起去開會，所以我也參加過雙方的溝通會議。

代表黨外跟國民黨溝通的成員主要都是公政會的民意代表，我們對國民黨說明自由與民主的精神，成立政黨是憲法規定的人民權利，政黨政治是基本的自由保障，議會政治也是民主的常軌。國民黨的代表則是提出目前是戒嚴時期，一切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最為重要，公政會可以繼續運作，但是要依法登記，分會則不能成立。具體來說，國民黨希望公政會不要成立政黨。依照後來我們看到的資料，當時不管是沈君山、關中、梁肅戎或蕭天讚，主要立場都是如此。

1982年我第二次應美國國務院之邀去美國（第一次訪美是在做平民法律服務時，美國亞洲基金會是平民法律服務的贊助單位，那時平民法律服務是他們的一個支持贊助項目，所以應邀去考察法律服務），是我當選議員以後美國國務院邀請我去，但出國程序非常麻煩。因為那時候我們出國都要警總發給一張出境證才能出去。出發前被說成是要去參加美國國會聽證，因為那年5

月 20 日蔡同榮在美國開聽證會，而我是 19 日出國，國民黨就開始刁難我，後來經過溝通才獲准出境。當時警總說我和蔡同榮有接觸，其實都沒有，當時我真的不認識他。

當時與國民黨的另一個溝通管道就是情治單位，黨外辦的活動，或者是黨外出版的雜誌，常常會被情治單位查封、查禁，所以黨外跟情治單位也常常為此溝通。我們當時從事黨外活動就是要去適應那個時代環境。我們對情治單位其實也是應付周旋，常故意散播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因為不能夠拒絕他們，也不能不讓他們監聽。如果不讓他們監聽，他們就會知道我們還有另一支電話，所以乾脆放任他們監聽。我在創黨那一年前後好幾個月都被調查局跟監，有一個調查局派來跟監我的人名字叫吳子逸，有一次還因此被我抓去警察局。

「抓耙子」事件

前幾年在五都市長選舉提名前，TVBS 連續兩個月用不實的資訊說我當年和情治單位斡旋是「抓耙仔」。後來被我告到法院，當年情治單位的謝育男和高明輝都到法院做證，他們都否認有這回事。調查局也以公文澄清我沒有所謂代號、化名，也沒有領酬勞，一切都是胡說八道。

2011 年，我利用一件民事案件，要求高明輝和謝育男到法院去作證，本來高明輝拒絕，說他忘記了；謝育男有來作證，但避重就輕，後來我公布錄音帶，他才說實話。因為 2008 年我總

統大選落選那一年，4月中旬時，謝育男透過一位議員連繫到我仁愛路的辦公室，表示有一份雜誌報導說我是線民，他希望來向我道歉致意。我們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了，不無感慨。謝育男當時講得很感性，我用手機把他的話錄起來，其實只錄一點點而已，但我在法庭放那一段給他聽，他後來就講真話了。他在那段錄音裡面講說：「你哪有可能拿錢？你也不讓人家招待。」他又講說：「那時候民進黨已經建黨成功，因為上面要追究組黨這件事，所以我才被調走。」

高明輝很厲害，他到法院作證的時候說：「你看我在地院的筆錄，我沒有講謝長廷有問題啊！我只是說謝長廷和我們局裡有工作關係。」我說：「什麼叫工作關係？」高明輝說：「我們在監控的對象，也叫工作關係。」照他這樣說，所有主張台獨而被監控的，也都和他有工作關係。高明輝真的老練厲害，他竟然可以說工作關係包括被監控的對象。

以「民主進步黨」為黨名

其實「民主進步黨」這個名字不是組黨那一天才出現，我在公政會成立時就曾發想過。當時的內政部長吳伯雄（1939 - ）、法務部長施啟揚一直說要拆公政會的招牌，幫我們和國民黨溝通的學者也很怕，有時半夜會打電話來說要緊急溝通，可能明天就要來拆公政會的招牌。那時候會這麼緊張。主要是他們要阻擋我們設分會，我說：「設分會是我們的權利」，國民黨執政當局要

我們去登記，我說：「不能登記，登記就完蛋了，那就變成社團了！我們是政黨，這就破壞了我們政黨的理論。」但是他們要拆招牌怎麼辦？因為我是秘書長，必須思索對應之道，於是有一次我發問卷給所有的會員讓大家選擇：一、馬上宣布組黨，叫作民主進步黨（這個名字是我那時候想的，為什麼是這個名字？我是想說「民主的包容，進步的取向」）。第二個選項是不組黨，拆掉就算了，大家就解散。有人拿了問卷不敢回，我記得回了幾十封，只有一封是罵我的，說我這一招是推責任給大家；其他的回覆都是贊成組黨。

所以在組黨的前一天，我就認為第二天應該會組黨。先前我們對外都是放假消息，情治單位來問，我們都跟他說：「公政會建黨，時間在各縣市地方分會成立過半以後，就會馬上宣布建黨。」那時候只有三、四個分會，台北市就有兩個，高雄一個，我們這樣講，情治單位也都這樣往上呈報。他們也認為不可能，因為地方分會超過一半，最快也是選後的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不可能等到選後，第一，到時候分會統統會被掌控；第二，只有後援會要提名那一天，大家最勇敢，因為我們都是選舉的時候最勇敢，罵蔣經國，罵什麼都敢，所以在後援會提名大會那天宣布建黨，大家也都同意。於是，前一天我們就緊鑼密鼓展開籌備、分工，我和尤清負責提案，游錫堃負責主持後援會提名大會。

成立民主進步黨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齊聚在圓山飯店。會議一開始，原本是後援會的提名大會，我突然提案說：「我們黨外的悲願就是要建黨……」這段文字是我和尤清寫的，游錫堃也馬上附合說：「好啊，我是後援會的主席，你們再推一個主席來處理提案」，大家就推舉費希平，因為萬年立委最安全。游錫堃說：「好啦！給你們一個鐘頭。」所以一個小時就建黨了。因為我們後援會報名時，報名單上已經寫說：「如果新黨成立，我願意成為當然黨員」，大家都有簽名。大家心裡可能也是想不一定會建黨，所以就簽了，結果建黨馬上就有一百多個黨員。

提案通過之後，台下有的人就開始落跑了，有的可能是去通風報信，我在那裡冷眼旁觀，裡面情治單位的人開始著急，可能在想：「糟糕，這下事情大了。」費希平在主席台上說：「建黨，建黨，建黨總要有個黨名啊？」有人就提議說：「太匆促了，這不是兒戲啊！要成立一個建黨籌備委員會，我們要先從籌備小組，再研究……」我知道這是要害死我們的，如果成立籌備小組，這些成員明天鐵定都被抓走。後來有人說：「要建黨，哪要再籌備？我們這個後援會改個名字就好了。」於是費希平說：「建黨就建黨嘛！黨名叫什麼咧？」何春木站起來說：「中國民主黨」，黃玉嬌也站起來說：「台灣民主黨」，又說：「下面照我，上面照你」，講黃色笑話雙關語，惹得全場哄堂大笑。

後來我站起來說：「我們的中國結和台灣結，不要在這個關節上發生問題，我們就叫民主進步黨。」費希平問大家：「有沒

有意見？」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朱高正反對，他說：「民主進步黨沒有邏輯，要叫作『進步民主黨』，進步民主黨將來如果分裂，可以分成『進步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左派右派就很清楚了。」我說：「還沒有建黨，你就要準備分裂？」大家笑成一團。費希平就說：「好啦！那就民主進步黨了，有沒有意見？」大家就拍手了，接著就討論等一下要召開記者會，那時候大部分的人比較害怕，所以就點名費希平在內的六個人，六點鐘舉行記者會。

至於為何選在圓山飯店開會，宣布建黨？外界經常猜測是否有什麼特殊意涵？事實上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原本是為了召開後援會成立大會，圓山飯店的空間比較大，而且是用淡江校友會的名義去借的。當初剛借到圓山飯店的場地時並沒有想要建



新潮流雜誌社舉辦的組黨說明會。在台上發言的是（左起）謝長廷、洪奇昌、林正杰。（謝長廷辦公室提供）

黨；後來我們第一次黨員大會是在環亞飯店舉行，也是用淡江校友會名義借的，當時張建邦（1929 - ）常常說：「你們都借用我們的名義」，因為他是淡大的校長。

國民黨的反應

民進黨成立後沒有人敢立刻跟蔣經國講，因為情治單位平常都在吹牛，國民黨認為一切黨外的情資都在掌握當中。當時的特務太多了，調查局、警總、國安局都有各自的特務在監視黨外，也有專人負責監視立委，或是比較活躍的黨外人士，像我就是謝育男跟我聯絡，我們也須應付周旋。所以國民黨認為他們都能掌握情資，以為佈下天羅地網，就可以掌握到黨外的一舉一動，可是他們想不到被我們用這種方法突破監控。平常情治單位私底下都會來找我們，但是沒有人知道我們在準備建黨，建黨之後他們就消失了。我最近才知道他們都因此被調職，所以後來很恨我，有一部分的人好像因為這樣被丟到研究機構，在他們來講，研究機構就已經算是冷宮了，是沒有前途的。

陳文成案與江南案

1981年台北市議員選舉那一年夏天的時候，陳文成陳屍台大校園，所以一直到12月，陳老爹經常在選舉台上到處哭訴。因為在選舉的時候，比較有人敢出來檢舉不公，曾經有位承包台

大宿舍工程的目擊者出面檢舉，我就請那個人跟陳老爹見面，不過後來沒有下文。我還記得陳文成遇難之後，也有人說陳文成或許是私人原因，和友人在大樓上面約會時，不小心墜樓。因此，這位目擊者出來證實當晚的確有一群人，還有一些車子出現在圖書館大樓附近。不過那個人也沒有說他看到陳文成的臉，而是證實那一段時間有很多車子進來，到底是抬著陳文成的屍體，還是怎樣，就不得而知了，他也沒有看得很清楚。

至於「江南案」，則是美國的孔傑榮不曉得是透過誰的介紹，說我是優秀律師，於是劉宜良（江南，1932 - 1984）的太太就委任我們擔任她民事的律師。因為她只能委任民事官司，不能委任刑事。孔傑榮也來找我，我跟他講了很多台灣的法律相關規定，他說要申請賠償，但是我說：「怎麼賠償？那時候公車撞死一個人，只賠償四十萬元台幣。」他說：「這不是連一條狗都不如？要申請賠償一億元。」我說：「你申請這麼多，我們附帶民事是不需要費用，但是被駁回之後，如果還要再上訴，訴訟費要百分之一；一億就是一百萬，這在台灣行不通。」所以我們只是象徵性地申請賠償（後來是庭外和解）。而且當年我們以民事的律師去旁聽刑事案件，說起來也是特例。

我當時看到很多江南案的檔案，不過很可惜，這些卷宗因為家裡搬來搬去已經不知下落，但是李勝雄他們那裡應該都還有卷宗。我也看到陳啟禮的自白書，他說出很多內情，例如竹聯幫就是國民黨一手養大的。當時陳啟禮就講，國民黨很怕台灣的流氓和海外的留學生結合，所以成立竹聯幫，將來要保護國民黨、保

護蔣家。陳啟禮講得很露骨，那是他的自白，還有錄音，他為了保命，所以說出竹聯幫的來龍去脈。

提出「命運共同體」

1987年我和趙少康那場辯論，讓大家印象深刻。那是民進黨建黨成功幾個月後，趙少康那時候算是國民黨最優秀的明日之星，我跟他辯論台灣的前途問題。因為那是《聯合報》舉辦的，整個輿論對民進黨並不利，我講了幾個基本概念：第一、統獨不是目的，人民的幸福才是目的；第二、民主就是要人民作主，台灣的未來要由人民來決定，不能由別人來決定統一或如何？我一直強調自決的觀念，所以趙少康不斷挑戰我這個主張，尤其是台獨問題，蘇起（1949 - ）也在場提問，他也挑戰我。

另外，我提出「台灣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再三聲明自決就是人民做主，台灣必須國際化。趙少康也是有備而來，他當時就問我中國人的概念，我的回答是：「如果是政治上的中國，我不是；但是血緣的、文化的、歷史的，我承認，我接受。」到今天我都沒有改變，有民調說現在96%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我們其實是排斥政治上的中國人，我們怕變成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但我們並不否認我們是華人，或是我們有血緣上的共源關係。這是我的想法，我看民調也是80%以上贊成。

我在那場辯論中提出自決的觀念，這在當時是很震撼的主張。僅僅在四年前，主張自決是叛亂罪，要判七年，所以我們常

講：「民主自決救台灣」，有人不敢講自決就說：「民主七年救台灣」，表示會被抓去判七年。我講「主權在民」，但趙少康認為「台灣的前途在中國，中國的前途在台灣」，只有國民黨的改革才有前途。我認為人民是第一，應該由人民來決定。趙少康又問我：「你不承認這部憲法，那你回歸哪個憲法？有沒有回歸臨時條款？」我那時候說：「回歸中華民國憲法」，我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揭橥一個憲法的基礎架構和理想，臨時條款是遷就現實，傷害理想，我們應該把現實和理想拉近，不是現實掩蓋理想，所以我的主張是回歸憲法。

其實我們在建黨的過程中，國民黨放話要拆公政會招牌，因此在民進黨建黨前五個月的1986年5月，我們曾經和國民黨有一次正式的溝通。當時公政會派八個人，國民黨也派了八個人，雙方得到四個結論：首先，我們願意遵守憲法，我們請國民黨實施憲法。黨外的訴求就是要遵守憲法，但是有四個條件，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集會結社自由，以及「陳文輝事件」²要公平審判。其實我到現在都保持一致，只是記憶好一點而已。我曾開玩笑說，很多人記憶不好，反而很快樂，所以變成每次講得都很有道理，但忘記我們當年也曾說要遵守憲法。我還記得，當年黨外政團的十二條共同政見，第一條也是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當時我們講得信誓旦旦，可是很多人現在都已經忘

2. 1985年底舉行縣市長和省議員二合一選舉，新竹市長施性忠的太太莊姬美競選省議員，陳文輝幫忙助選，因選票問題發生「新竹滋擾事件」，陳文輝被列為被告通緝，但仍登記競選第11屆縣議員，結果上午登記參選，下午就被新竹地檢處收押，判兩年有期徒刑。1986年初舉行縣議員選舉，陳文輝雖在獄中，仍獲得最高票當選。兩年刑期屆滿後，1987年12月28日由新竹地方法院趙榮仁庭長監誓，正式宣誓就職，創下了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的首例。

記了。

我和趙少康辯論就講這一些，他講了一個概念不錯，他說：「憲法是講國民，你的自決根據什麼？」我說：「根據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他當時說：「憲法是國民，你就是住民。」後來我就發展出事實主權的理論。他的一些說法，現在也站不住腳了。他當時說：「台灣的未來要由十三億人來決定。」這個現在就已經不通了。他也說：「要統一才有未來。」當時我避開，只說：「這要由人民來決定，不是由你來決定的。」現在我也認為兩岸關係是動態發展，不必設限什麼，只要加上和平互利的因素，自然就會往正面的方向發展。

1991年我和章孝嚴在台視的那次辯論，當時他是外交部次長，我是立委。那次辯論主要是加入聯合國的議題，我說：「中華民國在國際沒有辦法存在？」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他當然是為政策辯護，講說中華民國還是和現在一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當我們互相詰問時，我就問他：「有沒有辦法舉出一個國際學者說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你只要講出一個世界的領袖，只要一個，說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有沒有？」他被我問得啞口無言。那時候我曾帶團去聯合國，要求聯合國為台灣開門，我前後去了兩次，有一次呂秀蓮和我一起去。所以我是從現實出發的理想主義者，我都有實踐。當然現在我有一些調整，但調整就是因為實踐之後，知道有些方法要修改，例如我們憲法已經修改，提高變更現狀的門檻，美國也反對變更現狀等。

以憲法保護台灣

我認為從理論來講，台灣經過七次修憲，可以說大家其實也認同現在這部憲法，現狀也包含憲法架構，我們要用這部憲法來守護台灣，將來如果有任何人出賣台灣，自行去和對岸簽訂任何協議都是違憲。今天有任何人可以去協議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嗎？假如憲法存在，這就是違憲；沒有憲法，他什麼都可以做，所以憲法到底是保護我們，還是害死我們？這部憲法最荒唐也只是說代表全中國，但是憲法不會把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我認為台灣應該以憲法來化解對立，用憲法來保護自己，我的想法一直沒變，愛台灣不就是要台灣更安全，人民日子更好過嗎？愛台灣不是要去戰爭，台獨不是要大家過爭戰的苦日子。我認為台獨也是要讓大家幸福，統一也不是要讓台灣被併吞，成為威權統治，而是要讓大家幸福。幸福是主觀的，我和趙少康辯論時也曾講過：「你說統一才幸福，我說瑞士這樣最幸福。」到底誰對？最後應由人民來決定。我們人民經過七次修憲，沒有辦法更改國家名字，表示人民認為這樣是平衡的，這是我的解釋。因為憲法就是政治力量的結晶，修憲就是政治力量的對抗，大家都認為這樣已經差不多了，不要再對抗下去了，所以我主張台灣派要和中華民國派結合。

最近在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開會的前一天晚上，我有個靈感，寫了一首給憲法的「情詩」，就是在講這一段過程：

憲法的綠色呢喃

我還在宣誓大廳等你，你卻忘記曾經來過這裡，
你在我面前信誓旦旦，不背不棄，遵守到底，
我相信宣誓不是兒戲，
你的承諾，我沒忘記。

當初歷史偶然，來到你家裡，有人接納有人辱，
我不在乎別人說我有多壞，更不在乎有人否認我的存在，
但我在乎你的感受，默默接受你的安排：
你嫌我不夠本土，你嘲諷我胖嘟嘟，我一切忍受，任你修整，隨你改造，
一次不夠再一次，五次、六次，到了七次你終於滿意，
我雖已傷痕累累，氣若游絲，但只要你覺得安全幸福，我就心滿意足。

高峰已過，往事只能回味，
你失去政權的心情，我能體會；你胡亂怪罪，我也無悔，
時移勢易，朋友陸續遠離，你也逐漸孤立；在四分五裂的時候，我更不忍離你而去。

我希望你珍惜我們共同奮鬥的修憲結晶，不要自我否定讓他成為棄嬰，
我希望你凝視我們一起努力的民主心血，不要自暴自棄讓

它化為流水，
雖然你有意無意，不時對我的名字嫌棄，我仍然不在意，
因為：
我知道有一天我將保護你；
我知道只有我在才能化解對立；
我知道當你需要時我還在這裡，
那時，你將擁抱著我，破涕為笑，因為你擔心的事情，都
將違憲無效！

我還在宣誓大廳等你，我知道如果忘記我，你也會忘記回
來的路，
我已經等了好久，我願意再等更久，直到你記起我的那一
天。

我還在宣誓大廳等你，你卻忘記曾經來過這裡，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執政不是傳說，你的誓言，我一直放
在心裡。

「你說我太胖，你說要改造我，我就讓你改，你說我胖嘟嘟
要整形，我也讓你整形，一次不夠，兩次，兩次不夠，六次、七
次，你滿意了，你說安全了，你說幸福了，我都沒話說，你還不
認同我的名字，你還計較我的過去。」我以一個擬人化的角度來
看，憲法也有生命，也有感情，也會有委屈。

民進黨政績禁得起檢驗

總體來說，民進黨執政無論是地方或中央都是比較有效率，陳水扁執政時期也是很有效率，但是最後因為貪污的案件坐牢，有人說是政治迫害，有人說是事實，無論如何大家都說他有政績。以我來講，我當高雄市長時至少解決了多年無法解決的水質問題，過去高雄市民都要買水喝，現在高雄市的水是高級淨化水。第二，我整治了高雄河川的污染，我那時候寫一首詩，「在污黑的河川中，找到一滴清水，是我掉下的眼淚」，當時很多人傳頌，所以我努力提高汗水下水道接管率，把愛河、前鎮河弄乾淨。我在任內也讓延宕多年的高雄捷運動工、興建巨蛋，爭取到世界運動會，發包了世運主場館，也做了蓄洪池解決淹水問題；立下很多濕地的典範，現在高雄的溼地是全台灣做得最好的，大概已經有五、六個溼地完成。所以我相信對得起高雄市民的託付，擔任兩屆高雄市長六年內，我把市民抱怨的四大沉疴都解決了。

行政院長雖然我才做十一個月，但我也達成許多目標，做了很多事情，例如八年八百億的治水預算，現在行政院剛執行完，大家還要再追加，說這個政策是對的，但當年他們在立法院杯葛我，整整拖了一年半。那時候我說台北市用三、四百億在治水，全國一年卻只有十億的預算，我認為一年至少要一百億，我做到了。在行政院長任內，我提倡共生，我關懷弱勢，我廢除了計程車的汽車燃料稅，那時候一年要繳兩萬多元的稅，油價又那麼貴，所以現在很多計程車司機還記得我所做的這件事。此外，我

通過退休金可以「攜帶」的規定，以前退休金是看得到，用不到，現在無論在哪裡工作，換工作時退休金帳戶跟著轉，這是我立下的政策。另外，在我任內通過所得稅最低稅賦制，企業再怎麼樣免稅都要繳 10%，在我之前，財團企業不是免稅就是優待，錢都花不完，沒有人敢增稅，我是唯一提出增稅的行政院長，一年為國庫增加兩百億元稅收。此外，我把台電的備用電量由 20% 改為 16%，每年省下四百億，阻止電價上漲。

我也完成高鐵的興建，當時高鐵的「最後一哩路」還需要七十億，國民黨說要讓高鐵變廢鐵，一度要讓高鐵計畫終止。我認為高鐵是台灣的重大建設，不能半途而廢，所以裁示用航發基金的錢補貼高鐵的經費，結果還被移送法辦。後來北檢的不起訴處分書指出，台灣高鐵是國家重要交通建設之一，其能否順利完成，影響台灣西部縱貫交通之順暢及經濟發展甚鉅，也算還我公道。那些當年抗議高鐵的現在不也都在搭乘高鐵？證明我們那時候的眼光是對的。

我在行政院長任內也立下了「社區六星計畫」，國民黨執政後改名為「重點社區計畫」，其實做得很不錯，很多社區都是用那時候的預算發展起來的。我在 2008 年就有提出六個新加坡的「六星計畫」，就是要把台灣改造成六個新加坡，每個區塊都是四百萬人口，分成六個區塊，但是我後來沒有辦法去實踐，國民黨上台後，變成三都，再變成五都，又變成六都，其實都是照那個方向做，只是因為沒有整體的國土規劃，剩下零零碎碎的其餘縣市不知道怎麼進行而已。我當黨主席那一年，民進黨在該年的

立委選舉大勝，成為國會最大黨。我又在中常會提案通過在護照上加註「台灣」，要求我們執政的政府去做，所以現在護照上才有台灣。其實我是實踐而不是空口說白話，我的目標都有做到。我當行政院長時，發現駐外單位的名字太多了，有二十六種名字，有中華旅行社、孫逸仙中心……，我們就全部整理成為「台灣」或「台北」，當然這部分是配合總統的意志和職權指示去做。我的理論是對外用「台灣」，兩岸用「中華民國」，因為兩岸用台灣會被對岸吃掉，變成「中國台灣」，反而不是一邊一國，而是我們就變成地方政府了。我認為用中華民國對方吃不掉，因為有一個歷史的連結，所以在兩岸可用「中華民國」；但是對外要清楚，所以用「台灣」。其實現在的國號依我的理論就是「中華」，「民國」是國體，是REPUBLIC，將來我們只要去想怎麼翻譯「中華」這兩個字就好了，例如音譯為「Chung Hua」，中文則不必修改，如此一來不涉及修憲，也就不會弄得太複雜。



謝長廷先生受訪時專注講話的神情。

運動政黨轉型為議會政黨

民進黨在建黨的第一階段已經和革命團體做了劃分，明確定位我們不是要革命；第二階段，我們給民進黨的定位為運動政黨，在我們執政以後的第三階段，其實民進黨就是一個議會政黨。還沒有執政之前，可以說是運動政黨，後來我認為民進黨就是追求執政的議會政黨。但是曾經執政的政黨如果下台後三次、五次選舉沒有再執政，就有消失的危機，現在我們已經快要八年沒執政，如果 2016 年再沒有執政，就差不多快要消失了，所以政黨執政變成很重要，大家必須要有這個認識。

民間團體當然比較有理想性，所以運動團體是有其貢獻，有時候我們也有感情，因為那是我們走過的路，但是我們民進黨一定要很清楚自己是什麼角色，我們就是要執政，執政一定要在乎人民的感受，要考慮人民的風險、人民的憂慮。我們有理想，但是要跟人民溝通，也要讓人民感受到，我們有智慧和能力去處理風險，這一點很重要。如果說只談理想就好像比較有優越感，那就是要走運動的路線，但是運動的結果會是如何？如果我們不能執政，民進黨會成為一個只是發洩不滿的政黨，只是需要有個反對黨來發洩，卻沒有辦法執政。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如果要執政，第一、要得到人民多數的認同，而且不只要 50%，還要有 60%、70%，才能穩定執政，第二、要得到美國支持，第三、中共要忍受。中共可以不支持，但至少要忍受，我們不用去挑釁對方。運動社團講理念比較容易，其實我也很欽佩運動社團的理念，但是理念要去執行，要去跟人

民溝通。美國也不希望台海狀況不確定，為什麼美國 2012 年會支持國民黨？因為美國支持穩定，支持維持現狀。

所以追求執政不能只考慮中國，也要思考美國的看法，若沒有得到美國支持，也很難選上，選得上也沒辦法穩定執政。現在不是選不上的問題，而是執政之後，有沒有辦法做得好？台灣和美國的關係其實很深，我們台灣許多菁英都是留美的，美國現在不會公開說支持國民黨或支持民進黨，但是已經有個慣例，美國會在選舉時透過傳遞訊息表達他們的看法。例如「憂心蔡英文當選，兩岸會不穩定」，這樣就會影響選舉，因為誰會去支持一個讓兩岸不穩定的人？當然有人說：我們又不是美國的附庸！但如果沒有美國支持，台灣沒辦法單獨應付中國。台灣就是小國，認清這個國際現實就是務實的作為。

回到具體政策上，我認為，一定要把憲政法治確定下來，只要落實憲法，第一，台灣內部比較能夠團結；第二，對岸就沒有辦法挑釁我們是台獨；第三，依照憲法，沒有任何人可以出賣台灣；第四，美國相信現在的憲法很難改，也會認為台灣會安定。所以我還是認為台灣內部要有「憲法共識」最重要。

索引

Carl Schmitt 46

ECFA 183, 184, 265

FAPA →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Gustav Radbruch 40

Lynn Miles 337

Nori → 施明德

San Marino 教會 340

William Gleysteen 397

二劃

《七十年代》337

九二一地震 283, 382, 385

九二共識 248

二二八事件 8, 125, 154, 160, 232, 292, 400

二二八事件平反 149

人民最大黨 324

八一七公報 262

《八十年代》15, 25, 51, 88, 145, 146, 161, 165, 191, 193, 195, 197, 228, 257, 395, 396, 400

十人小組 → 組黨十人小組

十人秘密組黨小組 → 組黨十人小組

十八人小組 → 建黨十八人小組

十八人建黨工作小組 → 建黨十八人小組

十八飛鷹 88

十年政綱 67, 68, 70

三劃

三大聲明 275, 276

三民主義 95, 121, 390

三宅清子 336, 337

上海公報 262

于良騏 320, 321

《大公報》219

《大學雜誌》255, 295, 296, 299

小布希 (George W. Bush) 385

小林直樹 127, 128

小邱工作室 209, 212

四劃

中國人權協會 344

中國比較法學會 → 台灣法學會

中國民主黨 (1960) 13, 14, 18, 106, 371

中國民主黨 (圓山建黨) 18, 441

中國社黨 95, 362

中國青年黨 95, 255, 334, 360, 362

中國國民黨 8, 10, 13-16, 18-26, 29-32, 40, 42, 45-47, 49, 52-54, 63, 66-68, 72-75, 77, 78, 80, 88, 89, 91, 92, 95-97, 101, 102, 106-115, 121, 125, 127, 132-135, 137, 144-147, 149, 153, 155, 167, 175, 179, 181, 182, 191, 194, 198, 202-206, 210, 216, 217, 225, 228, 229, 231, 234, 236, 237, 238,

240-242, 246-250, 254, 255, 261, 265, 267, 270-274, 276-279, 281, 284, 294, 296-299, 301, 304-306, 309, 312-316, 321, 335, 336, 339, 347, 349, 350, 361-363, 365, 369-375, 377, 386, 387, 391, 394-399, 401, 402, 404, 405, 408-411, 415, 428-430, 433, 434, 436-439, 443-446, 452, 455

《中國論壇》130, 131

中華社會民主黨 114, 115

中壢事件 80, 257, 337, 338

五二〇農民運動 110, 111, 206, 209, 210, 259

仁教所 → 仁愛教育實驗所

仁愛教育實驗所 344

六一二事件 259

公共政策研究會 15-17, 21-24, 27, 29, 47-52, 55, 56, 134, 148, 161, 195-198, 257, 346, 347, 369, 370, 374, 402, 425, 428, 435-437, 439, 440, 446

公投法 175, 176, 178

公政會 → 公共政策研究會

《公論報》74

反六輕 90, 91, 377, 378

反共愛國聯盟 395

天安門事件 167

天皇機關說 125

孔傑榮 (Jerome Cohen) 345, 444

尤宏 15, 45, 48

尤清 14-18, 22, 32, 45, 52, 54, 55, 63, 64, 66, 100, 101, 103, 105, 114, 161, 199, 209, 257, 308, 311-314, 317, 364, 371, 373, 397, 398, 403, 409, 421,

- 424, 426, 434, 435, 440, 441
 文化協會 47, 48, 216, 429
 《文星》255, 256, 394
 文崇一 131
 方素敏 12, 82, 85, 86, 372
 毛清芬 338
 毛澤東 139, 167, 180, 271
 王世杰 135
 王正誼 127
 王永慶 377
 王伯琦 123
 王幸男 180
 王拓 163, 164, 307
 王昇 20, 97, 98, 303, 396
 王采玉 127
 王金平 280, 283, 311, 409, 410
 王淑慧 101
- 五劃**
- 世台會 →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239, 397
 加藤新平 417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 47, 392, 396, 401, 406
 卡特 (Jimmy Carter) 400
 司馬文武 25, 26, 51, 164, 193
 史明 432
 台獨聯盟 202, 219
 台獨黨綱 30, 167, 168, 169, 171, 174, 178, 181
 《台灣七色記》232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53, 315-317
 《台灣人權》195
 台灣人權促進會 195, 346
 台灣之音 338, 339
 台灣民主時間表 402
 台灣民主黨 (美國) 107, 202
 台灣民主黨 (圓山建黨) 17, 441
 台灣共識 383
 台灣命運共同體 445
 台灣法學會 130, 380
 《台灣青年》432
 〈台灣前途決議文〉70, 170, 17, 267, 383
 《台灣政論》25, 144, 222, 223, 228, 257, 335, 336, 393-396, 39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41, 112, 148, 254, 275-277, 355, 406
 《台灣教會公報》276
 台灣產經建研社 267
 《台灣與世界》195
 《台灣廣場》320, 321
 台灣憲法草案 137, 138, 240
 台灣獨立聯盟 391
 台灣關係法 69, 138, 244, 262
 四一七決議文 168, 174, 177, 178, 237, 238
 左舜生 255, 360
 平民法律服務中心 419-421, 437
 〈正常國家決議文〉180, 181, 383
 民主進步黨 8, 13, 14, 17-19, 31, 43, 51, 58, 63, 67-70, 90-92, 104, 106-108, 111-114, 133, 135, 138, 139, 147, 149, 152, 153, 155-157, 161, 164, 168-171, 174-176, 178, 179, 194-203, 205, 206, 209-211, 234-236, 238-241, 244, 247-250, 257, 261, 262, 264, 266, 267, 279-281, 289, 290, 322, 323, 347, 350, 352, 354, 367, 368, 373-375, 383-388, 401, 405-408, 410, 430, 433, 439-443, 445, 446, 448, 451, 452, 454, 455
 《民主路鄉土情》367
 《民主潮》334, 360
 民社黨 → 中國民社黨
 《民進報》174, 201, 202, 208
 民進黨 → 民主進步黨
 《生根》321
 田再庭 56
 田孟淑 74, 332
 田秋堇 12, 90, 96, 299, 335-337
 田朝明 11, 72, 332
 石錫勳 216
- 六劃**
- 乒乓球理論 230
 全斗煥 368, 397
 全國黨外助選團 363
 列寧 149, 167
 地位未定論 173, 176-178, 387
 安克志 (Leonard S. Unger) 400
 安保鬥爭 416
 朴正熙 397
 朱文伯 334, 360
 朱高正 10, 18, 19, 29, 56-58, 95, 97, 98, 100, 108, 109, 116, 199, 210, 211, 322, 406, 407, 409, 442
 朱匯森 45
 江南案 321, 443, 444
 江春男 84, 395, 400
 江蓋世 174
 江鵬堅 10, 17, 47, 50, 150, 170, 201, 205, 234-236, 248, 257, 259, 278, 346, 371, 374, 398, 404, 406, 407, 427
 竹會 61
 竹聯幫 444, 445
 《自由中國》14, 54, 58, 255,

260, 394, 425, 436
《自由台灣》101
《自由時代》28, 149, 150,
161, 162, 195, 197
《自立晚報》49, 55, 131,
344, 345
艾琳達 202, 231, 304, 305,
337

七劃

何春木 58, 312, 441
余政憲 210
余玲雅 205
余陳月瑛 229, 311, 312
余登發 203, 227, 229, 302,
332
吳乃仁 27, 51, 147, 236, 238,
257, 258, 335
吳乃德 12, 15, 48, 51, 161,
166, 258, 335
吳三連 49, 146, 165, 307, 334,
335, 344
吳子逸 438
吳伯雄 439
吳京 64
吳基福 292
吳梓 409, 410
吳祥輝 101, 102, 209
吳榮義 264
呂秀蓮 166, 210, 227, 231,
234, 274, 277, 302, 305, 307,
344, 345, 422, 447
宋心濂 19, 107
宋楚瑜 134, 378
希特勒 40, 42, 44
戒嚴法 15, 20, 45, 52, 220,
398, 423, 424
批康 319, 403
更生團契 → 基督教更生團
契

李亦園 131
李怡 337
李俊毅 180
李敖 66, 329
李添財 376
李勝峰 303
李勝雄 257, 444
李登輝 30, 112, 115, 134, 137,
154, 155, 179, 206, 236, 237,
239, 266, 377, 380
李逸洋 209
李煥 20, 97, 297, 395, 396,
405
李萬居 7, 11, 14, 74-76, 94
李筱峰 164
李璜 255, 360
李錫銀 101
李應元 202
李濟 122
李鍾桂 298
李鴻禧 10, 21, 23, 47, 137,
139, 142, 404, 436
李鎮源 66
沈君山 131, 344, 436, 437
私立復興商工美工科 188-
190
阮大仁 394

八劃

《亞洲人》44, 51, 228, 396,
161
亞洲協會 218, 221, 222
協志會 219
周弘憲 96, 335
周伯倫 195
周柏雅 204, 209
周哲宇 312, 313
周婉窈 335
周清玉 12, 14, 17, 55, 56, 113,

145, 195, 197, 199, 200, 204,
205, 209, 219, 228, 257, 301,
307, 308, 311, 316, 343, 346,
364, 371, 372, 404, 421, 424,
435
周滄淵 248, 257, 312
官來壽 363
宜蘭縣史館 378
東大事件 416
《東華錄》233
林子儀 126
林文雄 127
林水泉 202
林世煜 15, 27, 48, 52, 70, 88,
161, 318-321, 425
林正杰 27, 29, 145, 147-149,
161, 191, 192, 197, 200, 209,
319, 321, 335-337, 402, 424,
430, 432
林永堅 67
林玉体 64, 65
林宅血案 12, 81-84, 86-88,
168, 278, 342, 343, 363, 367
林亞卿 318, 319
林佳龍 170
林洋港 15, 310, 313, 401
林奂均 83-86, 278, 279, 343
林秋滿 10, 198
林紀東 124
林挺生 256
林時機 102, 114
林國正 350
林國華 105, 110, 206-208
林盛豐 376, 377
林彪 139
林義雄 10, 12, 51, 79, 81, 82,
84-86, 90, 222, 224, 225,
228, 229, 231, 248, 277, 299,
301, 302, 343, 345, 362, 363,
367, 368, 375, 383, 420
林嘉誠 96
林樹枝 196, 198
林濁水 15, 27, 31, 45, 46, 48,

52, 70, 84, 87, 145, 148, 167, 174, 180, 201, 208, 238, 256
林聯輝 103
林豐正 63
林鐘雄 48, 393
《「法統」黑面紗》219
《虎落平陽》79, 225
邱垂亮 430
邱垂貞 302
邱連輝 248, 301, 304, 305, 312
邱萬興 10, 14, 18
邱義仁 15, 27, 48, 49, 51, 82, 89, 147-149, 161, 164, 165, 169-171, 173, 174, 234, 236, 238, 257-259, 280, 318-321, 323, 335, 337, 374
金融六法 279, 280, 281
長老教會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阿扁 → 陳水扁
青年黨 → 中國青年黨
芮寶公 122

九劃

《前進》→《前進周刊》
《前進周刊》27, 145, 148, 149, 191, 195, 197, 319
姚立明 223
姚雨靜 335
姚嘉文 12, 56, 79, 81, 113, 167, 174, 176-178, 180, 200, 210, 211, 231, 234, 241, 257, 302, 306, 307, 322, 335, 336, 339, 342, 343, 345, 394, 396, 420, 421, 424, 435
威瑪憲法 46, 217
建交公報 170, 262
建黨十八人小組 8, 200, 257, 322, 347, 374, 375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382, 385

施明德 10-12, 30, 56, 136, 165, 170, 177, 210, 228-232, 256, 276, 277, 304, 305, 307, 308, 338, 342, 345, 362, 363
施啟揚 298, 374, 439
《星島日報》394
柔性政黨 16, 48, 49, 173, 258, 425, 426, 428
柯建銘 241
洪奇昌 50, 51, 256, 374
洪昭男 299, 409
洪應灶 124, 126
省政府組織法 364, 365
省縣自治通則 364
紀政 344
美國亞洲協會 218
美國亞洲基金會 437
美濃部達吉 125
《美麗島》→《美麗島雜誌》
美麗島大審 45, 52, 70, 134, 136, 166, 271, 363, 367, 421
美麗島事件 10, 12, 82, 86, 131, 133-135, 142, 145, 148, 151, 160, 161, 163, 166, 167, 177, 190, 200, 210, 230-232, 234, 257, 271, 272, 276, 277, 278, 300, 302, 303, 307, 309, 313, 338, 342, 344, 345, 363, 369, 371, 396, 420, 421, 422, 424, 425
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 → 美麗島大審
美麗島政團 10, 13, 111, 271, 277, 342, 362, 363, 368, 371
美麗島軍法大審 → 美麗島大審
美麗島高雄事件 → 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雜誌》12, 25, 40, 145, 146, 161, 165, 228-230, 257, 271, 276, 302, 303, 304, 339, 342, 362
胡佛 10, 21, 23, 47, 122, 131-133, 135, 369, 436
胡適 7, 255

范振宗 323
范清亮 338
范巽綠 165, 200, 335, 337
軍法看守所 342, 344
《風吹美麗島》229

十劃

剛性政黨 16, 48, 49, 173, 258
唐能理 (Neal Donnelly) 400, 408
《夏潮》163
孫文 121, 122, 135, 350
家博 86, 168
核四 62, 91, 281-284, 384
柴松林 298
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314
桃園中正機場事件 202-205
殷海光 124
《浪淘沙》120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420
海基會 263
班立德 (Mark Pratt) 399, 408
《疾風》257, 303
秘密組黨十人小組 → 組黨十人小組
索拉茲 53
索羅金 (Pitirim A. Sorokin) 42
翁金珠 205, 241
袁頌西 131
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376, 377
郝柏村 237, 240, 377
馬可仕 246, 368
馬永成 241, 349
馬克思 42, 164, 416
馬英九 20, 87, 152, 179, 183, 245, 248, 296, 351, 383, 386,

392
馬偕 254
馬漢寶 220
馬樹禮 20, 401, 402, 404, 405
馬關條約 70, 244
高玉樹 7, 14, 146
高明輝 438, 439
高俊明 276, 277, 312
高雄事件 → 美麗島事件
涂醒哲 256
唯物論 42

十一劃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379
國民黨 → 中國國民黨
國建會 → 國家建設研究會
國家安全法 20, 108
國家建設研究會 391, 393
基督教更生團契 284-286, 288
尉天聰 131
康寧祥 11, 17, 25, 26, 51-53, 70, 77, 89, 114, 145, 161, 163-165, 191, 193, 199, 222, 224, 226, 228, 229, 235, 296-299, 302, 305-307, 309, 318, 335, 336, 364, 374, 393, 394, 396-405, 420, 425-427
康德 69, 116, 418
張川田 363, 364
張系國 394
張忠棟 10, 23, 131, 132, 436
張俊宏 12, 25, 77, 79, 80, 81, 82, 111, 210, 222-226, 228-231, 234, 237, 238, 248, 294-304, 306-309, 311, 313, 323-325, 336, 337, 393-395
張俊雄 17, 270, 286, 288, 289, 371
張春男 226, 311
張振文 39, 40

張曼濤 298
張國龍 64, 65
張紹文 295
張博雅 94
張富忠 88, 200, 211, 256, 304, 336
張富美 219, 397
張貴木 312
張溫鷹 205, 422
張榮豐 184
張德銘 26, 53, 166, 302, 307, 364, 397, 398, 403, 408, 421, 424, 427
張賢東 301, 312
張燦鑾 315, 338, 391
張豐緒 401
張羣 132
《從蘭陽到霧峰：瞧這個省議會》81
御龍園 17, 56
曹啟鴻 352
曹欽榮 155
梁文傑 172, 176
梁肅戎 8, 21-24, 133, 437
梅仲協 123
《深耕》15, 26, 27, 45, 88, 145, 147, 148, 150, 161, 191, 257, 317-321
組黨十人小組 8, 10, 16, 17, 197, 201, 257, 346, 347, 433, 436
莊碩漢 65
許世賢 120, 121
許宗力 126, 137, 138
許信良 11, 27, 30, 46, 79, 80, 107, 146, 164, 165, 167, 170, 194, 202, 203, 227, 229, 230, 248, 261, 294-299, 302, 303, 319, 336, 337, 395, 396
許哲男 105, 106
許國泰 203, 209, 427
許榮淑 10-12, 27, 45, 102, 148, 191, 205, 234, 257, 324, 364, 404, 424, 435

許慶雄 179
連戰 284, 441
郭正亮 168-170, 172, 180
郭吉仁 65, 106, 257, 374
郭佳信神父 340
郭金龍 351
郭雨新 12, 73, 74-77, 79, 96, 97, 120, 216, 222, 224-226, 299, 313, 315, 330-332, 336, 359, 360, 362, 368, 394
郭倍宏 202
郭國基 94
野百合學運 151, 152, 154
釣魚台 172, 380
陳少廷 299, 300, 323
陳文成 12, 191, 443, 444
陳文成基金會 155
陳文茜 48, 258
陳文輝事件 446
陳水扁 11, 30, 31, 63, 70, 136-139, 151, 155, 169-172, 177-180, 182, 200, 237, 238, 241, 248-250, 262, 264, 272-274, 284, 285, 347, 406, 407, 424, 429, 430, 451
陳平景 298
陳永興 238, 321
陳定南 363, 377, 379
陳忠信 163-165, 167-171, 173, 184, 304, 342
陳明汝 126
陳明通 170
陳映真 185
陳唐山 53
陳哲男 311
陳師孟 265
陳婉真 163, 202, 420
陳啟禮 321, 444, 445
陳清泉 196, 198
陳菊 10, 12, 17, 28, 73, 76, 77, 79, 81, 195, 211, 257, 277, 299, 307, 334, 336, 371, 374, 394, 404, 423

陳隆志 240
 陳雲林 152
 陳裕清 296
 陳誠 274, 289
 陳鼓應 163, 164, 167, 295, 296, 304, 307, 420
 陳榮宗 127
 陳繼盛 130, 166, 420, 421, 424
 陳冲 381
 陳滔滔 363
 員山子分洪道 382
 陶百川 21, 23, 54, 55, 82, 132-134, 369
 雪山隧道 382
 章孝嚴 316, 317, 400, 401, 447
 傅文政 301, 312

十二劃

傅正 10, 16-18, 48, 50, 53, 56, 201, 236, 257, 346, 371, 435, 436
 《博觀》 15, 45, 46, 48, 161
 喇叭 → 邱義仁
 彭明敏 53, 123, 261, 316
 彭明敏自救宣言事件 → 彭明敏事件
 彭明敏事件 216, 217
 景美軍法看守所 82, 342, 344
 曾心儀 167
 曾文坡 299
 曾琦 360
 曾蔡美佐 325, 326
 曾繁康 126
 游木溪 358
 游振亮 371
 游錫堃 14, 17, 56, 57, 64, 105, 171, 180, 181, 198, 199, 211, 250, 257, 272, 367, 440, 441

渡邊洋三 416
 費希平 10, 16-18, 23, 29, 48-50, 53, 55-57, 199-201, 322, 364, 368, 371, 373-375, 426, 433-435, 437, 441, 442
 賀端蕃 259, 337
 辜汪會談 170
 《進步》 161
 階段論 432
 集思會 409, 410
 黃天福 302, 364, 408, 424, 426
 黃主文 114
 黃玉嬌 74, 199, 299, 441
 黃石城 27, 45, 317
 黃光平 21, 22, 52, 54
 黃信介 10, 25, 111, 134, 165, 167, 210, 222, 224, 226, 228, 229, 231, 234, 237-239, 248, 300, 302, 309, 323, 345, 362, 363, 393, 396, 422, 423
 黃俊英 348
 黃昭元 137
 黃昭堂 337, 339
 黃昭順 348, 350
 黃書璋 418, 419
 黃啟瑞 418
 黃華 224, 334
 黃越欽 231, 304, 305, 309, 320
 黃雲星 39
 黃順興 226, 360
 黃煌雄 26, 237, 238, 295, 361, 363, 397, 398, 404, 409, 427
 黃嘉光 208, 209
 黃爾璇 10, 17, 23, 28, 34, 48, 50, 53, 55, 56, 113, 175, 201, 210, 257, 259, 371, 404, 417, 435
 黃爾璇事件 417
 黃默 394
 黑名單 202, 203, 316, 317

十三劃

《傳記文學》 120, 256
 圓山大飯店 → 圓山飯店
 圓山組黨 8, 13, 14, 19, 23, 32, 57, 104, 107, 196-198, 272, 322, 367, 369-371, 373, 374, 405, 441, 442
 圓山飯店 7, 19, 28, 57, 104, 107, 198, 272, 322, 373, 405, 441, 442
 愛盟 → 反共愛國聯盟
 《新社會》 161
 新康德 418
 《新路線》 195
 新潮流 → 新潮流系
 《新潮流》 27, 88, 161, 257, 258, 320
 新潮流系 27, 50, 88, 89, 111, 113, 147, 149, 162-164, 170, 178, 241, 256, 257, 374, 403, 432
 《暖流》 161, 396
 楊日然 127
 楊玉宏 40, 42, 43
 楊光武 39
 楊金海 334
 楊青蕪 309, 424
 楊秋興 348, 352
 楊國樞 10, 21, 23, 65, 296, 131-133, 436
 楊碧川 258
 楊選堂 130
 萬年國會 23, 108, 271, 272, 367, 437
 葉俊榮 137
 葉菊蘭 260
 董作賓 122
 解嚴 8, 32, 108, 114, 151, 202, 206, 208, 227, 235, 261, 279, 289, 376
 詹益樺 207
 達賴喇嘛 352

雷震 7, 13, 14, 18, 54, 106,
332, 334, 336, 368, 425
《雷聲》191, 195
鼓山事件 303, 304

十四劃

廖大林 210, 211
廖仁義 88
廖文毅 72
廖泉裕 301
廖福本 311
廖學廣 101
綠色小組 205
《綠色年代》199, 211
綠島人權紀念園區 155
趙少康 114, 115, 445-448
趙綉娃 301, 312
遞補論 432
齊世英 334, 335

十五劃

劉兆玄 381
劉守成 88, 89, 258
劉旺才 418
劉慶瑞 123, 124, 126
劉峯松 66
暴力邊緣論 230
歐秀雄 199, 200
熱比婭 352, 353
編聯會 → 黨外編輯作家聯
誼會
蔣介石 54, 127, 134, 271, 274,
349-351
蔣宋美齡 198
蔣渭水 363, 368
蔣經國 13, 19, 20-23, 26, 32,
52, 54, 55, 97, 106-108, 131-

135, 223, 224, 228, 274, 279,
295, 302, 321-323, 374, 394,
398, 403, 404, 422, 440, 443

蔡丁貴 66
蔡介雄 301, 427
蔡同榮 53, 175, 176, 316, 438
蔡有全 235
蔡明憲 53
蔡阿信 121
蔡秋雄 420
蔡英文 67, 68, 70, 250, 251,
290, 324, 455
蔡滄波 392, 393
蓬萊島案 430
《蓬萊島雜誌》25, 406
調景嶺 220
鄭余鎮 100
鄭南榕 28, 149, 150, 321
鄭欽仁 400
鄧傳楷 97
魯迅 39, 121
魯實先 122

十六劃

《噶瑪蘭周刊》14, 370, 377
憲法一中 383
憲法各表 383
戰爭邊緣論 230
橋頭事件 167, 302
橋頭遊行 227, 229
璞玉專案 65
盧修一 175, 209, 260
蕭天讚 8, 21, 22, 52, 54, 133,
437
蕭裕珍 82, 205, 208, 335, 337
賴勁麟 195, 196
賴茂輝 360
賴晚鐘 310, 311
選罷法 20, 113, 225, 235

錢復 20, 399, 407
駱永家 127

十七劃

戴天球 122, 135
戴振耀 111, 209, 260
聯合國 13, 59, 60, 69, 173,
226, 249, 283, 447
謝三升 362-364, 367, 401,
404
謝育男 438, 439, 443
謝明達 96, 201, 335
謝長廷 14, 16, 17, 22, 23, 31,
32, 48, 50-53, 56, 63, 67, 69,
147, 163, 166, 180, 182, 195,
197, 199, 200, 209, 211, 244,
250, 257, 262, 274, 282, 307,
347, 371, 373, 374, 403, 411,
427, 439
謝雪紅 160
謝聰敏 202, 240
韓忠謨 98, 126

十八劃

簡錫堉 88, 164
轉型正義 31, 154-157, 386
雞兔同籠 29, 51, 88, 89, 147,
148, 321, 429, 430
顏明聖 334
顏錦福 50, 53, 195, 199, 209,
369, 430
魏耀乾 198, 209, 373

十九劃

龐德 (Roscoe Pound) 42
羅文嘉 170

羅馬法 40, 43, 44
羅福全 337
羅錦卿 125
關中 8, 10, 133, 308, 309, 314,
369, 437
關鍵十日 374
《關懷》88, 195, 435
關懷中心 113, 346
霧社事件 232
瀧川事件 416

二十劃

蘆部信喜 126, 128
蘇永欽 172
蘇南成 299
蘇洪月嬌 105, 312, 337
蘇秋鎮 100
蘇貞昌 28, 29, 62, 63, 166,
211, 248, 249, 257, 274, 284,
307, 364, 367, 424
蘇慶黎 394
《議壇縱橫集》360
饒穎奇 114, 408
黨外小妹 → 陳菊
黨外中央選舉後援會 14, 16,
17, 26, 49, 104, 105, 198-
200, 322, 368, 369, 371-373,
426, 427
黨外公政會 → 公共政策研
究會
《黨外公報》195, 196, 198,
201, 204
黨外後援會 → 黨外中央選
舉後援會
黨外新生代 27, 297, 318,
335, 337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 15, 16,
17, 24, 27-29, 47, 49-51, 88,
89, 134, 147-149, 161-163,
167, 174, 198, 256, 257, 346,
347, 374, 402, 425, 427-429,
435, 436

黨外編聯會 → 黨外編輯作
家聯誼會
黨外選舉後援會 → 黨外中
央選舉後援會
黨外黨 16, 425, 426

二十一劃

蘭陽博物館 379
《護法與變法》227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從建黨到執政：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 陳儀深
主訪，林志晟等紀錄 -- 初版，-- 台北市；玉
山社，2013.12

面：公分

ISBN978-986-294-065-5 (平裝)

1. 民主進步黨 2. 台灣政治 3. 訪談

576.334

102022843

從建黨到執政——民進黨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主訪者 / 陳儀深

紀錄 / 林志晟、彭孟濤、簡佳慧、嚴婉玲

發行人 / 魏淑貞

出版者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 106 仁愛路四段 145 號 3 樓之 2

電話 / (02) 27753736

傳真 / (02) 27753776

電子信箱 / tipi395@ms19.hinet.net

網址 / <http://www.tipi.com.tw>

郵政劃撥 / 18599799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編 / 蔡明雲

編輯 / 林邦由

封面設計 / 黃聖文工作室

行銷企劃 / 許家旗

業務行政 / 陳鈞毅

法律顧問 / 魏千峰律師

印刷 / 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 2013 年 12 月

定價 / 新台幣 480 元

本書由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贊助研究

本書第 37、71、93、119、143、159、187、215、269、291、327、357、413 頁之照片，
由邱萬興先生提供。其餘書內照片未標明出處者，皆由主訪者提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耶路撒冷朝聖日記》

文・圖 許書寧

定價：320 元

許書寧，酷愛旅行、畫畫，走訪過二十幾個國家。因為宗教信仰，踏上這塊受到天主祝福，留著蜜與奶的土地，追尋瑪利亞與耶穌行過的足跡。請跟隨著書寧的步伐，重新認識不同於媒體報導的耶路撒冷。你將會發現，這不單只是書寧的信仰之路，更是一趟重新審視自我生命與人生的朝聖之路。



《亞西西的小窮人》

文・圖 許書寧

定價：380 元

給基督穿上衣服，你將看見方濟；剝去方濟身上的衣服，你將看見基督。

聖方濟，一位義大利山城亞西西的布商之子。拋開名利與財富，仿效基督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在實際生活中將福音帶入廣大的人群裡。雖然他的外在看似貧苦，內心卻是富足的。八百年後，一群來自東方的基督徒，心懷對唯一至高美善的愛，踏上了追尋聖方濟的旅程。今天，希望你願意坐下來，與作者一同分享這個跨越時空的生命故事。

就像經濟學者談論經濟發展會認定一個起飛（take off）點一樣，政治學者會把「反對黨的成立」當作政治發展的起飛點，標誌著壟斷性體制進入競爭性體制。那麼，1986年在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突破長期戒嚴下的黨禁，導致1987年解嚴，當然是台灣政治史上「天大地大」的事件；尤其，十四年後民進黨竟能使中國國民黨交出政權，取得總統大位，這個政黨輪替驗證了台灣民主化的真實性。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本書訪談十五位當年參與從黨外、組黨到執政的關鍵人物，透過親歷參與者之口，瞭解台灣在這三十多年間的民主政治發展。這十五位受訪者之中，有些人已經淡出、退出政壇，甚至另立政黨，或頻跑中國，以今日眼光來看，都可能不符合「政治正確」，但是如果平心閱讀他／她們的訪談紀錄，可以發現其當年的重要位置，這就是歷史的態度。



Oral History
of the
DPP



建議分類：台灣政治、口述歷史